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

周士琦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

周士琦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周士琦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ISBN 7－107－12929－5

Ⅰ.周…

Ⅱ.周…

Ⅲ.汉语－语言学－文集

Ⅳ.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0501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55号 邮编：100009）
网址：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3.75 插页：1
字数：350千字 印数：0 001～1 100册
定价：23.60元

前言

本书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的一部有关语言学、文字学的论文选集，读者对象主要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及语言文字工作者。

先父周祖谟先生（1914年11月19日—1995年1月14日），字燕孙，北京市人，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中国音韵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委会副主任，《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汉语大字典》学术顾问，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周先生从1938年起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执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他学识渊博，曾开设的课程有语音学、音韵学、比较训诂学、《说文解字》研究、甲骨文研究，现代汉语、汉语史、语言文学要籍解题等十余门，颇受学生欢迎。治学自出机杼，多有创见，以严谨著称，为文清通简要，终生著述不辍。他虽然以音韵学名家，但在文字、训诂、辞书、目录、版本、校勘、历史、诗词、书法等诸多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著作等身，已刊行者有《广韵校本》《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唐五代韵书集存》《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方言校笺》《尔雅校笺》《问学集》《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洛阳伽蓝记校释》《汉语拼音字母学习法》《汉语词汇讲话》《周祖谟语文论集》等十余部，功力深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学术界所称道

本书由我承乏编选，从周先生的几百篇论文中精选56篇，结为一集，其中大部分论文曾公开发表过，也有一部分论文是首次

公开发表。入选的论文以短篇为主，以普及性、知识性为主，兼顾提高，内容以与语文教学有关者为主，兼顾其他，庶几能全面提高读者的水平。论文的写作年代从40年代起，直至90年代。本书的论文以类相从，大致按总论、语文教学、汉语规范化、语法、词汇（训诂）、方言、辞典、汉字、语音（音韵）、诗歌的顺序编排。论文的内容一仍其旧，未加删改，只做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1) 加题注，标明该文的写作年代、发表日期、发表于何处等等。除个别题注为周先生原文所有之外，绝大多数题注均为编者所加。(2) 加标点，有的论文写于40年代，原文未加书名号，为便于读者披阅，则由我补标。(3) 对原文中与今日要求不符的文字加以改动。如：按新颁布的简化字表的规定将有的“象”字改为“像”；将数目字一、二、三……改为1、2、3……等等。(4) 有些问题需要说明时，在小注上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汉字读音之变化，人名之注释，书籍之版本等等。(5) 对原文的笔误和印刷原件上的误植加以订正。

承蒙人民教育出版社慨允出版本书，邢克斌、谭桂声二位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的编选、标点、注释等不妥之处，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周士琦 1998年12月18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



1980年10月游汉阳琴台



80年代与周士琦在北京大学中关园家中

目　录

汉语发展的历史　1
谈谈古今汉语的几个问题　16
文章与语言　22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26
怎样自学语文　35
怎样学习古典文学　41
怎样学习古代汉语　48
谈治学的方法　55
写作与修辞　65
语文课的教学法问题　69
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　73
关于语言与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问题　84
编写《现代汉语》教材的一些问题　97
汉语规范化的意义　104
普通话的正音问题　107
论普通话的语法规范　115
汉字铅字字形规范化的重要意义　121
关于汉语实词分类的问题　127
划分词类的标准　129
副词和连词　133
关于主语和宾语的问题　142
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宾语和表示处所的状语　149
复句和多重复句　155

词汇和词汇学 168
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 185
汉语语词意义的转变和发展 193
汉语骈列的词语和四声 200
汉语成语概说 207
《尔雅》之作者及其成书之年代 214
书刘熙《释名》后 219
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 223
中国训诂学发展的历史 229
训诂学的继承和发展 247
清代的训诂学 251
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 257
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重要意义 263
词典学 270
“伍记”与《新华字典》 272
中国辞典学发展史 276
近三十年中国语文词典编纂法的发展 281
突出特色和确保质量 288
汉字的产生和发展 291
秦朝统一文字的历史意义 301
许慎《说文解字》及汉字的重要性 307
《说文解字》概论 313
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330
中国文字学发展的历史 361
汉字的优越性 374
古代汉语的字音 379
音韵学的内容及其功用 394

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途径	399
关于研究音韵学的几点希望	402
《广韵》略说	405
我和《广韵》	413
中国古代诗歌的比兴和想象	419
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	427

汉语发展的历史①

一 研究语言历史的重要意义

语言的历史跟民族文化的历史关系极为密切。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总是要在语言中反映出来的。过去研究历史的人不十分注意语言的发展和人民活动之间的关系，而研究语言历史的人又往往忽略了人民活动的历史，因此有些连带的问题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研究语言的历史，一方面要探求语言历史发展的规律，用以说明现代语的现象和发展的趋向，并解决语言在使用上的实际问题；同时也丰富了普通语言学、方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义学的知识。另一方面是根据不同时期语言发展的情况来从文字语言上去理解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活动的历史，包括从生产到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把历史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联系起来。特别是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文学艺术史。所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汉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也极其丰富，这是世界上罕有伦比的。当前研究汉语的历史已经成为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研究汉语历史可凭藉的材料也最多。在历史上，汉族与国内少数民族的交往，与东西方各国的文化交流，都有

①本文为1979年11月应广东语文学会的邀请在华南师范学院所作的讲演的一部分，1988年11月重订。

许多资料可以参考，可是有关汉语历史的各种文献尚未充分利用。我们必须努力，把汉语历史的研究工作积极向前推进，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语言既然是社会的产物，它跟社会的一切变动都有关系。研究语言的历史必须结合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历史进行研究，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语言的发展有其内部的自身规律。研究语言的历史更不要忘记应当从语言的整体出发，因为语言是一个系统，文字、语音、词汇（包括语义）、语法之间都有联系，不能孤立地去研究一方面，而脱离其他有关的方面。另外，语言的发展与修辞和逻辑思维都有密切的关系，修辞手段的多样性和逻辑思维的精确性都对语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必须把门路放宽，不能局限于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我们要给语言历史的研究开拓更广阔的前途。汉语历史的全面研究还处于发轫前进的阶段，有的部门已经有了好的成绩，但还有不少的部门刚刚在开始。这里只能粗疏简单地说明两三个问题，以引发大家从事研究的兴趣。

二　汉语发展的历史基础

根据考古所发现的大量材料，证明远在50万年以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人类。即以新石器时代而论，考古工作者在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都先后发现各种遗存，包括石器、陶器、骨器、兽骨、蚌壳等等。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铲、网坠。陶器有瓮、罐、瓶、盆、鬲、甑、纺轮等等；其中有红陶、黑陶、灰陶、白陶，而且有不少是彩绘的。骨器有骨镞、骨针、鱼钩、鱼叉等等。另外还发现有谷壳、菜籽，晚期还有炼铜渣。在很多遗址中还有不少半穴式的房屋、烧陶器的窑场和公共墓地。由此可见居民已经聚居，农业、渔猎、纺织已经逐渐发达，而且晚期还有了冶铜术。这正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面貌。那时的居民就是中国人民的祖

先。我们的祖先很早很早就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存着，并且创造自己的文化。

汉族既然有极悠久的历史，汉语的起源一定很早。因为语言是人类互相交际的工具，没有语言，社会就不会存在。汉语应当在远古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不过，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的当时人所留下的文字记载是商代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商代相当于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商代的文字已经是相当发达的文字。现在所看到的有文字的遗物大都是殷王般庚以后的东西，也就是商代晚期的东西，约距今三千多年。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就是考察商代的历史和语言的重要材料。我们要追溯汉语最早的情况只能从商代开始。

历史学家根据商代的文化遗存已经确定商代社会是奴隶社会从商代遗址的发掘，我们可以知道商代已有了都城；由地下所发现的生产工具和卜辞的记载，还可以知道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而且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冶铜、陶钧的技术和玉石骨器的雕刻艺术都相当高，并且有了历法和掌史册的史官。

商代的文学记载被保存下来而且数量极大的就是甲骨卜辞。卜辞是当时史官为殷王占卜各种事情的记录。卜辞所记载的事情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文辞也很简短，但也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时语言的大概情况。

甲骨卜辞自从公元1899年被发现以后，七八十年之间相继出土的总共有10万片。在大量的卜辞里，出现的词语很多，语法也并不简单，足见当时的语言已经相当发达。卜辞中的语法结构基本上与后代相同。例如修饰语在被修饰语的前面，主语之后是动词，动词之后是宾语之类，都跟后代一致。有些复杂的句法在卜辞里也出现了，跟后代的书面语言也是基本相同的。在词汇方面，卜辞中所出现的虽然数量不很多，但是汉语词汇中的基本词已经具备。如日、月、南、北、天、帝、春、秋、风、雨、来、往、王、立等等

一直是古今通用的词。从文字、词汇和语法各方面来看，后代的语言文字无疑问与商代的语言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下面的记载：

己巳王卜贞，□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东南西北的次序与现代语相同）

丁酉卜㱿贞，今春王収人五千正（征）土方，受㞢（有）又（祐），三月。

乙酉卜大贞，及兹二月有大雨。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隹（唯）王八祀。

我其巳宾（祀宾），乍（作，通则）帝降若，我勿巳宾，乍帝降不若。

戊辰卜宾贞，登人乎（呼）往伐𢀛方。甲午贞，其令多尹作王寝（寝）。贞日有食。

这些词句跟先秦古书中的文言都很相近。由此可以了解汉语书面语在商代的时候已经奠定了基础。

商代距今只有三四千年，但语言的产生远在有文字之前。据史书所载，商代以前是夏代，夏人和商人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南北地带，推想汉语的发源地就在黄河流域。商代的语言是从史前的语言发展而来的。这种母语可以称之为“原始的汉语”。

商王为周王所灭以后，周代承接了商代的文化，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周人跟商人不是一个部落，这两个部落的语言有哪些方面不同还很难说。不过，周代的铜器文字（金文）跟商代的甲骨文是前后相承的。铜器上的铭文虽然词语古奥，但跟商代卜辞的语法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周原所出的甲骨卜辞更是如此。由此推想，商周两个部落的语言应当比较接近，都跟“原始的汉语”有联系。

周人征服了商人以后，又征服了许多东方的部落。华夏诸族的不断融合，也就促进了部族的形成。从西周到春秋时代（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5世纪）汉族的文化由黄河流域普被到长江流域。随着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汉语也就不断丰富起来。当时虽然

有许多诸侯国家，方言不同，但经过一定时间的分歧，随着政治、经济、商业、交通各方面的发展，自然日趋接近，并且逐渐融合，以形成区域之间的共同语。

在春秋时代（公元前 722—公元前 481）黄河流域的国家统称“诸夏”，诸夏的经济、文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当时是列国争霸的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生产发达，商业兴盛等原因，各地人民的往来剧增，邻近国家的语言会更接近，至少周、郑、曹、许、陈、宋、鲁、卫、齐这一广袤地区有了区域的共同语。这一区域共同语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 481—公元前 221）就发展成为黄河流域以至长江流域的共同语了。这件事实可以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典著作在语法、词汇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证明。这种共同语就是汉代以后发展为全民共同语的基础。

在汉语历史的发展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战国期间古汉语书面语言的规范逐步形成起来。这种书面语言也就是后代“文言”发展的基础。如《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庄子》《战国策》以及《楚辞》等对后代的语言和文学都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些作品和著作各有不同的修辞风格，但语法没有很大的不同，可见当时书面语言已经有比较一致的语法规范。这种规范不是出于人为的，而是以当时的实际语言为根据的。

战国之后，经过秦代的统一，到了汉代，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在西汉时期，由于政治的统一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各地方言在语法方面会更趋于接近，汉族的共同语言应当已开始形成。这在书面上表现得最为清楚，至于各地的口语仍然会保持许多特有的词语，通行在一定的地区之内，语音也差异较大，那只能算是方言了。全民语言自有其一般通用的词汇。汉族全民语言的形成，加强了汉语人民的团结，并促进了汉族文化的发展。汉以后，中国虽然不断受到外族的侵扰，但汉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系统，并且按照自己的内部规律向前发展。

三 汉语历史时期的划分

从商代到现在，汉语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都曾经不断地产生过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的前进和人的思维的发展以及语言内部矛盾的统一有关系。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前进，新的事物不断出现，语言也就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这件事实在词汇和用语的递增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人的思维是受客观的存在而决定的。客观的事物有了发展和变化，人的思维也就随之而有改进，日趋于复杂，同时语言也必然日趋于精密和完善。语法的构词法和造句法随时代而有新的发展就与人的思维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还有，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内部都会有种种不同的矛盾，为了解决矛盾，不能不有所改变。如语音的同化、异化、颚化，词汇的繁衍所给予词法、句法的影响等等，都是语言内部的改变。所以，语言总是不断地在发展，在改进的。

语言的发展当然是相当缓慢的，不会有突然的变革。旧的不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东西逐渐消亡和新的能适应需要而又有活力的东西不断地增加，这是语言发展的规律。汉语也正是如此。不过，汉语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仍然可以根据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比较各个时期的一些特点，会有助于理解汉语发展的规律，辨认汉语发展的趋向，解决历史上各时代与语言有关系的问题。汉语的历史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根据目前我们的理解，可以初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上古时期（公元前771以前）

这一时期包括商代到西周之末。前面已经说过商人的文化比较

一个字可以代替几个字来用。如“侍”字可以通“待”，又可以通“恃”。在形体上，东方各国的文字大都趋于简易，而各有不同，秦人则用繁复的籀文，直到秦始皇灭六国，兼并天下以后，才统一文字。

战国之后，经过秦代的统一，到了汉代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汉族全民语言开始形成。

秦汉这一个阶段里，文字已有了新的发展。秦代统一文字，应用小篆，同时解散篆体的隶书兴起，随之又有草书。文字书写便利，著述也就日多。为了适应记录语言中新起的词汇和适当地减少同音的假借字，又逐渐产生许多新的文字，如增益偏旁之类。随着全民语言的形成，书面语的规范一直向一致的道路发展。就诗文作品的押韵情形来看，大体同于春秋战国时代，但方音随地域而不同。

语言的变迁跟人民的活动是相联系着的。西汉时期的水灾和新莽时候的农民大起义都使得人民流转播迁。这样，在大河的南北，语言就会更进一步地趋于相近，而且有新的发展。

从文字的材料来看，汉代的口语跟史传记载的书面语言已有不同。西汉的诏令和陆贾的《新语》以及《汉书》赵飞燕传中一些直录的语句都表现出当时口语的某些特点。汉代的词汇比春秋战国时代更加丰富，因为通使西域和佛教传入了中国，又增加了一些外来的词语。如师比、珊瑚、駞駝、葡萄、阏氏、浮屠、比丘、沙门、优婆塞等等。在语法方面，如疑问代词宾语的后置（如“莫我知”变为“莫知我”），“是”字做为系词使用等都是以前比较少见的。

（三）中古时期（公元220—588）

这一时期包括魏晋南北朝。在这三百六十多年当中社会的变动极大。首先是东汉末年农民战争连年不息，豪强争夺，干戈云扰，河洛淮颍之间，人民逃散，千里无人烟。其后三国、西晋，又战乱

一个字可以代替几个字来用。如“侍”字可以通“待”，又可以通“恃”。在形体上，东方各国的文字大都趋于简易，而各有不同，秦人则用繁复的籀文，直到秦始皇灭六国，兼并天下以后，才统一文字。

战国之后，经过秦代的统一，到了汉代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汉族全民语言开始形成。

秦汉这一个阶段里，文字已有了新的发展。秦代统一文字，应用小篆，同时解散篆体的隶书兴起，随之又有草书。文字书写便利，著述也就日多。为了适应记录语言中新起的词汇和适当地减少同音的假借字，又逐渐产生许多新的文字，如增益偏旁之类。随着全民语言的形成，书面语的规范一直向一致的道路发展。就诗文作品的押韵情形来看，大体同于春秋战国时代，但方音随地域而不同。

语言的变迁跟人民的活动是相联系着的。西汉时期的水灾和新莽时候的农民大起义都使得人民流转播迁。这样，在大河的南北，语言就会更进一步地趋于相近，而且有新的发展。

从文字的材料来看，汉代的口语跟史传记载的书面语言已有不同。西汉的诏令和陆贾的《新语》以及《汉书》赵飞燕传中一些直录的语句都表现出当时口语的某些特点。汉代的词汇比春秋战国时代更加丰富，因为通使西域和佛教传入了中国，又增加了一些外来的词语。如师比、珊瑚、驼驼、葡萄、阏氏、浮屠、比丘、沙门、优婆塞等等。在语法方面，如疑问代词宾语的后置（如“莫我知”变为“莫知我”），“是”字做为系词使用等都是以前比较少见的。

（三）中古时期（公元220—588）

这一时期包括魏晋南北朝。在这三百六十多年当中社会的变动极大。首先是东汉末年农民战争连年不息，豪强争夺，干戈云扰，河洛淮颍之间，人民逃散，千里无人烟。其后三国、西晋，又战乱

一个字可以代替几个字来用。如“侍”字可以通“待”，又可以通“恃”。在形体上，东方各国的文字大都趋于简易，而各有不同，秦人则用繁复的籀文，直到秦始皇灭六国，兼并天下以后，才统一文字。

战国之后，经过秦代的统一，到了汉代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汉族全民语言开始形成。

秦汉这一个阶段里，文字已有了新的发展。秦代统一文字，应用小篆，同时解散篆体的隶书兴起，随之又有草书。文字书写便利，著述也就日多。为了适应记录语言中新起的词汇和适当地减少同音的假借字，又逐渐产生许多新的文字，如增益偏旁之类。随着全民语言的形成，书面语的规范一直向一致的道路发展。就诗文作品的押韵情形来看，大体同于春秋战国时代，但方音随地域而不同。

语言的变迁跟人民的活动是相联系着的。西汉时期的水灾和新莽时候的农民大起义都使得人民流转播迁。这样，在大河的南北，语言就会更进一步地趋于相近，而且有新的发展。

从文字的材料来看，汉代的口语跟史传记载的书面语言已有不同。西汉的诏令和陆贾的《新语》以及《汉书》赵飞燕传中一些直录的语句都表现出当时口语的某些特点。汉代的词汇比春秋战国时代更加丰富，因为通使西域和佛教传入了中国，又增加了一些外来的词语。如师比、珊瑚、骆驼、葡萄、阏氏、浮屠、比丘、沙门、优婆塞等等。在语法方面，如疑问代词宾语的后置（如“莫我知”变为“莫知我”），“是”字做为系词使用等都是以前比较少见的。

（三）中古时期（公元220—588）

这一时期包括魏晋南北朝。在这三百六十多年当中社会的变动极大。首先是东汉末年农民战争连年不息，豪强争夺，干戈云扰，河洛淮颍之间，人民逃散，千里无人烟。其后三国、西晋，又战乱

不绝。从4世纪到6世纪之末，北方为外族所侵扰，中国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北方汉人的士族和大批流民不断南迁，有的甚至远徙闽广。现在江西、广东的客家人有些就是从4世纪以后由北方迁去的，所以在语音和词汇方面都有其特点。永嘉之乱以后，北方十六国纷争扰攘，人民为战争所胁迫，关洛之民或东去辽东，幽冀之人或西至秦陇，播迁不定。南北朝时，变乱不安，北人或南徙，南人或北移，往来交错，语言不能无变化。这三百多年内正是汉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

从语音上来看，这个时期与汉以前很不相同，而魏晋期间是一大转折。前一时期入声韵与阴声韵关系至密，至魏晋，则与阳声韵相承，韵部的分合也与前一时期不同。前一时期去声字少，魏晋以后则去声转多。到齐梁以后，音韵变化更大。韵有转移，声有分化，声韵系统与前迥异。隋陆法言的《切韵》恰是齐梁至隋初这一期间语音系统的代表。

这一时期内，双音词增加较多。由于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语言中也产生了很多专门词语；特别是受佛教的影响，外来词语也大量增多，这是前一个时期所没有的。

在语法方面，这一个时期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接近口语的文字表现得非常清楚。如代词“伊”“渠”的产生、被动句法的出现等等。接近口语的文字的出现，在书面语的发展上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较重要的作品和著作有南北朝的乐府歌辞、晋《法显行传》、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传译的佛经。

（四）近古时期（公元589—1126）

这一个时期包括隋唐五代和北宋。隋代只有30年之久，中国由分裂而归于统一。唐代是文化极其昌盛的时期，这时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跟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有很多接

触。在语言方面，因为历次农民起义和开凿南北漕运，人民播迁加剧，方言进一步融合，向集中方向发展。惟有闽广距离中原较远，方言变化不大。

在唐代中叶以后，接近口语的作品增多，演唱佛经故事的变文代表了当时北方方言的面貌。佛教宗派的禅师语录代表了南方某些方言的面貌，这时语法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和用语，如“把”字句和“这”“那”“甚么”“恁么”之类。从词汇方面来看，大量的双音词出现，双音词在汉语词汇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且在唐代出现的双音词大部分至今仍然沿用。在语音方面，唐代的科举取士虽然以《切韵》一系韵书为准则，但实际口语的读音跟韵书已经不完全相同。声母有分化，韵母有合并，声韵的分类逐渐由多变少。

五代几十年又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宋朝建立以后，汴梁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宋一百六十多年当中，北方语音变动最大。如浊声母变为清声母，浊音上声字读为去声。韵部减少，入声［-k］，［-t］韵尾趋向于失落，或变为喉部闭塞音［ʔ］。在语法方面，动词的形尾“了”与“着”表示时态的格式已经确立，人称代词复数的词尾也在书面上出现，这些都是特点。

（五）近代（公元1127—1918）

这一个时期包括南宋、金、元、明、清到五四运动之前。北宋末年金人入侵，占领了北方，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与金人对峙一百多年，长江以南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北人流寓到南方的很多，南方语言受北方话的影响，自然会有新的变化。特别是城市中演唱、讲史、说故事的人和“话本”“小说”一类的口语文学作品对语言的发展影响最大。

元明清三代都建都在北京，从金元到明清用北方话写作的文学作品，如杂剧、散曲、戏文、南曲、章回小说等等层出不穷，新的以口语为主的文学语言就有了稳固的基础。这样就促使以北京话为

主的北方普通话成为全民共同语的基础。这种普通话从16世纪至19世纪曾被称为“官话”，通行的区域越来越广。惟吴语、粤语、闽语、客家语等跟官话不同，各有特点，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

汉语在这一个时期内词汇又有增加。从明代中叶西方历算地理科学知识传入以后，直到晚清末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的词语大量出现，汉语的词汇日益丰富起来，音译的外来语和从日本语来的借词很多。

在语音方面，从很早北方与南方就有不同。这一个时期内北方话声母已不分清浊，平声分为两个调类，大部分地区入声已经消失，派入平上去三声。又“林”“深”“心”“三”“南”等字唐以前韵尾收［-m］的逐渐转为收［-n］。在南方，沿长江一带入声字收［-p］的开始转为收［-k］，后来入声韵尾［-k］和［-t］两类变为喉塞音［ʔ］，最终以致消失。阳声韵收［-ng］的，很多地方读为收［-n］。

这一时期，在800年中社会的变动很大。一方面是汉族与入侵的外族的斗争，另一方面是汉族人民与统治者的斗争，最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社会又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语言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改变又有了新的发展。

（六）现代（公元1919以后）

汉语的发展自五四运动以后转入一个新的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自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广泛传播，成为新的文体。以北方话写成的文学作品对汉民族全民共同语的确立起了极大的作用。随着外国文学、哲学和科技著作的大量翻译，在语言里不仅吸取了不少外来的词语，而且语法方面也有了很多变化。在构词法上，应用了许多新的构词成分，如“化”

"性"之类；在句法上，受西文语法的影响，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表达形式。在词义的发展上，旧日的形容词可以兼用为动词，动词兼用为名词。在书面语言里，修饰语已扩展加多，文句的结构变得精密繁复，修辞的手段结合着语法的规律，形式上更加多样化，这些都是很明显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汉语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交际工具，在国际事务中汉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四 汉语在历史上发展的道路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汉语在历史上有其独立发展的道路。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要点：

1. 汉族在历史上不断受到外族的侵扰和压迫，在外族统治之下，汉族人民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在语言方面，汉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并且按照本身的发展规律而发展，外族语言丝毫不能破坏汉语的独立性。在历史上，鲜卑人、氐人、女真人都曾统治过中国的北方，而且都在100年以上，元代蒙古人也占领过整个中国将近100年，清代满人入关又统治了中国二百五六十年，但鲜卑语、氐语、女真语、蒙古语和满语都不能打乱汉语固有的传统，汉语自有其独立性和稳固性，它一直是不断地战胜外来的干扰而发展成为世界上极丰富的语言之一。

2. 语言的发展变化跟人民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战争和商业以及交通等对语言改变的影响尤其大。在中国二三千年的历史当中，战争极为频繁。战争兴起，迫使人民迁转流徙，不同地区的人和睦地居住在一起，互相往来，语音和词汇必然要有改变。另外，在历史不同时期中外族人民往往为战争所裹胁，或被迫迁徙而与汉

人杂居，甚且互通婚姻，共同使用汉语，语音未必切正；但久而久之，世代更迭，在民族融合中，音韵不能没有变异。北齐时颜之推论南北语音时就曾经说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这是势所必然的。惟有地处边鄙，聚族而居，与外界交往较少的，往往累世不变，所以闽、粤、客家多存古语古音。

说到商业和交通，其对语言的影响当更多。如河、洛、淮、济、江、汉诸水以及漕运沟洫相通之处，商贾云集，人民往来，四方辐辏，语言也必然会随着口语的变易而有所改变。

3. 汉语始终是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但在长期封建社会制度之下，并没有能够完全排除方言的分歧。可是通语的势力不断扩展，方言即使暂时分化，随后又向统一的方向发展，这是汉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中国的北方大部地区都是平原，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北方方言就比较接近，逐渐形成以封建帝都所在的方言为基础的区域共同语。历史上，长安、洛阳、汴梁（开封）、大都（北京）都曾经是都城，这些都城又都在北方，所以北方话的发展对南方方言不断发生影响，南方的特殊方言区域也就不断缩小，最后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终于形成。黄河流域是汉语全民语言的发祥地，而普通话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期而形成的。

4. 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汉族使用的书面语言一直是文言。文言本来也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语言是不断发展的，口语有了变化，书面却仍然使用文言，那就与口语有了距离。文言的形式尽管长期仍为文人所使用，但不能阻止口语的词汇和语法形式向文言中渗透。广大人民所需要的更不是文言，而是接近口语的书面语。所以从唐代起民间的作品都倾向于用语体。宋元以后的话本、戏曲和小说几乎都采用据口语而加工的书面语言。这种新的书面语言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白话"。"五四"以后，白话盛行，直到现在，已成为全民一致应用的文体了。由此来看，汉语的书面语言由文言向语体发展，这是必然的趋势。

5. 语言中新词不断产生，旧词逐渐消亡，这是语言词汇发展的共同现象，汉语也是如此。从构词法来说，由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以致复音词在词汇中占绝对优势，这是汉语词汇发展的总的趋势；而且单音词的词义向多义方向发展之后，为求语义的明确起见，也必须利用产生复音词的方法来解决。例如“开”字本身是一个多义词，具有几个意义，在现代语中产生了开发、开展、开动、开拓、开设、开张等等不少的复音词。有了这些复音词，在使用时，要表达的意义就能确定不误。由此来看，词汇的发展跟词义的发展是互相关联着的。

语法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形式在上古时期已经奠定下来，而在表达思想的方式上则一步一步趋于精密。形态的变化比较少，而修饰语或限制语尽量要放在被修饰或被限制的词语之前，词与词之间意义连属的远近就要靠词序的先后来表现；同时，在前后词语有相互制约关系的情况下，或用一定的助词表明其间的关系，如“的”“地”“得”“把”“之”等等。这就是语法发展的主要情况。

至于语音，在上古时期，声母比后代要多，既有单辅音，也有复辅音（cluster)，韵母的元音可能比较少。后来由于声韵调的互相影响，声韵有分化，有合并，韵尾有改变，有消失。由中古以后总的倾向是向系统的简单化发展。现在普通话以北京语音系统为标准，声韵调三方面都是比较整齐而且简单的。各处的方音虽各有其特点，随着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人民往来的增多，教育的普及，差异必将逐渐减少。

汉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不少外来的词语，但始终以意译为主。最初是音译的，末了还是大都为意译所代替。五四运动以后，汉语语体文的语法也受到西方语言语法的一些影响，但也只能是按照汉语自身的发展规律适当地吸收，并不能改变原来的语法体系。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

谈谈古今汉语的几个问题①

一 古今汉语的关系

汉语的历史极其悠久，现在我们通常所称的古代汉语，基本上指的是从周秦时代到明清时代写在书上的文言。文言作为书面上的语言历时久远，但是，因为它是以实际的语言为基础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文体，所以历代一直作为书面语言的形式来使用。这种文言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这跟当时在北方的广大区域内有了共同语，即所谓“雅言”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在北方黄河流域有许多诸侯国，各国的方言有不同，各国间通行的语言则叫做“雅言”。《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孔子读《诗经》、读《书经》和执行赞礼的时候都说普通话。“雅言”是对“方言”来说的。自公元前3世纪之后，共同语流行的地区愈加扩大。虽然词汇有发展，但语法的基本结构形式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先秦的著作在后代读起来并非很难懂。加上汉字是一种形体文字，两千多年前从隶书开始，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历代的书籍也都是守着一定的语言规范写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通晓古书的重要原因。今天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继承了古代语言而又有所发展的。

---

①本文为1987年9月应北京市语言学会的邀请在该学会举办的教学语法系列讲座上的讲话。

古往今来，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汉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文化。语言本身有很强的稳固性，虽然历史上中国汉人也曾受过别族的统治，但是汉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融合了其他的语言。清代乾隆时期，很多满族人喜欢读《红楼梦》，八旗子弟也读《五经》《四书》，他们还能写出很好的文言文。汉语是根深蒂固的，无论什么力量也是消灭不了的。

尽管应用汉语的地区辽阔，不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方音和不同的语汇，但用汉字写出来，各地方的人都能互相交流思想。

古今汉语关系极为密切，研究现代汉语的语法，也要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我们要从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研究语法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并进一步研究语法规范在不同的方言里是怎样保持和演变的。

二　书面语跟口语的关系

古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的，即便并列在一起的汉字，也各有各的意思。由于受书写工具的限制，写在书面上的话就要求简明，句子以短的居多。西周以前写作的人往往是史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了诸子百家，读书的人多了，写书的人也多了，写出的东西也逐渐由短句发展为较长的句子，表达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商代的甲骨卜辞，周代的铜器铭文，以及《尚书》，文句都是很短的，但是语法并不简单。《论语》的句子也比较短，可是无论句子多短，语句中的虚词，特别是表示语气的虚词一定要写下来，这样才能使人读得懂。例如《论语·述而》说："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句话中的"于""奚""也""以""之""将"等都是虚词。所以书面语不能脱离口语过远。古代的文言有大量的虚词，如助词、介词、副词、连词、语气词，都用各有当。因此，可

以说掌握古代汉语的虚词，是学好古汉语的一把钥匙。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的。而书面语一旦稳定下来，就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变化很慢，这样书面语与口语的分歧就越来越大。一则是口语中词汇日益增多，单音词在向双音词方向发展，词义也不断有引申。再则语法要向精密的程度发展，定语、状语、补语以及谓语部分的扩展，使句法日趋复杂。书面语的句法也就要随之逐渐有所改变，在不同的时期也必然要吸收口语的形式，包括新词汇，以便更好地表达语意，绝对不能离开口语而发展。因此不同时代的古文，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例如汉代司马迁《史记》的文章跟唐代韩愈的文章两者就不同。我们要分别层次去看待古代的文言。在南北朝时代，流行一种骈体文。它是另外的一种表达形式。文句要求整饬，运用双声、叠韵、平仄、对偶等汉语的一些特点，形成一种特殊的文体，离口语渐远，不能为普通人所接受。

但是，一般文章如史书地志之类还是按旧日所通用书面语写的。晋宋时期的小说和翻译的佛经都趋向于口语化。如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所记“望梅止渴”的故事：“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世说新语·假谲》）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尽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书面语一直守着老文言的遣词造句的惯例，以及仍旧使用着各种文语的虚词，而人民的口头语言却不断有新变化。从南北朝时代的佛经译文，口语书札，到唐代的变文，中间变易很多，而唐代的变文与宋代的平话，又有所不同。这说明人民口语是不断有发展变化的。文言在不断吸收口语的营养的情况下，也屡有变化。所以我说要分别层次来看待古代的文言。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者韩愈的文章就跟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他以古文的形式，表达他那个时代的思想。由于社会发展了，思想复杂了，语句也变长了。前人说韩愈的文章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例如韩愈

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说："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他仍然用的是判断句的老格式："……者……也。"但是语法的附加成分多了，内容复杂了，在他以前的文言文里是不多见的。

加在动词后的"了""着""过"，原来是有实在意义的，后来虚化为表示时态的词尾，而成为现代汉语的样子。

我们现在研究语法，以一般选本的文言文与现代语文做比较，就可以了解到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了。

三　古今语法上的差异

要说明古今语法的差异，可以从语词上的差异和句法结构上的差异两方面来看。在语词上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文言中自有一套虚词，即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几类，总数有几百个。这几类词中，只有少数现在还在使用，如"为""与""而""之"等，其他大都不用了。"而"这个连词很有意思，一篇文章中不用"而"，简直办不到，还不易找到代替它的词。还有"之"，如果写文章不用这个"之"，就得完全改变句式，才能说得顺口。或把单句换成复句，或把短句延展为长句，反而冗赘。古汉语虚词虽然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的位置，古今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也不难以领会这些虚词用在句子里的作用，从上下文的意思也可以转译为现代语。在语词上的差异的另一方面，是词类的活用。名词、形容词用作动词，动词、形容词用作名词等。古代词类活用，是古人书面语表达的一种方法。一方面，文章要写得简明，主要用的是单音词，双音词不多；另一方面，书面语还不能适应口语的发展，所以有词类活用。所谓活用

的词，只是一种词义内涵的扩展，一种表达意念的手段，不是词类不分的混用。以今天对不同性质的词有一定用法的规律来看，古文里有不那么严格的地方，所以说是“活用”。

例如：

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阳。

“都”是名词，用作动词。

亲贤臣，远小人。

“远”是形容词，用作动词。

量入为出。

“入”“出”是动词，用作名词。

将士披坚执锐。

“坚”“锐”是形容词，用作名词。

另外，名词、动词或形容词有表示使动的用法。名词、形容词又有作为动词，表示以为如何的用法，称为意动。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尔欲吴王我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类都是其例。

下面谈谈句法结构上的差异。

在句法结构上，有几种文言特有的形式，在现代汉语里是不那么用的。

(1)“之”字结构，“之”字加在主谓之间。如：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2)“所”字结构。如：

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3)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介词前。如：

吾谁欺，欺天乎？

何由知吾可也？

(4)代词在否定句中置于动词前。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5) 强调宾语，宾语提在动词前，中间加“之”字。

何罪之有?

(6) 介词“以”的宾语往往前置。

夜以继日。

以上所说的都是最普通的情形。文言文作为古代汉语书面语的表现形式似乎很难懂，其实难在古语词的意义上和一些虚词的用法上，而不是在语法上，因为古今语法相去不甚远。文言中有些造句的形式，如句中有表停顿的虚词“者”“也”，或句中有些成分省略，只要多读些，注意定语、状语、补语的习惯用法，并多与现代汉语做一些比较，也就不难理解了。

文章与语言①



语言与文章同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语言是用许多声音表达思想，而文章是以书写的方式来代替语言，所以不同。我们说话的时候，不但在声音语气上可以有情感的表现，而且还可以有手势用以帮助他人的了解，这都不是文章中可以完全称情表现出来的。陆机《文赋》里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正是这个道理。同时在领受者的一方面，文章又不若语言之直接，举凡为文的意旨，词品的虚实及语气的轻重等，都要读者从文字上去体察玩味，终不免又隔一层。因此在效能上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文章虽与语言不同物，然绝不可脱离语言而独立。舍语言而谈文章的"义法"，是舍本逐末的。文章是代表语言的东西，语言就是文章的根源，词藻、格局全是末事。综观古人的文章，其精妙者都是有如说话的，凡是有如说话的文章，也就最生动。甚至于呆板叙事的史传文字，如插入问答语，则见灵活，引人入胜。《史记》即惯用此法。如《信陵君列传》（卷七十七）前后所载的对话几乎过半，所以极见精彩。其他直录口语的也很多。如《周昌传》（卷九十六）述周昌谏高帝废太子事：

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

①本文载于1948年1月17日《申报》（上海）。

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这里把周昌口吃期期的声音都写下来了，极为生动。又如《后汉书》的文字也有不少平易如话的。例如《范滂传》（卷五十七）写滂入狱后王甫鞫讯的话：

君为人臣，不推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

这虽是四言一句，然全是口语，王甫声色俱厉的情景均已表现无遗。据此可知要使文笔灵活清顺，都不能不在实际的语言上多加留意。

相反的，我们看《新唐书》的文章，总觉其中文气不畅的地方太多。所以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内有《新唐书辨》（《文集》卷廿二至廿四），专门攻发其短。例如所举《新唐书·令狐德棻传》云：

高宗常召宰相及宏文馆学士，问：“何修而王？何为而霸？二者孰先？”德棻对曰：“如欲行之，王道为最；而行之难。”高宗曰：“何修而王？若而霸？又当孰先？”对曰：“若用之，王为先；而莫难焉。”帝曰：“今兹何为而霸？”

以此与上面所说的两段相较，自然可以看出宋祁所作是如何的诡异晦涩不合语法了。与前面所举正是相反，这就是文章脱离语言的毛病。

论文体，有文言与语体之分。现在仍有人以为作文言文自有文言文的文法，与语体文接近的口语有不同，文章必以古雅为高。但这仅是一面的看法，如果认清文章要与语言相近的话，自然发现古代的文章除了虚字语词与今语声音有异外，在句法上仍然是说话的语法，设若舍语言而谈文法是错误的。因为语言上的习惯用法就是文法，合乎语言，即合乎文法了。现在的语言都是由周秦传下来的，语言虽与古代不同，语句的排列方式（syntax）尚无大变。如《尚书》及金文之一部分、都不若后世文字之清畅易晓，此乃事所必然，固可不论；然而自春秋时代以后的文章就清楚多了。即如《论语》一书，去今虽已两千余年，今日读来依然可晓，就因为它是根据当时

的鲁语写下来的，不但语词次第严整，就是语言中的语助词也都一一写出，几乎等于说话。足见要与语言相附丽，才能使人明白。

可是历代的文格，颇有变易，有人喜欢取法乎上，学习汉魏的文章，本亦无妨；不过要有所抉择。汉人的文章其艰深者固多，而平浅的也有。文章以达意为主，无贵乎艰深，如《汉书·文帝纪》所载诏书有云：

> 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又《刑法志》载文帝《除肉刑诏》云：

> 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这都是第一等明快的文章。所以刘熙载《艺概》中说："两汉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周书·吕刑》论者以为哀矜恻怛，犹可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然彼文至而实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然而刘氏所谓情至而文生者，即语无不真，倾肺腑以出之，而写成的文句即是语言，自然美妙。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又说："辞达而已矣。"其意未始不如是。

然而齐梁以后骈偶的文章盛行，在文体上诚然是一种大变动。可是名家于讲求声律格调之外，仍然注意笔致的流畅。下至隋唐，作四六文的人便滥用古人成语，广引故事，以衒其博学了。以致文

章与语言隔离，不但叙事不明，而且了无生气。因此直至韩愈倡导复古运动，才逐渐将积习加以扫除。所谓“复古”，是恢复了古人作文章的方法，并非剽袭古人的词句，而摹其形貌。由此文章又走上明畅的途径。韩愈《答李翱书》论文云：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他所说的“气”，就是“气势”的“气”；“言”就是心中“有所欲言”的“言”。而语言之发，皆由气呼造作而成，那就是“气”以载“言”了。且凡人之说话自有一贯的辞气，辞气盛，则言亦盛；辞气顺，则言亦顺。然则为文必与辞气相应，是很明显的事情。以往古文家尽管心知其意，然始终没有说明白。宋代的古文家欧、苏固是能手，也是积渐修养而成的。其功力之深，可以“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可以“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这是由读韩文久，而悟到文章与语言关系所致。

在此并非有意标榜唐宋八家，实在是八家足以代表能依照古人“文”与“言”一贯的方法来作文的。文章里吸收很多当时的词语和新的语法形式。所以自明末茅鹿门、唐荆川以迄清代桐城派的文家，都特重八家，也绝非无故。至于明代李梦阳之复古，为文有如伐木凿石，徒供后人所笑而已。往者章太炎先生早年为文，颇喜摹效秦汉以上文字，文多古字，语多简奥。但是晚年论文，仍以为初学当从八家入手。且其自作如《章氏丛书续编》所收的文章，也都一改故常，变为冲淡雅正了。足见章先生充然有得，从经验中体察出文章的正轨来，是暗与理合的。如此来说，历史上的文格虽变，而文章之美恶在修整之外，首先要看是否与语言相应了。凡与语言不相应的，多半不足为法。

总之，无论作何种文体的文章，流利畅达，有如说话，是第一要义。滞塞生硬，不合语言习惯的，都是不相宜的。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①

一　汉字与汉语联系的情况

汉字是在汉语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发展着的。要理解汉字，对于汉字和汉语的关系不能不有明确的认识。

汉字既然始终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在表现语言方面就不能完全与语言相应合，因而形成种种错综的关系。

（一）字和词不能完全相应

汉字是一个个方块式的字，每一个字都代表语言的一个音节。语言里的词有的是一个音节，就用一个汉字来代表，例如“人”“走”“高”“大”之类；有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的合成词，就要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来代表，每个汉字就是一个构词的语素，例如“人民”“伟大”“工业化”“图书馆”之类。因此，字跟词并不完全相应。有些汉字就相当于语言里的一个词，有些汉字只相当于一个词的语音组织的一部分，甚至于很少单独应用。例如：

崎岖　澎湃　淅沥　逍遥　唠叨　吩咐　徘徊

灿烂　玛瑙　蔷薇　葡萄　柠檬　窟窿　圪垯

这里面每一个字只代表整个词的一个音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词。

①本文写于 1957 年 11 月。载于《问学集》，中华书局 1966 年 1 月出版。

（二）汉字本身不能正确表示语音

汉字当中有一部分是象形字和表意字，如“生、重、育、建、长、奔、齐、逐、析、间、困”之类，固然不能表示出声音来，就是形声字也不能把语音完全明确表示出来。例如“居、固、苦、胡”不都读“古”，“格、客、路、洛”不都读“各”，“功、空、项、江”不都读“工”；“语”从“吾”得声，可是“语”现在不念“吾”，“假借”的“借”从“昔”得声，可是“借”现在不念“昔”，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造成这种事实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种是原来造字的时候声符并不与字音完全一致，只是相近而已；一种是最初造字的时候，声符的读音本来与字音相合，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字音有了改变，于是产生了歧异。由此可见汉字的形声字构成的办法固然很巧妙，可是并不能达到真正表音的作用。还有些形声字从现代书写的形式上已经看不出哪是形旁，哪是声旁，更无从辨出它的声音来了。例如“年”从禾千声，“康”从米庚声，“成”从戊丁声，“舉”从手舆声，“釜”从金父声，“责”从贝朿声，“産”从生彦省声，“疫”从疒役省声。这些字没有专门文字学知识的人就很难知道它是形声字了。由此可见汉字中尽管大部分都是形声字，字形所表现的声音跟字的读音并非都密合无间。

汉字既然不能完全直接表音，一个汉字的读法古今可以有不同，各处的方言也可以有不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读音都可能有差异。例如“歌”，唐以前念꜀ga，现在念꜀ge，“写”唐以前念꜂sia，现在念꜂xie，这就是古今有不同；“南”唐以前念꜁nam，现在广州仍然念꜁nam，可是普通话念 nán，“云”唐以前念꜁riüan，现在厦门话念꜀hun，可是普通话念 yún，这就是方音的不同。因此，要求得语音的统一，就必须认真推广普通话。

（三）口语里的词未必有相应的字来写

汉语的词汇是非常丰富的，但是由于汉字是表意系统的文字，所以有些词只在口语里应用，而无适当的文字可写。例如一连串的东西叫一 dūlu，如说“一 dūlu 葡萄”，“一 dūlu 生花生”。“dūlu”一词一定很早就有了，可是不知道怎样写才更合适（曾经有人写作“嘟噜”）。像这样的词因为受了汉字的限制在书面上没有表现出来的很多。在不同的方言里都有一些口语中特有的词，但往往因为没有恰当的字可写，也就很难在书面里应用。研究语言的人听到一个口语词要把它用汉字记录下来也很困难，因此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到古书里去寻找“本字”。这都表明使用汉字来记载汉语有时不免要受到一些限制。

（四）语言里同样一个词古今字有不同，造成很多的废字

例如“shuàn”是洗的意思，放物在水中摆荡冲洗叫“shuàn”，唐人写作“澤”，现在写作“涮”，“澤”已经成为废字了。又如果子里的坚硬部分叫“hú”，宋人写作“棚”，现在写作“核”（hú），“棚”已经废弃不用了。词有定而字无定，音同而字不同，这是产生古今字的一个原因。

有时语言里的一个词古代怎样说，现在还是那样说，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文字的读音有了改变，于是跟口语的说法就有了距离。例如，我们吃饭用筷子取菜，北方说꜀jia，南方说꜀ga 或꜀go。在汉末服虔《通俗文》里这个词写作“攲”，作“以箸取物”解。但是“攲”这个字按后代韵书的读法它跟“奇数”的“奇”同音，那就跟口语音相差很远了。事实上古人的读音是 giā，并不是 qí，qí 是后来的变音，字音改变了，而口语里跟古语相近，这就造成了语言和文字的分歧。所以现在一般都写作“夹”，而“攲”这样一个字就废弃不用了。

（五）汉字中有大量的同音字，字的应用要随着所表达的语词而变更

例如“榆树”“娱乐”“愉快”“剩余”“愚昧”这些词当中的“榆、娱、愉、余、愚”都是同音字，但在应用上就不能同音代替，因此每一个字都成为一个独立的表音符号，必须一个个地联系语词来学习。汉语的音系并不是十分复杂的，但文字随着语言的发展逐渐增多，以致多到好几万。汉代书籍中应用的文字有一万多，到唐宋时代韵书中所收的字已增加了一倍，到了明清时代，字书中所收的字就多到四万以上。在个别方言区域内使用的方言字还不在内①。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汉语的丰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汉字数目的庞大，不过其中有大量的废去不用的字，现在通常应用的字只有六七千而已。

二　汉字形音义的矛盾现象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对于汉字的性质已经认识得很清楚：汉字是一种表意系统的文字，它虽然很早就走向表音的道路，想尽量跟语音结合，可是没有完全脱离表意的范畴，在形体上既要表音，又要表意，这就是汉字特有的一种性质。形体本来是一种书写的符号，要从形体上显示出来语言的声音和意义，二者兼顾就很难达到好处，同时在形体与声音或意义之间也不免会产生一些分歧和矛盾的现象。这种分歧和矛盾的现象有些通过产生新的形声字而获得解决，有些就存留下来造成使用上的不便。

从汉字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下面一些事实：文字要跟语音相结合是一个总的趋向，原有不标音的字固然往往要为标音字所代替，例如“厤”为“沥”所代替，“凷”为“块”所代替，“害”为

①如广州话的“嘅”“冇”，福州话的“伓”“侕”等。

“轊”所代替等等①。但即使是标音字，也可能在某一个时代因为音符已与实际语音不很相应而另外产生一个新的标音字。例如“煼”字见于汉扬雄《方言》，从火取声，这个字就是“炒菜”的“炒”字。晋代这个字写作“𤒕”（见郭璞《方言注》），到唐代又改写作“㷅”（见慧琳《一切经音义》），都从芻音。从取从芻原来可能跟语音比较接近②，但是后来就相差很远了，所以后代又改写作“炒”。“炒”从火少声，跟꜀chǎo这样一个音就接近得多了。又如“掛”字，古代写作“挂”，现代写作“掛”，“挂”从手圭声，当然不如写作从手卦声更与近代语音切合，所以又产生了“掛”字③。这都表明了文字要尽量跟语音相结合的总的趋向。在汉字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新字出现，用新字来代替旧字。这样异体字固然增多了，可是形音之间的矛盾有一部分的字可以获得解决。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汉字不仅要求表音，而且要求表意，于是就要在形体上尽可能地区分词义。要区分词义，文字就不断孳衍，逐渐繁化起来。

语言里一个音常常代表几种不同的意义，为了尽可能把这不同的意义在形体上表现出来，汉字就常常用增加形旁的办法来解决，于是原来的一个字由于增加形旁就繁衍成几个不同的字。例如：“人才”和“木材”，“才”与“材”要写成两个字；“支派”和“四肢”，“支”与“肢”也要写成两个字。

有些词的写法古人最初应用假借的办法借用声音相同的字来

①这几个例子都见于《说文解字》。履石渡水为“砅”，车轴耑为“軎”。

②现代所写的“吵”字在唐人书里写作“謅”，跟“炒”字写作“㷅”相同。现代“謅”音zhōu，例如“胡謅一气”。编者按：“謅”简化作“诌”。

③以前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取“挂”不取“掛”，是因为“挂”字笔画少，便于书写。

写，后来就另外造一个字。有的在原来应用的假借字上加上一个形旁，有的或另外用一个字来代替。例如："价值"的"值"古人原来作"直"，后来加人旁作"值"，"猝然"的"猝"古人原来作"卒"，后来加犬旁作"猝"；"直"跟"卒"都是假借字。又如："疲劳"的"疲"周秦古书里作"罷"，"罷"是一个假借字，汉以后就用"疲"来代替；"早晨"和"早先"的"早"汉以前的古书里很多都作"蚤"，班固的《汉书》仍作"蚤"，"蚤"是一个假借字，后来就用"早"来代替。"值、猝、疲、早"都是后起的字。

还有一些字原来所代表的语词在意义方面有了引申，引申出来的意义由于声音上的改变而成为另外的一个词，于是文字也随着语词的发展分化为两个字。例如："知道"的"知"和"智慧"的"智"最初都写作"知"，后来才产生"智"字；"扇子"的"扇"和"搧动"的"搧"古代都写作"扇"，"搧"是后起的一个字。这种字就是一种"分别字"，都是在原来应用的字上加上一个形旁所构成的。

另外还有一些字原来自有它的本义，可是后来在应用上又去代表其他的词语，而且这种新的用法占了优势，原来它所表示的词的意义反而模糊了，于是也利用增加偏旁的办法为本来所代表的词另外造一个字。例如："止"原来代表的是足趾的"趾"，后来"止"字有了别的用法，于是又造出"趾"字来；"益"原来代表的是满溢的"溢"，后来"益"字有了别的用法，于是又造出"溢"字来。其他如"須鬚""要腰""縣懸""卑箄""暴曝""朝潮""監鑑""新薪""然燃""莫暮""鄉嚮"等等都是这一类的例子①。这种后起的字，文字学上称为"后起本字"。

---

①当然也有不用增加偏旁的办法而另造一个形声字的。例如"獸"字本义为"田狩"，后来"獸"作"禽獸"的"獸"字来用，于是又造一个"狩"字。不过这种例子远没有应用增加偏旁的方法那样广泛。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汉字要在形体上区分词义是相当费事的。要解决形义之间的矛盾，主要的办法就是增加偏旁造成一个新的形声字。文字在书写上是要求简化的，可是汉字在跟语言的关系上又要求与语词的声音和意义相结合，这样在形体的结构上又不能不趋于繁化。简化和繁化是相矛盾的，形体与音义之间也免不了产生矛盾。汉字在解决形音义之间的矛盾时过去只有采取不断创造形声字之一法。这种办法固然可以解决一部分个别的矛盾，但不能根本解决所有的矛盾，因此在汉字发展过程中还存留下不少的形音义矛盾的现象。

这种矛盾的现象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一）同形异音同义

一个字意义相同而读音不同的现象很多。有的是传统的读音就有两种不同的读法，例如："侧"有 cè，zè 两读；"栖"有 qī，xī 两读①。有的是读书音跟口语音有不同，例如："学"读书音是 xué，口语里或说 xiáo（如"学好"）；"摘"读书音是 zhé，口语里或说 zhāi（如"摘一朵花"）②；"尾巴"的"尾"读书音是 wěi，口语里或说 yǐ。有的是同样一个字，做为单词是一个读法，与别的字组成一个词又是一个读法。例如："剥"音 bāo，"剥削""剥夺"的"剥"音 bō；"薄"音 báo，"薄弱""淡薄"的"薄"音 bó。有的是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词里读音不同，例如："模"在"模范"这个词里音 mó，在"模样""模子"里音 mú；"凿"在"凿子"这个词里音 záo，在"穿凿""确凿"里音 zuó③。

① 一个字在一种读法之外还有另外的一种读法，另外的一种读法称为"又音"。

②编者按：现"摘"字已改为统读 zhāi。

③编者按：现"凿"字已改为统读 záo。

（二）同形同音异义

用同一个字代表两个不同意义的同音词，就是前面所说的假借字。汉字当中不少同形同音异义的字，例如：“会”是“会合”的“会”，又是“会不会”的“会”；“升”是“升斗”的“升”，又是“升降”的“升”；“抄”是“略取”的意思，而又是“抄写”的“抄”；“打”是“打击”的“打”，而又是“打水”的“打”。

（三）同形异音异义

汉字中一字数音数义的例子很多。有些单字所代表的语词不是一个语词，因此音义就有不同。例如：“行”音 xíng，是“走”的意思，又音 háng，是“行列”的意思；“盛”音 shèng，是“兴盛”的意思，又音 chéng，是“装纳”的意思。又如“好”音 hǎo，是“好坏”的“好”，又音 hào，是“爱好”的“好”；“创”音 chuāng，是“创伤”的“创”，又音 chuàng，是“创造”的“创”；音义都不相同。另外有些字出现在不同的词里，它所代表的意义不同，读音也就不同。例如：“漂浮”的“漂”音 piāo，“漂白”的“漂”音 piǎo，“漂亮”的“漂”音 piào；“折腾”的“折”音 zhē，“转折”的“折”音 zhé，“折本”的“折”音 shé；“强大”的“强”音 qiáng，“勉强”的“强”音 qiǎng，“倔强”的“强”音 jiàng；“炮火”的“炮”音 pào，“炮制”的“炮”音 páo，“炮肉”的“炮”音 bāo。这些都是同形异音异义的例子。

（四）异形同音同义

音义相同而写法不同，这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例如：

槍鎗　暖煖　檐簷　愧媿　跡迹　谿溪　疎疏　筍笋

麴麯　烟煙　栖棲　綫線　泄洩　濕溼　歡懽　階堦

嫉妒嫉妬　忼慨慷慨　怳惚恍惚　彷佛髣髴

这些都是音义相同而写法不同的字，这种字一般称为“异体字”。异体字的产生是汉字在社会上长期使用的结果。有些是由于造字的时间和地域不同，造字的人所采用的表音和表意的符号不一致而产生的。有些是从古代两种字体保留下来的不同的写法，如“禮”是篆书，“礼”是古文，“禮礼”同样保存下来。有些是由于要求形体能够更好地表达声音和意义而产生的异体字。例如：“褲子”的“褲”汉人写作“絝”①，从糸夸声（夸音꜀kua），后来写作‘袴’，从衣，不从糸，再后又写作“褲”，从衣库声。从形旁来看，从衣比从糸意义要显明得多，从声旁来看，从库比从夸声音更加切合，所以一个字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另外还有很多异体字是由于要求简化而产生的。例如“糉”又作“粽”，“筍”又作“笋”，“粽”和“笋”都是简体字。异体字产生的缘由很多，这几点都是主要的。

总起来看，汉字形体和声音意义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少矛盾的现象。有些异读词就需要进行规范化，无用的异体字也需要淘汰掉，这样才能使汉字更好地为汉语服务。

①《说文》：“绔，胫衣也。”

怎样自学语文①

最近有许多《语文学习》的读者来信提出怎样自学语文的问题，迫切希望得到解答。这些读者有在机关部队中工作的，也有在学校里服务的。他们说语文基础较差，在工作中时常遇到些困难，所以迫切希望提高语文水平，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这种热爱工作、热爱学习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底下是从他们的来信中摘出来的话：

1. 目前感到一个困难问题，就是缺少语文基本读物。虽然有了语法修辞书，但是还缺少对语文全面知识的了解，仍然不知道怎样自学语文，如先从哪儿学，怎样学等等。

2. 我想有系统的学习语文，很快地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但不知怎样学，学习些什么？希望给我一个满意的解答。

3. 现在提出下面几个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我现在的程度和希望，应该从哪里开始学起？我应该怎样进行自修？哪些书籍可以作为我的基本学习材料？如果每天以两小时计算，约要多长时期可以达到初中的语文程度？以上请在复信时尽可能的讲的详细一些。

4. 现在我看了有关语法修辞的一些书，感觉这些抽象的东西很难搞通。我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因此我迫切的需要提高自己的语文程度，请你们根据我的情况，指出怎样来进行自学。

---

①本文载于《语文学习》（上海）1954 年 7 期。

5. 由于我的语文知识缺乏，在实际工作中就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写个总结、报告之类，写出来，不是词句不通，就是成了公式化，有时连自己看了也感到不对头。可是，我满怀信心地要把语文程度提高，希望告诉我在语文自学上，用什么学习方法才能获得进步。

这几段话里都充满了想学习语文的热望。所提的问题主要有三点：(1) 想学习语文，应当从哪里学起；(2) 怎样学习，怎样自修，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3) 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应当学习些什么。这三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很概括，很笼统，难以做出很全面很具体的答复。因为每一个人的语文修养的基础和学习的情况与条件不十分清楚，单凭一封来信怎能就做出正确的解答呢？如果随便举出一两本书来说说，对这些同志未必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样一个普通的问题必须求得解决才行。现在我试着来回答一下。

从来信所说，我觉得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先跟同志们谈谈。第一，学习语文的目的，同志们大致是认识的。这里还需要多少说几句，再明确一下，因为明确了目的才好说到学习的方法。运用语文的能力跟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其他科学知识都有密切的关系。要是我们不善于思考，不能明确地表达思想，不能深切地了解别人所写的东西，那就会在工作中和学习中遭遇很多的困难。学习语文就是要学习运用这个工具，好克服工作上和学习上那些因语文障碍而产生的困难，从而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那么学习语文就是要自己具有很好的实际的语文知识，有正确地阅读、书写和说话各方面的足够的能力和良好的习惯——为了很好地进行工作和学习。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单纯地认为学习语文只是为了能把文章写通，因而专门去注意写作一方面，而忽略其他。在学习的方法上，我们也就不会一股劲儿地去追寻写作的“秘诀”，知道要从多方面去吸收知识，蓄积知识，从说话、阅读、写作各方面来培养自己正确地运用语文的能力。在学习的材料上，也就不一定单单依

靠一两本语法书，而知道从日常所接触到的读物，如报纸、文件、杂志、小说等去寻找学习资料了。这是第一点。

其次，学习语文必须有耐心。有些同志希望马上速成，这是不正确的，这牵涉到学习态度的问题，与学习能否获得进步很有关系。学习是自觉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劳动，一切知识必须自己在实践中认真地精细地去体会，去了解，才能成为自己的活的知识。《毛泽东选集·实践论》里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因此，由不知到知，由知到能熟练地运用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尤其学习语言，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的语言有极丰富的词汇，多样的语法结构的形式和修辞的手段，所以学习必须有耐心，经过长时期的辛勤劳动，才能学习得好。同志们要求快，可是又快不来，就很可能感到苦闷，信心不足，以致畏难而止。所以我劝同志们不要先存着一个求其速成的愿望，只要脚踏实地去学习，认清目的，估计自己的基础、条件去进行，是一定可以逐步提高的。当然，方法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学习的效率。不过那只是相对地讲，就是说，方法好的可以比方法不好的效率高些，而不是说会有一种方法能使我们转眼之间就把语文学好。这是第二点。

再次，就是学习语文必须联系实际，不能单纯依靠讲语文的书本，更不能跟工作或其他学习截然划开，不相联系。上文说到学习的方法问题，联系实际应该是最基本的方法。从同志们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有一种现象，就是把提高语文程度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语法书和指导写作的书上，希望能够买到那样一本书，正好合乎自己的程度，一看就很快可以学会。像上面举的第四封信所说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存了这样的想法，就不容易从书本中细心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经过咀嚼寻味而变为自己的东西。当然，语文工作者目前没有给广大的读者写出很多符合实际需要的读物来，值得省察；可是，同志们把学习语文看成那样简单，希望从书本上找出什么公

式、定理来，好去照办，这也是不正确的。要真正能够获得进步，最可靠的办法是把书本的知识和实际的工作和日常的学习联系起来。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认真地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通过学习，我们对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对于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对于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等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可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对每一条每一个词的意思都要理解清楚呢？我想同志们一定是这样做的。那么，这不就是联系到语文学习了吗？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在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中，都能随时留意语文的问题，处处与实际联系，收获必多。单单死读书本是不行的，这是要说明的第三点。

以上我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学习语文的目的；二是学习语文的态度——不能希望速成；三是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不要以为单纯地、食而不化地读一些语法书或指导写作的书就行了，应当联系实际，多多实践。如果对于这三点没有明确的认识，只希望别人给开一个书目，规定出一个计划来，帮助是不大的。这三个基本问题认识清楚以后，关于学什么、怎样学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我以这些话来回答同志们的问题，可能还不能满足需要。也许还有些同志希望我能够针对着问题再具体地谈一谈。因为所有的来信都说：希望答复得越详细越好。那么，我就再谈一些。

学习语文应当注意的方面很多，主要是词汇、语法、修辞三方面。这三方面尽管可以随着每个人的基础和需要去安排时间特别着重哪一方面的学习，可是无法分别先后，因为这三方面都是语文学习的具体内容。根据青年们的一般反映，三者之中，讲语法的书多，可是说法纷歧，意见不一致，术语弄不清，所以比较难学。词汇、修辞两方面的书籍又太少，简直不知道怎样办。要解答这样的问题，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完的。现在只能简单地提供一些办法。

学习语法，尽管有些术语一时不容易理解清楚，但是主要的方法是根据自己在语言实践中（说话、写作）所认识的规律来和语法书中所讲的有系统的知识相印证，注意词与词组合的关系、句子里组成的成分、词在句中的次序、句子结构的主要形式、虚词在句子中的作用等等。根据这些知识再应用到阅读上去，试着分析句子的结构，遇到有不了解的地方再翻阅语法书，这样自觉地积极地去学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钻研，一定可以逐渐了解透彻，而且可以使学到的知识得到巩固，成为技巧。

关于词汇和修辞两方面既然没有很多的书可以参考，只有从平时阅读的读物中去学习。应当了解词的多义性，词的本义和转义，同义词和反义词。对于某一个词不但要了解它的意义，而且要注意它的用法，它在句中经常担任什么职务，常常跟哪类词连用。另外还得注意同义词在意义上和用法上的细致的区别。

讲到修辞，首先我们要了解修辞的作用。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修辞的作用就在于充分运用语言的表现能力而收到运用语言的最大效果。要收到运用语言的效果，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正确，能真实地把思想情感表达出来；（2）清楚，使人易于了解，易于接受；（3）词句生动鲜明，富于说服力，使人易于感动。高尔基在《论文学》里曾经说过："作为一种感动的力量，语言的真正的美是由于言辞的准确、明了和响亮动听而产生出来的。"同志们千万别误以为修辞要求的就是词采华丽，其实并不如此。修辞的范围很宽，如说话有条理，有重点，有逻辑的力量，有各种生动活泼的表现方式都是，所以研究修辞也是多方面的。不过主要的需要注意两方面：（1）学习怎样选择词汇，并且把词汇适当地配合起来；（2）学习表达情感和描写事物的手段，如修饰、比喻、对比、反复、陪衬、铺张等。要了解这些，都需要从政治论文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去学习，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

现在只能简简单单地谈到这里。总起来说，同志们要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首先要估计一下自己的基础和条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读过一些有指导性的书籍以后，多多从实际的语言材料去学习。书本的知识很重要，可是要会运用它，不可死记；要把知识变成熟练的技巧。只有在说话、阅读、写作中反复地实践，日久自然就有进步。关于写作的问题比较复杂，而且已经有很多的书讲到，在这里只预备提出一点意见，不多说。要把一篇文章写好，条件是很多的。首先，思想内容要正确，这要靠一定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条理层次要清楚，这要靠合乎逻辑的思维习惯；遣词造句要正确，这就要求我们具备适当的语法修辞知识。提高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和思维能力，又要靠各方面的学习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有些同志认为只要学好语法，再看上两本讲写作的书，就可以把文章写好，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语法修辞是有用的知识，甚至是必要的知识，可是它不能解决写作上的一切问题。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这些意见考虑并不成熟，而且讲得很简单，诚恳地提出来，作为同志们的参考。

怎样学习古典文学①

自从中学文学课本增多了古典文学以后，青年们都注意到古典文学的学习。有些青年对于为什么要学习古典文学，学习古典文学对提高语文水平有什么作用，还有一些疑问。有些青年又感觉到时代较早的作品，如唐宋以前的文章，文辞艰深，很难理解得透彻，尽管依靠课本的注释和译文可以解决不少问题，但独立阅读的能力还很差。他们很想知道怎样学习才能提高理解的能力，特别是自学的青年们要求更加迫切。现在想就我所理解到的贡献一点意见，作为参考。

对于学习古典文学的目的和要求，青年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认识的问题。认识明确以后，也就容易知道应当怎样学习了。

学习古典文学的目的和要求，概括来说，有三方面：

1. 从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了解祖国过去的文化和各历史阶段的人民生活，了解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情感，以提高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

2. 了解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于古典文学的丰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有理解和欣赏的能力，以提高我们艺术修养的水平，继承并且发扬祖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①本文写于1957年4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3. 通过古典文学的学习，丰富我们的有关祖国语文发展的认识，认识作家对于全民语言加工的手段，吸取作品中的新鲜生动活泼而且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以提高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

为什么这样提呢？根据近代新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我们知道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所谓现实生活，包括人和客观世界中事物的关系，也包括人的内心生活。作家运用语言把现实生活中人民所关心的一切事物以活生生的形象真实地表现出来，人们读了就会有所感受，有所体会。真正的优秀作品必然是表现人民生活、人民的理想以及人民所关心的事物。我国的古典文学，从周秦到明清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光辉历史，各时代都有极宝贵的富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诗歌、散文、传记、戏剧、小说等各种体裁的优秀作品非常丰富。这些作品反映出人民的勤劳、质朴、勇敢、高尚的品质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并且表现出历史各阶段中社会生活的面貌、人民对生活的认识以及人民对封建制度对统治者的憎恨和反抗。学习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了解祖国过去的文化和人民的生活，获得极丰富的知识，而且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这就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其次，文学是以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的。凡是历史上优秀的古典作品是一直为人所传诵的，必然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历史上的著名的作家们在刻画人物、描写自然的景色和叙述故事的情节上都表现出无穷的智慧，在表现的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学习到怎样观察事物，怎样塑造形象，怎样表达思想情感。这样，一方面可以发展我们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在艺术方面的修养水平。因此，我们要学习古典文学，培养我们的写作能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通过语言来表现艺术形象的一种形式。文学的专门特点就在于它与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古典作品的语言固

然跟现代语有差别，但是现代语是从古代语发展来的，古今相同的地方还是很多。要想深刻地了解现代语，也必须对古代语有一般的认识。例如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合成词都是以古代所用的单词构成的，不了解古代语的面貌，对现代语就不能有透彻的了解。我们要从古典作品中认识汉语发展的过程，要从古代优秀的作品中学习作家运用语言的技巧，吸取富有生命力和生动活泼的词语，这也是学习古典文学的目的之一。

学习古典文学的目的主要包括这几方面。有些青年对于这些学习的目的了解得还不够，于是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有人认为学习古典文学就是要学习文言文，甚至练习写文言文。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诗经》《史记》是古典文学，《水浒传》《红楼梦》也是古典文学，凡是不属于现代的都可以称为古典作品。古典作品在词汇语法方面有的跟现代语相差较远，如《左传》《史记》之类都是“文言”；有的就跟现代语非常接近，如宋元以来的小说之类都是“白话”。所以古典文学不就是文言文。其次，文言文只是古代书面语的一种，我们学习文学作品，不等于单纯的语言方面的学习。学习古典文学，透彻地了解古代书面语的用词造句，逐步养成阅读古典作品的能力，是需要的，但是没有必要去练习写文言文。文言跟现代口语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写作应当用现代语。

另外有人认为学习古典文学对提高写作的能力没有什么帮助，这也是不正确的。这样理解的缘故在于把古今语言隔开来看了，把文学的学习缩小为单纯的词句的学习了。试看现代优秀的作家哪一个人不是在古典文学方面具有一定的修养呢？我们不能认为学习古典文学对于提高语文的水平没有用，只看我们能否从不同的方面去吸取它。

现在可以进一步谈谈学习的方法。

根据上面所说的学习的目的和要求，我们学习一篇作品，首先要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了解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了解作家对现

实生活的态度和情感。要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当然先要知道作家的生平和作品。然后从作家所描写的现象、人物、情节各方面来看作品的主题以及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情感。我们读陶潜的诗，如果不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生平，就不容易明白诗意。我们读杜甫《石壕吏》、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也都必须知道作品的时代背景，才能了解得深刻。要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不能不理解作品所描述的各方面，因为作者的思想就渗透在人物、事件等等各方面的描绘中，即使是写景的部分，也同样体现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例如杜甫《绝句》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表现出诗人胸襟的广阔，孟浩然《过故人庄》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也体现出作者对于这种清幽环境的爱好。所以我们要善于观察，善于分析，从作品中认识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体验和他给我们的启示。

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有深刻的思想意义，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事实上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密切地结合的。我们读一篇作品，不可略观大意，知道主题、思想以及情节就完了，还要注意它的艺术技巧。应当细心地分析作品的结构，观察作品内容的联系和配置，还要看作家怎样叙述事情的发展，怎样刻画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怎样分析人物的心理，怎样鲜明而生动地描绘自然的景色。这样才能真正体会作品的优点。

作家运用语言的技巧和重要的修辞手段，我们也应当注意。例如：《史记·刺客列传》叙述鞠武的话，“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谓资怨而助祸矣”，应用反义词构成强烈的对比；岑参《白雪歌》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描写落雪的景色，李白《送友人》用“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来表现相别时的情感，都用的是比喻的方法。又如李白《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苏轼《蝶恋花》“白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

泪”，“三千尺”“千行泪”都是夸张的说法；秦观《蝶恋花》“持酒劝云云且住，凭君碍断春归路”，这又是拟人的方法。像这些修辞手段都是常见的。

诗歌富有想象力和艺术感染力，是古典文学中的重要部分。诗的语言比散文更要求精练。汉语的特色在诗歌里表现得格外清楚。在命意遣词方面，形象鲜明，生动活泼。例如杜诗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春雨，“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写江上的夜景，词语精练、形象生动鲜明，是我们应当留意的地方。白居易《琵琶行》写琵琶的声音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这是非常生动而且形象化的一段。凡是伟大的作家在语言上都是不肯放松的，不仅用词要求生动活泼，而且讲究声音的和谐、顿挫。我们学习古典的诗歌，除了了解不同的体裁的形式的格律外，特别要注意学习它的丰富和精练的语言。

所谓精练，不等于刻意雕琢。精妙的语言往往是质朴而生动的。如王维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欧阳修词“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都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的。

如果能够按照上面所说的方法来学习，自然会有收获。读得多了，理解和欣赏的能力以及艺术修养的水平都会提高。

目前青年们学习古典文学最感觉困难的恐怕还是语言上的问题，特别是时代较早的作品，只能略观大意，而不能真正了解。有时一句话不看译文就不能讲，一个词换个地方就不能懂。这主要由于词句了解得不透彻。必须冲破这一关，才能无往而不利。

如果没读过古典作品，最根本的方法是先从语言方面去注意。理解了古人应用的书面语言，才能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果读不下去，其他就都谈不到。怎样从语言入手呢？初学的人最好是先读

在语言上有代表性的浅近的散文，从古今的比较逐渐认识古代书面语和现代语的异同，熟悉文言的面貌、文言的词汇和语法。

古词汇和现在的有同，有不同，有些只是一部分相同。同一个字，有时意义不同，有时意义相近而有广狭之分。古典作品语言跟现代语差异较大的是虚词，虚词大多数不相同。我们要看哪些虚词与现代语的虚词相同，要看一些常用的虚词在造句上有什么作用，代表哪些语气等等。吕叔湘先生的《文言虚字》对学习古典作品很有帮助，可以参考。

仅仅注意词汇还不够，还要注意语法。古代文言语法跟现代口语语法有很大的一致性，可见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是一脉相连的。文言跟现代语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三方面：（1）在词的用法上变动性比较大；（2）有些句子的词序跟现代不同；（3）省略的成分比较多。《文言虚字》的附录里举了很多例子，可以参看。注意古今词汇和语法的异同，逐渐熟悉古人用词造句的方法，要达到能阅读浅近文言的程度是不难的。

现在有些青年学习古典作品，对于单词的意义不够重视，这样就只能说大意而不能逐句讲解。前人解释古书的文句，总是先释单词，然后贯穿文义，这是一个良好的传统。现在文学课本着重贯穿一句而加以解释，是必要的，对读者的帮助很大，但是有些文章的单词缺乏个别的解释，学的人不会注意从整句的注释中寻求单词的解释，就不能一一讲解了。为了逐步培养独立阅读的能力，必须注意单词的意义，根据单词的意义把全句的意思贯穿起来。只能说说全句的注义，而说不出每个词的含义，知识必然不能活用。

词的意义有时是多方面的，要知道一句话里某个单词的含义，就不能脱离上下文。所以了解全句的意思跟了解单词的意义是相联系的。先了解单词的一般意义，再结合上下文来看它用在这句话里的意义。例如“尔”有“你”“你的”“你们”“你们的”几种用法，而在这句话里是什么意义，要根据上下文来决定。

在古典作品里一个字不一定就是一个词，有时候一个词可以相当于现代语好几个词。例如上面说的“尔”，“盍各言尔志”① 里的“尔”跟“君尔妾亦然”② 里的“尔”就不是一个词。又如“於”，在“於赵则有功矣”③ 一句中，“於”相当于现代语的“对于”；在“於斯时也”④ 一句中就相当于现代语的“在”。所以不能忽略单词的意义，而且了解单词的意义和了解整句的意思必须联系在一起。

词义方面的问题，学生有教师指导，可以解决，但自己也需要查字典或辞书，自学的青年更要自己动手。现在的辞书对学习古典文学有帮助的是《辞海》和《辞源》。

注意语言的学习是最根本的办法，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哪怕我们的语法知识差，也不要紧，只要逐步熟悉古代的词汇的面貌，熟悉常用虚词的用法，了解常见的一些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段，阅读的能力就会逐渐提高。能冲破这一关，才能深入地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有更多的收获。

学习古典文学的方法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针对初学来谈。只要青年们认清学习的目的和要求，根据自己的基础认真地学习，日久自然发现学习古典文学对于提高思想认识和语文水平有很大的作用。当然学习现代的作品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宜因为对于古典作品有兴趣就忽略了现代作品的学习。

---

①《论语·公冶长》。

②《孔雀东南飞》。

③《史记·魏公子列传》。

④《孟子·万章上》。

怎样学习古代汉语①

一　学习的目的

古代汉语是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必修科目，用意在于使学生了解古代的书面语言，能阅读古代的文籍，通晓古今语言的异同。

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从周秦直至明清，历代的著述极多，举凡历史、地理、典章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农、医、天文历算等科学技术，无所不包。我们要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就要阅读古书，要有运用古代资料的能力。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就是要研究汉语发展的历史，研究古代书面语的词汇和语法与现代语的关系和古今的异同。我们学习古代的书面语言，还可以从中吸收生动活泼的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学习古人精于表达语意的方法，对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都会大有裨益。

二　古代汉语跟现代汉语的关系

汉语有极悠久的历史，从商代有文字的记载到现在已经过四千多年，文字的写法体势虽有改变，但是一直守着原来最早的形态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是世界上罕有的。语言本身自有其继承性，

①本文写于1955年8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古汉语的基本词语，现代依然应用。现在使用的双音词大都是根据古汉语的单字字义构成的。例如机智、辐射、批判、鲁莽、凝结、固定、沸腾、残酷、技术、激烈等都是。至于成语，更是继承古时候已有的词语。如养精蓄锐、南辕北辙、色厉内荏、破釜沉舟、化险为夷、运筹帷幄、偃旗息鼓等不胜枚举。语言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变化的，不过语言的变化是渐变的，不是突然变的。这在语法方面表现得更加清楚。因为古今的基本语法结构和主要的构词方式都具有一致性，这也是我们学习古代汉语的方便之处。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古今的界线问题。古今汉语本是一脉相承的。古代传流下来的著作大都是文语，文语跟口语自古就有一定的距离。商代的卜辞，文句简短，是最古老的书面语言。《尚书》和周代的铜器铭文，文辞古奥，是早期周代史官应用的文语，带有豳岐方域语言的特色，跟春秋战国以后的书面语不同。春秋战国时期河南雒邑以东广大地区形成一种北方区域的共同语，即当时通行的"雅言"。当时列国史官书于史册的和《孔子》《孟子》以及战国诸子书中所载的语言就是文言文的基础。这种文言文体，在不同的书里，风格不尽一致，从中可以看出有的最接近于口语，句子的结构和虚词的使用、语气的表达等都与现代语切近；但有的较整饬简练，似与口语稍远。前者如《论语》，后者如《左传》。汉魏六朝期间一直使用古典式的文语，甚至骈偶文辞盛行，离口语日远。这同一些带有口语性质的书札、传记、状词等一比较就看得很清楚。语体文字自唐代起逐渐发展起来，如佛曲变文、和尚语录、民间的文学作品已经用语体来写。宋元明清的文人学士仍用文言著述，而儒者的语录、民间的平话、小说、词曲、杂剧都是白话，惟词语和语法还与现代语不尽相同。可以称之为近代汉语。现在我们说的古代汉语一般所指就是古代的文言，包括散文和诗歌。古代的文言以其实质而论，也就是《论语》《孟子》《礼记》《史记》等书所写的书面语言。以前有的学者认为《论语》《孟子》的文言就是以鲁语为

基础而形成的，很清楚，是有实际语言作根据的。实际的语言，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北方广大区域的共同语。我们要学习的古代汉语应当就以这种文言为主。

三　学习的侧重点

学习古代汉语，一要注意比较古今语词的异同，用心辨析词义；二要注意比较古今语法的异同，掌握文言语法上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在语词方面，在古代汉语里，除专门名词以外，多数是单音词。古代的一个单音词，现代可能发展为双音词或几个双音词，但单字成词是古汉语里的普遍现象，而且往往是一字多义，所以要仔细分辨。古今字义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义近而有别。例如“他”在汉魏南北朝时代是“别的”意思，如“他人”“他物”，跟现代作第三人称代词不同。又如“握手”，古代是“执手”的意思，跟现代的“握手”稍有不同。

2. 义有广狭。例如“售”是“卖”的意思，如“贾用不售”。可是前人也有当“买”的意思用的。如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余怜而售之”，词义较宽。现在就只能作“卖”讲。

3. 义有改变。例如“经济”古人指“经世济民”而言，现在就不是那样用了。又如“赖”古人作“善”的意思讲，如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现在用“赖”这样一个词是“劣”的意思，如“好的”“赖的”对言。只有作“无赖”一词的语素时，还保留有古义。

4. 义有消失。例如“豆”是古人用的一种食器。《周礼·梓人》说：“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现在“豆”字无此义。又如“窃”古有“私自”的意思，也作为自己的谦称，现在只作盗窃的意思用。古今字义有不同，用字也有时不同，有的是古今字的

关系，有的是假借。如“婚”作“昏”，“途”作“涂”，“嗜”作“耆”，“值”作“直”，这是古今字的关系。如“刑”作“形”，“惟”作“唯”，“慧”作“惠”，“待”作“侍”，这是字的假借。书籍越古的，假借字越多，不可不辨。在读古代作品的时候，要注意上下文，从上下文去体会词义，词的确切含义是表现在句子当中。例如欧阳修《江邻幾文集序》说：

自明道景祐以来，名卿钜公，往往见于余文矣。至于朋友故旧，平居握手言笑，意气伟然，可谓一时之盛；而方从其游，遽哭其死，遂铭其藏者，是可叹也。

这里的“方”“遽”“遂”三个字的意义，孤立地讲，不能理解透彻，从文句上下文看就容易理解了。

学习古代汉语所要注意的语法特点是看它跟现代汉语有哪些不同。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 古汉语名词前有数词时，一般不加量词。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晏平仲二桃杀三士”。数词在特定的场合也有放在名词后面的。如“车一马一”，“予有臣三千”。说年月，过“十”，则加“有”字。如“十有八载”，“行年二十有五”。

2. 名词作动词用。如《左传》僖公二年“城楚丘”，《论语·先进》“孔子以其兄子妻之”，《史记·淮阴侯列传》“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又《陈丞相（平）世家》“陈平不事事”，《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器之”。诚、妻、衣、食、事、器都是名词，这里作动词用。

3. 形容词作动词用。如《论语·宪问》“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陶潜《桃花源记》“渔人甚异之”，柳宗元《袁家渴记》“余无以穷其状”。寡、小、异、穷都是形容词作动词用。

4. 主谓式中加“之”字。如《列子·仲尼》“公孙龙之为人也，行无师，学无友”，又如《通鉴》卷六十五《赤壁之战》“众士慕

仰，若水之归海。”

5. 被动的意思以主动式表述。如“未闻于人”是不为人所知的意思，“选为昆山尉”是被选为昆山尉的意思。

6. 自动词用为使动的意思。如“生之长之”是使它生，使它长的意思。又如《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王怜而活之”是使他活的意思。晏幾道词“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使碧树凋落的意思。

7. 受事格宾语放在动词或介词之前。例如《论语·里仁》“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之见”即“见之”，“之”字提前。范仲淹《岳阳楼记》“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谁与”即“与谁”，“谁”是介词，作“归”的宾语而提前。

8. 状语有在动词之后的。例如“晓之以利害”即“以利害晓之”，“观于其市”即“于其市观之”，“得之于人”即“于人（从别人那里）得之”。

9. 动词后没有“了”“着”之类的附加成分。例如《吕氏春秋·察今》“有过于江者，见人方引（着）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引”后不加“着”。又如《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簪笔磬折，向（着）河立，待（了）良久。”又白行简《李娃传》“时也适遇（着）生之父在京师”。动词后都没有“了”“着”。

四　学习的步骤和方法

学习重在能自学，要由浅及深，不可好高骛远，要根据自己的基础选择适当的作品去读。（这里指自学而言，在教学上由教师去安排）所谓深浅，是程度上的差别。古代的作品有难有易。难易是从文辞与现代汉语接近的多少来看的，接近的多就容易懂，接近的少就难懂，这是很自然的。先秦的古书或比唐宋以后的难一些，但同一时期或时代相近的也有难有易。如《论语》容易懂，而《左传》就比较难，《史记》容易读，而《汉书》则比较难。深或浅，

只能看个人的基础和素养，不能单从时代先后而论。由浅及深，就是古人所说“盈科而后进”的意思，要逐步提高。选择读物不能不以个人的基础为准。

学习应注意实践，用心阅读，用心体会，时时与现代汉语相对照，练习口译。如果仅凭借读语法和讲虚词的书要弄通古代汉语是不容易的。语法书和讲虚词的书是要配合着阅读而起作用的。初步经过学习，知其梗概，在阅读时有疑问，再翻检这类书，加深理解，逐步掌握古文的语法和规律。这样交替为用，而以练习阅读为主。所以读书要懂得读书的方法。

在阅读时首先要明句读（dòu），要能断句。现在写文章要讲句读标点，而古人的文句一般比较简短，有的也比较整齐，或四字一逗，明句读也不太难。多读并利用有标点的本子熟悉古文的句式是很可行的办法。

所谓阅读，不能局限于阅而不读，要读出声音来。用听感帮助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读时对古人命意遣词以及各种语气的表达法会逐渐得其神味。如《史记·信陵君列传》侯嬴说：

> 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

这些话的神情和语气在文辞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只阅不读是体会不到的。如果是诗歌，更要诵读，在吟咏中可以增加对诗歌音律美感的认识。如李白《夜泊牛渚怀古》：

>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谢尚）！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诗中没有对仗，而音节铿锵，情致高雅，韵味不尽，在诵读时自然可以体会到。限于篇幅，不能多举。

最后要谈到选读与精读的问题。前人编纂本有两种目的：一明流变，一明文体或风格。编排的方法，有的分时代，有的分作家，

有的分体裁，各有其用，随目的而不同。《古文观止》分时代，《唐宋八大家文钞》分作家，《古文辞类纂》分体裁。前面我已经提到学习最好由浅及深，如何选择，只能随个人的基础和要求而定了。

不过有一点须要说明的即泛读不如专攻。譬如打仗，战线太长，目标分散，都是不相宜的。读书贵专，贵精。真能精通一家之作，反复诵习，有了深厚的基础，就无往而不胜。其难者，比较艰深者，不过在于古字古义，换言之，即词汇和词义而已。因为古今语法结构相去不远。至于典故、典章制度等，那要利用辞书和有关的著作来解决，如《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之类。不过，一家之作也有难有易，因其写作的目的和功用不同，而在风格、用字上或有差异。这里面也可以先取其易，而后及其难。只要有专攻的精神，日久自有成效。

谈治学的方法[①]

所谓治学，就是从事于研究学问。研究学问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利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精的地步，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治学的方法，前人讲过很多，各有所见。现在，我根据个人治学的一点粗浅的体会，结合目前的情况，陈述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对学术有所建树，做出成绩来，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青年同志不必自卑。可是要脚踏实地，更要虚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一步一步地去做。荀子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就是说，积蓄得深，才能有成就；见识窄狭，读书不专，基础薄弱，积蓄不厚，华而不实，那就不能多有贡献。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第一个问题，治学要有根基

比如研究古代的历史、语言、文化各有些专门的书籍要读，但是无论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都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作根基。根基不好，就处处感觉困难，所谓资之深，才能左右逢源。现在一般讲"基础"，我说"根基"，就是要有根底，要有基本知识。基本知识，包括一般的基本知识和专科的基本知识。

---

① 本文载于《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中华书局 1983 年 8 月出版。

从一般的基本知识来说，我认为有古汉语知识、书籍知识、历史知识三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以下分别来谈谈。

一、古汉语知识。要利用古代书本知识，通晓古汉语是非常必要的。读古书，就不能不知道古字、古音、古义、古代语句结构，以及古人用词表达语义的方法。这是基础知识。中文系的学生必须具备文字学、音韵学的基本知识。历史系的学生要研究先秦史，当然也需要具备这些知识。尽管有的大学分语言、文学两个专业，而文学专业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就谈不到真正理解古典文学作品。如果是学习历史的，不能读一般的古书，只能依靠一些《史记》《汉书》的翻译节选本，那是绝对不行的。你必须自己能理解原文。怎样掌握古代汉语，我认为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读文，要多读、熟读、反复读。古人的文句，脱离不了它的语法结构，尽管用了些古代词汇，可是在语法结构上，跟现代汉语一致的多，不一致的少。古人行文精赅，讲究篇章组织，要求文句生动、简练明了。如不反复读，你就不了解它的词义的配合，上下句的联贯，语气的转折。反复读，才能逐渐领会它的意义。即使学了一点文字、音韵知识，不熟读原文也还是隔了一层。感性知识丰富了，才能提高到理性知识。前人讲究背文，现在我们不提倡背诵，要求熟读，熟读可以成诵。古代一些大文学家，对一些名著都反复念，念得非常熟。至今还有学者能背《汉书》，这很受用。第二，读的当中要比较古今异同，跟现在相同的地方可以不必管，要注意和现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就把要了解的面缩小了。凡是不同的地方，比如词汇、语法、词义等各方面，都要跟现代汉语比较。（比较的方法非常重要，下面还要提到）

其次谈谈书籍知识。我们要初步了解历史上存留下来的书籍，有哪些内容，这是比较浅近的。前代就有所谓目录之学，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一门传统学问。我们的古本书多得很，所以，自古就有书的目录。最早是汉代刘歆的《七略》。他的父亲刘向曾校订官府收

藏的古书竹简，刘歆继承父业校书，编了一个目录，就是《七略》。《七略》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前面有一个总述“辑略”。这部书现在没有了。但很多内容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汉书·艺文志》继承刘歆《七略》的目录，又增加了一些他看到而刘歆没有注意到的书。每种书都登载了书的时代、作者、篇数。到南北朝时，也有人编写了很多公家或私家的藏书目录。唐人修的《隋书·经籍志》(历代正史里大都有书籍的目录，或叫“艺文志”，或叫“经籍志”)，修的特别好，首次使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它不仅记录了当时能见到的书，还把一些当时虽不存但前人目录书有记载的书，也记下了书名、作者、卷数。这是很有用处的。到清乾隆年间，就有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保存中国历史文献起了很大作用。最初，馆阁大臣为乾隆翻阅书籍的方便，在每部书前加一个浮签，上面写了这本书的作者、内容等简短的提要，到后来编辑整个目录时把它登载进去，而且搞得更加详细，这就叫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籍有提要，始于宋代。宋代有两个大藏书家，一是南北宋之间的晁公武，有《郡斋读书志》，一是南宋理宗时的陈振孙，有《直斋书录解题》。他们都是把自己的藏书编成目录，而且写出内容提要，或称题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每种书都介绍卷数、内容、作者的简历和后人对此书的评价。这些评价虽不一定对，但可以使读者初步了解书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是以“经、史、子、集”为大类，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小类。这样，目录书由只记书名、作者、篇数、卷数，发展到书的内容、作者、篇数、卷数，又发展到对书的内容、作者都有说明，这是目录书的逐渐加细。这部书比较大，我们可以翻阅简单一些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它除了一些只有“存目”的东西不登外，其他部分均有简明的提要，篇幅小，好翻阅。求其次，可以翻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它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编的，少有变动。它

很有程序，重要的书顶格写，记出卷数、作者，并且指出版本，注明善本（善本指错字少、卷数足的本子），但没有解题；某一书跟它类似，而是次要的，就低一格来写；几种书性质相近，就在书名后打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很重要，表明这几种书同一类别。后来，只有贵阳书院的刻本保留着这个符号，别的刻本都丢了。近人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就是根据这个版本，并作了增补。这些目录书，大家可以选看。至于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则可帮助我们了解书籍流传的历史、佚失的时代。《明史·艺文志》最为简略，它只登本朝人写的书。如果我们不做专门考察，只是一般了解书籍的分类，应当看哪些书，到哪儿去找材料，目录书给我们的这点知识是很容易吸取的。

另外，有些工具书，也是做学问要经常应用的。如讲历史，现代有些历史年表，很方便。比较全一些的如翦伯赞等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既有中国历史的记事，又记载了同一年内别国的重要事情。这是按日本人的方法做的。你研究某一时代的历史，也有些前人作的年表，如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

还有字书、辞书，也是我们要经常翻翻的。比如有一个佛教名词不懂，就可以查《佛教大辞典》。对一个典故不懂，不知出处，可以查《佩文韵府》。它是按要找的那个词的下一个字依韵排列的，找到下一个字，就可查到你要找的词。相似的还有《骈字类编》。诗词里有的特殊词汇不懂，可以看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现在还有人做了一些索引，如你要研究杜甫的诗，不知杜甫的这句诗出在哪一篇，有《杜诗引得》；要查晋朝一个人的事迹，有《晋书索引》。日本学者也编有许多古书索引。

此外，还有类书，类似现在的百科全书。常用的类书如《太平御览》，它对校订古书就很有用，其中引了许多古书跟现在的本子不一样。因为它根据的是写本，时代早，文字上有很多地方胜于现在的传本。另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专书，你要查某一类事时，可

以到里面去找。作者收集了很多材料，排比在一起，加以叙述，很方便。比如你想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经济、军事等问题，可以看“三通”：即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想看古代小说，有宋人编的《太平广记》五百卷，唐代的传奇小说也都在里面了。要了解古代建筑，有宋人李诫《营造法式》。有关农业的，可看元王祯的《农书》；有关碑刻的，有清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文字补正》；有关植物的，有清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还有如《全唐诗》《宋诗钞》等诗歌的总集。这些综合性的书很重要。

至于如何掌握历史知识就不用再多说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都应抽时间读两本，这也是为学的根基。有了这些根基，你才能从事各方面的研究。

第二个问题，为学要有次第

或者学文学，或者学语言、历史，都要有一个先后次第。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他。如从事语言研究，语音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这里，要格外提出的是：第一，如果向专门方向发展，先要认真把一两部书读好。不读书是当今通病。束之高阁，不念，或者只念两篇、三段，那有什么用处？《诗经》只念《伐檀》《七月》《硕鼠》，那离懂《诗经》还差得远呢。要研究文学，就得先读《诗经》，然后读《楚辞》，读魏晋南北朝的五言诗。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步就要把《诗经》全读了。认真念好这部书，受用无穷。一直到清人，还在用《诗经》呢！它是最早的一个诗歌总集，

后代都受它的语言词汇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应该把一两本书读好。研究《楚辞》，只念一两篇如《哀郢》《东皇太一》《湘夫人》，那不行，你得先把《离骚》念好。不读书，空谈，学术大门就没法进去

第二点，研究文学，仅读选本不行。选本的用处是帮助了解历代文体的发展，不同作家作品的风格，但是研究某一作家，还要读他的全部作品。如研究杜诗，就有仇兆鳌《杜诗详注》；研究李白，有王琦《李太白全集》；研究王维，有赵殿成《王右丞集注》。应该先读选本，了解概貌，然后进一步读全集，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上讲的就是为学要有次第。

第三个问题，为学要靠平日积累

读书必须手勤眼到，随看随摘记。平日的功夫非常重要。专门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要把有关材料随手记下来，即使是不属你研究的学科，你觉得有兴趣，或许以后用得上，也要记下来。凡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都要注意平日的积累。如果手懒，凭记忆，那是不行的。随手札记，可以广泛记录，然后再集中起来，根据不同的目的分类存放。逐步做到以时代先后为序，做上记号，给以时代标志，最后整理起来就容易多了。书名、卷次、页数一定要同时记下来，以后用时可以核对原文。现在的杂志上的文章也要记。同时，要多作读书笔记。可以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作一个提要。通过这种练习，对帮助我们逐渐领会全书的内容，大有好处。还要练习写作。现在许多人写出东西来文字不通，就是因为平时缺乏练习。练习写作，不必要老师出题目，自己经常作读书笔记，或长或短。古人有很多著名的书，都是由笔记、札记而来的。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平日念书积累材料，最后用一个题目综合起来，加以说明评论。或是把历史渊源、演变沿革写出来，也

很有用处 如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就是很好的笔记，这些书可以看看。日本有一位有名的汉学家带研究生，让学生第一部书念《日知录》，因为《日知录》内容非常广泛，历史、文学、典章制度各方面都有，足见他是很有眼力的。我希望同志们也能在笔底下天天有"日知录"。我认为教师要指导学生有目的地去看书，同时教他们做札记，畅览有关材料，慢慢积累起来。心中有了些问题，或者发现了哪方面有价值的资料，就可以写一篇短文以至一篇论文。

第四个问题，注意从搜集材料入手，然后进一步参互比证

研究某一问题，有时有好多同类材料。同一事实，不同的书可能有不同的记载。比如研究历史，可先看正史，次看别史。关于制度，可看《三通》。《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它是根据很多历史材料综合编写而成的。有的录原文，有的加以简化，有的加以考证。假如一个年代，正史写的二年，《资治通鉴》写的三年，这就要参看其他有关的材料如笔记、杂书、金石文字之类互相比证。

正史里记载某人事迹往往很简略、某人文集里写到某人的传记，或者有给他写的墓志铭，记了这个人的生年卒年和一生经历官职，因为是当代人写的，往往比较正确真实。当然也有些不可信的"谀墓文字"。（本来这个人恶行多端，他的儿子请别人作墓志铭，别人就不好把他骂一顿，只好说他有什么功绩、德政，这就是"谀墓"）但一般历史事实、年代，往往不错。另外，某人事迹还可能记在方志里，如县志、府志、省志，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材料。

方志的材料很丰富，不仅记载当地的山川地理、风习人物和物产，而且还有关于语言的材料。有些方志对当地特有的词汇、说法，都有记录。有的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如广东《肇庆府

志》就非常好，记载当地方言非常细致，而且有注。当然，利用它还要和现在活的口语相印证，音义才能搞准。

又如，古代讲山川地理的书很多，如《太平寰宇记》，把宋代的地理山川，分地方区域记载，这是考查地理的重要材料。有些问题牵涉到历史地理，现在还没有一份翔实、完整的历史地图。使用过去一些历史地图时，还须考证核实，把它和今人画的地图相比证，你才能了解山的走向，水的流向；原来是哪里，现在是哪里；古代什么战场，应在现在什么地方。由此看来，研究任何问题，都须搜集很多材料对比一下，要经过考证，经过一番思考，根据各种材料来断定。

清人提倡考证，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比如，《尚书》里的一些词，可同金文相印证。王国维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些常用的成语，从《诗》《书》的比较中确定它的意义，就能解释很多前人没有讲通的词语。清代王引之有《经义述闻》，是解释经书文辞的意义的；他还有《经传释词》，是专门解释虚词的。如“终”字见于《诗经》，有“终风且暴”（《邶风·终风》）、“终温且惠”（《邶风·燕燕》），古人讲不出来什么意思。他加以比证，把有“终”字的句子列在一块，然后才看出“终”字当“既”字讲。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把诗词曲中一些特殊的词比列在一起，唐诗、宋词、元曲中凡是用这个词的都列在一起，从上下文意观察这个词的意义。一个、两个、三个例句都讲通了，然后确定这个词应当怎么讲。或者这几个例子是这个意思，另外几个例子是另一个意思，就确定这个词有两方面（或多方面）的意义。这是一种比证。总之，研究问题，离不开比较。

比较是知识提高一步的必然方法，是引导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最好办法。有些问题你根本不知道，看不到，比如前面说的“三年”还是“二年”的问题。你只有经过比较才能发现异同，然后加以考证，才能有所发现。比如研究《诗经》，有的汉学家认为“毛

传”“郑笺”最好，要根据它来讲明《诗经》的意思。清人陈奂，用30年作了一部《诗毛氏传疏》，用力很勤，也很有成绩，但他拘守“毛传”，不敢以“郑笺”破“毛传”。同时，还有齐、鲁、韩三家诗，他也不管。这样拘守“毛传”讲《诗经》，有些地方怎么兜圈子也讲不通。另一个有名的学者马瑞辰写的《毛诗传笺通释》，不仅解释“毛传”的意思，同时把“郑笺”同“毛传”相比证，不拘守“毛传”，破了这个家法。更高明的是，他还参照了“三家诗”的文字。“毛传”的这个字，用通常的意义讲不顺，“三家诗”可能是另外一个字，两个字声音有关，用那个字就讲通了。因为古人学习，最早是口耳相传，到汉时才有人记下底本。“三家诗”的说法和文字，跟“毛传”不完全一样。马瑞辰既能通释“毛传”“郑笺”，又能利用“三家诗”来说诗意，这就比陈奂高明得多。从这里，我们可以体悟到：治学要善于参照各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证，经过考释，而后作出决断，那才是真正有所得，我们要注意这类书的考释方法。

第五个问题，讲讲治学态度

治学态度似乎与方法无关，其实不然。态度不正确，就影响学问不得前进，所以也需要附带谈一谈。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态度要认真，不可粗鲁。即使是一个概念，一个名词，也要弄清楚，使字字落在实处。

二、重观察，重实证，不能凭空悬想，满足于一知半解。

三、重分析，要实事求是。人云亦云不好，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

四、重精审，要切磋，不墨守成规，不蔽于自见。不要自以为是，拘守一家之说，不肯接受新的学说见解，把别人的是处拒之于千里之外。清代学者非常注重切磋，朋友往还，互相研讨，很重视学术的科

学真实性。每个人都有长处，要善于吸取，不能“文人相轻”。

五、重条理，避免驳杂。写出东西，不要急于发表，可以放一段时间来修改。多了的就删掉。有人写文章很长，说来说去，其实，就那么一点意思，要言不烦，岂不更好？不肯割爱，必然拖泥带水。唯其能割爱，少而精，人家才爱看，才能从中得到教益。因此，希望大家多写短文，不要写不必要的长文。

以上五个问题，内容很平浅，只是个人的一点体会，仅供参考。

写作与修辞①

文章写出来是给别人看的，一方面要叫别人看得懂，另一方面要叫别人看了有清楚的印象，首先自己要立意明确。即：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效果，起到什么作用。有了主旨，然后动笔才能围绕着主旨有顺序地展开。

在机关工作的人经常要写一些请示、报告、总结、报道、通知等等的文字，要说明一桩事情的缘由、经过、目前状况、并提出某种问题，制订出某些措施，或陈述有哪些经验，都很具体，这与一般文学作品不同，不需要渲染烘托，也不需要绚丽的辞藻，首要的要求是要条理清楚。要做到条理清楚，必然要思想明确，思想明确，才能理顺条理，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在着笔之前要思考写作的内容，分别主次先后，安排好顺序。这样做才能有比较好的成效。这就是写作时必须要考虑的。

其次，文章因其使用的方面有不同，而体制也不一样，用词也略有差异。如请示与通知不同，报告与报道不同，各有内容，各有所用，写法不同。因此又牵涉到怎样写才合体的问题。这要看写者与接受者或读者之间的关系而定。不同的关系自然措词也不一样。如此说来，在条理清楚之外，还要写的得体允当，符合客观的实际需要。文辞要平实确切，意思显豁，说理明晰，符合事实，不能有

① 本文写于1982年3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依违两可、含混不清的地方。

就修辞方面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是写得清畅流利，逻辑上没有语病，用词妥贴，合乎语法。至于如何锤炼词句，应用什么技巧使表达的意思更加深刻生动而且富有感染力，那是进一步的要求。但不是以字面华丽取胜，也不是以堆砌辞藻取胜。一般讲修辞学方面的书对积极修辞都讲得很细。如在命义方面，有比喻、夸张、对比、拟人等方法。在句式方面，有对偶、排比、重复、变换等方式。在这里不去申说，只就修辞的基本要求，略作说明。

修辞的基本要求，从运用语言的角度来说，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用词妥贴恰当，二是句法合乎语言习惯。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所谓“彪炳”，指文采焕发；所谓“明靡”指文辞清畅；所谓“精英”，指用词精当。句之根本在词，所以用词妥贴恰当是写作的根本要求。词用得不妥当正确，会影响文句的意思，使人发生误解。要做到词符合自己的意思，能表达明确，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首先要正确理解词义和成语的含义。例如“开展”指活动而言，“展开”则对场面、前景之类而言。“负担”一词跟“担负”义近但“负担”是名词，指承担的事物，“担负”就是承担任务、责任的意思，是动词。这些都不能相混。又如“故步自封”，“故”是旧的，原来的，“故”不能写作“固”。“前仆后继”也写作“前赴后继”，两者意义不同。“仆”是向前倒下的意思，“赴”是向前去的意思，这都要分辨。

2. 区别义近词。汉语里有很多义近词，在意义上的轻重有不同。例如“明显”与“显著”，“指责”与“斥责”，“勇敢”与“英勇”，“阻止”与“制止”，前者跟后者意义相近而轻重有异。又如“时代”与“时期”所代表的时间的长短不同，“时期”可以表示一

段的时间。又如“集录”和“辑录”字面不同，意思也不同。

3. 注意词的色彩和意义的褒贬。例如“坚强”“顽强”“顽固”三者，“坚强”是褒义，“顽固”是贬义，“顽强”则属中性。又如“成果”“结果”“后果”三者，“成果”是褒义，“后果”属于贬义，“结果”则属中性。

4. 注意词与词的配合。例如“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应用原理”“使用工具”“利用人”等各有用法，不能疏忽。

5. 注意词在应用上具有的不同的风格和文言词语的应用。如“公布”不如“颁布”庄严，“颁布”大都对重要命令或法规而言。又如“光辉”跟“辉煌”不同，我们可以说“光辉的业绩”而不大说“光辉的战果”，说战果通常说“伟大”，说“辉煌”。又公文或信件中有一些常用的词语，如“感荷”“为荷”“亮察”“鉴亮”“承蒙”“批复”“以此为准”“一切事宜”等等都用各有当，在一般作品中不用。

6. 注意字词的规范。汉语的双音词的写法跟词义是相联系的，我们不能随便写。例如“刻苦”不能写作“克苦”，“糜烂”不能写作“靡烂”，“艰苦卓绝”不能写作“坚苦卓绝”，“要言不烦”不能写作“要言不繁”。这些似乎是小事，实际也是对词义的理解问题，应当注意。

说到句法方面怎样才符合习惯，主要须注意以下几点：

1. 结构完整。句子的完整是很重要的。经常看到的病句，在上下文之内，缺落主语；或一句之内有两个不同的宾语，其中有一个宾语没有相应的介词或动词。

2. 搭配得当。主要是动词与宾语、动词与补语的搭配要得当，如说“衡量轻重”“估计大小”“说得清楚”“考虑得很周密”，这些都配合得比较得当。把“大小”放在“衡量”后，把“轻重”放在“估计”后，把“周密”放在“说得”后就不符合习惯了。

3. 关系明确。在文章中关系不明确的地方主要出现在前后词

语的关联上。例如这样的一句话："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提高企业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益创造条件"。这里"发展生产力"是目的之一，"提高企业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益"又是另一个目的，句中"提高"前应当有一"为"字，同上面的"为进一步"的"为"字并列才对，否则就把两项目的混合为一了。

4. 虚词要用对。虚词是连接实词，表示种种不同关系的必要造句成分，所以在写作中不能不注意虚词的运用，特别是在偏正复合句里连词要用对。

以上所说是有关遣词造句的基本要求，也是属于修辞上的内容。写作要达到清畅流利，没有语病，就要在这些方面用心。同时在从阅读别人好的文章里仔细体会，吸收营养，日久也就会写得很好。

语文课的教学法问题①

在中学里怎样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一直是语文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这是许多人的共同看法。根据这样的目的和任务，怎样进行教学呢？这就牵涉到教材与教法的问题。

教材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教材的内容和教材的编法，跟能否达到教学的目的要求有直接的关系。多年来不断改换教材，改进编法，可是大家仍然不满意。我看，主要的原因在于大家对怎样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怎样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不同的年级应当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等问题讨论得不够，意见也颇不一致，更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如今要编好切合实际、能适应今日需要的教材，还要从多方面去研究和实践。但是，教材终究是进行教学的一种凭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当怎样去做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就不能不研究教学法。在这里，仅就语文课的教学法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以当刍荛之献。

一

我们从事任何一项工作，总是要对中心任务有明确的认识。语

① 本文写于1981年1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既然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那么就应当以讲授基本的、必要的、能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的知识为主体，这一点必须肯定下来。知识跟能力不是对立的。知识对于技能的增长会起很大的作用，过去总有人认为学生只要多读多写就行了，那是一种旧的办法。因为以前缺乏教学的理论和科学的语言学知识作指导，只有靠学生自己去背诵和揣摩。但是在今天，我们就要以语言学的知识和理论为指导，使学生逐年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不断通过阅读和写作的实践提高他们的语文水平。这样，教师就要确定不疑地把语文课做为语言教学来教，从语言的角度说明词汇、语法、逻辑、修辞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有关阅读、欣赏、写作的方法，教会学生怎样去读，怎样去写。

当然，语文课还会给学生多方面的教育，如哲学的、道德思想的、文学的、美学的等等，但是那些都不是语文教学的中心任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可以有所发挥，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可是重点要摆对。

二

语文课的教学内容很多，应该怎样进行呢？很值得研究。我认为，我们现在虽然有统一的教本，但是任何一种教本都不可能完全符合各方面的要求，因此不能不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程度，联系实际情况，安排好教学的内容。教师应当依据《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要求，利用教材设计自己的教学方案。不同的班，不一定要求一致，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充分发挥才智去引导学生学好。我想，教师应当首先把教学的内容和重点按时间的先后分配好，把所要讲的多方面的知识和要进行的教学项目组织成一整体的有系统的教学过程，既要分项进行，又能前后融贯，多从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着眼。如果能突出说明汉语的性质，能把词

汇和语法的知识联系起来，把读跟写，以至于说（语言的训练）联系起来，教学的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要使学生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绝不可能作为一种单纯的知识来讲授，也不是一讲就了的事，而是要从学生的基础出发，从无兴趣引向有兴趣，多做比较说明。一方面要联系阅读的教材，有步骤地来进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要联系学生写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讲解和剖析；同时，也要安排一定分量的练习，使学生得以巩固所学到的知识，并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要使学生能把知识转化，发展为技能，就必须往复循环讲解，讲到新的，同时复习旧的，把前后所讲的融贯在一起，反复解说，叫学生反复领会，用于实践才行。

三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课文的讲解问题。课文是基本的学习材料。课文上所选的文章都是一些范文，但是怎样利用和讲解范文以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应当进行研究。怎样做才算好，毕竟要看具体的情况和不同的文章来决定。比如文言文跟语体文就各有所侧重。文言文的教学应着重与现代语的比较，结合语法的结构和用词的异同来讲，说明文言文词语的特点和虚词的用法；而语体文的教学又随不同的体裁而异。现在只就语体文来说。

我想，范文是多种多样的、讲范文的时候不可千篇一律，每篇宜各有侧重点，不必面面俱到，有如刻板文章。书中有"解题"的，就毋庸多说。为使学生能增加知识，提高阅读和写作的能力，除了上面说过的结合课文以讲解有关的语文知识外，如能多从作者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推寻作者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文章是怎样展开的，布局如何，结构如何，以及作者运用语言的技巧，具有哪些独特的风格等方面加以阐发，使学生了解：在阅读文章时，怎样去领会作

者的主旨，作者怎样观察事物，分析事理，从文中可以吸取哪些表达的方法；在写作时，怎样叙事，怎样描述，怎样说明一个问题，怎样推理等等；诸如此类，可以开发学生的思路，对阅读和写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四

最后而不是最小的一个问题，是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希望学生学得好，往往喜欢自己多讲一点给学生听，这是好的。但是学习绝不是单凭教师的讲授可以学好的，必须能够自己动脑，动手，善于学习。因此教师应当改变单纯讲授的办法，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叫他们自己动手动脑，培养他们具有自学的能力。例如教他们要学会利用字典或词典检查字音和字义，叫他们课前预习，学着自己讲解课文，并提出问题，叫他们分析句子的结构和文章的结构，讨论文章的作法，自拟题目练习写作或互相批改作文等等。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程度，适当给一部分课外读物，包括文言文在内，训练学生去阅读、扩大知识面，提高理解的水平，并从中吸取营养。

总之，要改进课文的教法，要研究语文教学法，要把以教为主改为以学为主，使学生学到的知识通过各方面的自我实践转化为技能，这是非常重要的。

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1]

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是语文教学中一项崭新的而且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怎样做到理论结合实际，怎样在进行教学上用最短的时间而能收到最大的效果。关于这一方面就有很多的问题，例如教学的基本原则、教学的目标、教学的内容、教材的配置、进行的程序、教学的方法等，都要从实践中求得真正的解决。本文的目的，就是着重这几个问题，根据从实际工作中所得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来谈一谈。有些具体的实施办法是在北京大学少数民族医科预备班和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科朝鲜学生组进行汉语教学中试用过的，在此也提到一些，供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一　“汉语教学”的基本原则

一般学习汉语的人感觉学习汉字是顶困难的一件事，在学写汉字上要用很多的时间，因此认为汉语很难学。教的人也就专门注意汉字教学，而忽略了语言教学。我们认为汉字是一种很大的障碍，固然需要大大突破，可是汉语和汉字不是一回事，如果以为学习汉语能够认识汉字就成了，这是不对的。我们说一句话是许多语词在

①　本文载于《中国语文》1953 年 7 期。

一定的语法规律下组织成的，教汉语的人必须从语言的基础出发，使学的人能够实际掌握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才行。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可以用汉语做为交际的工具。单纯从汉字出发，领导学生认识几千汉字，读一些课文是不能实际应用的。我们必须建立以新的语言学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语教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对于我们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他说："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因此我们要使学汉语的人能够充分掌握汉语，就必须注重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这是汉语教学的基本原则。

其次要着重提出的是必须联系实际，发挥教师的领导作用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并且做好群众性的互助辅导工作，这样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

二 教学的目标

教学的目标是随客观的要求来决定的。例如少数民族的学生学习汉语，有的准备作政治干部，有的准备作翻译工作，有的准备在学好汉语之后再学习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他们将来从事的工作不同，学习汉语的要求也就有不同。因此，教学的目标一定要随学生的要求来定。

但是学习一种语言要达到能够应用的目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基础的。根据一般的要求来看，能够日常生活会话，能听学术报告，能读懂浅近的读物，能写简短的叙事文和学习笔记，都是很必要的。这就是很具体的目标，也是一般学习汉语要达到的水平。这里面包括了听、说、读、写四方面。四者之中，能听能说是基本的要求，能读能写是进一步的要求。上面所说的"要有一定的基础"，就是指这四种能力而言。要达到这种基础，首先要重视口语的训练。口语训练有了好的基础以后，再针对学生将来要从事的工作来

订训练阅读和写作的目标的实施计划，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胜利完成教学的任务。

三　教学的内容

教学的内容要根据目标来定。如果初学汉语要达到上面所说的水平，就要包括发音、会话、词汇、汉字、语法、阅读、写作练习几项。这几项都要保持联系，不能孤立看待。例如学发音的一段时间内在练习拼音的时候就可以学习一些词汇和短句，其他的项目，如会话和语法、阅读和写作也都要结合起来进行。可是在全部教学过程中，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应当是教学的中心，别的都要围绕着这一个中心来进行。

词汇教学是要拿一个词一个词来教的，跟认单个儿的汉字不同，学生不但要把每一个词的声音学好，同时还要知道它的意义和用法。假如学生没有掌握足够的词汇，说话的能力就很难发挥。所以词汇教学非常重要，在整个教学中应当有一定的计划（学习的数量，先教什么，后教什么），而且要结合着语法和阅读来进行，否则会有“会说会讲不会用”的毛病。

至于语法教学，主要的目的是给学生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使他们了解汉语的结构，掌握汉语的内在规律，这样不但可以帮助他们学习说话，而且可以培养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北大的朝鲜学生经过一个多月的语法学习以后，不但可以说话了，而且有的学生还可以写几百字的叙述文，这就是学习语法的好处。语法是语言教学的基础，如果不教语法，单单通过反复的口语练习，固然也可以达到能说能看的目的，但是那样基础不是很实在的，而且教学的效果往往事倍而功半。我认为：不论通过一种什么讲解的方式或练习的方式，语法的知识是必须教给学生的。学习汉语在语法上必须掌握三点：句子结构的形式，句中语词的次序，词与词、句与句关联的虚

字。有了这种基本的知识，自然学得快，理解得也快。

四　进行的程序和教学的要点

上面所说的教学内容，每种教材必须联系实际，符合学生的需要。教材的配置也一定要有严格的系统性和联贯性，顺序进行。至于具体的实施步骤，虽然还没有全部的经验可以提出来，但是体会到一点，就是：在全部教学中找出重点，分段来进行，是比较好的方法，也就是“分散难点，逐步占有”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上面提出的几项教学的内容来说，不妨分做两个大的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着重听话和说话的训练，第二阶段着重阅读和写作的训练。两个阶段又可以分步来做。第一个阶段可分为下面几个段落：

(1) 发音　(2) 口语练习　(3) 汉字写法　(4) 词汇及语法

发音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教师和学生必须一致地重视。要把拼音字母、拼音、声调、轻重音教好学好。教发音以前，教师要把学生的本族语的声音系统理解清楚，先教他们语言中有的声音，后教他们语言中没有的声音，哪些音是他们所没有的要抓紧时间，集中突破。根据经验，如果发音学得好，说话就容易有进步，否则以后处处感觉吃力。在教发音的时候，学生跟先生都容易犯急燥的毛病，学生忙着要学说话，先生急于求成，如果再感觉练音非常单调，往往草草了之，对于教学全部的效果可能影响很大。为免于有感觉枯燥的毛病，应当教一些词汇和短句，从学习词汇或短句上来练习发音是最有意义的办法。在这一段教学工作中，教师要特别努力，充分辅导学生，不可把时间拉长，以免学生失去信心。发音的标准，应当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全国的普通话语音为标准，这

是不成问题的，要求学生严格一些也是正确的，但是一定要与学生学习的情况相结合。例如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和朝鲜学生对于 p、f、zh、ch、sh、r、ei、ao、u 几个音和北京话的四种声调感觉很困难，可是这不是在学习发音一个阶段内可以学得很好的，假如大多数的学生都学会了，就可以进行下一段教学，有不熟练的以后再随时帮助。

口语练习是练习说一些日常生活会话的句子。这一部分的教材要完全用拼音字母来写，而且需要采取词儿连书的办法。目的在于使学生巩固学习拼写字母的成果，练习看和说，同时也学习语调和句中语词的声音轻重、词与词相连在读音上的关系。就学生的要求来说，他们学了发音以后，很想学说话，如果学习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会话句子，马上就可以应用，非常切合实际，他们学习的情绪一定很高。这一段学习是跟发音练习相连的。要多用一些时候，而且要把基本的语法规律贯注在例句里面，往复练习，使学生在不断的实践中变为技巧。学生会说一些句子以后，再学习语法，也增加很多的便利。

教非汉族的学生学习汉语最不好处理的问题是学写汉字的问题。学生开始学汉语的时候往往希望很快地学写汉字，这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加以劝止。如果教材中很早写出汉字来，他们就会专门去注意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写去念，忽视了语言的学习，所以在口语练习的阶段里教材中不应写汉字，要写拼音字母。可是在学语法之前就可以学着认汉字了。例如汉字结构的形式，笔画的样子，常用的偏旁，书写的笔顺等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先教一教，等到学习语法的时候，教材中就可以把拼音字母和汉字一齐写出来，学生也可以逐渐练习着写。一直等到语法学完，词汇学习很多了，再练习大量书写。如果学习语法的时候，强调书写汉字，必然有顾此失彼的毛病。

语法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法知识，以便发展说

话和听话的能力，并且为培养阅读的能力打下基础，这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意思。这种语法教学跟教汉族学生不一样，不能专门讲述理论的知识，要扼要，要简明，特别是要把一些汉语的表达法教给学生，使学生能够充分灵活运用，并且要结合他们的实际需要来进行，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在教学中是不能脱离练习的，每讲一个要点要多举例句，通过例句，指出其中语法的规则。学生学了以后还需要应用这种规则按照例句来说话，如果不实践，空学一些语法知识是没有用处的。更重要的是：在教语法的时候，要把汉语语法的结构跟学生的本族语语法做适当的比较说明，这样对于他们帮助更大。例如维吾尔族的学生初学汉语的时候常常按照维语语句的结构方式把动词和宾语的次序说错，“我买书”可以说成“我书买”，朝鲜学生可以按照朝鲜语的句中词序把“我没有找他”说成“我他找没有”。类似这种特殊的不同，必须提醒他们注意。

上面说过，词汇的教学是要贯注在全部教程里面的，要有系统有计划地加以布置。在教发音和会话的时候，就可以教很多的词汇。在进行语法教学的时候，这一方面也要配合着来进行。（语法例句或练习中的词汇可以提出来先教）教的时候必须要求学生把词的发音，如声母、韵母、轻声、声调等都要说得准确，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师和学生忽略了这一点，将来会产生说出来语法不错可是别人听不懂的毛病。学说话不怕说得慢，就怕声音不清楚，发音不正确，节奏不分明。要想避免这种流弊，就要从教词汇的时候起加以注意。特别是声调对于非汉族的学生最难学好，最好的办法是结合着词汇来学，每个词的读音都学得很好，说得很准确，那么，再有了语法的知识，说出来别人还能听不懂吗？这是从失败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所以特别提出来说一说。其次，所教的词汇必须是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有关系的词汇，这样才符合实际的需要，学生学了才有用。一般说起来，如果不要求学生写汉字，正规的学习每

天可以学四五十个词，一个月可以学习一千多词。这样也许有人会问，每天学四五十个词记起来不是很困难吗？但是如果能够利用卡片，采取北京高等学校学习速成俄文的“循环记忆法”，自然容易成功。应用这种方法来记汉语的词汇，北大的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是有经验的。他们在突击词汇的时候，随着词义的浅深，一天可以记80个到100个词。卡片上写出拼音字母、汉字、维文，反复比照着来记，学得很快。词汇与语法同时并进，学生说话和听话的能力可以迅速提高。这是汉语教学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能够胜利完成，阅读和写作就有了很好的基础了。

还有一个学生学习很多的词以后如何巩固的问题。教师可以编制分类的词汇表发给学生，教他们复习。同时可以把词汇表中的汉字抽出来，把声音相同（或偏旁相近）的排在一起，而且把应用这一个字的语词也附注出来，写成另外一种词汇表（例如：发——发生、发展、启发、出发……），这样叫学生一面温习词汇，一面书写汉字，很快可以记熟、念熟、写熟，汉字书写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就得到解决了。

这一些事做完以后，还要结合着复习（包括词汇和语法），展开听话说话的练习。利用讲故事、小组漫谈、讲述通讯报道、重述文章大意等种种方式，使学生熟练知识，掌握技巧，第一个大阶段才算完成。

教学的第二个大阶段是阅读和写作。学生有了以上所说的基础以后，就可以大力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如果单凭课堂的讲授，一句一句地教，收效很慢，必须发扬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教师的帮助下可以逐渐练习独立阅读，阅读也可以分段来做，先读短文，再读长篇的文字。短文的取材必须由浅到深，内容包括的方面要广，要具有多样性，而且要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有联系，像报纸上的通讯报道、有关政治时事的讲话、革命的故事、劳动英雄的事迹、浅近的科学文字、短篇的文艺创作等都是学生所喜爱的。在此

必须提出来引起注意的是：阅读课中除了充分说明读物的思想内容以外词汇和语法还是教学的重要部分。不但词汇、成语需要做充分的讲解，语法的问题也要多做解释和练习。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由此才能逐渐达到能读长篇的程度。其次阅读课中必须着重练习听写和朗读，这样不但可以增强学生听说写看四方面的能力，而且可以使他们所学的更加巩固、更加明晰。

阅读长篇的浅近读物是发展学生阅读能力的最好办法，一方面可以巩固已知的词汇，熟悉它的用法，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地学习很多新的词汇，接触很多不同的句法，进步自然很快。长篇读物中的新词可以先找出来进行突击学习，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以后，学生经过记忆，就可以进行阅读。阅读之前，教师可以先说明大意，指出要点，然后学生阅读。阅读之后，提出问题，由教师解答；同时教师也要提出一些问题叫学生回答，借此可以检查学生的理解能力。这种方法费时少而收效大，可以根据学生的程度试着来做。

至于写作练习是要跟阅读相结合的。开始的时候，教师可以指定一些学过的词让学生用这些词来写他自己要说的话，进一步可以结合着阅读教材提出一两个可以引申发挥的问题叫学生笔答。这样练习几次之后，教师就可以给学生一个题目或一个范围练习写话，先写学生自己本人的事情，然后再写生活里的事情，逐渐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关于这方面，常青同志的“写作教学法”是极有价值的，可供我们参考。

五　教学的方法

教学法是非常重要的。教材没有配置好，固然会走些弯路，可是仅仅教材配置得好，而没有积极的好的教学法，仍然没有用。例如：只知讲述，而不研究如何来讲才可以使学生易于接受；或者强调学生接受的能力差，没有主动地发挥领导作用，寻找更好的方法

进行；或者只重课堂讲授，不能帮助学生复习或巩固；或者没有发扬学生善于理解和体会的能力，对于成绩较差的不去设法帮助。诸如此类，都会影响教学的成功。

关于教学法的问题很多，现在举出四项来谈一谈。

1. 综合教学法。一般教语言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直接教学法，用实物或图片使学生通过认识形象的过程来直接掌握语义和声音。一种是翻译教学法，用学生的本族语言来做辅助的工具，经过翻译，学习另外一种语言。这两种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直接教学法的优点在于学生可以把所学的东西记忆清楚，善于应用；缺点在于了解不易完全正确，也不能真正深入。翻译教学法的优点在于学生可以理解得很清晰，进行也比较便利；缺点在于学生依赖翻译，不善于从听觉视觉的直接感受中去体会去学习。另外还有一种综合教学法，把直接法和翻译法配合着来用，可以兼有上面两种方法的长处。这种方法曾经试用过，从发音教起，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完全直接听讲了。经验告诉我们：惟有练习直接听讲，听和说的能力才能很快地提高。要训练学生直接听讲，教师必须特别注意说话的技术。在上课的时候，说话一定要慢一点，发音要清晰，一个词一个音都要使学生听到，有很深刻的印象，尤其重要的是要用学生已经熟习的正确的句法和词汇来讲，同时要联系学生的生活，始终以口语为基础，逐步提高。这样学生自然容易接受，而且会感觉非常亲切。每讲一种新的东西，必须反复练习，有难懂的或者很抽象的概念，可以用翻译法来帮助，进行的时候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这是应用综合法的一点经验。

2. 练习和辅导的方法。北大教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和朝鲜学生学习汉语，除课堂讲授词汇、口语、语法以外，每一天有一定的练习。练习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课堂作业，一部分是课外作业。另外每天还有课堂辅导和课外辅导。

课堂作业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学生练习当天所学的东西，不但

要使他们彻底领会，而且引导他们反复练习，如对话、造句、听写、重述等各种练习，把学到的知识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经过练习以后，学生通过自学和小组学习，然后提出问题，当天再由教师做课堂辅导。教师辅导的时候，一方面解答他们的问题，一方面提出问题，检查他们是否充分了解，能否应用。这个时间内也可以听录音。最后布置课外作业。课外辅导是请汉族的学生做辅导员，经常帮助学生做实际的练习，并且帮助教师检查学生学习的情况，提出问题做教师的参考。

实施这一套方法的目的就在于帮助学生把学的知识及时巩固起来，而且达到能够灵活运用的地步。教师如果能利用所有的条件给他们造成优良的学习环境，如每位学生都有一位汉族的朋友，或请他们和汉族的学生住在一块儿，经常在一起做文娱活动，教学一定可以“速成”。

3. 复习。知识必须巩固以后才能有用，复习是巩固知识最重要的方法。如果学过的东西经过复习更加巩固，更加明晰以后，自然就有吸收新知识的能力。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经常领导学生复习。学习告一段落以后还要分出时间做一次总复习。在复习的时候，教师要把学生学过的东西做有系统的说明，并且指出重点和复习的方法。如果内容很多，就要规定时间，分步来作。

4. 思想领导与学习领导。在进行教学中教师必须与学生取得密切的联系，教材的难易和进行的快慢是否合乎他们的要求，要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他们学习的情况和他们能否搞好小组学习，更要有充分的了解和帮助。因此要有坚强的思想领导和学习领导。教学能否顺利成功，这也是主要的一个环节。思想领导和学习领导必须密切结合起来，要能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才能收到效果。现在举出一些具体的办法：

（1）组织学生，发挥集体互助的精神。

（2）每一阶段开始的时候，必须先讲明这一阶段学习的目的和

具体的方法，使学生在思想上有明确的认识，同时要鼓舞他们的学习热情。

（3）在进行当中，不但要研究教法，而且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研究学习的方法，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加以指导。对每位学生都要有一份学习情况登记表，他在学习上进展的情况，所遇到的困难，教师都要按时登记，加以研究，找出根源，进行个别辅导。

（4）从思想上启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学习过程中尽量用汉语讲话，同时要创造好的学习方法，很快地掌握知识，具体去运用它。在每一阶段完了的时候要发动学生做小结，交流经验，把好的学习方法加以推广。或者选出学习优良的学生加以表扬，这样可以很快地发挥学生的积极性。

（5）教师要经常和小组长谈话。小组长要汇报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教师也要主动地提出问题做全面的正确的了解。

以上所举的五个问题是结合着一些经验和体会来谈的，其中有的地方说得还很粗疏，考虑得还不够成熟，仅供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参考，希望我们大家从实践中共同创造一套好的办法出来，把祖国人民教育事业中这种重要的工作做得更好，迅速地得到发展并取得成就。

关于语言与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问题①

有机会来参加河北语言文学学会的学术年会，能和许多同行见面，我非常高兴。

河北省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像汉代涿郡的高诱、卢植，都是很有名的研究语言和文献典籍的专家。古代范阳卢氏是一个大的世族，在六朝隋唐间出了很多名人，各位都是知道的。如北齐的卢思道，唐代的卢照邻、卢仝，都是范阳人。东南的钜鹿有魏徵，是唐初的大政治家，对古代文献十分精熟，编纂过《群书治要》。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诗歌也见于《全唐诗》。还有赵郡，也出了不少人才，像唐代的李阳冰就是。他写篆书，当时是第一把手，他说："斯翁之后，唯有小生"，他认为李斯之后就数他了。唐代的李峤、苏味道、李德裕，都是赞皇人。李峤的诗在日本流传很广，很有影响。宋代古文的倡导者柳开是河北的大名人。总之，历史上对语言和文学做出贡献的河北人是不胜枚举的。河北语文学会的会员应当继承和发扬前代的光荣传统，应该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谈我们的语文学会。湖北、广东也都叫"语言文学学会"，简称"语文学会"。我想，语言和文学合成为一个学会，大概是有

① 本文为1982年12月在石家庄召开的河北省语言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

点道理的。语言和文学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讲出很多道理。简单说，文学作品就是我们研究语言的极其重要的资料，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当然，研究语言离不开现代语言、现代方言。可是一牵涉到历史，就必然要利用古代的文学语言资料。研究文学呢？也不能不重视语言的研究，这是很清楚的。我们说话，是一般的口语，写到书面上，就是书面语言。书面的语言在口语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就成了文学语言。所谓文学作品，还要经过作家在艺术、思想内容各方面加工提高，才能在社会上起一定的作用。古代的作品，流传到现在，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我们要研究文学，如果不懂得古人怎样运用语言，古代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样的，古代的语法跟我们现在的是不是完全一样，搞不明白这些，要继承和发扬，岂不是空话？还有，古人的作品中有很多语言很动听，在修辞上有很多特点，是不是也值得研究呢？如果撇开这些不讲，我看把古人文章读懂也不是很容易的，甚至说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研究它的思想艺术了。因为他们写出来的就是语言。这是很明白的一个道理。所以，研究文学的人，不能不重视语言的研究。可是，我特别感觉到，研究语言的人，有时候忽略文学方面的知识，把语言孤立起来看。那也很不好。比如说，我们讲语法，是一种结构形式，那不错，因为语法有一定的规律，古代的现代的都是如此。既然结构有一定的规律，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用数字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我们现在还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把一定的材料、按一定的语法规律储存起来。可是，说一句话是有思想内容的，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如果脱离了语句的内容去讲规律和形式，这就有很多问题说不明白。我并不反对就结构来谈语法，但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疑问，是不是一点意思也不讲？完全不讲表达的内容需要用这样一种结构的原因，恐怕也是不合适的。其次，结构与意义，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应当是内容决定形式。所以研究语言不注意内容不行。比如修辞，现在我们对修辞学研究的还少，古人没有不讲修辞的。春秋

战国时代“出使专对”的一些使臣，都非常善于辞令。看看《战国策》里那些游说之士，简直口若悬河，都有一套说话的本领。研究语言的人，我觉得对文学不能不注意，尤其是现代文学理论不能不知道一些。我们研究的内容，研究的范围，应当逐步扩大起来，要研究古代，也要注意研究现代。语言的风格学，我们没有多少人讲。我在香港遇到一位香港大学的先生，他讲鲁迅的风格学，用英文写了很厚的一本书，而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很少，就是在世界语言学界，对于语言的风格学也研究得不够。我的意思是说，研究语言应当多注意一些文学是有必要的。单独把语言看成是一些零琐的部件，那是不太恰当的。

再说，研究文学的人，我深感到不能不研究语言，刚才已谈了一些。这些年，尤其感到这是一个问题。语言和文学一样，也是一门学问，非学不可，不学就不成，想搞文学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比如说读《诗经》，你不懂得古音古义就读不懂，看清人的书籍也不会懂。读《文选》，要用李善的注本。李善注里面有很多“反切”，他那时没有拼音，都是用“反切”来注的。学一点音韵学的知识，读《文选》那就容易一些。如果某一个字你都念不下来，要把这句话的意思弄懂，岂不很难？古书里面还有很多通假字，为什么这个字能通那个字？清人虽有专讲通假字的书，也没有全讲清楚。只有通晓文字学和音韵学才能解决这类问题。

我国古代的一些有名学者，往往既是语言学家，又是文学家。如晋代的郭璞，他注《尔雅》，注《方言》，注《楚辞》，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是一个很有名的古代语言学家。他不仅注古人这些文献书籍，而且还有发明。他在古人的基础上，又联系晋代的语言实际加注解，这很不简单。说明他不仅知道古书上的意思，而且懂得当代的语言。当然还不那么广泛深刻，可这种做法是很了不起的。郭璞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著作。同时，他又是个文学家，《文选》里不是有他的《江赋》吗，还有《游仙诗》等一

些著名的作品。他既研究语言，又能驱遣词汇，写出很好的诗赋作品。梁代的沈约，不仅是个写了很多诗的诗人，而且深明语言的声音、格律，对韵律很有研究。他认为作文章不能不讲究声音美，主要在于能“上口”，念出来，好听动人。汉语本身就有这样一个特色，就是音节美。沈约讲究韵律，“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前面有个平声，后面最好有个仄声。就是一联之内，两句话之间，互相交错，“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话很有道理，调节音韵，就造成诗的韵律、产生了婉转回环的音律效果。他自己很自负，他说：“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古人都不知道，就他知道，非常自信。确实，惟其有这一点，就对后来唐代律诗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解语言，对促进文学的发展有作用，沈约就是一个例子。谢灵运是南朝宋文帝时的大诗人。据说他还懂梵文，这里不去谈他了。唐宋的诗家，虽然没有专门的语言学著作，可是也都非常重视语言材料的运用。韩愈讲了，要作文，先要识字。欧阳修说韩文“起八代之衰”，他作诗作文都追踪韩愈，诗文虽然有新的境界，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来龙去脉。可是他写的小词就有不同，别具风致。如他的《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这是拿去唱的，所以直抒胸臆，明白如话，这就不是他写《新五代史》那样简古的文字了，大都是当时的口语。虽然也有当时的书面语词汇，可一点也不古奥，都是文人口里所说的词儿。当然还没有像黄庭坚那样大量利用当时的俗语。我觉得，在宋代，没有一个人像欧词那样明快自然的了。可以说有如行云流水，无拘无碍。不是深于领略语言的作用的，就办不到。另外，清代有些朴学家，如顾炎武，他作有《音学五书》，研究古韵，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山祖师，超过了宋人和明人。《音学五书》是很有名的。他的诗也是非常好的。他不是单纯的朴学家。他的著述很多，《天下郡国利病书》《昌

平水道记》《肇域志》《日知录》等书。一个人作学问应当广博。研究语言的人也要研究文学。在文学上应当有一定的造诣。不是要去兼当作家，而是要理解有关文学的一些问题。古代的、当代的，历史的、现在的，都要知道一些才行。

还有钱大昕。他在《潜研堂答问》《十驾斋养新录》里谈语言、语音的问题很多，都非常重要。他所总结的规律，有些是颠扑不破的。其实他的诗也写得很好，向来却很少有人注意。同志们不妨读读看。近代学者像刘申叔，他的《左庵集》《文学教科书》等，有很多地方谈到语言方面的问题，对我们治学很有启示。他对六朝文学也有很深的研究。王国维做学问的面更宽，他在古史、古文字和训诂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可是他同时又是词曲家，他的《人间词话》是极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著作。他自己的词也填得很好，曾自诩能直攀欧晏，就是说可以追踪欧阳修和晏殊。读来也确有独到之处，不同凡响。我讲这些，意思是说，不管作学问、作研究，还是教学，都要多方面地学习掌握知识。

黄季刚先生，他精于研究《说文》《尔雅》。大家看过他的《论学杂著》，我个人深为佩服。而他作的辞赋、诗歌，无一不高妙。这对于我们很有启发。文学和语言要统顾，不要偏于一方面，过于"偏"，则不"深"。我认为一个研究工作者，要做一个通人，从多方面理解问题，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尽管学无止境，而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心思。要谦虚，要多问，要向人请教，这话都可以向青年学生去讲。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勿捷径以窘步为也"。不要净走小道，就走那么一条。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也应当有所注意。学习面通常都是很窄很窄。学生也就满足知道那么一点。当然，听课、考试是必要的，如果只停留在老师讲，学生记，考也只考这个笔记，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这就不妙了。这是一种倾向　把专业搞得都那么专，学现代文学的，毕业论文是这个，考研究生论文也是这个，古代的就不去理会，因为不是他本人的专业，这不成为理由。

学习固然应当有一定的方向，可是，古代的也应当知道，也应有足够的了解，不要“一条鞭”，搞得那么窄。进一步来说，学理科的不学点文学，学文科的没一点自然科学知识，都不行。我们已经看出弊病来了。所以有人提出理科学生要学一点文科的课程。你懂得“x + y”和各种公式定理，能计算得很好，这必要，有用。不过要知道我们还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要交往，要有精神生活；还有一个道德品质、思想修养问题，所以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了解一点文学，学一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是有必要的。老一辈的专家，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都知道得很多。研究语言文学的人，也应了解一些自然科学。今天，时代不同了，科学发展这样快，有些边缘科学出现了，我们不能不有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不仅在生活中需要这些知识，对提高我们的语言文学研究的水平也是需要的。我们应当在这方面作一些工作。哪一方面的知识不足，就应当补足哪一方面，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在的，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多知道一些就比不知道强。对学生，在这方面要鼓励一下。不是说要设多少门课程，而是要指导学生在课外多读一些，或者在选课的时候，使学语言的选些文学课程，学文学的，选一些语言课程，不仅对他是个调剂，而且促使他知识面扩大。对大学中文系来讲，语言文学课程是首要的基础课程，一二年级就要学语言文学基础课，不管将来的专业是学文学，或专门研究语言，都要这样引导，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

我们不否定学有专攻，也不是主张泛滥无涯涘，没有一个方向。我们提倡的是扎扎实实地打一个广博的知识基础，由博返约，进而对自己的专业作深入的研究。就目前情况而论，无论我们研究语言，还是研究文学，都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值得讨论，我姑且提三个问题来谈一谈。

首先是重古还是重今的问题。

侧重古代还是侧重现代，就目前说，我们有些偏差应当注意。

就是我们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割断古与今的历史发展关系。研究现代的，不能不知道古代的。研究古代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了解现代，更好地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这里面取得经验、教益，发展我们现代的学术。所以"古"与"今"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把研究语言作为研究文学的重点，是要放在理解现代上，但又不能不联系到现代以前的历史，不能不涉及到古代的语言，这是我的观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古或重今的问题，应当联系起来看待。研究语言，应当古今并重，而把研究现代作为起点。这就是它的特殊性。对学生来讲，应先知道现代的，然后追溯古代的，再把古今联系起来，说明语言发展的规律。就是由今知古，以古证今的过程。如果学生没有现代语言的知识，不了解今天的语言是什么样子，什么语音的系统、语法的规律他都不知道，你给他谈先秦两汉的语言，他就无法理解，摸不着边际。所以要先从现代了解起。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要真正理解语言，还必须接触方言。现在我们讲普通话，当然首先要对普通话理解清楚。语言的问题很多很多，有各个方面，要想理解它，光学一本《语言学概论》不够。我是这样体会的：应当首先就你口里所说的家乡话去理解语言。我在指导研究生的时候，要求他们古今并重，都要学。但是先要了解现代，让他们暑假或寒假回家时完成一项作业，就是调查自己家乡的方言，把自己家乡方言的词汇、语音、语法的特点记下来，与普通话作一个比较。或者不比较，专门作详细的记录。他们原来对语言的复杂、丰富没有足够的理解，只有一般的一些概念和知道一些肤浅的事实。我请他们回去记录方言，回来就不同了。他们知道了语言的各方面要点，就能够跟普通话做比较，收获很大。要让他们明白古今音的不同，就让他们先了解自己口里的语音系统，然后去跟古代的声韵系统相对照。口里没有浊音声母，对古反切的浊音字须要多注意。凡声韵类别跟自己的口语不同的，都要专门去记。相同的，就不要怎么特别下工夫去记了。口语里没入声怎

么办？就要注意哪些入声字变成“阳平”或“去声”。读古诗的时候要专门注意。例如“德”是入声字，你念“德（dé）”为阳平，就不对了，古人不这样念。我的意思是说作学问要有个方法，有方法就有了捷径。要了解古代，就要以现代为基点，然后去追溯古代。这是古今并重。

研究文学必须要了解文学发展的源流。那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想，古今还不是绝对对立的。如果研究现代文艺理论，那你就应知道，我们自己也有历史传统的文艺学理论。各时代都有著述。我们古人从来对这件事没有放松过。我们可以把它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传统，我们不能忽略丢掉。现代语义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我们可以接受下来。但总得和我们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联系我们的历史。所以，无论研究语言或文学，重点都是理解现代，而又不能不联系到历史。这就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作指导。以此作为根据，去分析问题、说明问题才行。语言随历史发展而变迁。“语言随社会发展而发展”，这是任何语言学书都要讲的一句话，究竟社会的发展怎样和语言的发展连到一块，这就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到底什么影响到语言的发展呢？语言有它本身发展的规律，这个本身的规律又是什么呢？这两个规律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就要联系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联系到我们民族的特点等等。这些都应当联系起来思考。这才是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单纯讲语言的自身发展规律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语言是活的，是社会的产物，不是一代人，也不是自然科学家某一项技术创造。它有它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研究语言，就要联系到过去民族历史的各个方面。

研究文学亦是如此。文学本身有他的规律。不同的文体，不同的作品出现，跟社会都有一定的联系。就它的本身看，总是从民间产生。无论五言诗、七言诗，无论词曲、小令，都是从民歌演化而

来。但它在某一时候出现，某一时代才有，这就要跟社会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比如佛经传入中国，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我们的小说故事，有不少是从佛经中吸取来的。当然又经过改造，跟我们民间的东西结合起来，变成了新的东西。“说因缘”是从佛经来。唐代变文的出现，是当时佛教流行，大规模修建寺院的结果。佛教徒为了引起听众兴趣，求得施主的布施，在佛经中加进了世俗故事，进行演述，讲得天花乱坠，以致于倾城士女都来听大和尚讲“经变”。这样变文就出现了。我们注意到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都市里的生活是什么情况，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又是什么情况，一起联系起来看就好了。不理解这些，是不行的。因此，我感到，我们不要割断历史，把古今对立起来，而是要上下联系起来看。

总之，无论研究语言或文学，对于中国的历史，包括文化史、宗教史、政治经济史、交通史都得研究。比如刚才讲的唐代赞皇为什么出那么多文人，这与当时的世族势力有关系。与六朝以来的门阀势力有关系。所以，我们从这些历史事实出发，就知道我们要研究理解一个问题，不能不广泛理解事物的各个方面。一个作家、作品的评价，应当放到当时的历史时期去看，而不能用今天的眼光，今天你所想象的这个人应当具备的思想境界去衡量这个人。毫无疑问，古代是封建社会，这些文人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当然是这样的。这还用说吗？有的文学史，最后总有这么一句话：“他的作品里面还有糟粕，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话等于没说。我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单纯，都一律公式化。讲作家作品的特点，唯有了解他与历史互相联系的各个方面才能讲得清，讲得透。公式化的讲法是不行的。如果对19世纪外国文学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吗?）不理解，你能理解30年代吗？你不理解30年代，研究当代文学又从何谈起？这也是历史，应当古今并重。姑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其次，是理论与实际应用问题。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实践反过来丰富理论。我这里谈的是理论与实际应用，以及与实际工作怎样结合的问题。要理解理论，就得实践。搞创作，不深入社会生活，自己不去调查研究，没有好好地与群众结合，你的创作就往往空洞，写不出好作品。研究语言，不了解自己口头的语言，不了解自己的方言，学了一些空洞的理论，什么《语言学概论》啊，什么《语言基础知识》啊，等等几大本，你还不能应用理论解决问题。我主张理论要与实际应用、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怎样结合才好，值得大家讨论。大家都很注意语言各个方面的研究。从大会提交的论文看，不少是关于古代汉语的，现代汉语的。我们还有一样工作应当重视，那就是语言教育。

语言教育，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以至于大学，究竟我们怎样使儿童、青年在最短时间内掌握祖国的语言，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我们先读了一些理论，是不是应当作一些实际工作呢？如汉字，总还是要教他们认吧！那么究竟怎样认呢？应当先学哪些汉字呢？汉字字音也很麻烦。如果一个个去认，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怎样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中把时间缩短一点呢？如果我们就汉字形声字多这个特点来观察一下，可以看出同从一个声旁的，字音往往相同，或相近，四声也许稍有变化。可以一看声旁就能够约略估计出这个字怎么念。当然还要剔除例外，不能一概而论。只要我们能找出汉字形声字的常见的声符是哪些，我们就可以先教这些声符。这些声符的读音知道了，一连串的常用字也就容易认识了。在教学工作中，会使老师、学生受益不浅。这就是实际工作。

过去，我们仅停留在笼统的几句话上，说形声字很多，占汉字的80%以上，读音有的相同，有的不相同等等。但究竟有哪些呢，闹不清。我们在科学上讲统计，讲数字。我们在语言教学上也应有一点科学思想来提高教学的效率，知道应先教哪些，后教哪些。总

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则来。

汉字书写，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字应当怎样写，怎样才能写好，在座的同志一定深切感觉到这是一个问题。好多学生字写得难看、难认，主要责任在于我们，在教师，在我们的教育方法。过去写毛笔字讲“永字八法”。现在我们不能用那一套了。但还要教学生写毛笔字，写钢笔字。这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能不研究。

说到学习词汇，应当让小学生先掌握哪些词，中学生又应当掌握哪些词，都值得考虑。在小学我以为基本词汇应当先学，进一步讲明用基本的单音词怎样组合成许多双音词，怎样教法也是一个实际问题。总之，我们要在教育上用最短的时间，使学生收益最多，要收到最好的效果，这是进行教育的起码原则。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做些建树性的工作。

目前，我们大学的现代汉语课问题很多。语音、词汇、语法从头讲起，一点一点学。费的时间不算少。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属于综合性的，如果把一些东西提前，在小学进行一部分，在中学进行一部分，是不是好一些呢？值得我们从事语言教学的人在这方面作一些实际的研究工作，把理论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空谈没有用。这样做，中学语文打好了基础，在大学，课程就不需要安排很长的时间了。当然，现代汉语还要讲，但时间要节省一些。

古代汉语课也很麻烦，我们给学生选了读物是必要的，课本也是必要的。古汉语课本，现在也出了足有五六种。但是怎样编课本，因循守旧，脱离实际都不行。古代汉语课本到底怎么编，值得研究。不能选来选去老是《七月》《捕蛇者说》《伤仲永》《赤壁赋》，跳不出这个圈子去。前人编辑选本的目的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要求表示选者的文学主张，编者自己的文学志向。选本另外一种要求是从文体的发展或不同作家的风格来考虑，编成一集。《古文观止》所选都是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名作，作品是好的，但对精通古代汉语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收益到底多大？实践过没有？考

虑过没有？很难说。恐怕就是“神而明之”吧。当然教师在利用选本时会有高妙的主意的。比如说，这一段着重讲什么问题，那一段讲什么问题，这确实很好。可是真正让学生了解古代汉语，是先读先秦的好呢？是先读两汉的好呢？还是先读明清的好呢？这就有不同的见解了。开头就是《荀子·劝学》“学不可以已”。学生好念吗？好理解吗？我们应当认真想一想，减少盲目性，避免少、慢、差、费，多一点科学思想和方法，提高计划性、目的性，这是我们搞语文教学所需要的，也是研究语言的人需要做的工作。不要认为这是不重要的。自己写一篇高深的论文发表了，固然有价值，研究出用科学的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同样有价值。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即理论与实际应用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继承与借鉴的问题。

我们深深感觉到，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新时代。无论在哪方面，对于以往的科学成就和实践经验都应当吸取，不应当弃置不顾。我的意见是说，我们对于过去的东西还理解得不全面、不深刻，对于前人所作的成绩，我们还知道得不够，缺乏深入地研究和总结。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不足，就应当对以前的一些东西作一些具体的实际的调查搜集、整理工作，贯穿起来，作出系统的叙述。这些工作，我们都没有做。比如自然科学，我们古代有很多成就。不仅那几项重大的、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极大影响的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等，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探讨。英国人李约瑟写了一部书，叫《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翻译过来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研究或研究甚少呢？晋人葛洪的《抱朴子》里就讲到了化学，李约瑟看到，我们却没有挖掘。我们讲经络、针灸几千年了，至今治病靠经验，还不能上升到理论上去。一位瑞典学者右腿长年不利于行走，多处治不好，今年暑假他告诉我说：来到中国治，一针就好了，几年都没有犯。对我们的针灸赞不绝口。欧洲也都在研究我们的针灸学。经

络针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现在我们自己还没有讲明白。中华民族过去有着悠久的文化，可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西方语言学界最近又出了几本讲汉语音韵、语义的书。可是我们自己至今还未对音韵、训诂作一个系统的总结，这是不应该的。文学也是如此。文学史一本一本出版了，可是要把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些问题都讲清楚，一时还做不到。我们还要做很多研究工作。由个别的研究，再提出概括性、总结性的东西。过去的研究成果都应当有个总结才能继承，以适应今天的需要，向前发展。要继承优良的东西，就一定要把总结搞好。如果写了一篇文章，而别人早写过这个题目了，你心里会很不舒服。人家说过了，我还讲什么。可是古人已经说过的，我们还不知道，还以为是自我发明，那好吗？所以我们应当有辨别地继承古人的东西，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求得发展。所以，无论是研究语言的，还是研究文学的，在这方面应当注意。

说到借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借鉴古人的，一方面是借鉴外国的。借鉴与不借鉴有很大不同，这是人所共喻的。外国的一些有用的科学知识，可以用来发展我们的研究工作。外国的东西要学，一定要学。人家在前进，我们还没前进，我们就要吸取有用的东西，促使我们前进。人家能的，我们也能，就在于我们是否善于学习人家有用的东西。怎么借鉴呢？不是全听人家的，而把自己的东西都忽略了。社会的情况不同，各有特点。他们有些东西对我们有用，我们要吸收，要学，但是也不要偏。各国的情况不一样，特别是人文科学，外国喜欢搞标新立异。他们有科学的头脑，善于找门路，我们得承认。但他们的目的是争名望，他们不搞标新立异就站不住。所以，我们在吸取外国的学术成就时，还要有鉴别力，一定要防止盲目性。

以上所谈，都是自己在工作和研究中想到的一些问题。主持大会的先生既然要我讲一讲，我就借此机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说说自己的看法，没有什么系统，信口谈出，请各位多多指教。

编写《现代汉语》教材的一些问题[1]

今天在这里参加审阅《现代汉语》统编教材的会议，心里非常高兴．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多年不见的朋友了，特别是在这暑热的天气里，很多同志由远路专程来到这里，群英硕彦，济济一堂，正好可以乘这个机会向各位请教，所以心里格外地高兴。山东大学的同志为我们选择了这样好的居住环境，使我们得以很好地工作，非常感谢。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会开得很好，胜利地完成教育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前年我在兰州的时候，黄伯荣先生就跟我说正在同兄弟院校的同志一起编写一部现代汉语教材，并且谈到编写方面的一些问题。后来知道很快有了成稿，又经过反复修改，去年就有了印本，拜读之后，非常钦佩。对词汇部分我曾提过几点意见，以供参考。今年又出版了下册。这种为提高高校教学质量而努力工作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前天各方面的同志都表示希望我先谈谈，我原来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的，可是大家叫我先谈谈，我想可能是因为 20 年前我教过现代汉语语法，也教过现代汉语的全部课程，并且曾经在高教部的

---

① 1980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3 日在青岛召开了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试用本）统编教材审稿会，本文系根据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题目为编者所拟。

领导下主持过制订《现代汉语教学大纲》，1957年的时候又着手编写过高教教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不很清楚。不过由此引发出我有一种感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56年《现代汉语教学大纲》就是几个学校教现代汉语课的教师的集体创作，内容就是现在这本教材的几部分内容，只是没有修辞。那时我计划早日完成编写教材任务。1957年写成绪论、语音、文字三部分成稿以及语法大部分的初稿。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搜集了大量语法例句，卡片有几千张。加上词汇部分，再有一年多就可以完成。可是1958年“双反”、反白专道路，关于现代汉语这方面的大字报就很多了，可以说是纷至沓来。后来我也不教现代汉语这门课了，转而教汉语规范化问题和其他有关的专题课。这样，我的工作也就没有完成。今天在许多当时一起讨论大纲的同志面前，感到非常惭愧，没有提早完成编写教材的任务，内疚很深，而且觉得很可惜。因此，我就想了，如果我们1957年实行这种分工合作的方法，那也许在1958年初也就有成书了。那是多么好啊！不过随后几年同志们也没休息，也都各有述作，开出不少绚烂的花朵。

现在这个教材，基本上是根据1956年的教学大纲编写的。几方面的同志发挥集体的智慧，并且得到其他院校的支持而写成这部教材，我通读了一遍，确实受益不浅。同我过去没有想到，或想到而力有不逮的情况相比较，真是大胜于前。同志们利用了各方面有利的条件，相互切磋，反复修订，为发展我国的语文教育精进无已，实在令人欢欣鼓舞。这是我个人一点感想。我感觉同志们这种积极努力工作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编写一本教材确实很不容易。吕叔湘先生昨天说到编教材有三难，讲多少，讲什么，怎样讲，都要仔细斟酌。这三点也正是审稿所应注意的。一本好的教材，本身也就是一部科学研究著作，代表一定的科学水平。教材的针对性、科学性、系统性，都要强；同时文字本身要能引导读者喜欢读，具有吸引力，条理清楚，层次分

明，论点明确。文句要生动活泼，例句要富有趣味，这都是需要用心考虑的。所以说要编写一本好的教材确实不容易。像吕先生的著作写得那样清新隽永，像丁声树先生的著作写得那样清通明畅，两位先生的著作逻辑性都很强，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常跟朱德熙先生谈到写作之难，写教材尤难。吕先生说的这个三难正是关键所在。

就现在这两本教材来看，除了上面所说的五部分，又加入了修辞一部分，这是完全必要的。在这本书的绪论部分第三节里曾提到现代汉语课的性质、内容和任务，指出："现代汉语是高等学校的一门基础课，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作指导，以党的语言文字政策为基础，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地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为以后从事语言文字工作、语文教学工作和现代汉语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书里面提出的任务，根据书里提出的这几项任务来看，这个教材是不是做到了一定的程度呢？估计这本教材在教学上能不能收到一定的效果呢？这也是我们审查这本教材时应当侧重的一面。

就本书的内容来看，是按照 1956 年的教学大纲来安排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再从细节、每一章每一节的安排来看，我认为层次很清楚。许多同志都曾经细心讨论过。比如语音和文字这两部分，章节次序都摆得很明确。在高等学校需要讲的科学知识，我看大体都具备了。根据上面的任务，既要把基础理论、基本知识讲出来，各方面都要照顾到，同时也要注意到知识的实际运用，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本书在这两方面都能照顾到，这是很好的。例如在语音方面，有很多练音表、正音字表，虽然列为附录，我觉得很有用处。对于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学生来说，要掌握普通话的语音系统，这些材料都很有用，无形中起到了推广普通话的作用。在当前推广普通话也还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一点正符合前面所说的，在

教学上要以党的语言文字政策为基础，不同地区的同学，来到学校说不同的方言，应当使大家很好地掌握普通话，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我感觉语音这部分内容相当完备了。语音里面还有一节专门讲朗读，这是我们从前没有注意到的，过去在现代汉语教学大纲里也没有提到。朗读正是应用语言学里的一个具体问题，也是从事语言教学和广播工作的人应有的知识。对师范院校的学生，这项知识尤其需要。他们大部分将来要作中学的老师或大学的老师。在中学里如何把语文教好，这是大家当前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教师要能读课文，语音要正；其次要能把原句的音调、节落以及语气等都能读得很正确，很美。这样学生就在无形中有一种感受。学生学语文一般是自治，很少提倡朗读、朗诵。但朗读、朗诵很重要。学生要学好语文，要多读一些文章，在读的时候增加自己运用语言的能力。朗读这一节不管写得如何，只要标举出这样一个题目，在现代汉语中占有一个地位，这就很好。我是赞成的。这是就语音这方面说的。

语法这部分，有一节，即第五节，讲句子结构上常见的错误。这一节可以使学生认识学习语法的重要意义，并且帮助他们学会运用语法知识来修改病句。一般说来，同学们在学习语法的时候感到有些复杂，或者对语法术语了解得不透彻，感觉纷扰难懂。在学习过程中，有时囫囵吞枣，勉强记记背背，没有深刻理解学习语法的重要意义。要想学生真正了解学习语法的重要意义，必须拿许多不合语法的句子给他看，叫他运用学过的语法知识去改正它。这就很重要。如果他改一改，改对了，就有了收获，自然会产生学习兴趣，而且学到的知识会更加巩固一些。他在写作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些不妥当的句子，可以让他先念一念，看是否合乎平时说话的习惯。有时他们会感到有些别扭，这时，让他进行分析，找出不合语法的地方在哪里，这样就会有所提高。学了语法能改正自己的文章，这就很好，就达到了提高分析、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目的。我

觉得这一节很重要，希望再增加一些例句，加以申说，使学生认识到学习语法确实很重要。

全书在适当的章节后面都附了思考与练习，我很感兴趣，看了大部分。思考题目可以使学生把前面已学过的知识加以概括，复习前面的理论；后面的练习题可以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书中练习的例子还相当丰富。思考与练习，起到了巩固知识和训练运用知识的作用，这说明编写的同志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还是比较周到的。

书中语法部分分析语法现象颇为详备。就是说，不同的语法结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讲不同的句法和分析句子的结构的时候，各方面都能照顾到，没有谈到的不多，这也是一个优点。当然有些地方还谈得过于简略。有时仅举一个小例子就完了，很不够，应当多举几个例子，两个或三个，前面一个简单一些，后面一个可以稍微复杂一些，这样可以使学生理解得更透彻一些。这样说，在举例方面，也不无缺点。可是在练习里所举的例子，倒做到了多样化，课文里举例少，练习里举得多，句子也长一些，给学生一些练习的机会，这又是个优点。不过这方面也要进行分析。课文讲得少或例子比较简短，而练习的例子比较复杂、学生看到这些问题，是不是就能够解答呢？也许只能解答一部分，不能全部解答。如果后面附上答案，固然便于自学，但是学生也可以偷懒，自己不去用心思考，失去练习的意义。我想是否可以在练习中再调配一下，把不易解答的问题加些提示，或者好一些。书本在复句一节里列了一些表格，很便于学生理解，这是值得称赞的。

在修辞这一部分，除了讲述一般的修辞格以外，还讲到词语的锤炼和句式的调整，都是属于实际运用语言的知识，这对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会有很大帮助，不过还嫌讲得少了一些。

我看了两本书各个章节以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印象，就是编者把多年从事教学所积累的经验大都表现在这里了。这是一个事

实，不容否认。

这本书由于是集体编写的，所以各部分的分量不一样。当然内容没法平衡，这是很自然的。例如语音这部分特别详备，文字部分就少了一些，我并不是说要等量齐观，要求字数一样，而是考虑在教学上如何安排匀当。从进度、进程多作考虑。在课本前面最好写个使用说明，指出各部分如何调配，时间如何安排。书中有个别章节还薄弱一些，小毛病也是有的，有个别提法还要认真考虑，说得更确切一些。例如文字部分第四节讲汉字改革的方针和当前的任务一段，就需要根据目前文字改革的工作方针有所陈述。其他细节就不多说了。词汇部分，我已提过一些肤浅的意见，听说已有所改动。语法方面有些问题在语法学界中意见尚有分歧，本书可备一说，经过试用，再使其逐步完善。

总之，我的意见是本书可作为统编教材来试用。这是个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是否确当，还要大家来讨论。

任何一本书要做到很美备，总是要经过不断修改增订的。有些地方还需要仔细审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内容多寡是否合适、例句是否妥切，讲到例句、要特别注意例句的时间性，不合适的不要选。我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在这里只是提醒一下。另外，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语音有正音，文字有正字，是否词汇部分加一节，讲讲怎样克服用词不当的毛病。

过去常讨论学习现代汉语与写作有什么关系，多少年没搞清这个问题。同学们觉得学了些知识，写作还没有多少长进。这要从教育学上研究。但其中至少有一个问题，就是学生学了知识而在运用知识上没有自觉的能力。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努力去解决。在讲现代汉语课的时候，要尽量培养学生善于运用语言，不断提高写作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词汇和语法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可用一章一节专讲讲如何克服用词不当的毛病，作个总结性的、有条理的、有例

证的说明。总的来说，书中词汇一章，在理论方面讲了些东西，还可以就实际运用中的一些现象做一些分析比较，给一些指导。

第二、语法里标点符号可否独立为一章。按道理应该独立为一章。因为标点用法并不完全与语法有关，这一节可以放在修辞后面。语法修辞连贯在一起，标点符号就放在最后，但讲述上不一定放在最后。

第三个建议是有关语法分析的问题。以平时治学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要解决一个问题，应当从多方面入手，不限定要用一个方法去解决，有时一个方法、一个观点还不行。校书就是这样，你光用一个本子是不行的。本着这个认识，联系到语法，完全采用一个方法就可以做得很合适，也许不行。语法是有规律的，但是在一个句子里，意义和结构还是有关联的。有些句子，还得用意义作线索帮助结构的分析。我觉得综合分析也许有些好处。从结构层次入手，学生可能更容易理解。总之，要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看，不断找出好的办法。

第四、这本教材有修辞部分很好。可是语法、修辞与逻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在适当的章节里，根据语法修辞内容的需要，谈谈逻辑问题呢？怎么讲。正是吕先生讲的三难之一。这个问题可以从目的需要出发考虑是不是有必要。吕先生和朱先生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就有逻辑一节。

第五、全书在文字上还要加工。有些提法不妥切的要加以修订。文辞方面也要多加考虑。有些地方上下文句不那么接气。例如上册第十五页讲到文字部分的教学任务时说“使学生正确地使用汉字，做文字改革的促进派”，文意不顺，可否改为“使学生正确地使用汉字，避免写异体字，写错别字”。书里还有个别地方用词不准确，也要注意。其他细节，这里就不一一多举了。以上几点建议，谨供参考。耽误大家很多时间，谢谢！

汉语规范化的意义①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已经在上月底胜利闭幕了。这次会议根据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所通过的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决议而进行关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学术讨论，是非常及时的，而且是必要的。

会议作出的重要决议和提出的为实现汉语规范化的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完全是正确的。我们拥护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且决心为完成会议所提出的任务而奋斗。

汉语规范化是与推广普通话相关联的。普通话就是汉族的民族共同语。民族共同语的规范问题是全国每一个使用汉语的人都应当关心的问题，而且有责任为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关于汉语规范化的意义，也许有些人不很了解，在这里，简单地谈一下。

所谓语言的“规范”，就是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大家所公认的标准的总和。所谓“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确定并且用宣传、教育等方式来推行汉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各方面的明确的一致的标准，使大家共同遵守这个标准。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最重要的语言之一。汉语的词汇是丰富的，语法是精练的。我们不能说汉语没有规范，我们只能说汉语的规范还有不十分明确的地方，需要加以研究，把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确定下

① 本文载于《语文学习》（上海）1955年11期。

来。对于语言使用上的一些分歧混乱的现象，还要分别处理，使不一致的趋于一致。这就是规范化。

语言规范化的问题是在语言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民族的统一，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巩固，国内各地区之间联系的发展，统一的教育，人民文化生活的普遍提高等等，都使语言规范化的问题成为重要的问题。

汉语的民族共同语早已形成起来，汉民族语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类型的伟大民族的语言。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汉语的规范问题。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就号召全国人民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成就，跟党和政府的领导更是分不开的。在今天，为了团结人民，为了早日完成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促进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语言规范化的问题更有突出的重要性。

汉语规范化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全国人民应用的书面语言虽然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方言的差异，口头语言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没有完成统一。所以语音是汉语规范化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是词汇、语法的问题。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问题性质不同，必然要分别处理。规范化的目的要求就是要使民族共同语早日完成统一，使其精密和完善。

语言是一种客观的现象，人们自然不能按照任何个人的意志而把它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听其自然，任其分歧。人们对于语言有促进统一的力量，这种主观的力量是值得重视的。假如我们认识到了语言的发展的正确方向，确立了一定的标准，大家向同一目标前进，那就能帮助语言尽快地完成它的统一。

规范不是随意来定的，而是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来定的。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一天比一天扩展，会说普通话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这是整个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趋势。我们现在要大力推广普通话，把北京语音确定为标准音是完全正确的。

汉语规范化并不意味着马上要消灭方言。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它的稳固性，有时表现出一种相当大的生命力，所以方言还要保存很多年。不过在民族共同语发展时期，方言之间过去所有的那种明显的界线会逐渐消失，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削弱，各方言区的居民会越来越多地转用民族共同语，这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汉语中词汇、语法方面的一些分歧的现象，我们又怎样来处理呢？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一方面掌握语言的发展规律，依照规律来确定共同应当遵守的规范，一方面还要根据语言中的需要和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精密性来决定。词汇和语法形式都不是可以主观地任意地加以弃取的。我们必须把语言中词汇和语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语言中不应当有的分歧现象区别开来。凡是在不同文体上具有不同修辞色彩而且是需要的东西，一定要保留的。我们不应该认为规范化就是要把一切的语言组成成分都规定得死板板的，而削弱我们伟大的语言固有的优美和丰富。

汉语规范化的工作是当前迫切的工作，为了发展文化，为了提高人民文化的水平，为了早日胜利地完成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个工作必须迅速地开展。对于汉语规范化的社会意义需要广泛宣传，使每一个使用汉语的人对于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都有明确的认识，共同为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普通话的正音问题[1]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首要的工作是要使各处说不同方言的人都能掌握北京语音。要掌握北京语音，这就联系到正音的问题。北京语音是普通话基础方言北方话的代表，北京音的语音系统是能代表北方话的共同趋势的，但是并非把北京音的一切读法都整个搬过来，北京的一些土音当然不能做为标准读音。对于北京语音的一切读法，如何取舍，就是正音上的一个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共同来讨论，来研究，使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进展得更快，使汉语语音规范化得以早日实现。

关于正音问题，不能不先确定一些原则，做为研究具体问题的依据。我们大家共同认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指北京语音的声音系统来说的。

北京语音的声音系统自有它的内在规律，当然不宜有所增改，因为语音是构成语言的材料，一个词有一定的读音，改变语音系统就会牵涉到语言里的词的意义和语法的构造，就会造成语言的混乱。但是我们为什么又说不能把北京音一切读法都整个搬过来呢？这是说个别一些词的读音，如果普通话的基础方言里大部分都不这样读，在牵涉整个的北京语音系统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不采用北京的读法。因为普通话是说出来要人人都能听得懂的，普通话与基础

① 本文载于《中国语文》1956年5期，1986年12月重订。

方言是相联系的，不能以个别的某一地点特有的土音机械地搬过来做为普通话的读音。虽然是北京的读音，也需要加以选择。因此在正音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注意某一些音是否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这是就北京音和基础方言内其他地方的异同来说的。

就北京音而论，我们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还应当以一般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人的语音为标准。因为语言是交际工具，同时也是发展文化的工具，在民族文化一天比一天提高的时候，全民语言的口语规范必然与文学语言的书面形式日趋接近。我们文学语言的规范必然是以学校教育、讲演、广播以及电影话剧上所应用的语音为准。一般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在读音上往往带着很重的土音，有些词还可能读错，所以我们需要以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人的语音为准。我们要建立起文学语言的发音，就必须肯定这一点。

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会话的音和读书或向群众讲演的音不完全相同。文学语言的发音也必然不采取日常会话的音而采取读书音。因为读书音往往与历史传统的读法和一般方言的读音相合。我们要确定全民的语音规范，应当以读书音领导口语音，而不应当采取在日常会话当中所有的变音。这样才能合乎全民语言发展的规律，才能取得各地人民的承认。例如“把”（bǎ）北京人在日常谈话中有时说“bǎi”，“棉花”（mián·hua）有时说“mián·huo”，这些就不能作为标准。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讲正音，是针对一个个词的读音来说的，除了一时不能肯定的以外，每个词最好只有一个读法，这样才能使口语逐渐趋于一致。现代汉语里复音词是占绝大的优势的，但是单音词还不少，一个单音词作为单词来用跟用作一个双音词的组成成分有时读音不同，例如“给”单用读“gěi”，在“供给”一词里读“gōngjǐ”，“剥”单用读“bāo”，在“剥削”一词里读“bōxuē”。这是就一般的读音来说的。“给”老的书音读“jǐ”，“剥”老的书音读“bō”，现在一般读“给”为“gěi”，读“剥”为

"bāo"，未始没有区别单音词的同音词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正音上也需要注意怎样便于区分同音词的问题。这样对于将来实行拼音化会有很大的帮助。

以上所谈是一些基本原则。根据以上所说的基本原则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正音上有哪些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怎样处理比较适当。

一 同义两音的问题

一个词有不同的读音，有些意义相同，有些意义不同。意义不同而读音也不同的，当然要保存读音上的区别。意义相同而有两种不同的读法的，就需要加以选择。同义多音的内容很复杂，有的是读书音，有的是口语音，有的是口语里的变音，有的是新起的读音。遇到这种情形，怎样处理是一个大问题。关于这一类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这里只举一些主要的情况来谈一谈。

1. 已经不通行的读音可以不采用。例如：

我	wǒ	（旧音 ě）
肉	ròu	（旧音 rù）
窄	zhǎi	（旧音 zé）
贼	zéi	（旧音 zé）
缩	suō	（旧音 sù）
麦	mài	（旧音 mò）
脚	jiǎo	（旧音 jué）
钥匙	yào·shi	（旧音 yuè·shi）
喝彩	hècǎi	（旧音 hēcǎi）

2. 适当地照顾语音的系统性。例如"理发"有"lǐfà""lǐfǎ"两读，① 但"白发"读"báifà"，为求一致，不采用

① 《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已改为统读。

"báifǎ" 音。

3. 取与北方方言和古今音演变条理相合的音。例如：

"波"有"bō"，"pō"两音，采用"bō"，不用"pō"。

"含"有"hán"，"hén"两音，采用"hán"，不用"hén"。

"谁"有"shuí"，"shéi"两音，采用"shuí"，不用"shéi"。

"耕"有"gēng"，"jīng"两音，采用"gēng"，不用"jīng"。

"提"有"tí"，"dí"两音，采用"tí"，不用"dí"。

"混淆"有"hùnxiáo"，"hǔnyáo"两音，采用"hùnxiáo"，不用"hǔnyáo"。

"气馁"有"qìněi"，"qìnuǐ"两音，采用"qìněi"，不用"qìnuǐ"。

4. 适当照顾北京音发展的趋势和新起的读法。凡是具有极大普遍性的，都应当采纳。例如：

"危险"有"wēixiǎn"，"wéixiǎn"两音，"wēixiǎn"一音已经具有普遍性，应当采纳。

"诬赖"有"wūlài"，"wúlài"两音，"wūlài"已经具有普遍性，应当采纳。

"暴露"有"bàolù"，"pùlù"两音，"bàolù"一音已经具有普遍性，应当采纳。

二 轻音问题

轻音在北京音里应用得比较广泛，有些词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例如"大意"跟"大·意"（疏忽）不同，"冷战"跟"冷·战"（发冷而颤抖）不同，"地道"跟"地·道"（指货物真实，如"东西很地道"）不同，后面一个音节都读轻音。有些词有区分词类的作用，例如"报告"是名词，"报·告"是动词；"练习"是名词，"练·习"是动词。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词，如复音单纯词（葡·萄，玻·璃，

模·糊)、并列式的双音词（规·矩，朋·友)、带词尾的词（桌·子，石·头）和重叠式的动词（看·看，试·试）等，后面一个音节都读轻音。[1] 这些都没有问题。可以照北京音来读。

但是在北京话里有些词后面一个音节也可以轻读也可以重读，如果没有区分词义或词类的作用，最好一律采取原来的读音而不读轻音。例如：

记录　介绍　节目　坚固
支持　谨慎　职务　经费
成就　限制　仪器　待遇
修理　敷衍

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在北京音里，由于一个音节读为轻音，结果又产生一种变音，这种变读只见于日常会话里边，不宜采用。例如：“拾掇”（shí·duo）后面一个音节是轻音，有时说成“shí·dou”，“笤帚”（tiáo·zhou）后面一个音节是轻音，有时说成“tiáo·shou”，“唾沫”，（tuò·mo）后面一个音节是轻音，有时说成“tuò·mi”，“耳朵”（ěr·duo）后面一个音节是轻音，有时说成“ěr·dou”，诸如此类都应当照原来的音来读，不应当采用变音。

三　儿化词问题

儿化词不仅北京有，在基础方言内的其他方言里也有，但是在吴语、粤语、闽语里就没有。北京音里哪些词可以儿化、哪些词不能儿化，不会说北京话的人很难捉摸。在正音上我们可以跟处理轻音的办法一样，除了必须儿化的以外，一律不儿化。

北京话里儿化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表示小的意思。如“小孩儿”“小猫儿”“小床儿”，等等。

---

① 参看徐世荣《双音缀词的重音规律》，《中国语文》1956年2月号。

2. 区别不同的意义。如"花"、"花儿","心"、"心儿"(菜心儿),"肝"(人的身体的器官)、"肝儿"(牛羊的"肝"),"头"、"头儿"(没头儿),"手"、"手儿"(有一手儿)等。

3. 有"儿"无"儿"词类不同。如"吃"、"吃儿"(没吃儿),"讲"、"讲儿"(这个字没讲儿),"绊"、"绊儿"(使一个绊儿),"盖"、"盖儿"(瓶子盖儿),"卷"、"卷儿"(一卷儿),有动词和名词的分别;如"亮"、"亮儿"(没亮儿),"尖"、"尖儿"(没尖儿),"远"、"远儿"(绕了远儿),"准"、"准儿"(没有准儿),有形容词和名词的分别。

4. 表示特殊的意义。如"芽儿""玩儿""一会儿""一点儿"。这些都是与词义有关系的,而且在基础方言内也比较普遍①,应当保留,对于南方人学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

不过,北京话里还有很多儿化词,例如"村儿""梗儿""穗儿""绳儿"之类,都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在普通话里是不是需要保留,就值得研究。我们也可以应用"村子""梗子""穗子""绳子"来代替,这样可能跟基础方言以外的方言更接近些。这就牵涉到词汇规范化的问题了。一般说起来,受过学校教育的北京人口里说的儿化词并不很多,例如"手腕儿"说"手段","围脖儿"说"围巾"。因此,凡是可以儿化也可以不儿化的词,在正音上都可以采用不儿化的读法;在词汇方面可以不用儿化词的也可以用其他通用更广的词来代替。这样对于推广普通话将起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没有牵动北京音的语音系统。

四 地名和方言词语及外来语问题

地名应该适当地按照当地的读音来读,这样才能使人听得懂。

---

① 各处读音不一定完全相同。

例如河南渑池县，河南人都读“miǎnchí”，而字典一向都标“mǐnchí”，这是不正确的[1]。又如叶县，当地人说“yèxiàn”，而没有说“shèxiàn”的，字典音“shèxiàn”也是不合适的[2]。字典的音大部分都是根据古代的读书音来拼的，往往与当地读音不合。凡是这一类都应当改正。例如：

山东“莘县”音“shēnxiàn”，不读“xīnxiàn”。

四川“垫江”音“diànjiāng”，不读“diéjiāng”[3]。

湖南“茶陵”音“chálíng”，不读“túlíng”。

广东“番禺”音“pānyú”，不读“fānyú”。

这些地名的读法都应当根据当地的音来读。

至于方言词语有些已经吸收在普通话里而且有了一般通行的读音了，当然应当照已经约定俗成的读音来读。例如“垃圾”读“lājī”，不必照方音读“lèsè”。但是有的还没有完全通行，如果有人应用在文学作品里做为一个方言词来使用，那就应当照方言来读。例如“尴尬”音“gāngà”，不宜改作其他念法。

另外就是外来语的问题。外来语中有些是古代或近代输入的，过去已有沿用的一致读法，当然不需要改动。如果有两种不同的读法，例如“月氏”有“yuèzhī”“ròuzhī”两读，“卡车”有“kǎchē”“qiǎchē”两种读音，“卡片”有“kǎpiàn”“qiǎpiàn”两种读音，就应当确定一个读法。现代新吸收的外来词，凡是译音词或一部分译音的词都不必按汉语的声调来读，可以一律按接近的语音来读。这里会涉及很多专名译音的问题，希望各学科部门能够在译名上做一次审定，使各种译音的名词更接近原文的读音，同时要合于北京语音的声音系统。总起来说，普通话的正音问题是当前为推广普通话

---

① 《新华字典》1971 年修订重排本已改为 miǎn。

② 《新华字典》1971 年修订重排本已改为 yè。

③ 《新华字典》1971 年修订重排本已改为 diàn。

首先要做的工作。以上所谈的几个实际问题，最主要的是同义两音的一类。轻音和儿化词的问题不仅和语音有关，同时与构词有关，还需要联系词汇规范问题一起讨论。在这里只是指出一般的问题，做为进行推广普通话教学上的参考。

论普通话的语法规范[①]

从去年（1954）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来，大家对于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今年2月间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里对于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为北京从明清以来就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近百年来随着北方官话的传播[②]，北京语音早已成为大家公认的标准音了。关于这一点不需要多谈。至于说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而又说"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些道理不易理解清楚。例如，普通话和它的基础方言在语法方面的关系如何，为什么说普通话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所谓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特点是什么等等一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共同来研究，使我们对于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了解得更明确一些，更透彻一些。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推广普通话、进行语文教学和促进汉语规范化的工作都有极密切的关系。

---

① 本文载于《语文学习》（上海）1956年6期。

② "官话"的名称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万历中张谓在《问奇集》的"各地乡音"条说："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这里所说的"官话"就是公共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共同的口语。

关于这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从普通话与基础方言的关系，白话文与普通话的关系两方面去了解。《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

> 通常做民族语基础的是部族语言，这种部族可以因某一种方言的影响而发生更大的变化，但影响部族语的这种方言必定是由于政治或文化条件而提升到第一位的，并能充分反映该语言发展的一般趋向的。这样的方言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往往好像是该语言的方言系统中的过渡的、最典型的和最中立的方言。例如，俄罗斯民族语形成时，情形就是这样的，它是在南部大俄罗斯诸土语（尤其是库尔斯克——奥勒尔方言）的影响下形成的；乌克兰民族语形成时，情形也是这样的，作为它的基础的是坡尔塔发——基辅方言；法兰西民族语形成时，情形仍是这样的，作为它的基础的是法兰西岛省（*Ile - de - France*）的方言①。

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民族共同语通常是在某一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础方言的地区总是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上和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地区②。

从历史上来看，汉民族共同语——也就是普通话，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方话是汉语方言的一种，这种方言分布的区域极广，包括大北方、西南各省和长江中部及下游沿江一带，它充分反映了全民语言发展的趋势，而且从宋元以来就产生了许许多多以这种方言口语为基础写成的文学作品，这种书面语言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白话”。这些作品流传很广，使非北方话区域的人对于北方话也逐渐熟悉起来，而且受到北方话的影响。明清以来北京是

---

① 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5卷《标准语》（《文学语言》），译文载《中国语文》1954年11月号。

② 参看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国语文》1955年12月号。

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传播一天比一天广，于是逐渐取得方言区之间的交际工具的地位。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说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而发展起来的。

但是，事实很明显，基础方言只是基础，并不是说这种方言就是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通话无论在词汇或语法方面都比北方话丰富得多。

北方话包括的范围很广。就大的范围来说，有所谓"北方官话""西南官话"和"下江官话"之分，而每一种还可以细分为若干小的方言。这许多小方言在口语里不仅语音、词汇有些差别，在语法方面也有一些不同。例如：

一　陕西①

1. "你要不要"，说"你要哩吗不要"；"你去不去"，说"你去哩吗不去"。

2. "我跟你一块儿去"，说"我连你一块儿去"；"我的年纪和他一样"，说"我的年纪连他一样"。

3. "把火柴拿来"说"拿洋火拿来"；"把书拿来"说"拿书拿来"。

4. "他起不来"说"他不得起来"；"过不去"说"不得过去"。

二　内蒙古自治区

1. "没有几天"说"不多几天"；"没有几个人"说"好不几个人"。

2. "一天比一天好"说"一天好起一天"；② "一个比

---

① 汉语方言的调查资料不多。这里所举的行政区域的名称，只是说下面的一些例子见于这个区域之内，并非整个区域内都是如此。

② 陕西说"一天好出一天"。

一个高”说“一个高起一个”。

3.“你穿着很薄的衣服，这样冷天气不能出门”，说“你穿着精薄的衣裳，这样冷天道治不得出门”；“柴火都是湿的，不能烧了”说“柴火都精湿的，治不得烧”。

三 河南

1.“我拿得动，他拿不动”说“我拿动了，他拿不动”。

2.“你告诉他”说“你告给他”或“你告他说”。

3.“我到城里去”说“我往城”或“我去城”。

4.“说得很好”说“说哩怪好”，“重得拿不动”说“重哩拿不动”。

四 四川

1.“到底你知道不知道”说“到底你晓不晓得”①。

2.“我比他小两个月”说“我小他两个月”。

3.“照着这样做就很好”说“照倒这样做就好”②。

五 湖北

1.“有没有”说“有没得”或“有不有”。

2.“拿得动拿不动”说“拿不拿得动”或“拿不拿得起”。

3.“给我一本书”说“把本书我”或“把我一本书”，或“把本书达我”。

由此可见普通话虽然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但是基础方言内部在语法方面也并不完全一致。那么，普通话的语法规范究竟以什么为标准，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作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的语法规

---

① 湖北话也这样说。

② “照着”说“照倒”，湖北也是如此。

范，是在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①，但又更加精练，更加发展。所谓精练，是去掉北方话内部的一些特殊的、共同性较小的成分；所谓发展，是以过去丰富的历史传统为基础，在北方话之外又吸收了古语成分、外来语成分和其他方言中有用的东西，使语言更趋于精密，更能适合全民族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所以在词汇方面普通话比任何方言都丰富，在句法方面也比任何方言都复杂，同时它的语法规范也最巩固。因为它的语法规范已经在书面语言里巩固下来了，那就是现代的白话文。我们不能离开已经在全国流行的"白话"另外去找普通话的规范。

现代白话文的语法规范是在汉语发展历史中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而形成的。从宋元直到明清，用与口语直接相联系的"白话"所写的文学作品非常丰富，这些作品就是现在的民族共同语书面形式的主要来源。其中大部分作品都以北方话为基础，但也或多或少地带有地方色彩和与口语不完全相应的文言成分。很早的不用说，就是时代比较近的《红楼梦》的语言也是如此。直到20世纪初，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开始加速形成，全民的、与活的口语相结合的书面语言形式才真正建立起来。这种书面语言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白话文。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白话文是根据大多数人都能了解的普通话来写的，它跟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是相联系的，普通话的语法规范就明显地表现在典范的现代白话文里。所以我们说普通话的语法规范应当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准。所谓"现代"，主要的是指五四运动以来而言。

白话文也有种种不同的白话文，有的是"不文不白"的白话文，有的是掺杂许多不必要的方言成分的白话文。"不文不白"的白话文称不得是现代的白话文，掺杂许多不必要的方言成分的白话文称不得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① 北京话流行的区域也很广，不限于北京城。

所谓"典范"，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符合全民语言的规范、不用特殊的方言土语；一方面是经过文学的加工，不仅精密完整、正确、而且善于运用全民语言所有的丰富的表达手段、成为使用语言的模范。典范的现代白话著作，就是能够体现民族共同语语言规范的"文学语言" 民族的文学语言不仅应用在文学作品，而且应用在文化、科学、教育各个方面，它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极其广大的作用。文学语言必然是全民的共同语经过高度加工的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书面形式，是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杰出的政治家以及优秀的文化工作者等所建立起来的。它具有内部一致的明确规范。这种规范，是使用语言的人都必须遵守的。

自从解放以来，书面语已经基本上统一于"白话"，书面语在口语的基础上随时在提高它的精密和丰富的程度，同时也就对口语的发展起着集中和提高的作用①。我们要求我们语言更精密、更发展，并且形成全民口语的统一，就需要以书面语言领导整个语言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因此根据汉语历史发展的事实，在找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和它的基础方言之外，同时又指出它的语法规范应当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依据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今后的语言教学和语言科学研究工作也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总起来说，普通话是全民的共同语言，现代白话文就是全民共同语表现在书面上的加工形式，所以普通话的语法规范就必须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标准。目前在使用语言上还存在着很多不合语法的现象，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典范的白话文著作的学习，提高语文修养的水平，消灭用词和造句方面不应有的混乱现象，以促进汉语规范化的实现和汉语进一步的发展。

---

① 参看《人民日报》1955 年 10 月 26 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汉字铅字字形规范化的重要意义①

今年1月30日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通知指出“为了便利阅读，需要统一铅字字形”。同时把汉字字形整理组所编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印成样本，分送全国各有关部门，以便逐步进行。这是整理汉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现在印刷书籍报刊所用的汉字铅字有三种：一种是普通的宋体字，一种是仿宋体字，另外一种是楷体字。这三种铅字的笔画规格不是完全一致的。主要的分歧有两点：一种情况是笔画有多有少，不尽一致。例如：

宋体	仿宋	楷体
眞	真	真
尙	尙	尚
換	換	换
爭	争	争
麻	麻	麻
虛	虚	虚
通	通	通
卽	卽	即
黃	黄	黄

①本文载于1965年8月4日《光明日报》。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普通的宋体字和楷体字差别较大，而仿宋字或同于宋体，或同于楷体，介于二者之间。

这三种铅字所以不同，和它们的依据有关。普通的宋体铅字是因承宋元明清的雕版书而来的。有不少字的偏旁点画采用了接近于隶书的写法。如“礻”旁作“示”，“辶”旁作“辵”，“青”字作“靑”，“羽”字作“羽”之类都和近代以来通行的楷体不同。至于横画细、竖画粗的笔法是明代万历以后木刻本书的普通格式。清代相承不改。现代应用的铅字字形就是根据清代的一般刻本书来制造的。仿宋体的铅字，笔画粗细均匀，这是仿照宋代刻本书刻制的，所以称为仿宋体。宋代的刻本书大体都是楷体，和唐石经的写法相去不远。不过，各种宋板书雕刻的时间和地点有不同，规格也不一样。有的在楷体之中又杂有近似隶书的写法，颇不一致。现在通用的仿宋铅字和楷体的写法不完全相合就是这种缘故。至于楷体铅字，它是最接近现代手写楷书的了，可是也有些字和社会上相沿成习的写法不合。例如“并”作“并”，“既”作“旣”都是。这些又不免受了旧日讲字学书籍的影响。由此可知这三种铅字各有依据，而所保存的隶书写法也有多有少，所以，彼此之间互有异同。

三种铅字的字形有不同，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种字体的同一个字在不同的书籍报刊上有时也出现不同的写法。这是因为字模制造有先后，新制造的就可能和旧制造的稍有出入。同时，制造字模的工厂不止一处两处，制出来的铅字字体也可能稍有差异。因此，印出书来就不完全一致。

印刷铅字在字形上有分歧是由来已久的事了，可是在今天，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首先从识字和写字两方面来看，印刷铅字字形不统一给学生带来很多的困难。同一个字在不同读物里所印的字形不一样，是一是二，初学的人就很难分辨。小学生有时看到一个字，明明是学过的，可是不敢认，因为字形和他所熟悉的楷体不同。例如“巨”字

宋体铅字作“巨”，“卧”字宋体铅字作“臥”。查查字典看，字典是用楷体铅字印的，“巨”“臥”两个字形根本找不到。这就成了疑问了。只有去问老师才能解决。学生在阅读时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为此，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最后，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把全部问题弄明白了的。在写字方面，也是如此。因为铅字字形和楷体不同，学生常常产生疑惑。例如宋体铅字的“內”“戶”“尙”“平”“研”“直”等等和手写楷体都不一样，到底应当怎样写才算对呢，在学生的心里总是一个疑问，当然这对读书多年的人不算什么问题，可是我们必须想到印刷的字形不一致给数以千万计的初学汉字的人所带来的困难有多么大。

其次，从汉字的排检来看。由于铅字字形不同，笔画的多少有时也不一样，在排检的时候就出现很多麻烦。我们出版的书籍往往要有一个索引或检字表。在编排索引的时候，每一个条目能按音序来排列固然最好，不过有时还不能不按字的笔画多少来排列。如果一个索引是按字的笔画多少来排列的。那就牵涉到铅字字形的问题。无论是用宋体铅字或用楷体铅字都和手写体不完全相同，应用索引的人在查检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郎”字手写体是八画，而宋体铅字左边从“良”，是九画。笔画的数目就有了分歧。同样，与“良”字有关的字，如“朗、廊、榔、螂”等字，宋体铅字也都照样多一画。那么，编索引的人是按照手写体的画数来排呢，还是按照铅字的笔画来排呢？比如把“郎”字排入八画，而铅字明明是九画；如果排入九画，同字形结合了，但又明明知道会给查检的人造成困难，怎样做都不妥当。假如采用楷体铅字的话，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那又不然。举例来说，如楷体铅字的“并、既、溉、收”等字都同一般手写楷书的笔数不同。有的多一画，有的多两画。在排检方面也同样有困难。

如此看来，为了减轻记认和书写上的困难，为了便利于排检，就有必要整理铅字的字形，使印刷用的汉字在字形上有一致的规

范。

从1962年起汉字字形整理组就开始进行这项工作，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查和反复地研究，在去年已经编成一个《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这个《字形表》包含印刷上通用的6 196个汉字，每个字都确定了它的笔画结构和笔数，为统一铅字字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在《字形表》的《说明》中指出："整理字形的标准是：同一个宋体字有不同笔画或不同结构的，选择一个便于辨认，便于书写的形体；同一个字宋体和手写楷书笔画结构不同的，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书，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这种观点和方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只有采用这样的标准才真正能解决铅字字形的矛盾，才符合汉字在长期使用中发展的规律。

我们知道，汉字在书写形式上发展的规律，简单来说，就是由繁趋简。简化的目的和要求是：既要便于辨认，又要便于书写。在历史上由篆书发展为隶书，由隶书发展为楷书，都是顺应着这条规律而发展的。以前木板书的宋体字有不少接近于隶书的写法，那是在一些文人崇古的风气下而产生的，后来变本加厉，刻板书的字形和发展了的手写楷书之间差异更多。现在的印刷铅字字形上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宋体和通行的楷体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使汉字字形趋于规范化，根本的办法只能是使宋体字尽可能接近于手写的楷体，而不是使手写的楷体向宋体字看齐。这是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的一条原则。同样，现在使用的仿宋体和楷体的铅字也应当本着这条原则进行规范化。

在手写楷书方面，有些字也还存在着不同的写法。例如"爭""争""着""着""彥""彦""骨""骨"之类。对这类字又怎样办呢？在《字形表》里照样本着简化的精神，不采用笔画繁的，而采用笔画简单的；不用不便于书写的，而用容易书写的；凡是可以做一笔来写的，不再分为两笔。同时又尽量要求系统化，偏旁相同

的，写法一致。例如确定用“争”不用“爭”以后，从“争”的字，如“净、静、狰”等都一律从“争”。这样就秩然有序，既容易学，又容易记，完全符合群众的要求。所以说《字形表》所确立的整理铅字字形的标准是完全正确的。假如不这样做，每一个字都斤斤固守着文字学的传统，惟恐有失，那就必然不能有所改革，有所前进。

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变不利为有利。既然铅字字形和我们现在手写的楷书有分歧，对我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利，我们就完全可以改革铅字，使铅字能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统一汉字铅字字形是对人人有益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作。它不仅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利，而且对后代也沾溉无穷。字形有了一致的规范以后，在教与学两方面可以免除许许多多的麻烦，学生可以不必既要熟悉手写体，又要熟悉印刷体了。仅就全国的小学生来说，不知他们可以节省多少精力和时间，而学习的效果也必将大大提高。

另外，铅字字形规范的确定，不仅消除了铅字字形本身的分歧，而且还可以带动手写楷书的规范化。前面已经说过，手写楷书有些字在笔画结构上是有分歧的。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既然在社会上都流行开了，就很难说哪一种写法算错。例如“牙齿”的“牙”有“牙、牙”两种写法，“没有”的“没”有“没、沒”两种写法，“宫殿”的“宫”有“宫、宮”两种写法，都不一致。如果一个字的笔画结构在印刷物上得到统一，写字的时候就可以依据铅字的笔画来写，无形中也就逐渐趋于规范化。字形确定以后，笔画的多少当然也就有定了。要编排索引之类的东西在笔数上也可以得到统一。

总之，统一铅字字形这件事的意义非常之大，这是我国进行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现在全国从事印刷出版工作的同志正在积极为统一铅字字形而奋斗，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同志更应当从多方面支持，共同为促进汉字字形规范化而努力。

关于汉语实词分类的问题①

研究语法必须虚实并举。实践固然重要，但必须以理论作为指导，所以理论的探讨是必要的。王力先生分别转类和分化，我很同意。关于实词分类的标准，我的基本观点跟王先生一样，但也有一些小问题。首先，王先生认为词汇意义有决定性的作用，未免强调得多一些。名词和非名词的区别可以从意义着眼，动词和形容词的区别就不能单从意义着眼。词类是“词汇、语法范畴”，语法应该是主要的。其次，功能论与形态论不能定优劣，尽管也强调形态优于功能，有的地方却并非从形态来看问题。例如“热闹”的两种重迭格式就是形态的不同。第三，要从发展看问题。“热闹”本来是形容词，后来又具备了动词的功用，这是一种分化。王先生认为“丰富起来”的“丰富”是形容词，没有分化为动词；我认为，从形态看，“密切了”“丰富了”……已分化为动词。同样，“大起来了”的“大”具有动词词尾的形态，也应该看作动词。这是从发展看问题。这类现象不但今天有，来源很早。（所以龙果夫把动词与形容词合成“谓词”而与“体词”相对）看到语言的发展，就应该承认它们是跨类，如不认为是跨类，就得在形容词中再分出小类。第四，报告里似乎有过分简化、压缩，尽量减少跨类的倾向，从形态和功能来看问题不够，这也不合实际情况。第五，报告中指出汉

①本文为1959年5月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讨论汉语实词分类问题的发言。

语实词的跨类大多数由于西洋语言的影响。我认为西洋语言对汉语肯定有影响，但汉语实词的跨类现象不是现代才有，在古代，跨类的情形更多。如“树”在甲骨文是“种植”的意思，为动词，到了《说文》已发展为树木的“树”，而在汉代的文献里“树”还当动词用的，跟树木的“树”有一定的关系，并非同音词。所以跨类在汉语里是历来就有的现象，不完全是西洋语言的影响，因此，在划分词类时还要考虑到古今的问题，如在这方面多作补充，能对汉语实词的分类作出更好的说明。

划分词类的标准①

讲汉语语法和学习汉语语法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分别词类的问题。从《马氏文通》以来，每一本语法书里都谈到词的分类，可是至今还没有确定的说法，何去何从，很难决定，所以就成为问题了。

关于词类，一般学习语法的人常常问到两个问题：(1) 汉语的词到底应当分多少类？(2) 一个词用在句子里作用不完全相同，它的类别是固定的呢，还是不固定的呢？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势必先问一问：词类是拿什么标准划分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有了标准，上面所说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为了讨论方便起见，这里先简单地举出几种不同的说法：

1. 黎锦熙先生在《中国语法中的词法研讨》里说，分别词类要按照词义的"性质"（词典上）和它在句子里的"作用"（语法上）来定。普通词典只能看定单个词的词义的性质特征，注明它的主要的词类；它入句子以后所起的作用，可以有种种不同，必须依句辨品。有执行本类本职的，有兼他职的，有由职显类的，都从句法成分上表现出来②。

2. 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里说："词可分为两大类，凡本身能表示一种概念者，叫做实词，凡本身不能表示一种概念，但为语言结构的工具者，叫做虚词。实词的分类，当以概念的种类为

①本文载于《语文学习》（上海）1953 年 12 期。

②见《中国语文》1953 年 9 月号。

根据，虚词的分类，当以其在句中的职务为根据。"他以欧洲的语言与汉语比较，认为欧洲语言的词有一定的字尾及屈折形式，汉语就没有这种词类标记，所以正好让咱们纯然从概念的范畴上分类，不受形式的拘束。

3. 吕叔湘先生在《语法学习》里说："为了研究语法的便利，我们要把词分成多少类。西洋语言里的词往往有语形变化，可以拿来做划分词类的标准。中国话里的词没有语形变化，划分词类主要地凭词的意义和词和词之间的关系。"

这三种说法显然是不一样的。综合起来看，三种说法都提到词义。这一点就看怎样来解说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单单从词义的性质或者说概念的范畴来分别词类是不够的。例如"幸亏""就""把""因为"等等从词义上就很难定类。其次我们会感觉到从词义上来分类，必然你可以这样分，他可以那样分，没有一定的标准。况且一个词在应用上可以有多方面的意义，单说一个词，从词义上又怎能定类呢？这样看来，单纯从词义的性质来区分词类，不是一个很好的标准。我们不能因为受了相沿承用的一些名称如"名词""动词""形容词"之类的影响就认为词义是划分词类的标准。

词类是语言自身表现出来的类别，不是你想这样分，他想那样分的一件事儿。我们应当从语言的结构形式上来区分词类。

词的种类，各种语言不尽相同，不同的语言也可以有不同的分法，必须从语言结构自身的特征出发。俄语的词类分十种，英语就分八种。在欧洲的各种语言里词有明显的形态变化，每一类词一般地都有它的共同的形式特征，所以分别词类主要是根据词的形态来决定。汉语没有那一类的词形变化，所以要分别词类就还需要其他的标准。那么，应当根据什么标准呢？总的一句话，就是按照词的句法作用和词法特点来划分。分析来说，可以有以下三个标准：

1. 按照词在句中的作用来定。我们从词与词配合成为句子的结构的一般情形来看，能够结合成句的词，主语常常都是名词或代词，

有时是动词或形容词，谓语则常常是动词或形容词。副词、连接词、语气词配合在一起就不能成为句子①。其次我们看到名词或代词放在动词前面可以成为句子，而动词在名词代词的前面可以成为一个复合词，或者成为一个短语，但是不能成为句子。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词类上的不同。假如从词在句中能充当哪一种句子成分来看，哪些词不能做主语、宾语，哪些词不能做谓语的主要成分，自然也就划分出一个类别来。这可以作为分类的一种标准。

2. 按照词与哪一类词（或哪一类附加成分）相粘合或不相粘合的性能来定。这就是说从词与词彼此联系的关系来区分类别。举例来说：名词前可以有数量词，代词就不可以；指示词可以与量词连起来做名词附加语，而人称代词就不能这样做；动词前面可以受副词“不”修饰，助动词虽然也可以，可是它的后面不能有宾语；“的”是一个语法成分，名词、代词加“的”，指示词、数词就不能加“的”；又如形容词和动词的后面可以有句尾“了”，而别的词就不能有。诸如此类，也可以作为一种分类的标准。

3. 按照词的形态来定。汉语虽然没有像俄语、德语、英语那一类的屈折形式，可是也有一定的形态。例如：名词可以有“子”“儿”“头”的词尾，像“漏子”“亮儿”“作法儿”也都是名词；形容词、动词可以重叠，别的词（除“天天”“人人”以外）就很少能够重叠。又如人称代词的多数要加词尾“们”；语气词都读轻声；动词加词尾“了”表示完成貌，加“着”表示持续貌。这都是可以从形态上来看词类的分别的。

现在提出这样一个标准来，也就是对黎先生所说要从句子的作用来看词类，吕先生所说要凭词和词之间的关系来划分的一点补充。这三个标准是有不可分性的，分别词类不能专就一个标准来看，有时要从一两个标准合起来看。根据这样的标准来划分词类，

① 参看张志公先生《汉语语法常识》，《语文学习》1952年2月号。

似乎比从词义来区分要恰当些。古人虽然没有精密地分析词类，可是从文学作品中，特别是诗歌的对句里，可以看出他们把词类辨别得相当清楚，那就是从语言的结构形式来定的①。

根据上面所提的划分词类的标准，我们解决前面所提的“汉语的词到底应当分多少类”的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量词是汉语里的特殊词类，是否要作为基本词类；指示词跟代词、数词跟形容词是否分为两类；助动词是否要分为动词的一小类；副动词中“于”“在”一类的词要不要称为“介词”；这些问题，本着上面所说的标准，经过研究，自然能够有所决定。

同样，前面所提的“词类是否固定”的问题也不难索解。根据上面的标准来看，凡是能从词的一般用法上确定它是属于哪一类而不属于别一类的，那就是词有定类。假如一个词用在句子里在句法上或词法上有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就要说它具有两种属性。例如“红”是形容词，假如说“花红起来了”，“红”与“起来了”连在一起，跟“站起来了”是一样的，“红”就是动词一类了。可是如果换一种说法单从一个词在句中的“职务”来定词类，那就有一点麻烦。例如“昨天阴天”，“昨天的报”，“他昨天来看你”，同是一个“昨天”，不能因为它可以作主语，作名词和动词的修饰语，我们就说它具有名词、形容词、副词三类属性。如果这样就接近“词无定类”的说法了。总之，“词有定类”和“一词多类”是不相矛盾的。

由此看来，划分词类必须有一定的标准，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就很难处理。我认为分类是从掌握规律而来的，我们不去掌握用词造句的规律而空谈分类，对于分类就是模糊的。所以必须先从语言实践中去认识语言结构的规律，然后从规律来定分类的多寡和类别。这又是本文最后要说的一点儿意思。

---

①参看王力先生《汉语的词类》，《语文学习》1952年4月号。

副词和连词①

一 副词和连词的特点

副词是表示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在程度、范围、时间、情势等等方面的不同状况的虚词。这一类词，如“很”“最”“更”“极”“又”“再”“也”“还”“就”“都”“只”“也许”“已经”之类，既不表示实在的意义，又不能单独用来回答一个问题，所以是虚词。

副词一般总是修饰动词或形容词。例如：

很漂亮　最紧张　极深刻
更完备　太顽皮　非常简单
已经完成　恰巧碰见　必定做到
刚刚出去　正在商量　忽然发生
再三表示　永远记住　终于失败

“漂亮”“紧张”“深刻”“完备”“顽皮”“简单”是形容词，“完成”“碰见”“做到”“出去”等是动词。

形容词跟副词的界限我们要分别清楚。形容词是实词，副词是虚词。所以形容词能够单说，副词不能②。例如问“好不好”，我

---

①本文写于1956年3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②只有“不”和“没有”在一定语言环境里有时单用。

们可以回答"好"，问"擦干净了没有"，我们可以回答"干净了"。副词单说就不行。其次，形容词能够修饰名词，副词不能与名词组合。只有"不"用在成语里或特殊的习惯语格式里是例外。如"人不人，鬼不鬼"，"不胫而走"，"不伦不类"，"不声不响"，"管它什么星期日不星期日，先把工作赶完了再说"。除此之外，副词是不能与名词组合的。

还有形容词可以做谓语，有时也可以做主语，副词都不可以。例如"心情愉快""衣服干净整齐"，"愉快""干净""整齐"都是形容词充当谓语，副词绝对不行。假如我们要检验一个词是形容词还是副词，那很容易：前面可以加"很"，可以重叠，还可以用肯定否定相叠的方式表示疑问的词都是形容词，不是副词①。例如"很单纯""很特别""红红的""清清楚楚地""红不红""清楚不清楚"，副词不能如此，② 我们不能说"最最"或"最不最"。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副词的特点。副词有以下几种特点：

1. 副词是虚词，不能单独用来回答问题；

2. 副词不能修饰名词；

3. 副词不能作主语、谓语；

4. 副词不能重叠，更不能用肯定否定相叠的方式表示疑问。

副词的主要用途是作状语。少数副词"很""极"可以用在形容词后面作补语，表示性质的程度。如"好得很""漂亮极了"，"很"用作补语，它跟形容词之间必须用"得"相连，"极"就没有这种需要。除了修饰作用和补充作用以外，副词另外有一种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关联，后面还要谈到。

---

①形同音同的词有时不是一类词，我们应当分别开。例如"好坏"的"好"跟"好痛快"的"好"是两个词，"年老"的"老"跟"老说话"的"老"也是两个词。前者是形容词，后者是副词。

②"渐渐""每每""常常""往往""稍稍"是构词上的一种重叠形式，不能构成否定的重叠形式。

副词的特点就是这些，我们再来看看连词的特点是什么。

连词是连接词、词组或句子以表示种种不同关系的虚词。包括“和”“跟”“与”“及”“或”“或者”“不但”“而且”“如果”“要是”“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这类词本身没有实在的意义，只表示语法关系，所以也属于虚词一类。

例如：“工人和农民”，“勤劳而勇敢”，“讨论并且研究”，“受到政府的重视和表扬”，“不但好看而且结实”，“去或者不去都行”，“因为气候很冷，所以常年结冰”，“虽然年老，可是身体很健壮”。从这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连词的功用了。

连词的特点是：

1. 不能单说来回答一个问题；

2. 只能连接词、词组或句子，表示各种意义上的关系，起语法作用。

连词表示的语法关系有两种。一种是联合关系，一种是偏正关系①。联合关系是平等的联合，不分主次，有时前后位置可以互换，而意义不变②。偏正关系是一偏一正，也就是有主次之分。偏正之间可以有种种关系，但是“正”总是正意所在，“偏”是从属于正意的。像上面举的例子，前面六个都是联合关系，后面两个是偏正关系。

表示联合关系的连词有的连接名词、代词或名词词组，如“和”“跟”“与”“及”“以及”等；有的连接动词或动词词组，如“并”和“并且”，有时也用“和”；有的连接形容词或形容词词组，如“而”“而且”“不但……而且”等。有的连词连接各类词或各类词组，如“或”和“或者”。这里面，“而”“而且”“并且”等也连

①“联合关系”或称“并列关系”。按汉语课本的系统，并列关系只是联合关系的一种。“偏正关系”或称“主从关系”。

②有时不能互换，必须看修辞的条件是否合宜。

接分句。表示偏正关系的连词，如“如果”“假设”“因为”“所以”“虽然”“可是”之类常常连接分句，构成复句。有时单用，有时要跟另外一个连词或副词配合起来用。

二　副词和连词的类别

副词按照所表示的意义范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表示程度的副词

有的副词表示动作或性质的程度，如很、极、最、顶、太、非常、十分、更、比较、稍、稍稍、稍微等。

2. 表示范围的副词

有的副词表示动作、性质或事物的范围，如都、全、总、总共、统统、也、只、光、净、仅仅、只有等。

3. 表示时间的副词

有的副词表示动作的时间和动作的频率，如已、已经、曾经、早已、早就、本来、正、正在、才、刚、刚才、将、快要、就、赶紧、立刻、马上、登时、现①、暂且、终于、始终、忽然、突然、渐渐、老、常、常常、时常、往往、每每、永远、永久、一直、一向、再三、屡次、又、再②、还、先等。

4. 表示情势的副词③

有的副词表示动作、行为的情况和发展、变化的情势，包括必然性和可能性，如必、必然、决、反正、也许、大约、大概、真、的确、其实、自然、果然、居然、幸亏、依然、照样等。

---

①即“现蒸热卖”的“现”。

②“又”“再”都表示动作的反复，“又”表示已然，“再”表示未然。例如“吃了一碗，又吃了一碗，再吃就吃不下了”。

③或称“性态副词”“方式副词”。

5. 表示否定的副词

有的副词表示否定，如不、没、没有、别、不必、未必等。

6. 表示语气的副词

有的副词表示不同的语气和感情。如岂、难道、莫非、何必、到底、究竟、偏、索性、简直、却、倒、可等。

以上六类是大致的分别。有的副词用法很多，如“也”“还”“就”等，可以分属好几类，要就表达的意义来定。例如“就”有几种用法：

就有两把椅子。（“就”是“只”的意思，指范围）

我们一会儿就去。（“就”指时间，表示不会很晚）

他就不听你的。（“就”是“偏”的意思，表示坚定的语气）

至于连词，按照前面说的连词的句法作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示联合关系的，一类是表示偏正关系的。

表示联合关系的连词依照不同的用法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1. 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

两个词或词组平等地列在一起，没有轻重的区别，就是并列的关系。连接并列关系的词或词组所用的连词有“和、跟、同、与、及、以及、并、而”等。

例如“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并”“与”“及”“和”都表示并列的关系。

2. 表示选择关系的连词

表示选择或两可关系的连词有“或、或者、不是……就是、是……还是”。如“或多或少”，“坐汽车或者坐火车”，“不是你说错了，就是他听错了”。“是……还是”经常用在疑问句里。

3. 表示层进关系的连词

表示一层进一层的关系的连词有“并且、而且、不但……而

且、尚且……何况”等。如“布置工作而且要检查工作”，“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

表示偏正关系的连词大半都是连接句子的。依照不同的用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 表示假设或条件关系的连词

这类连词有“如果、假如、要是、只要、倘若、除非、无论、不管”等。如“假如阵地失守了，一定要夺回来”，“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先都要有充分的准备”。

2. 表示因果或目的关系的连词

这类连词表示因果关系的有“因为、所以、因此、既然、以至、惟其……所以”等。表示目的关系的有“为的是、省得、以免”等。如“因为我们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所以目前还不能下结论”，“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

3. 表示转折或让步关系的连词

这类连词有“虽然、尽管、即使、哪怕、纵然、可是、但是、然而、虽然……可是”等。如“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鲁迅）

4. 表示比较关系的连词

这类连词是表示比较得失的意义的，有“与其……不如（宁可）”。如“与其增加时间，不如精简内容”，“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鲁迅）

三　副词的修饰作用

副词主要修饰动词、形容词，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不同的副词的修饰作用也不相同。

表示程度的一些副词常常修饰形容词，例如“很健康”，“顶复杂”，“最精确”，“极普通”，“太呆板”，“比较浅近”。这些副词有

时也能用在动词前面，例如“群众非常欢迎”，“他对这件事情最关心”，“他很会做菜”，“你稍微想一想!”。

表示时间的副词主要是修饰动词，例如“已经投入生产”，“刚刚开始”，“马上进行”，“忽然发笑”，“早已成功”，“再说一遍”。

其他几类副词都能修饰动词，有时也能修饰形容词，如“都好”，“都来了”；“也许大一倍”，“也许走了”；“的确紧张”，“的确有那么多”。

副词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是极普通的，但是副词还可以用在能愿动词和介词的前面。例如：“他不肯去”，“工作必定可以取得胜利”，“我们不应该麻痹大意”，“他到底能来不能来”，“不从这一方面着手不行”，“早就把应该带的东西准备好了”，“才从城里回来”。还有些副词能加在数量词前面，如“再一次”，“又一年”，“才五岁”，“已经三年多了”。

四 副词和连词的关联作用

有一些副词除作状语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主要的作用，那就是关联作用。

副词的关联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副词与副词连用，前后呼应，表示联合的关系；一方面是连词与副词配合，前后呼应，表示种种关系。

副词与副词连用有以下几种格式：

1. 又……又（表示并存）

   又干净又整齐；又说又笑；又快，又多，又好，又省；又能写小说，又能写剧本。

2. 也……也（表示并存）

   他也不喝酒，也不抽烟；也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风也停了，雨也住了。

3. 越……越（表示比例的关系）

越想越胡涂；争论得越认真，是非就越明白；越大越好；越说越高兴。

4. 刚……就（表示事情先后紧接）

刚来就走；刚听完就忘了；刚到家就有人找他。

5. 非……不（表示肯定）

非去不可；非他不行；非下苦功不能了解；非失败不可；部队非夜里行军不可。

6. 只……才（表示对比关系）

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这几种格式都是副词与副词呼应，共同表示某些联合关系。

副词与连词配合在一起用，常常在复句中出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格式：

1. 不仅……又，不但……还（表示层进的关系）

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毛泽东）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

2. 既不……也不（表示两非的关系）

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既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必须正确地掌握政策的精神和实质。

3. 既然……就（表示因果关系）

他既然已经走了，就不用叫他了。

既然时间还早，我们就可以等一会儿再去。

4. 如果……就，要……就（表示假设关系）

如果我们不早一点去，可能就没有座位了。

谁要以为我们人民对事业没有信心，那就错了。

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与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毛泽东）

5. 只有……才（表示条件关系）

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

6. 不管……也，任凭……也（表示无条件）

不管怎样忙，你也要来一趟。

任凭你有多么大的本领，你也阻止不了社会向前发展。

7. 尽管……也，就是……也，哪怕……也，即使……也（表示让步关系）

尽管他不一定来，我们也要通知他一声。

就是有了材料，没有工具也不行。

他就是想走，也走不成。

哪怕他说的不一定全对，你也要注意听取他的意见。

即使他不能出席，他也一定会提出书面意见。

8. 虽然……却（表示转折关系）

虽然积雪还复盖着祁连山峰，大戈壁上却换了新装。

这些格式都说明了副词和连词的关联作用跟句法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才”“还”“又”几个副词跟连词配合在一起用，形成一对一对的关联词语。我们要掌握虚词的用法，对副词和连词就不能不特别注意。

关于主语和宾语的问题①

主语和宾语的问题很复杂。对待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才能得到解决。现在大家在讨论中提出很多意见，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在于分析汉语的句子到底应当从结构出发，还是应当从意义出发。关于这一点现在尽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把问题孤立起来看，那是不妥当的。我们知道：形式是内容的表现，是由内容决定的；形式是和内容联系着的。形式和内容是在内容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相互制约着的。② 我认为不同的语法形式就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如果单就语法形式看问题，而不去了解不同的形式在语言中所表达的意义是否相同，或单从意义出发而忽略了语法形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如果不从全面看问题，单从一点出发，也就难免陷于主观，把不同的事实混淆起来。

我们知道语言所表现的不仅是思想，也有感情、愿望和意向。苏联《俄语教学》杂志 1954 年第 1 期，在题为《列宁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一篇社论里曾经指出："言辞中理性事实同感性事实的混同，妨碍对句子的不同类型性的理解，妨碍着表达见解的句子和表现情绪和意向的短语、特殊句子的区别"。③ 这段话很重要。

---

①本文载于《语文学习》（上海）1955 年 12 期。

②参看阿历山大罗夫：《辩证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版，233 页。

③译文见《中国语文》1955 年 1 月号 19 页。

假如我们不顾及语言的修辞色彩，认为汉语的句子只有一个固定的格式，那就未必合乎事实。

汉语是有谨严的规律的，在谨严中又有很多不同的句式。例如“主——动——宾”这是动词谓语句的一般的格式，但仍然有一些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变动。比如“我不认得这个字”，也可以说“这个字我不认得”。假如我们说“我不认得这个字”、“我”是主语，“这个字”是宾语；而在“这个字我不认得”一句里，我们说“这个字”是主语，“我不认得”是主谓式谓语，就很不容易解释。我们还可以说“这本书我不想看，我想看那本书”，假如说前面一部分的主语是“这本书”，后面一部分的主语又是“我”，一句之中，前后不同，那就很难使人理解。

我们现在不专从施受关系来看主语、宾语和动词的关系是对的，但是一句话有没有主语，主语是什么却不能含混。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以为主语就是说一句话的“起点”，于是有人认为“下午我们开会”，“下午”是主语；如果说“我们下午开会”，“我们”就是主语，这就陷于形式主义了。前面一句话，“下午”绝对不能称为主语。主语跟谓语的关系是：主语应当是句中被说明的对象，谓语乃是说明主语的，说明主语所代表的事物是什么，它是怎么样，它的状态怎样，它做什么等等。如果说“下午”是主语，“我们开会”是说明“下午”的，显然不是；如果说“这本书我不想看，我想看那本书”一句中的“这本书”是主语，“我不想看”是说明“这本书”怎么样的，也不是。这样的句子一定是用来回答“你想看这本书吗”一类问句的答语，对于“你想看这本书吗”，我们分析为“主——动——宾”，而对于“这本书我不想看”一句答语反而分析为“主——主·谓”，那是不妥当的。

主谓式谓语是汉语句法中谓语的一种结构形式，例如：

1. 中国地大物博。

2. 他的确身体很好。

3. 戈壁滩一带地势太高，空气薄，风又硬。①

4. 内地乍来的工人嗓子都发干，鼻塞头昏，睡不好觉，还常常闷得透不过气来。②

这种句子都是属于描写句一类。句子的主语跟谓语中的主语一般都是领属关系。上面所说"这个字我不认得"，"我"是主语，"这个字"跟"认得"是有联系的，应当是宾语，为了承接别人的话来说，或要提出加重来说，所以提前。这样提到句首的宾语所代表的事物一般是有定的，或是具有周遍性的。同类的句子还有：

1. 那个人你认得不认得？
2. 这本书你先留下看吧，我还不用呐。
3. 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不是此地人。
4.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③
5. 这样的傻事谁肯干？④
6. 另外一篇短篇小说，他也很喜爱……⑤
7. 风头他要出，党的荣誉他要享受，一切好的事情他都企图霸占……⑥
8. 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⑦
9. 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

---

①②杨朔：《石油城》，见初中课本《文学》第二册。编者按：本文小注中所引课本的版本，参见本书中的《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宾语和表示处所的状语》一文注②。

③④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见初中课本《文学》第一册。

⑤特洛岩诺夫斯基作、严风译：《二十世纪年代记》，见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

⑥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版，33页。

⑦《共产党人发刊词》，见《毛泽东选集》601页。

内理论水平低，兜卖自己那一套。⑧

这些句子开头的词语都是宾语成分。有些同志认为这样分析是专从意义出发的，其实并没有忽略形式。第4、第9两句都能说明这个问题。假如认为句首的词语是主语，那倒把丰富多彩的语言事实给抹杀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要把事物与事物之间互相制约的关系割断，在于我们怎样看待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的问题，也就是形式与内容是有联系的问题。假如这样考虑一下，这种句型应当怎样处理是不难确定的。

宾语提前的例子，还见于“他什么书都看”“他什么事情都管”“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以及“他连这个意思都不懂”一类句子里。这类句子在语法上最大的特征是宾语的后面都有“都”“也”或“都不”“也不”。宾语一定是具有周遍性的，或是表示一定的事物的。宾语的位置跟一般动词谓语句不同，正是表明意义上有变化。“什么都……”是完全的肯定，“什么都（也）不……”是完全的否定。“连……都不”是表示“甚至于”或“无论其他”的意思。这种句子的宾语也可以提到句首，例如：“他什么书都看”也可以说“什么书他都看”。

另外，我们在宋人的小说里还看到“都无……”这一种格式。例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有这样的句子：

1. 寺中都无一人，只见……

2. 次入一国，都无一人，只见……

3. 前去都无人烟，不知是何处所。

现在我们就要说“一个人都没有”“人烟都没有”。显然也是一种宾语提前的格式。

其次要谈的是“东边来了一个人”“墙上挂着一张画儿”这类句子。这类句子如何分析，从正面去比较，不容易找到结论。我们

---

⑧《整顿党的作风》，见《毛泽东选集》829页。

可以从变换说法的方法去进行分析。

“来了一个人”，有人说“一个人”是主语。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如果把“一个人”提到动词前面的话，就必须说“有一个人来了”。“有一个人来了”，“一个人”是“有”的宾语，是“来了”的主语。鲁迅《故乡》里说：“小旦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如果把“小生”提前，一定要说“立刻又有一个很老的小生出来了”，也需要加“有”，“小生”就成为“有”的宾语。由此可以看出“来了一个人”的“一个人”不是真正的主语。龙果夫教授说这种句子里动词后面的名词是“附属主语”，是有见地的。这种句子的特点是在于陈述一件事实，动词后面的名词凡是带有数量词的都是无定的。这样一种句子，我们应当认为是一部分的句子。动词后面的名词就是谓语组成的一部分。

假如这样理解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墙上挂着一张画儿”一类句子。要了解这一类的句子，我们也可以变换说法：

1. 墙上挂着一张画儿

2. 墙上有一张画儿

3. 有一张画儿在墙上挂着

4. 桥上站着一个人

5. 桥上有一个人

6. 有一个人在桥上站着

这一类句子要把动词后面的名词移在动词前就必须加“有”，那跟“来了一个人”是同样的。所以动词后面的名词也应当是谓语中的一部分。1、4两句动词前面的地位词（处所词）不移到后面，不能加“在”。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几类例子：

1. 台上坐着主席团

2. 主席团坐在台上

3. 主席团在台上坐着（呐）

4. 水里长着芦苇

5. 芦苇长在水里

6. 芦苇在水里长着（呐）①

这一类句子，“主席团”“芦苇”可以放在动词前，成为主语，但是意义就起了变化。变成主语以后，就成为被说明的对象，再不像原句那样是陈述一件事实了。“台上坐着主席团”的“坐着主席团”应当是句子的谓语部分。

再看一类句子：

1. 身上系着围裙

2.（把）围裙系在身上

3. 围裙在身上系着（呐）

4. 腰上挂着钥匙②

5.（把）钥匙挂在腰上

6. 钥匙在腰上挂着（呐）

这一类句子，如果把动词后面的“围裙”“钥匙”提在动词前，那就成为被动句，或陈述句。意义变化很大。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1、4两句的“围裙”“钥匙”应当是“宾语”。“系着围裙”和“挂着钥匙”是动宾结构。

我们还可以看一类例子：

1. 嘴里吹着气③

2.（气吹在嘴里）×

3.（气在嘴里吹）×

4. 教室里剩下十个人

5.（十个人剩下在教室里）×

---

①3.6. 两句很少用。

②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讲到白虎精变成人形说：“有一妇人，身挂白罗衣，腰系白裙，手把牡丹花一朵。”“挂、系”下不用“着”。

③管桦：《小英雄雨来》，见初中课本《文学》第一册。

6.（十个人在教室里剩下）×

这一类例子，动词后的名词根本不能像上面几类那样向前移。这可以说明“吹着气”“剩下十个人”是动宾结构。

我们总起来看，这几类句子虽然性质不完全相同，可是句子的结构形式一样。“墙上挂着一张画儿”的“一张画儿”，“台上坐着主席团”的“主席团”，跟“来了一个人”的“一个人”，还是称为“附属主语”好呢，还是跟“身上系着围裙”的“围裙”一样同称为“宾语”好呢，就可以抉择了。

要作决定，必然又牵涉到地位词能否作主语的问题。根据事实，地位词在某一些句子里是作主语的。例如：

1. 我望望车外，四下苍苍茫茫的……①

2. 对面屋顶上，窗外地上，全都白啦。②

3. 太阳一晒，沙漠上热得像个大蒸笼……③

4. 看见车身的外壳上满是斑疤和红锈……④

5. 碧绿的芦苇上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⑤

6. 上部缺乏各个塞门材料……⑥

从这些例子可以知道：地位词可以作主语是肯定的。回头看上面所说的一些句子中的“墙上”“桥上”“台上”“水里”“身上”“腰上”等地位词是不是主语呢？我认为还需要讨论。⑦ 但是后面的谓语部分可以统一起来称为“动宾结构”，当然性质上的不同还是要认识清楚。

---

①杨朔：《石油城》，见初中课本《文学》第二册。

②③艾芜：《屋里的春天》，见初中课本《文学》第一册。

④钱小惠：《死车的复活》，见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

⑤管桦：《小英雄雨来》，见初中课本《文学》第一册。

⑥同④。

⑦在古代汉语文学语言里，地位词作主语的句子很多，但一般都是判断句或有无句。

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宾语和表示处所的状语[1]

我们在叙述一种事物的存在或出现的时候，最常用的表达方式是先指出处所，然后说出存在着什么或出现了什么。这种句子也是一种陈述句，但跟一般陈述句的结构不同。为了说明这种句子的特点，先举一些例子来看。

我们先看表示存在的句子：

（甲）1. 桥脚上站着一个人（文学一，95）[2]

2. 屋子里坐着十多个人，就有五六个是抽烟的……（文学一，128）

3. 对面，靠壁坐着女特等劳动模范武玉兰……（文学一，129）

4. 门口围着好多人…………（文学二，180）

5. 主席团的座位上坐着政府的委员们。（初中三，1）

---

①本文写于1956年2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②例句后面括号内是出处。“文学一”指的是：初中文学课本第一册（1955年5月版），“文学二”指的是“初中文学课本”第二册（1955年11月版）。“初中”指的是初中语文课本（1，3，5册见1954年11月版；2，4，6册见1955年7月版），“工农”指的是“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1册见1954年5月版，2册见1954年8月版）；“一”，“二”等数字指的是册数，册数后面的数字指的是页数。

6. 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初中六，45）

（乙）1.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文学一，53）

2. 蓝色的天上飘着一块一块的浮云……（文学一，112）

3. 河里奔腾着白色的浪花。（初中二，92）

4. 七岭的右边，耸立着一座魁伟雄壮的大山。（工农二，18）

（丙）1. 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2. 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的像。

3. 房对侧右手角上斜放着一张办公桌，桌上堆满文件。（工农一，68）

4. 每个墙报的旁边挂着一块识字牌，上面写着一天当中需要认识的生字。（工农二，146）

5. 村子里白茫茫的一片，积雪有膝盖深，又吹着刺骨的寒风。（初中五，21）

（丁）1. 广宽的平原上种满了麦子，……（初中二，19）

2. 屋里院里挤满了人。（工农一，141）

3. 地下堆满了各家送来的棉花包，……（文学二，171）

4. 墙上嵌满镜子，……（初中二，70）

5. 在二楼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工农二，50）

这四组例子都是叙述事物存在的，虽然所叙述的事物存在的情况有不同，但是句子的结构形式是一样的。

这种句子跟一般陈述句不同。一般陈述句都是由主语谓语两部分组成的，主语在前，谓语在后；主语是陈述的对象，谓语是对主语的陈述。谓语所说的动作行为必然是属于主语的。例如“他看书”，“他”是主语，“看”是谓语；“书”是“看”的对象，放在动

词“看”的后面作宾语。这就是一般陈述句的结构。但是这里所说的表示事物存在的陈述句都是一部分的句子，它只具有谓语部分，而没有主语部分。句子的开头虽然有处所词（表示处所的名词），但是处所词并非陈述的对象，句中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也并不属于处所词，处所词在这里只是修饰动词的状语，而不是主语。

这种句子的表达作用就在于叙述客观存在着的某种事物，并且指出这种事物是以什么姿态而存在着的。句子的主体是动词和代表事物的名词。在结构上是一种“动宾结构”的形式。但是这里的宾语是依附动词而存在的，它的性质跟一般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承受者）的宾语不同，它不是动作所要涉及的对象，而是说话者所要指陈的以某种动作方式或受了某种动作方式而存在着的事物。① 这里的动词所表示的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这种句子跟一般说明人的动作行为的陈述句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句子有以下几种特点：

1. 句子的开头总是有表示处所的状语，开头就是动词的很少见。处所词一般都带有“上”“下”“里”一类的方位词。

2. 这种句子里的动词有的表示人体的动作或物体的运动变化，如“坐”“站”“围”“挤”“吹”“飘”“停泊”“奔腾”“耸立”之类都是；有的则表示人对物品的安置或处理的动作，如“放”“挂”“堆”“种”“嵌”之类都是。这些动词的后面大多数带有语法成分“着”，表示事物是以某种姿态存在着，如（甲）（乙）（丙）三组的例子都是如此。有些动词后面带有补语“满”和助词“了”，表示某处尽是某种事物并且表示这种事物存在的情况。如（丁）组的例子就是如此。

3. 这种句子的宾语所代表的人或物件一般都是无定性的，宾语的前面一般都有数量词，除非指的是某种人或某种东西不需要指

---

① 张志公先生称这种宾语为“存现宾语”，见《汉语语法常识》102 页。

明数量的时候才可以不用数量词。如果动词后面有“满”，已经具有“尽是”“都是”的意思，宾语的前面也就不加数量词。

4. 这种句子开头的处所词前面不用介词“在”。如果把宾语移到开头的地位，把处所词放在句中，处所词前就必须加“在”。这时候，如果宾语是无定性的，而且带有数量词，那么宾语的前面往往要加“有”。例如：

桥上站着一个人。

有一个人在桥上站着。

有一个人站在桥上。

像上面所说（丁）组的例子，如果宾语移前，处所词放在句中，动词前一般加“都”。例如：

地下堆满了棉花包。

棉花包在地下都堆满了。

这几点都是表示事物存在的句子的特点。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表示事物出现的句子。这类句子跟表示事物存在的一类句子的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例如：

（甲）1. 东边来了一个人。

2. 昨天来了一位客人。

3. 小旦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文学一，93）

4. 进来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工农一，52）

5. 路上过来两个年轻妇女……（工农一，155）

6. 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初中六，39）

（乙）1. 冒起好大一片红光。（初中四，73）

2. 院子里又响起脚步声……（工农一，175）

（丙）1. 就在这群学生中间，出现了一个新学生……（初中二，1）

2. 我望见远远出现一片湖水。(初中四, 72)

3. 远处又现出一片房子。(初中四, 72)

(丁) 1. 外面走进一个人来。

2. 门缝里露出来一线灯光。(文学二, 144)

3. 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文学一, 107)

4. 山脚下突然钻出五个人来……(初中三, 58)

5. 总事务所门前开到一长串汽车, 车里走出好些人来。(工农一, 1)

这些句子都是表示出现的。在动词前一般都有处所词或时间词, 处所词或时间词一律是状语。这里的动词主要是"来""出""出现"和带有"出""来""起""出来"一些词的动词。这种动词几乎都是自动词。动词后面的名词并非动作的对象, 它所表示的是出现的事物。这种结构都是"动宾结构"。特别是"走出许多人来""钻出五个人来"跟"拿出一本书来"的形式完全是一样的。这类句子也同样是一部分的句子, 只有谓语部分, 没有主语部分。

这类句子的宾语如果代表的是人或物件, 一般都是无定性的, 如果是无定性的, 它的前面也必然有数量词。如果把这种宾语移到动词前面去就需要加"有"。例如:

昨天来了一位客人。

昨天有一位客人来了。

外面走进一个人来。

有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

总事务所门前开到一长串汽车。

有一长串汽车开到总事务所门前。

这样代表出现的事物的名词前面加了"有"以后就成为"有"的宾语了。

再看这种句子在处所词前面也都不用介词。如果用介词的话, 或用"在", 或用"从", 随着意思来定。"远处又出现一片房子"我们可以说"在远处又出现一片房子","东边来了一个人"我们可

以说“从东边来了一个人” 如果宾语移在动词前，处所词移到后面去的时候，处所词前就要加上介词。例如：

车里走出好些人来。

有好些人从车里走出来。

路上过来两个青年妇女。

有两个青年妇女在路上走过来。

这种表示出现的句子跟表示存在的句子在结构上是一致的。

另外还有表示消失的句子。例如“在这次战役中仅仅死了两个人”，“人们来来往往，昨天来了一批，今天又走了一批”，句法也完全相同。

总起来看，这种表示事物的存在或出现消失的句子是一类，可以统称为“存现句”。这类句子的表达作用不在于叙述人的动作或物的变化，而在于叙述一件客观存在的事实或新发现的一种事物。在结构上，只具备句子的谓语部分，包括：处所词——动词——宾语。处所词是修饰动词的，常常带有后置的辅助成分如“上”“下”“里”之类的方位词。在动词方面，表示存在的句子的动词不带“着”，就带“了”；表示出现的句子的动词，或带“了”，或带“来”“出”“出来”一类的辅助成分。至于宾语，它所代表的事物一般都是无定性的，它的前面多半都有数量词。假如移到动词前面去，往往要加“有”字。

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存现句”跟带有主语的表示行动的动词谓语句不仅在意义上不同，在形式上也不一样，所以不会跟一般表示行动的陈述句相混。假如我们把处所词认为是主语的话，就无以说明动词和后面表出的人或物之间的关系。假如我们认为这种句子是倒装句，句中所表出的人或物是句子的主语，那又不能说明如果把它移在动词的前面，加上“有”，还不是主语。所以我们不承认它是倒装句。我们认为它只是单部分的句子。在语法上只具备谓语部分，不具备主语部分。

复句和多重复句①

这一讲有三个重点，一是复句与单句的区别，二是复句的分类，三是多重复句的含义和怎样分析多重复句。下面分五个题目来讲。

一 复句的特点

一个句子有长有短，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复杂的句子不一定就是复句，单句也可能很复杂。是复句，还是单句，这要看这个句子的整体结构如何而定。在一个句子里，某一个句子成分，无论是主语，还是宾语，如果是一个句子形式，这样复杂的句子，仍然是一个单句。如果一个句子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相关的句子组成的，彼此分立，互不作为句子成分，这样的句子我们称之为"复句"。组成复句的小句子，我们称之为"分句"。

一个复句总有整体的结构形式，全句有一个统一的语调。分句与分句之间，有较小的语音停顿。这是为了使听的人知道前边是一个句子，后边又是一个句子。说话时有语音停顿，在书写上就要加上一定的标点符号。比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说的时候，在"进步"后边就有短暂的语音停顿，表现在书面上就

①本文写于1981年6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有一个逗号。复句中的分句有时是很复杂的，如果是多于两个的分句，中间就不止有一个逗号，有时要用上分号，有时要用上冒号。

一个分句可以是一个很完整的主谓结构，也可以是一个非主谓结构。比如：

要积极发展轻工业，以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

这个复句没有主语。当然，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说者和听者都很了解，这个没有说的主语就是“我们”。后边一个分句的意思在于说明“发展轻工业”的目的。前后两个分句都没有主语。

复句中各分句的主语或相同，或不相同。相同的，有时在前后两个分句里都出现，有时因为前边已然出现了主语，后边就不再出现，这是经常见到的情况。还有的复句，前边分句没有主语，而在后边的分句里出现，这是由于符合修辞上的需要，或是为了表达上的方便使然。如果两个分句的主语不同，当然都要把主语说出来，不能省略。在我们说话或写作时，也经常出现另一种情况：后边分句的主语与前边分句的主语不同，而它的主语隐含在前边分句之内。主语能不能省略，就看说的人与听的人能不能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如果不发生误解，大家都懂得，是可以省略的。如：

(1) 风从田野掠过，掀起一层一层的麦浪，一望无际。

这个复句前一个分句的主语是“风”，后一个分句，“掀起一层一层的麦浪”的主语也是“风”，“一望无际”的主语是“麦浪”。后两分句的主语都省略掉了。

(2) 树荫深处有一群小鸟，不时发出清脆婉转的叫声，使人感觉格外幽静。

这个复句的第一个分句“有”后边的宾语是“小鸟”，“发出清脆婉转的叫声”的是“小鸟”，“小鸟”应为第二分句的主语，但没有出现，隐含在前边分句的最后了。后面“使人感觉格外幽静”的是“叫声”，那么，“叫声”又是第三分句的主语。三个分句联贯在一起，虽然有两个主语没有说，意思还是清楚的。

另外，复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复句中分句之间在意思上是密切相关的，而在语法结构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顺着说下来，平行顺连的；一种是用关联词语连缀起来的，如用连词“虽然……可是”“不但……而且”之类，或用副词“也”“就”“才”等等。这些关联词语表示分句之间种种不同的意义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复句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一个句子由两个以上意义相关的句子组成，分句之间不互为句子成分；第二，整个句子有一个统一的语调，中间有短的语音停顿，全句末有较长的语音停顿；第三，复句的分句在意思上是密切相关的，在结构上有的平行顺连，有的用关联词语来连缀。

二 关于区别复句与单句的问题

在研究汉语语法结构方面，对于复句与单句的划分存在一些困难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句子以某种形式出现时，是一个单句；同样的意思，前后稍微移动一下，就变为复句了。还有，有的语言学家认为某种形式的句子是单句，另外一些语言学家则认为应该归到复句里去，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这本书中就讲过：“单句复句的划分是讲汉语语法叫人挠头的问题之一。”（见第 87 页，第 97 节）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困难，我们还不能不从理论上结合句法的分析，根据语法上的特点来寻求区别单句与复句的标准。为进行教学的实际需要，这里提出几点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1. 如果一个句子的谓语部分是联合成分，中间没有语音停顿，或小有停顿而语流连接得很紧，只在句尾才有一个大的语音停顿的话，应当属于单句。例如：

(1) 她心直口快。

“心直”与“口快”是连接在一起的联合词组作谓语，应当是

单句。

(2) 老师不断地教导他，督促他。

这句的主语是“老师”。讲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教导他”，一方面“督促他”，中间没有连词，语流还是很快的，应当是单句。

(3) 我们有信心而且有能力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这个句子里，“我们”是主语，谓语是连动式。“有信心”“有能力”两个词组用“而且”连接起来，后面是“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是一个单句。我们不能认为凡是有关联词语的句子都是复句，关联词不仅可以连接分句，也可以连接词组或单词。这里连接的是两个词组。

2. 一个主谓结构的句子中某一成分是句子，那不是复句，而是单句。例如：

(1) 我没想到你忘了！

这句话的语流很快，中间没有什么停顿，它的结构是很清楚的。“想到”是谓语的中心部分，“你忘了”是个句子，做为宾语。这应属于单句。

(2) 内容要正确，表现形式要恰当，都是为了读者。

这句的主语部分是两个句子，“内容要正确，表现形式要恰当”，中间没有用连词连接起来。如果没有后边那部分的话，就成复句了。现在这两个主谓结构连在一起作了这个句子的主语，谓语是“是为了读者”，“都”是副词，作状语。这个句子也是单句。

(3) 我们不允许这种现象再发生。

这句与第一句相同。这句的宾语是“这种现象再发生”，它是一个主谓结构。这个句子是一个单句。

(4) 许多专家都一再表示他们一定竭尽全力为四化做出贡献。

这句的主语是“许多专家”，“表示”后边是宾语。这很清楚是

一个单句，而不是复句。

3. 两个句子所陈述的对象是一个，主语或在前一句出现，或在后一句出现，都是复句。例如：

(1) 他听到这个喜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这句话中间有语音停顿，后一分句的主语也是“他”，因为在前一个分句出现了，所以后边就省去了。“听到这个喜讯”是前一分句的谓语部分；“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是后一分句的谓语部分，这是一个复句。

(2) 早晨起来，他洗了洗脸，很快就到工地去了。

这是由三个分句组合在一起的。“早晨起来”的主语是第二个分句里的“他”；“很快就到工地去了”的主语也是“他”，第一和第三两个分句主语都省略了。这个句子是一个复句，不是单句。

4. 有些关联词既可以用于复句，也可以用于单句，不能认为有关联词的句子就是复句，应当从整个句子的结构来辨别。这就是要看它是一个主谓结构，还是两个主谓结构，是分句与分句组合在一起，还是一个句子里某一成分是一个主谓结构，不能只从有没有关联词语来定。例如：

(1) 那个孩子既聪明又活泼。

“既……又……”是一对关联词语。这句的谓语部分是一个联合成分，用“既……又……”连接在一起，这是单句。

(2) 只有肯虚心向人求教的人才能有进步。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出什么样的人“才能有进步”。前面“肯虚心向人求教的人”是全句的主语。这是单句。

(3) 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

“然而”是个连词，它在这句话中是与上文相联系的，与本句没有直接的主要的关系。句子前边的“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是附加成分，不是句子，而是一个词组。“我知道最早的”是主语

部分，"的"后省略了"名目"一词。"然而……却……"属于关联词语，不能因为有这样的关联词语，就误认为是复句。

5. 复句中有一种紧缩的形式，句子有两个谓语部分，既不是联合词组，也不是表示使令意的兼语词组，意思的内容是，表示一种转折、假设的关系，而又省去可用可不用的关联词语，第二个谓语前省去主语，句子中间也没有语音停顿，这很像单句，但不是单句。一般语法书称之为紧缩复句。例如：

(1) 你叫他也不答应。

这个句子，实际是由两个句子组合在一起的，它省略了第二个谓语前边的主语。应当是"你叫他，他也不答应。"把两个"他"压缩在一块，语流很紧凑，中间没有语音停顿。这种句式我们经常会用到。

另外，有一种句子是用关联词语的，大都是副词。例如：

(2) 大家越干越起劲。

这里两个"越"字是关联词语，主语是"大家"。句子展开后应该是："大家越干，大家越起劲。"这类句子也是紧缩复句。再举两个例子看：

(3) 他一坐下来就看书。

"一……就……"是关联词语，把前后两个内容联系在一起了。"就看书"的主语（"他"）没有出现，同前面压缩在一起了。

(4) 他端起碗来就一口气喝完。

如果这句话去掉个"就"字，那么它就属于连动式的单句了。"端……喝"是一个连续动作。它和兼语式一样都属于复杂单句。有"就"字就是一个复句了。

对于紧缩复句，各家看法不同，有的著作把它归属于单句。不过，我们还是根据大多数的语法著作，把它归之于复句里边。

三 复句的分类

复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组合在一起的。分句与分句在意思上的连属有种种关系，也许是分别叙述的，也许是推理的，也许是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的，也许是表示一种假设或条件的。从全句的语法结构方面来看，分句与分句的语序有先后，为表达不同的意思，有时还要利用关联词语把分句组织起来。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讲语法，是不是要完全从形式上来看呢，还是要照顾到句子的意思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学语法不是为学语法而学语法，学习的目的是为实际应用；任何一个句子都有它实际的意思，不能抛弃意思，单纯从形式上来讲语法。我认为如果能从语序和关联词语两方面跟意思结合在一起来进行分析，在教学上会有很大的便利。把形式与内容两者结合起来，就容易讲解清楚。

根据复句中分句之间的连属关系和所用的关联词语，可以把复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联合复句，一类是主从复句

联合复句的分句之间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主从的分别。随着内容的需要，多说一个分句，少说一个分句，或者由两个分句扩展到几个分句，都不受限制。它是平列的，顺说的，不分主次。主从复句则不然，分句之间就有主要和次要的区别，主要的分句是全句的正义所在。没有主句，单有从句，意思是不完备的。因此，凡是分句连接在一起，属于平行的叙述，或顺说，或分说等一些关系的一般是联合复句；凡是分句连接在一起属于转折、假设、条件、因果等一些关系的都是主从复句。

主从复句的分句通常是从句在前，主句在后，这是汉语的一般顺序。有时主句列前，从句列后，这大都带有补充说明的意味，有时是因为修辞上的需要而突出从句的内容。这种情况往往在文艺作品里出现。也有的是从翻译外文而来的，迁就了原文的语序。

联合复句不一定都要有关联词语，但主从复句因为意念的不同，大都有关联词语。当然，前后分句可以增加些内容，但前后连属在一起要受关联词语的制约。

下面分别列出联合复句和主从复句的各种关系和经常应用的关联词语：

A. 联合复句

1. 并列关系（也，又，既……又，一方面……一方面，一边……一边）

(1) 黑夜已经过去了，海面上露出了曙光。

(2) 那块地是一片从来没有开垦的荒原，人烟稀少。

(3) 篷子里饱孕着海风，海水上卷起一阵阵雪白的浪花，船追逐浪花急驶着。

(4) 我已经忘记了怎样和他初次见面，也忘记了他怎样到了北京。

2. 选择关系（或者，还是，不是……就是，要么……要么）

(1) 或者你到我这里来，或者我到你那里去，最好说准。

(2) 他不是到天津去，就是到上海去，在北京的时候很少。

3. 递进关系（不但……而且，不仅……还，而且，并且，甚至，不但不……反而）

(1) 这种桥不但形式优美，而且造价便宜。

(2) 我们的祖国，不仅土地广阔，而且物产丰富。

(3) 别说男人都按时到田里干活，就连妇女也都起早贪晚地忙个不停。

4. 连贯关系（就，便，接着，于是，然后，后来）

(1) 他有点儿激动了，站起来，推门出去了。

(2) 你刚走，他就来了。

5. 分合关系

(1) 历史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

的。

(2) 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两种都是主观主义。

B. 主从复句

1. 转折关系（虽然……可是，但是，然而，却，倒，只是，不过）

(1) 事情没有办成，可是走了不少路。

(2) 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很有才能。

(3) 别看他身体很弱，精神倒是很好。

2. 假设关系（如果，假如，倘若，要是）

(1) 如果敌人敢来进犯，我们就坚决消灭他们。

(2) 要是你认为可以这样做，我一定设法去办。

3. 让步关系（即使，纵然，就是，尽管）

(1) 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的进步，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2) 好是好，就是价钱太贵。

(3) 尽管他不一定能来，也要通知他一声。

4. 条件关系（只有……才，只要……就，除非……才，不管……都）

(1) 只要我们肯用心钻研，就一定能成功。

(2) 只有干部与群众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3) 除非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否则顶好缓办。

(4) 不管怎样忙，你也要去一趟。

5. 因果关系（因为……所以，由于……所以，既然……就，因此，因而）

(1) 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2) 既然他做事很认真，我们就应当相信他。

(3) 文艺的素材取自生活，因此作家不能不熟悉生活。

6. 目的关系（为，为了、为了……起见，免得，以便，以免，用以）

(1) 为了把事情办好，事先要考虑周到，以免临时手忙脚乱。

(2) 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使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

(3) 梅雨季节过去以后，要把柜子里的东西拿出去晒一晒，免得日久发霉。

7. 取舍关系（与其……不如，宁可……也不）

(1) 我们与其坐火车，不如坐飞机，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2) 宁可提前到达，也不要迟到。

8. 连锁关系

(1) 群众越是信任我们，我们越是要谦虚谨慎，努力为群众服务。

(2) 你要多少，有多少

(3) 他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

(4) 谁先到，谁买票。

四 复句分类的问题

复句的分类，各家的语法著作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分得粗疏一些，有的分得细致一些。粗疏的显得概括性强一些，细致的则把用不同关联词语所具有的意念关系表现得清楚一些。这样在归类上也出现一些不同。比如，有的著作把假设归于条件：这样的句子用“如果……就……”作关联词语。如果怎样怎样，可以是一个条件，所以有的书属于条件句。但那是一种虚拟的条件，因此有的书属于假设句。另外，有的书把假设归于让步，比如：“要是你认为这样做好，我就这么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让步关系，因为如果你认

为这样做好，我就让步了。还有的书把让步归在转折一类，也有的书叫让转关系，归类颇不一致。

为什么出现这些不同呢？主要原因在于各家对复句分句间意义关系的着重点不同。有的着重在这一点，有的着重在另一点。举几个例子来看：

(1) 即使你不能来，在事先也给我一个信儿。

对这句话有的归于假设，有的归于让步。

(2) 虽然这里是一座偏僻的小镇，可是在春节的时候我们还过得很热闹。

这句话有的归于转折，有的归于让步。

(3) 水渠修成了，纵然不下雨，我们也有水灌溉了。

这与（2）一样，有的归于转折，有的归于让步。

(4) 文章与其长而空，不如短而精。

这类句子有的归联合复句的选择关系一类，有的归主从复句取舍关系一类。

那么，怎样处理好呢？如果分得粗一些，把假设和条件归为一类，把让步与转折归为一类，未始不可；不过，为了避免笼统，便于教学，把句子分析清楚，还是分细一点好。当然要有细分的理由。我认为有两点可以提出来说一说：

(1) 转折与假设语气不同，应当有区别。因为转折关系一类的从句所表示的事实是已经存在的，而假设关系一类的从句所说的是虚拟的，尚未实现的，两者不完全相同（参看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知识》219页）。同样，转折关系的从句跟让步关系的从句也有这种分别。即属于转折关系的从句所表示的事实是已有的，属于让步关系的从句大都是虚拟的，最好分为两类（参看胡裕树先生的《现代汉语》增订本404页）。

(2) 取舍关系的句子有比较得失的意思。用"与其……不如"作关联词语的，前者是从句，后者是主句；用"宁可……也不"作

关联词语的，前者是主句，后者是从句；两者都同有主次之分。这跟联合复句的选择关系句（或称交替句）还有所不同，应当属于主从复句一类。

五　多重复句

多重复句这个名称，很早就在语法著作中出现了。单从名称上看，似乎不易理解，实际就是一种复杂式的复句，就是复句中有多层关系的分句。如果一个复句基本是一个联合复句，其中某一部分又可能是一个主从复句；如果一个复句基本是一个主从复句，其中某一部分又可能是联合复句或主从复句。要了解这种复句的结构，应当首先通读全句，从全句总的意思去看，第一步分清大的段落，然后再分析小的段落。

不论复句怎样复杂，所包含的分句怎样多，总有一个贯穿全句的基本结构关系：或者是一个长的联合复句，或者是一个长的主从复句。这是大的层次，是全句的主干。了解了大的层次以后，再分析构成大层次前后所有的分句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看出一个复杂式的复句是怎样构成的了。举出《汉语知识》241 页的例子来看：

只要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改善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并列）把国家的真实情况和达到美好的将来的必由之路清楚地告诉他们，⋮（并列）在全体青年中间发扬艰苦奋斗的正气，⋮（并列）反对自私自利的歪风，|（递进）并且努力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条件）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帮助广大的青年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弱点，|（并列）勇

敢地愉快地迎接自己的战斗任务。

这里用的划线办法与《汉语知识》不同，根据一般的习惯，总感到划的线越多越表示重要，用在复句中划的竖线太多反而不合适，所以我采用了把多重复句两层主要关系之间画上双线的办法，首先明确地表明前后两部分的关系，然后再分析前后分句的层次，分别划单线和虚线。

这里的“只要……那么，就”是这个长句的关联词语。很明显，这个长句是一个表示条件关系的复杂的主从复句。“那么”之前是一个大段落，“那么”以后是一个大的段落。

在前一大段，由“并且”划分一个层次，前后两层是递进关系。在表示递进关系“并且”一词之前又是三个并列的复句。在后一大段中的两个分句，又是并列关系。只要我们首先分清了多重复句大的层次，然后再分析每一大段落中分句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理解全句的意思了。

词汇和词汇学①

0 词汇是语言里全部词的总称。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没有词汇，就不成其为语言。所以词汇在语言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汉语、英语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高度发达的语言都有极丰富的词汇。词汇的丰富不能仅从数量来理解。我们说某一种语言的词汇很丰富，是就这种语言中词汇的纷繁性，词所表达的概念的丰富以及词在语义方面和修辞方面的意义、色彩的丰富而言的。我们要掌握语言，充分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必须对语言的词汇有深刻的了解。

“词汇学”是研究语言词汇的科学，它跟语音学、语法学一样都是语言学的分科。词汇学着重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语言词汇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和语言词汇发展的规律。词汇学又有一般的词汇学和个别语言的词汇学的分别，上面所说就是一般的词汇学，个别语言的词汇学如汉语词汇学、英语词汇学等是就某一种语言的词汇进行研究的科学。

词汇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因此词汇学中又分出一些专门的分科，如“语义学”“词源学”“词典学”“历史词汇学”等都是。“语义学”主要研究词的意义和词义的发展变化；“词源学”研究词语的起源和词语最初的形式及意义；“词典

①本文载于《语文学习》（上海）1958年9期。

学"研究编纂各种类型的词典的原则和方法；"历史词汇学"则专门研究某一种语言整个词汇的发展历史。这些可以说都是词汇学的分科。

1.1 语言的词汇是经过许多年代发展而成的。在远古时期，人类最初有了语言的时候，词汇当然是很贫乏的，可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语言的词汇逐渐增多起来。社会不断往前发展，语言的词汇也日趋丰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消失掉一些不合用的词，但增添的新词的数量要多得多，所以现代极发达的语言的词汇都是非常丰富的。

语言的词汇既然非常纷繁，非常丰富，是不是杂乱无章毫无系统呢？不是的。语言中的词尽管很多，在构词、词义各方面仍然有一定的联系，并且构成一个统一的词汇体系。

比如汉语中"工"这样一个词是从上古时期就有了的，它也是一个构词的词素，在现代汉语中如"工人""工业""工资""工厂""工程"，以及"工整""工致"等等一些词都是用"工"构成的。"工"与这些词，以及这些词彼此之间，都有联系，这些词不仅在构词的成分上有关系，而且在词素的意义方面也有联系，如"工整""工致"中的"工"都是"工巧"的意思，与上面"工人"等词中的"工"的意义有区别。由此可以看出语言的词汇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1.2 还可以从构词方法上来看。世界上各种语言都有与本身的结构特点相应的构词法。构词法尽管各有不同，但每一种语言所有的构词类型是成系统的，那么，整个词汇在构造上也就有了系统。例如汉语的构词法主要的类型是词根复合法和附加法（如"运动""展开""青菜""第一""麦子""工业化""人民性"）。俄语的构词法主要的类型有三种：（1）改变语音，（2）在词干上加前缀或后缀，（3）词干的复合。类型既然很清楚，词虽多，也可以分出词群来。所以词汇本身就是一个体系。

词汇的系统性当然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词义的发展、词与词在意义方面的关系等等都可以看出词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知道了词汇是一个体系，而不是散漫纷杂的堆积，那就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研究词汇了。

2.1 词汇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里的词，究竟什么是词呢？词是人类语言中具有一定意义的声音单位，它能够在语句中独立运用，作为构成词组或句子的材料。例如“生产”（shēngchǎn）是一组音，包括两个音节，它的意义是：人类改变自然界的东西，制造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活动。这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我们可以把这个词运用在各种不同的词组或句子里来表达这个意思。比如：“生产的指标”“农业生产”“生产技术”“增加生产”“以生产为中心”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词就是语言的一个基本单位。没有词就不能构成句子。

“生产”这样一个词是用两个词素（“生”和“产”）构成的，“生”和“产”在语言里又是另外的两个词，但那两个词跟“生产”这一个词所表达的意思不同，“生产”表达的是一个独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所以“生产”是一个词。汉语里一个构词的词素能够另外是一个单词的并不很少，但是我们不能受汉字的影响而把“词”跟“词素”混淆起来。还有，“生产”一词是用词根复合法构造成的，跟用两个词构成的词组相像，但不相同。“生”“产”结合在一起有不可分性，同时它是作为一个词汇单位在语句中应用的，所以它是词，而不是词组。研究词汇，把“词”和“词素”及“词组”区分开是必要的。

语言是用词组成的。人在听到一句话的时候，能分得开是哪些词，才能了解词与词之间在语法和意义上的联系；不了解词，人就无法进行交际。美国有些语言学派，企图把语言分解为不能再分的要素，在他们的概念中语言是由词素组成的，不是用词组成的，这完全是错误的。

2.2 语言里每一个词都具有声音和意义。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着的。声音就是词的物质外壳，意义就是词的内容。词的物质外壳也就是词的外部形式。

人类的语言是有声的语言，离开声音就不能进行交际。一个词的声音是一个整体，少的可以只是一个音素，例如汉语北京话的 e（鹅）、上海话的 ŋ（五），俄语的 c（从）、B（在），都是；多的可以有好几个音节。词的声音是传统所规定下来的，一个词所以那样说是社会所决定了的，跟词的意义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表达同一个意义的词，在不同的语言里声音可以完全不同。

词的意义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说者和听者——所共同了解的。一个词的意义总是概括的。在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大家都用同一个词来表示词义中所反映的人们所共同认识了的现实，所以词义是具有社会性的。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认识各种事物或现象，概括出它的特征而形成为概念，就以一个词巩固下来，并使各种事物或现象有了通用的名称。词的意义就同客观现实中的一定的事物、现象有联系，社会上对这些事物在生活中的特性和作用的理解，自然就在词的意义中反映出来。说到一个词，人们就都有共同的了解。词的意义也就是传统所巩固起来的由使用同一种语言的集体在生活实践中确定下来的词的内容。国外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词的意义是个主观性的东西，没有固定的内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词和概念是一个统一体，概念是在人的意识中概括反映现实的思维形式，概念的物质外壳就是词。语言里的词具有称谓作用的（包括事物、现象、行为、特征等等）都是表示概念的，例如“火车”“快”“劳动”“发展”，这些词所表示的都是一些独立的概念。语言里有些词如介词、连词之类跟上述那些词不同，但它们在语言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所表示的是词与词或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它们的意义就在于是现实现象间关系的概括，例如“把”“对于”“和”“如果”“所以”之类。语

言里还有语气词、感叹词之类的词，如“呢”“吗”“嗯”等等，这种词都有它的特殊意义，但它的意义也是概括的。具有称谓作用的那些词一般称为“实词”，后两种具有特殊意义和作用的词一般称为“虚词”。但无论哪一类词都是具有一定的涵义的，而且是概括的。概括性就是词的特征。词的概括性正说明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表现出人能掌握复杂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的巨大力量。

我们天天在应用语言表达思想，但能否把思想表达得准确、鲜明、生动，与我们掌握的词的多少和运用词的能力有关系。要能够善于运用词就必须对词的意义有足够的了解。不了解词义或对词义理解得不正确，那就不能正确地了解别人的语言，也不能正确地、鲜明地、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研究词义是词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3.1 词汇中最复杂的现象是词义。一个词的意义不一定只是一个，有的词有好几个意义。例如：“落”是“掉下来”的意思，“落在后面”的“落”是“遗留”的意思，“全国解放以后，政权落在人民的手里”的“落”是“归属”的意思。“推”是“手向前或向外用力使物移动”的意思，“把事情推掉”的“推”是“推卸”的意思。“通”是“没有阻碍、通达”的意思，“文章不通”的“通”是“通顺”的意思，“他通俄文”的“通”是“懂得很透彻”的意思。“运动”在物理学上指物体继续不断地改变位置而言，可是社会上政治、文化方面的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众性活动也叫“运动”（例如“推广普通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在体育方面各种锻炼身体的活动也叫“运动”。这都说明一个词不止有一个意义。一个词有复杂的多方面的意义是语言里的词的一般特征，几乎各种语言里都是如此。这种现象叫做“多义现象”，词的这种性质叫做“词的多义性”。

3.2 一个词在产生的时候一般是单义的，但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词义可能经过多次的变化，从一种事物、现象、行为的名称转

为另一种事物、现象、行为的名称，或者由具体的意义发展出抽象的意义，因此一个词就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词的多方面的意义是互相有联系的。例如上面所说的“通”这样一个词，原义是“通达”的意思，“文章不通”的“通”和“通俄文”的“通”，在意义上都跟原来的意义有关联，这些意义就构成了一个系统。原来的意义是基本的意义，其他的意义就是由基本的意义派生出来的意义，一般称为引申义。假如原义跟引申义的联系已经消失，不能为人所了解，在语言中就成为不同的词了。

3.3 词义当中还有一种意义是比喻义。比喻义是由于比喻而产生的。例如“辉煌”本指光彩耀眼的意思，如“金碧辉煌”，现在我们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辉煌”是“伟大、出色”的意思。这就是一个比喻义。又如“架子”是一种放东西的器具，可是我们说“这个人的架子很大”，比喻人的骄傲的样子，这也是一个比喻义。

3.4 总起来看，词义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法子去理解它，只要我们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注意事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就可以找出系统来。词的多义性是不会妨碍人们的互相了解的。因为不论词的意义多到怎样的程度，在连续的话里或在对话里，它的意义由于有了上下文的限制就变成十分确定的了。

4.1 在语言词汇当中就一个词来看，它可以有许多意义；就许多的词来看，其中又有许多是同义的、同音的和意义相反的。

凡声音不同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一般称为“同义词”，例如“克服”“克制”，“稳固”“稳定”，“激烈”“剧烈”，“侵犯”“侵略”，“消失”“消灭”，“宏大”“宏伟”，“保卫”“保护”，“发现”“发觉”等每组的两个词都是同义词。

严格说起来，语言中除了由于方言和借词所产生的意义完全相同的词以外，一般的同义词的意义都不是绝对相同的。例如“火

柴”和“洋火”，“玉米”和“苞谷”所指同是一种东西，这是因方言不同产生的意义完全相同的同义词。“麦克风”和“扩音器”，“盘尼西林”和“青霉素”所指也是同一种东西，这是因音译外来语和自造的词不同而成为意义完全相同的词。这种意义完全相同的词在任何语言中都不是很多的。

除了这种意义完全相同的同义词之外，其他的同义词因为在意义上具有共同性，所以构成同义的关系。但是同义词之间在细微意义上、修辞色彩上和应用的场合上还是有区别的。例如“决定”与“断定”在意义上有相同处，但是“决定办法”就不能说“断定办法”；“操纵”与“控制”是同义词，但是意义既不完全相同，感情色彩尤其不同，“控制”是中性词，没有褒贬的不同，“操纵”则多用在贬义；“飞”与“飞翔”是同义词，但是“飞翔”一般用于书面，特别是文学作品里，在口语里就很少用。研究同义词的目的就在于找出同义词间的共同点和准确细致地分析其间的细微的差别。既要看到一般，也要看到个别。

同义词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不断深化。为了精确地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所以有了许多同义词。同义词的丰富性也就是语言的高度发展的证明。我们要充分地掌握语言，以便更精确地表达思想，就需要特别注意同义词间的差别。

4.2 语言中发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称为“同音词”。同音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音相同而写法不同的；一类是发音相同而写法也相同的。前一类如“公式”和“攻势”，“绘画”和“会话”，“著名”和“注明”，“数目”和“树木”都是。后一类如“写一封信”的“信”和“信不信”的“信”，“桑麻”的“麻”和“腿麻了”的“麻”都是。

同音词在各种语言里都会遇到。例如英语的 ear（耳朵，麦穗）。同音词和一词多义是有区别的。多义词的各个意义不论怎样不同，但它们总是环绕在一个意义中心的周围，各个不同的意义都

与基本的意义有关联，并且是从基本意义发展而来的。至于同音词则只是声音的相合，在词义方面并没有任何关联，所以是两个不同的词。同音词当中可能有一部分原来是一个多义词，后来这个多义词由于各个涵义之间丧失了意义上的联系而变为两个同音词，但在现代既然无可考查，也就只好作同音词来处理了。

我们知道词汇中有这种同音的现象，就不会把两个全无关涉的词误以为一个多义词。在编纂词典时尤其不能不注意。同音词对于语言的理解不能说没有妨碍，但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妨碍不大。

4.3 词汇中有不少彼此具有对立意义的词，这种词一般称为反义词。例如“深”和“浅”，“高”和“低”，“建设”和“破坏”，“延长”和“缩短”，“团结”和“分裂”，“坚强”和“脆弱”，“干燥”和“潮湿”，“明显”和“晦暗”，“勇敢”和“怯懦”，“稀疏”和“稠密”等等都是。

反义词跟同义词恰好是语言词汇中的对立面。这两方面都说明语言发展正是矛盾的统一。反义词也同样是一个对立面。反义词不仅是意义上对立的词，而且也是词的意义系统内含有对立意义的词。从这个观点来看，反义词乃是一种独特形式的多义词。”① 我们研究词汇不能不注意反义词，善于运用反义词会增加语言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

5.1 语言的词汇从修辞学的观点来看，还可以区别出感情色彩和语体风格的不同。这些就是一般所说的“修辞色彩”。

语言的作用不仅要表达人的思想，同时还要表达人的感情。有不少的词除了具有要表达的意义以外，还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即表示说话的人对客观的事物的主观评价。感情色彩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示尊重、严肃，例如“祖国”“嘉奖”“谴责”；有的表示亲切或亲密，例如“小朋友”“战友”“小伙子”；有的表示热情或兴

①布达哥夫《语言学概论》，时代出版社 1956 年中文译本第 51 页。

奋，例如“歌唱”“欢呼”；有的表示有礼貌，例如“您”“阁下”；有的表示轻视或鄙视，例如“叫嚣”“懒汉”；有的表示讽刺，例如“老爷”“傀儡”“嘴脸”等等。这些词都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

5.2 在语言里并非所有的词都带有感情色彩。有很多的词只有指称的作用，例如“煤”“工业”“大”“看”“发表”等；有些词则只有极抽象的意义，例如语言中的虚词。这些词都说不上有什么感情色彩。

但是在运用语言中，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词也能够获得感情色彩，那就要从上下文来确定。例如“木头”一词是没有感情色彩的，如果说：“他是一块木头”，“木头”在这里就表示“人的呆板、不灵活”，那就具有不喜爱、甚至轻视的意味了。这已经涉及到修辞学的范围，在此不需要多谈。

5.3 词在语体风格上的区别是就词的使用范围、场合的不同来看的。语言中的词汇是非常纷繁的，有些词口头上常用，书面上比较少用；有些词书面上常用，口头上比较少用；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词口头上和书面上都常用。

口头上常用的词和书面上常用的词，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且二者越来越接近一致了。不过就今天的情况来看，词在语体风格上的区别多少还是存在的。例如“脑袋”（头）、“个子”（身材）、“老婆”（爱人）、“加油”（努力）、“拉倒”（作罢）、“麻俐”（敏捷）、“大伙儿”（大家）等词，口语里常用，而括号内的词是口语和书面语共同使用的。书面语里也有些词，例如“乘（车）”“观看”“欢宴”“给予”“追溯”“屏除”“岁月”“奔驰”“闪烁”等，在口语里还比较少用。口语跟书面语所表现的风格并不完全相同。口语特别是日常谈话的语句总比较随便一些，而书面语就比较郑重庄严一些。随便或者郑重庄严，并不完全决定于用词，不过就一般情形而论，用词有一定的作用。

词的风格跟书面语的体裁也有些关系，例如“飞翔”“漫长”

"澎湃""声响""皎洁""耸立""荡漾"之类的词，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里；而公文、法令当中又有些常用的词，在别的体裁的文章中用到的机会就比较少，如"抄件""附件""审核"之类。这些词由于应用在不同的体裁里也就有不同的风格。词的风格不是可以一个个地孤立起来看的，必须从许多词在语言实际应用中的情况来考查。一个词是否应用得合适，要从连续的上下文和文章的体裁去衡量。区别词汇中具有不同语体风格的词可以使我们在运用语词的时候知道有所选择，并且掌握词的正确用法。

6.1 词汇是一个纷繁的体系，每种语言的词汇都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古今相承一直通用的词固然占多数，但是也吸收了不少书面上相传应用的古语词、方言词、专门行业语和外来词。

古语词包括的范围很广，有些在现代语里很少应用。其中有一类是属于历史上的事物或现象的名称，这类词一般在历史著作和叙述历史事实的作品中出现。例如"天子""诸侯""圭""笏"等一类词都是历史性的词，与现代社会生活毫无联系，所以现在一般文章很少用。另外有一类是属于表示封建关系的一些词，例如"大人""台端"等都是新社会中不用的词。古语词中还有一类是已经不能普遍为人所了解的古代书面上的词，例如"策励""缀辑""诚款""拊掌"等已经不通行，现在常用的是"自勉""编辑""诚恳""拍手"等词。

6.2 古代语和现代语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现代语言里各种词汇当中总有一大部分的词是直接继承古代语而来的。古代书面上应用的词，有些仍然符合现在的需要而且是普遍为人所懂的，这些词还照旧应用，成为现代语词汇的组成部分，例如"沸腾""振奋""扬言""频繁""羞涩""震撼""宏伟"等都是。

有些词也有这种情形，即一个古语词在现代语里很少单用，但在某一些完整的词组（成语）里还存在。假如"目"单用的时候很

少，但在“有目共睹”“耳濡目染”“目中无人”“目不转睛”“目光如炬”“目不识丁”“历历在目”一些成语里仍然存在。

在语言中采用古代语当中一些有生命的词，不仅丰富了语言，同时还使言辞具有某种语体色彩或特殊的意味。例如“魁梧”“典范”“遵循”“诞辰”等已经是普通常用的词了。这些词对于我们都是有用的。至于那些陈旧的不符合现代需要的词自然就废弃不用了。

7.1 语言当中有全民应用的词汇，还有方言词汇和专门的行业词语。全民应用的词汇也就是民族共同语的词汇，这是全民族共同使用的。汉民族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至于方言词汇只是在某一地区内使用，流行的区域比较狭窄，当地的人能听得懂，别的地方的人就不一定听得懂。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分支，是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既有全民语言的共同性，又有本地的一些特点。例如汉语许多大的方言区域的词汇绝大部分都是全民共同使用的，只有一部分是本地区特有的词。本地特有的词主要都是日常生活方面的词，例如“喝”广州话说“饮”，“屋子”福州话说“厝”，“太阳”有很多地方说“日头”，都是常用词，特别是属于亲属关系的一些名词各处往往不同。至于现代有关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方面的词通常没有什么差别。

方言中有很多生动活泼的词，其中普遍性比较大的而且对丰富语言有积极作用的会不断为全民语言所吸收，即由方言词变为全民应用的词。汉语的发展事实也正是这样，例如“把戏”“名堂”“垃圾”“搞”之类原来都是一些方言词，现在已经成为普通话的词了。但方言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断在起变化。交通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促使民族共同语成为全国各处人民共同交际的工具，方言词应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了。

7.2 专门的行业词语是社会上不同职业的特殊用语，这种特殊用语只在某一部分人当中应用，例如工业生产上应用的“构件”

“高压釜”“打浆机”，农业生产上应用的“保墒”“活茬”“打场”，都是专门用语。其他各种行业也都有一些专门性的词语。专门性的词语，意义是确定的、单一的，非本专业的人不一定完全了解，它的使用范围也比较狭窄。但是由于文化教育的普及以及生产事业的发展，人民接触到各方面的生产活动，很多专门性的词慢慢变成为一般人都能了解的词。我国正处在积极建设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时代，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全民办科学，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各种专门用语在全民大跃进的形势下已经大量地引进到一般词汇中来，专门用语跟一般的词语的界限也就有了巨大变化。

8.1 各种语言的词汇当中除了本民族固有的词以外都曾经吸收一些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或者由于民族之间的接触，或者由于文化方面的影响，语言中就会借用一些为本民族语言所需要的词，这种词称为“外来词”，或者称为“借词”。汉语里从古代起就吸收了一些外来词，例如“葡萄”“菩萨”“比丘”“袈裟”等都是，而从19世纪末叶以来吸收的外来词尤其多。现在应用的哲学、科学方面的术语和社会政治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词当中有不少的外来词。

外来词被吸收到本民族语言中来，不仅不会损害本民族语言固有的民族特质，反而可以使本民族语言趋于丰富，趋于完善。因为本民族语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实质，并且按照自己的内部发展规律继续发展。外来词增加进来，只是丰富了词汇和构词的词素，并不能改变本民族语言的语法构造。有时某一种语言里的词被别种语言吸收之后还会有所改变，失去本来的面貌。例如汉语里“菩萨”一词是由梵文 budhisattva 来的，原文是四个音节，“菩萨”只取第一、三两个音节，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这是古人为了适应汉语一般的词都是双音节的特点而译成这样的形式。又如法语的 la lampe（灯）被俄语吸收以后成为 лампа，原来的阴性冠词 la 去掉了，加上了俄语阴性词尾-a，就与原来的词形不同了。由此来看，借用必要的外

来词丝毫不会损害本民族的语言。

8.2 借用的外来词，有从某一种语言直接吸取来的，也有通过另外一种语言的中介间接吸取来的。汉语在鸦片战争以后从日本吸收了不少的新词，这些新词都是日本应用汉字所翻译的西洋的一些词的译名，我们利用了日本的译名而不另外翻译，这一类就属于间接吸取的性质。

借用别的语言的词一般所采取的方式是连音带义一起接受过来。例如俄语的 совéт，汉语借为“苏维埃”，英语借为 soviet；英语的 tank，汉语借为“坦克”，俄语借为 ТАНК。这种方式普通称为“音译”。汉语里这类音译的借词很多，例如“布尔什维克”“奥林匹克”“咖啡”“阿斯匹灵”等都是。这样的词一望而知是外来词。

另外一种方式是不采用原来的声音，而按照原词的构造样式构成一个词。这种词往往有两个以上的构成部分，借过来就按照这些部分进行意译，跟原词是相对照的。这种方式可以称为“拟造”，或称为“摹借”。例如汉语的“马力”是由英语借来的，英语说 horsepower，horse 是“马”，power 是“能力”，以“马”对 horse，以“力”对 power，就构成“马力”一词。又如“足球”，英语说 football，foot 是“足”，ball 是“球”，汉语按照英语原词的意义和构造的样式而构造成“足球”一词。这样的词跟音译的外来词不同，首先因为它不是译音的，而且构造也合于汉语某些词的样式，这种情况，已经不能说是外来词了。至于参照别的语言中的词的意义用本民族语的构词的材料和形式构成新词来表达同样的概念，这种词只能说是自己创造的词，不能称为外来词。

汉语中的外来词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即借用外国词还怕意义不明确，后面又加上说明。例如“摩托车”，“摩托”是译音，“车”是说明事物的类属。其他如“啤酒”“卡片”“法兰绒”“霓虹灯”等都是。

借词在各种语言里都是存在的。借用别的语言的词一定是根据需要来的。有些是国际性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的术语，有些是本民族语言所需用的而原来自己没有的词。本民族语中已有通用的词，就不需要另外去借。借进来的词也必然要适应本民族语言的内部规律。因此也就变为本民族语言词汇的组成部分了。

9.1 语言的词汇当中还有作为一个意义统一体来应用的“固定词组”，这就是一般所称的“成语”。例如“别开生面”“畅所欲言”“吹毛求疵”“德高望重”“故步自封”“见义勇为”“日新月异”“事半功倍”“推陈出新”等都是成语。

成语跟一般的词组不同，区别在于：（1）一般的词组里词与词是比较活动的、自由的，而成语是不可分割的和有机的整体。（2）一般的词组里的词可以用同义词替代，而成语里的词很少能用其他的词来替代。（3）还有，一般的词组里的成分可以有增有减，成语里的成分就不能增加什么，去掉什么。例如“闭门造车”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比喻脱离实际，关上门在屋子里造车，跟路上的轨辙就很难相合，“闭门”就不能用“关门”来替代。

各种语言中都有各式各样的成语，表达同样一个意思的成语，各种语言的表现方式也互有不同。成语的意义是决定于整个的词组，并且通常都不能逐字地译成为其他语言。例如，英语表示大雨如注的意思，说 to rain cats and dogs，直译就成为“从天上落下猫狗”。法语表示熟睡的意思，说 dormir sur les deux oreilles，直译就成为“枕着两个耳朵睡觉”。所以成语是要作为整体、作为统一的意义来理解的。从词汇学上来看，每个成语犹如词汇当中的一个词。

9.2 汉语里的成语绝大多数是用四个字构成的。从语法方面来看，它的构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名副其实”“所得无几”“胸有成竹”都是主谓结构；“水落石出”“风流云散”都是两个主谓结构；“好为人师”“莫名其妙”都是动宾结构；“知己知彼”“提纲挈领”都是两个动宾结构；“粗心大意”“深谋远虑”都是两个偏正结

构。其他的形式还很多。但总起来看，音节都非常整齐。

9.3　成语是各族人民在历史文化发展中所创造出来的。其中有从口头上流传下来的，有从古代寓言或历史故事来的，有从古典作品的辞句来的，都是经过长期提炼的语言，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活泼生动，具有很大的表现力。例如"排山倒海"形容声势巨大，"九牛一毛"比喻对比之下非常微小，这都是很鲜明生动的。

9.4　语言当中跟成语类似的是"熟语"。熟语也是一种比较固定的形式。例如"碰钉子""拉后腿""露马脚""来不及""吃不消"之类，这都是一种常用的词组，所以也称为"习用语"。但是一般的习用语结构不如成语紧密，有时可以增字，例如"碰钉子"可以说成"碰了一个硬钉子"，"拉后腿"可以说成"扯后腿"或"拉他的后腿"，所以不属于成语之列。

10.1　以上是就语言词汇构成的内容来谈的。另外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到语言的词汇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始终是不断地在发展和变化。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论到最近30多年中俄语变化的情况时说："在最近30年中，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基础，建设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在这个时期中，俄罗斯语言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罗斯语言的词汇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发生了新的社会生产、出现了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的社会精神、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添加了一大批新的词和语；有许多词和语的意思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思；有一些陈旧了的词在词汇中看不见了。"① 汉语的词汇在近代也正是这样一些情况。

新词的产生是跟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联系着的。由于"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就要求语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

①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2页。

充实它的词汇，语言也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文法构造。”① 新词的产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创造新词，一方面是借用外来词。创造新词的材料必然是语言里固有的东西，而且要按照语言中已经确定的构词法来构成，要跟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相合，离开自己语言的固有的传统是不能创造新词的。汉语在近几十年来所产生的新词都是多音节词，这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而且新词的构词方法也都是按照已有的形式的。

至于旧词赋予新义，主要是词义的扩大。例如“业务”原指职业上的事务而言，一般应用在商业上，现在学术性的知识或所从事的专业也叫业务。又如“单位”原义是计算物体的轻重、长短及数量的标准量，现在机关中各个工作部门也叫单位。

语言一面不断地增加新词，一面抛弃掉那些已经陈旧的和不符合新社会的精神面貌的词，这也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旧词的消失与政治经济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自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都一扫而光，“租界”“工部局”一类的词都不存在了。又如在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情况下的一些词和在旧社会中轻视劳动的一些词随着社会的根本变化也都消失掉了。

11.1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词汇在语言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要掌握语言，充分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必须对语言的词汇有深刻的了解。研究词汇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提高运用词语的能力。说话或写文章要做到准确、鲜明、生动，与能否善于用词来表达正确的思想有关。思想正确而且有条理是主要的条件，但词汇贫乏，就不能做到上面的三项要求。我们要能够运用词，就要了解词的读音，词的通用意义和它的特殊意义，以及词的修辞色彩和词的具体用法，同时还应当知道语言词汇的整个面貌，

①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8页。

词汇中的同义现象、反义现象和用词的规范等等，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具备有关词汇的知识。作为一门语言科学的词汇学，就是要把人类语言中词汇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和语言词汇发展的规律指出来以指导实践，使人们具有科学的有系统的知识，普遍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并且进一步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发展词典的编纂工作，以利于语言的规范化。

11.2 就语言科学的成长的时间来说，科学的词汇学的产生是比较晚的。在汉语方面，从前有不少的语言学者从事汉语词汇的研究，但只重古代而不注意当代，只着重在材料的整理和个别一些词的研究而缺乏科学的有系统的全面理解。所以真正的科学的汉语词汇学过去还不曾建立起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主要的成绩表现在两方面：（1）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说从事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初步说明汉语词汇的一般情况。（2）结合汉语规范化研究词汇方面的问题。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一门新的科学正在形成和发展，我们应当做更大的努力使它成长起来，并且以此来丰富普通话语言学的内容。

11.3 词汇学跟语音学、语法学、修辞学是有密切的联系的。我们要了解词的声音与意义的关系，词的构造，词的用法和用词的修辞手段就与上面所说的三种科学有关系。因此要研究词汇又必须具有这些科学的知识。要研究汉语的词汇，当然还需要具备文字学的知识，因为汉语是一直用汉字来记载的，文字跟语言的关系就不能不弄清楚。对于词典编纂工作者来说，还需要有属于语言发展的各方面的历史知识，词源学和词典学的知识更是不可缺少的。

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①

词汇是语言所有词语的总称。语言里有单词、复词。还有成语、习用语等，我们可以总起来称之为词汇（vocabulary）。在语言学里有一部门是词汇学（lexicology）。词汇学主要研究词汇的组成，词素（morpheme，或称语素）构词的功能，词汇的发展，词义的规范，解释词义的方法和不同词典的编纂法。

关于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不过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行钻研和讨论，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简单来说，我们的任务有三方面：

1. 有关理论方面的建设。语言本身是一个体系，语音、词汇、语法都有其系统性。现代汉语的词汇极为丰富，而且不断有新词产生，词义也时有发展变化，我们应当把词汇做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探求语言在造词、用词方面的规律性，为建立汉语词汇学打下基础。

2. 研究词汇教学方面的实际问题，以加速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水平。

3. 研究编纂各种语文词典的方法，适应社会上不同的需要。

任务确定了，在观点和方法上也需要研究。前面说过，语言是一个体系，那么，我们在研究词汇的时候就不能忽略词汇与语言其他各方面的联系；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都有它

①本文载于《语文研究》1982年2期。

的特点，在表达语义的方式上都有它的内在规律，并且跟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习俗有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不从汉语的特点和语言的实际情况出发，贯串词汇和语音、语法以及语言环境（context）、表达方式（包括修辞和文辞的风格）等等方面进行综合的考察，分开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另外，我们还要把中国传统的对语言词汇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的语言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推陈出新，把词语的语言形式和词素的结合同词语的含义（包括正常的、特殊的和附带的）联系起来观察，从繁富的词语中归纳出有系统的知识，以指导实践。简单来说，就是要避免孤立地、静止地研究语言现象，要注意词语在语言中实际使用的各个方面。

现在需要研究的专题很多，下面不妨简单举几项来说。

一 不同词素构词的方式在表现词义上的性能

在现代汉语词汇里有的词素单独是一个词，有的词素只是一个构词的词素，不能单独成词。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词素与词素结合在一起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我在《汉语词汇讲话》里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类是由同样重要的基本成分构成的，有联合式（土地、生产）、偏正式（铁矿、雪白）、支配式（握手、动员）、补充式（减少、提高）、表述式（地震、心疼）、重叠式（年年、慢慢）几种。另有一类是由基本成分和辅助成分（附加的成分）构成的，有前加、后加的不同（第一、忽然、重要性），这都是就词素与词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来看的。至于词素与词素的结合在词义和语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功能还需要进行分析研究。

例如联合式的双音词的两个词素有的是义类相近的，有的是义类相对的：

a 疾病　诗歌　器械　语言

b 首脑　体面　口舌　胃口　手脚

c 大小　长短　深浅　厚薄

这三组里，a组每一个词的两个词素本来各有它所指的意义。如“疾病”一词，“疾”指轻微的病，“病”指“疾甚”，两者合成一个词，成为统称。又“诗歌”两个词素各有所指，合在一起，成为文学的一体的总名。“器”指用具，“械”本指兵器刑具，“器”“械”合在一起就成为有专门用途的器物的统称了。“语”与“言”本来各有专义，一个人说话叫“言”，对别人说话叫“语”，“语”“言”合在一起，就用来称谓人类表达思想，用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了。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组里两个义类相近的词素结合在一起有把词义所指的事物概括化的作用。

上面b组的词都是用两个表示人体方面的名称做为词素构成的，但是都形成了一种新的含义，不是原来两个词素语义的总和。这里“首脑”指为首的人，“体面”指面子好看，“口舌”指由误会而引起的争吵，“胃口”指食欲，引申为所好，“手脚”指举动、动作，引申为出诡计。这种词素配合的类型都带有比喻的意味。

上面所列c组的词是用两个意义相反的词素构成的。“大小”“长短”“深浅”“厚薄”都表示一种程度，每个词素本来都是一个单纯的形容词，现在把意义相反的词做为词根构成一个词，就变成抽象意义的名词了。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词素构词的方式在表现词义上，除了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形式上的共同性以外还具有个别的性能，值得我们进行综合细致的研究。①

①其他不同的构词方式在词义上的表现，这里不再举例说明。

二　关于一词多义和词义发展的问题

一词多义是常见的现象,① 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和词义的发展变化等应从什么角度去阐明，很需要研究。就历史的发展来说，从一个中心意义出发，词义有扩大、缩小和转移，这是一般的讲法。在我们传统的训诂学里有所谓“本义”和“引申义”，我们现在又分析出所谓“比喻义”和“转变义”的名目。但是怎样就是引申义，引申义的界说是什么，范围有多大，需要有明确的解释。谈到比喻义，究竟是怎样的比法，有哪些比喻的方式，也需要加以分析。至于转变义，在《新华字典》的《凡例》里所下的定义是“由原义、故事、成语等转化而成的意义”。如“简”有“书信”义，“推敲”指“斟酌文章字句”，那么，“转化”的含义是什么，跟原义的确切的关系又如何，这不能不从理论上加以说明。有些还要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去进行解释。

我们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有利于我们区分多义词和同形同音的异义词。例如同是一个“足”字，做为单纯词来用，有几个不同的意义。“立足”的“足”跟“不足”的“足”意义不同，虽然都写作“足”，但不是一个词，因为两个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只能算是同音异义词，而不是一词多义。

三　解释词义的原则和方法

怎样解释一个词的词义是词汇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编纂字典或词典所要研究的问题。前代的字书或辞书有就字形说义的，有以同义词互训的，这都是不妥当的，惟有用解说的方法才能说明词

①同写一个汉字不一定是一个词。

义。可是我们要把词义解说得准确、显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现代的辞书里，有些场合利用反义词来解释，这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方法。要确实能说明一个词的正确含义还不能不采用多种方式。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已经注意到尽量多应用下定义的方式来说明词义。例如解释“大”字，不用“跟小相反”和“大小的大”的说法，而注为“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对象（跟‘小’相对）。”这就比较细致，科学性也较强。另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词义和用法的内在联系。因为语言中大部分语词的意义是在语言实际运用的例句中显现出来，所以在解释词义时不能不联系到用法。至于有关词性的问题、① 感情色彩的问题似乎也不宜忽略。总之，究竟有哪些原则、哪些方法，都要进行研究。

四　同义词（或者说义近词）的辨析方法

任何语言都有许多同义或义近的词语。在汉语里义近词很多，例如“奥妙、玄妙、微妙”“精妙、巧妙、神妙”两组都有“妙”字，意思有不同，而每组的三个词的词义也不完全相同。又如“惶恐”与“惊恐”，“恐惧”与“忧惧、畏惧、惊惧”等词彼此之间在意义上也有差别。在教学上怎样辨析这类的义近词，应当有一套办法。譬如我们可以分别说明其共性和个性，或从程度的深浅、所指陈的对象、使用的范围和上下文的搭配以及语感等等方面加以区别。现代的词典还不免有互训的毛病，值得考虑。

---

①我们提倡在字典里每一个词或词的不同用法应当标注词类。

五　实词中双音词的词素意义的解释问题

语言中的双音词，有很大一部分是容易解释的，可是有一部分词不易解释。虽然在词典里给出了整个词的词义，而没有点到其中有必要解释的词素的意义。如“企图”的“企”，“情绪”的“绪”，“简慢”的“简”，“黎明”的“黎”，“籍贯”的“贯”，“领略”的“略”，“盘费”的“盘”等等。在编者可能认为没有必要，也许觉得那样做会支离破碎，过于繁琐，不符合一般词典的体例，不过，我觉得要真正理解一个词的词义所包含的内容就应当有所说明。当然，有些词的词素意义很不好解释，这就要调查研究，找出典型，创通类例，寻出解释的途径。

六　方言词语和外来词语的研究

汉语不同的方言都有很多独特的词语，其中有不少鲜明生动的表达词义的能力强的词汇可以丰富普通话的内容。要研究现代汉语的词汇，我们不能抛弃方言而不顾。语言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的，随着人与人的交接日益繁多，方言中有用的词语也必然会为普通话吸取。另外，汉语从十七八世纪以来吸收了很多外来语，外来语的吸收也是有层次和不同来源的，我们应当对被吸收而且在一直使用着的外来语有全面的理解。现在语言中还产生了很多根据外来语创造的新词术语，是否都妥当，也值得研究。

七　用词的范围问题

用词是否合乎规范关联到语言在交际中能否起到交流思想的作用。为了正确表达语言的意思，用词必须合乎规范。这道理，人人

都是懂得的，但是我们也经常在书面上发现不合规范的例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可能因为对词义不太理解，或者完全理解错了；有人可能用意很好，想写得更丰满、更有文采，由于一时选词不当，未能纠正。这样，为了提醒人们的注意，语文工作者就应当搜集材料，经过分析研究，选出不同的类型，分别加以解说，给人以有系统的知识。另一方面，我们要求有一部供学习应用的词典，在解释词义之外加一些提示，指出用词的对象和范围、① 词义的褒贬，词与词的搭配，词义所显示的特殊语感，以及不应有的误解和错误的用法。这样做，虽然要费事一些，但确实是一种新颖的有用的词典，对汉语规范化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八　中小学的词汇教学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放在最后说，但并非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关于词汇教学方面的问题要从教与学两方面来看，研究怎样便于教和便于学而能收到最好的效果。我想有两件事情是当务之急。一是编出常用词汇表，一是编出词汇学习手册。要编出常用词汇表有必要先做好词汇的频率统计，有了统计的数据就可以分清哪些词是常用的，那些词是不常用的。有了常用词汇表，在编辑语文课本和进行语文教育时就可以从中选择常用词和基本的构词词素有计划地进行教学了。至于常用词汇表的编排方式如何，可以根据需要而定。另一件事，即编出词汇学习手册，内容可以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项目可以多一些，要求实际有用。怎样才编得好，要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才行。在教学上属于教法的问题，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就不谈了。

---

①像《现代汉语词典》在“采取”一词注作“选择施行（某种方针、政策、措施、手段、形式、态度等）”就是很好的办法。

事实上，有关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专题很多，以上仅仅提出八项来说说。其中也有人做过一些工作，但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以丰富我们对于语言的知识。我们不宜只注意语法问题的研究，而忽略词汇的研究。有时不能不两相结合，把词汇的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联系起来去分析问题，也许会有更多的创获。

汉语语词意义的转变和发展①

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但内容又十分复杂，须要细致地探讨，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词义是社会所约定形成的。就一个词所具有的意义来看，有原来的或最早的和比较普通的使用意义，也有由原义而衍生和转变出来的意义。要确定一个词的原义，一般可以从三方面观察：一是从字形上看它所表现的意义。例如"雨"，甲骨文作𠕲，意思是天下雨；"若"，甲骨文作𦱔，像人跪跽理头发之形，所以古书训解为"顺"。二是看古代文献中最初出现的涵义是什么。例如"河"，甲骨文作𣲾，指黄河；"朕"，见屈原《离骚》"朕皇考曰伯庸"，"朕"是"我"的意思。三是看古代书籍中通常是怎样用的，它的意思是什么。例如"兵"本义为兵器，《周礼》有"五兵"；"册"指典册、简册而言，见于《左传》和《周礼》。这些是就推寻词的原义来说的。

如果要推寻词义的衍生和转变的轨辙，那就复杂得多了。可以说变化多端，类别纷繁，难以全面概括。虽则如此，我们还可以就不同的情况，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分析。

①本文为1984年7月28日在日本京都大学讲课的讲稿。

二

一般语言学的书籍中讲到语义的变迁有“扩大”“缩小”“变坏”“变好”等一些名目。在汉语里这类的现象是常见的。例如：

“江”“河”两个词原来指的是长江、黄河，后来泛指一般的河流，北方称“水”，或称“河”，南方多称“江”。又“同胞”一词本指同一父母所生的兄弟姊妹，近世又用来称同一个国家的人，其侨居在国外的则称为侨胞。这都是意义的扩大（widening，generalization）。

“宫”原来指的是居住的房屋，《尔雅》有《释宫》篇，“宫”是泛称，后来则专指帝王后妃所住的高大的居室。又如“墳”原指高起的堤岸和土堆，《诗经》有“遵彼汝墳”的话，“汝”是“汝水”，汝墳是汝水的河堤，后来墳专指墳墓而言了。这都是意义的缩小（narrowing，specializition）。

“赖”古有“善”的意思，如《孟子》有“富岁子弟多赖”的话。现在有“无赖”一词，还保存古义。但现在转有“坏”的意思。多就事物的情况而言。“氓”（méng）原是“民”的意思，《南史》《北史》中有“流氓”一词，即是迁徙流转之人，可是现在普通话里“流氓”一词指行为不正当的人，音 liúmáng。这是意义变坏（degeneration，贬义 deterioration）。

“幽人”一词本指幽囚之人，后来用以指幽居隐逸之人。苏轼词“下有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又“乖”本是乖背的意思，后用指乖巧，现在普通话说小孩儿温顺安详曰乖，是意义变好（elevation，褒义 amelioration）。

三

当然，也还有另外常说到的一些现象，如变轻、变重、以偏代全，或变换位置之类。举例来说：

“取”字从又，从耳。“又”表示右手，原义当是截耳（即馘guó），后来夺取别人的城池叫“取”，如说“取荆州”。现在说拿什么东西都说“取”，如“取货、取书”之类，意义由重变轻，也可以说是由强变弱。“病”（hypobole）古代原称大病，小病曰疾。《论语》说：“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疾”“病”连在一起说。后代说“病”，意思变轻，小病也叫“病”。

“谕”原来的意思是告诉、譬谕，后来成为皇帝对臣子或上级对下级有所指示的敬辞，意义变重了。“毒”（litotes）原指痛苦，后来转有毒害、狠戾的意思。

“手”是人的肢体，以“手”代“人”是以偏概全。如古人说“弓箭手”是指持弓箭从事战争的人。又“春”跟“秋”是一年的两季，古人把“春秋”合为一个词来说，代表一年，后来又称人的年岁为“春秋”多少，这就是以少代多。

“闻”跟“聽”两个字都从“耳”，“聽”是用耳去接受声音，“闻”是聽到，后来把“闻”当作用鼻子去嗅气味，器官的位置改变了。现在北方有的地区把嗅气味又说为“聽”，如“你来聽聽”，说的是“闻”，而不是“聽”。那又不同了。

以上所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语义的转变。不过这些现象在汉语里并不是太多。

四

如果联系到语词的词性的话，语义的改变有时就牵涉到词性的

改变。词性的改变在语音上还可能变调。名词可以转为动词，动词也可以转为名词。其他如形容词作名词、动词，量词作名词之类也有。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看：

“关”原意可能是“门闩”（shuān）。《说文》说：“以横木持门户也”。《史记·魏公子列传》侯嬴说自己“乃夷门抱关者也”。“关”还指关口，如“函谷关”“雁门关”，近代又有“海关”“关卡”等名称。“关”由名词转为动词，那就是“关门”的“关”了。“粉”原指米粉。细粉或如粉状的东西也称之为粉。如“铅粉”“花粉”。古人常说：“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粉”成为动词，是使之成粉的意思。“臣”（chén）原意为“臣仆”。是名词，如果说“臣服”一词，“臣”是“称臣”的意思，那就是动词的性质了。

“班”字的字形中间从“刀”，“班”是分的意思。《说文》说：“分瑞玉”，这是动词。近代所说“分班”“科班”都是由叙列等第而来的，是名词。“批”原是“手击”或“排开”的意思，后来有“批示”“批注”都是动词。可是读书人在书上所加的“眉批”，帝王在奏折上加的“朱批”，“批”指所加的言辞，那就由动词变为名词了。

“尖”是“尖锐”的意思，是形容词，我们说“刀尖儿”“笔尖儿”那就是名词了。“黄”是黄色，是形容词，如说“蛋黄儿”，“黄儿”成为名词。加“儿”有名词化的作用。又“恶”指言语、行为不善，是形容词。如果用指不善的行为或作恶事的人，那就是名词了。如说“为恶不悛”“元凶首恶”，词性已经改变了。

“层”，《说文》训“重屋也”。凡是可以分出层次的都可以用“层”作量词来用。如“三层楼”“两层意思”。现在我们有“地层”“表层”“矿层”等名称，“层”发展可以作名词来使用了。

“笔”是名词，我们说：“一笔钱”“一笔买卖”，“笔”成为量词。“道”也是名词，如果说“九道湾”“两道墙”，“道”就成为量词了。

汉语里形态的变化是不多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形容词加“了”（·le）或加“起来”（·qilei）的时候就有“变为什么样子”的

意思。如“头发白了”“饭好了”“天亮了”“孩子一天一天大起来了”，这些句子里的谓词都是形容词，那就具有动词的性质，而意义也有了变化。这些都是从语法的角度来看意义的转变的。

五

语词意义的转变和增多，以前讲训诂的人通常都称之为“引申”，引申出来的意义称之为“引申义”，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由原义发展出来的可以说是引申，有的与原义没有关系，看不出是由原义而来，就不好称之为引申。因为一个词义的来源，不是都能弄清楚的。有不少是“取义于彼，寄形于此”的。凡由别的词义而来，因声音相同或相近而写为这个字的，即所谓“取义于彼，寄形于此”。另外，也还会有古人原来就是用一个字表示两种不同的意思，那也无所谓引申。所以谈意义的引申不能不谨慎。例如“亡尤”屡见于商代卜辞，“尤”是“过失”“祸患”的意思，至于后来所用“尤甚”“怨恨”等义的都不能说是引申。又如“简”从“竹”，是“简牒”的“简”，至于“简单”“简慢”等的意义，就不是引申义。

现在，我们可以把引申义所指的范围限制得窄一些。凡由原义孳衍，意思与原义关系比较贴近的，我们才称之为引申义。例如：

“奔”是奔跑，我们说“奔流”就是“急流”，“奔”取急速的意思。

“蔽”是掩蔽、遮掩的意思。说“一言以蔽之”，引申有“概括”的意思。

“泛”是漂浮，如说“泛舟”，引申有“浮浅”的意思，如说“泛泛之交”；又有“广泛”和“一般”的意思，如说“泛览”“泛称”。

“筹”是计算数目的工具，引申有“谋画”的意思，如说“筹

划”“筹备”。

“贫”原是贫穷。《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引申有“缺乏”“不丰富”的意思，如说“内容贫乏”。

“素”是白色的丝，引申有“本来”的意思，如说“素质”“素性”；又有“平时”“向来”的意思，如说“素日”“素不相识”。

“符”原指“符信”，如“兵符”。引申有相合的意思。因为“符信”都是剖分为二，而又可合而为一的，如“兵符”。如说“符合”“相符”，即从“符信”的意思而来。引申又有“记号”的意思，如说“符号”“音符”。

“归”原意是由一方面向另一方面去。古人称女子出嫁曰归。引申有“归还”“归属”“归并”等一类的意思。

“抚”指用手抚摩，引申有“安慰”“慰问”以及“扶持”的意思，如说“安抚”“抚慰”“抚恤”“抚养”。

“浮”指在水面漂浮，引申有“在表面上”“空虚”“多余”等一些意思。如说“浮泛不切实际”“浮名”“浮辞”“人浮于事”“心浮气躁”等等。

以上所举是意义引申的一类。

六

汉语词义的转变和发展除了上面所说的情况以外，还有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个语词作为一个语素在构词时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意义。

汉语构词的基本方式有三种：一种是联合式，一种是偏正式，还有一种是述宾式。

可是词素在构词上反映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现在分别为以下几种：

1. 比喻义。比喻是常见的，而且有不同的比喻方式：

(1) 明喻

盆地　雏形　林立　辐射　狐疑

绵薄　肤浅　笔直

桔红　月白　湖绿

(2) 明比

木耳　耳房　河床　伤口　心房

针鼻儿　扣眼儿

(3) 借喻

枷锁　机械　规矩　关键　眉目

荆棘　脸面　风波　本末　手足

爪牙

2. 专指义。意义是特定的，所以称之为专指义。如：

垂青（黑眼球）　　扫盲（文盲）

排头（队伍站在最前面的人）　　对外（外国）

3. 借指义。所指非本来的字义，借指别的意思，所以称之为借指义。如：

胸襟（指气量）　　桑榆（指晚年）

后尘（指踪迹）　　先锋（指领头的）

4. 借代义。以物代人，或以物代物，是借代义。如：

椿萱　冠盖　衣冠　裙衩　泰斗

领袖　丝竹　社稷

5. 转化义。去原来字义已远，转变出一种新义，所以称之为转化义。如：

白吃　白说　黄色（指小说）　用项（经费）

消息　声望　地道（真正的）

以上是从不同方面作的分别，仅仅是举例的性质，代表在构词上所表现出来的词义的发展。词义的发展有多种的样式，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汉语骈列的词语和四声①

一

刘庆义《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一段故事说：

> 诸葛令（诸葛恢）、王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耶?"

案诸葛恢为琅邪阳都人，父祖辈都是三国时代有名的人。祖父是魏司空诸葛诞。父亲是吴大司马诸葛靓，族祖有诸葛瑾、诸葛亮。王导是琅邪临沂人，祖父王览在晋初为太中大夫，伯祖王祥在魏为司空，在晋为太保，父亲王裁，在晋为抚军长史。这两家都是名门望族。

诸葛氏原为葛氏，后称诸葛。晋元帝司马睿为安东将军时以王导为丞相军咨祭酒，以诸葛恢为江宁令。二人在一起戏谑，争论姓族称名的先后，以见门第的高下。诸葛恢以"驴马"为喻，可以说极尽诙谐之能事。结果，王导不仅没有占上风，反而语塞，无以答对。

这则故事很有趣。可是为什么当时人都说"王葛"，而不说"葛王"呢？是否王姓的声望高于诸葛？还是有别的缘故？再则，人人都说"驴马"，而不说"马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单纯是一种习惯吗？还是意在分别大小，而以小大为次？我看，其中当别有

①本文写于1983年12月。曾于1984年7月在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部作过讲演。

道理。

"王葛"跟"驴马"都是两个字（词）并举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骈词"。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汉字每个字都有一定的声调。两个字，也就是有确定含义的两个词，在一起并举合称的时候，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大都是依照说话的时候怎样顺口来叙次的。这里面就与字音声调的起伏升降长短有关系。

从声调来看，上面所举的"王葛"，"王"是平声，"葛"是仄声（入声）①，平声在前，仄声在后。前代合称两个人的时候，这样的例子很多。如：

苏李1（苏武、李陵）　　班马（班固、司马迁）
嵇阮（嵇康、阮籍）　　王谢（王导、谢安）
邢魏（邢劭、魏收）　　燕许（张说、苏颋）②
苏李2（苏味道、李峤）　　萧李（萧颖士、李华）
王孟（王维、孟浩然）　　韦柳（韦应物、柳宗元）
元白（元稹、白居易）　　牛李（牛僧儒、李德裕）
温李（温庭筠、李商隐）　　欧晏（欧阳修、晏殊）
何李（何景明、李梦阳）

这些都是平声在前，仄声在后。"班马"就时代来说，"马"当先说，"班"当后说。然而要合于平声在前的规律，所以宋娄机作《班马字类》，称"班马"，不称"马班"。

进一步来看，如果两名都是仄声的话，那又是"上""去""入"的次序为先后。如：

管乐（管仲、乐毅）　　沈宋（沈佺期、宋之问）
李杜（李白、杜甫）

①北京音没有入声，这是按照《广韵》一类的韵书来说的。
②编者按："燕"指张说，他被封为燕国公；"许"指苏颋，他被封为许国公。二人同为唐玄宗时人，均以文章扬名，时称"燕许大手笔"。

这里“管”“沈”“李”都是上声字，“乐”是入声字（今读去声），“宋”“杜”是去声字。两名并举，上声在前，去入声在后。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有些与时间先后有关系。如屈原和宋玉并称为“屈宋”，屈原在前；段玉裁和王念孙并称为“段王”，段的年龄长于王，所以段玉裁在前。“屈”是入声字，“段”是去声字。

这种声调上的安排在汉语的骈词中表现的很普遍。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不同方面的例子。（字下加点的为入声字）

古代国名：

秦晋　齐楚　燕赵　吴越

天象和气象：

霄汉　河汉　牛斗　星月　风雨　霜露　冰雪　云雾
霜雪

地理名称：

山水　河洛　江汉　湖海　陵谷　丘壑　秦陇　川陕
云贵　康藏　闽粤　江浙　湖广

动植物：

龙虎　牛马　猫狗　狐兔　猪狗　禽兽　鸟兽　虎豹
松柏　花木　梅柳　花鸟　草木　桃李　黍稷

人体：

肢体　手脚　须发　肠胃　脾胃

饮食：

鱼肉　酒饭　烟酒　荤素　米面　梨枣　瓜果　葱蒜
羹饭　油醋

衣着器物：

冠带　衣帽　衾枕　床帐　帷幕　锦绣　绸缎　几案
纸墨　琴瑟　钟磬　钟鼓　脂粉　耒耜　弓箭　弓弩
牌匾　砖瓦

词义对衬：

高下　深浅　浓淡　远近　顺逆　哀乐　生死　成败
正反　升降　繁简　难易　优劣　好坏　文武　先后
良莠　荣辱　南北

这些骈词的声调都跟前面所举的例子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那就是：在汉语里两个词并举合称的时候，两个词的先后顺序，除了同是一个声调以外，一般是按照平仄四声为序，平声字在前，仄声字在后。如果同是仄声，则以上去入为序。先上，后去、入；或先去，后入。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骈词未必要管声调的平仄。如以时间先后为序的：

周孔（周公、孔子）　　孔孟（孔子、孟子）
秦汉（秦朝、汉朝）　　唐宋（唐朝、宋朝）
史汉（史记、汉书）

这些不期然而然地与上面的一条规律相合。可是，也不无例外。如“夏商”（夏朝和商朝）“宋元”（宋朝和元朝），仄声字在前，平声字在后。其他如“是非”“管弦”“肺腑”“犬羊”（曹丕《与吴质书》：“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之类也都不与一般规律符合。不过，这类例子究竟是少数，甚至于可以说是极少数。

另外，有些由文语来的骈词包括入声字，如果依照普通话语音系统来读，似乎不与上边所说的规律相符，如“祸福”“手足”之类，可是依照旧日的韵书音系来看，还是相合的。

这一条规律，在近代，最初指出的是余嘉锡先生。他在1938年撰写《世说新语笺疏》，在解释前面所举的《排调》篇那一节的时候，曾说：

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则必以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之自然，在未有四声之前固已如此。

他所说“未有四声之前”，当指平上去入四声说未有之前。他的话

很简单，但已经把汉语的声调古已有之的事实和二名同言时以字音的平仄来分先后的事实都指出来了。不过，如果二名同是仄声的时候又是如何，他并没有阐发，不能不加以补充说明。

二

上古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后来双音词逐渐加多，有很多词就是用骈偶的单音词作义素（词素）而合成的。如“阶梯”“皮肤”“齐全”“篇章”“栽培”等等。构词的两个义素可能是意义相近的，或是属于同类事物的，也可能是意义相反的。最有意思的是前后两个义素（也就是两个字）的顺序在声调上仍然跟上面所说的规律一致。下面把不同声调的字所组成的词依次列举一些来看。

（1）平平：

桥梁　图书　提携　钱财　钻研　声音　开发　贫穷
谦恭　攀援　稀疏　辛酸　高深

（2）平上：

光景　柔软　牙齿　唇吻　躯体　包裹　基础　头脑
标本　宽敞　珍宝　寒冷　温暖　奔跑　评选　奔走
抚养　星斗　迁徙　朋友　描写　幽雅　遥远

（3）平去：

a. 空旷　昏暗　蒙昧　依靠　迷恋　思想　恭敬　宏大
飘荡　穷困　煤炭　行动　容貌　嘲笑　浅陋　仓库
门户　宫殿　愉快　灾害　饥饿　囚禁　征兆　清静
消耗　坟墓　疲倦　尊敬　思念　评论　奇怪　镶嵌
材料

b. 墙壁　储蓄　面目　踪迹　痕迹　侵略　消灭　区域
铺设　疑惑　人物

（4）上上：

引导　岛屿　奖赏　主宰　允许

(5) 上去：

a. 分际　检验　缓慢　简慢　土地　领袖　巧妙　醒悟
简陋　恐惧　恼怒　辅助　诽谤　妥善　懒惰　警戒
勉励

b. 闪烁　整饬　堵塞　缴获　养育

(6) 去去：

a. 次序　怠慢　眺望　赋税　旺盛　构造　怨恨

b. 跳跃　践踏　盗窃　吝啬　教育

上面字下加圆点的都是古入声字，现在普通话已经读为去声。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来看，现在通常应用的双音词（复合词）基本上也是守着前面所说的声调次序来组成的。平上，平去，上去的词都不少。这是在两个义素（词素）之间的一项很有意思的语音现象。

根据上述所举的骈词和复合词两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到汉语的声调在词与词合称或在有联合关系的词素组合中所起的制约作用。

《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述的那一段故事，王导在当时的名位也许比诸葛恢高一些，把二人合称“王葛”，不无原由，同时也比说“葛王”合于声音规律。说“驴马”而不说“马驴”也正是这个道理。但驴不如马大，马贵而驴贱。“驴马”这个骈词恰恰被聪敏的诸葛恢抓住了，弄得王导啼笑皆非，无言可对。

三

在汉语里还有很多由两部分并列组成的四字成语，以第二字是平声字、第四字是仄声字的居多，先“平”后“仄”跟骈词和双音词极相似。这在成语中的数量也比较多。因为是约定俗成的，又是符合词语组合的规律的，所以一般都不能改变先后的次序而倒过来

说。例如：

(1) 平平仄仄：

山清水秀　平心静气　深谋远虑　龙腾虎跃
倾家荡产　雄才大略　精耕细作　娇生惯养
焦头烂额　瞻前顾后　街谈巷议　轻描淡写
排山倒海　山珍海味　呕心沥血　盘根错节
同仇敌忾　通情达理　摇唇鼓舌　眉开眼笑

(2) 仄平仄仄：

巧言令色　正言厉色　曲高和寡　眼明手快
冷言热讽　自高自大　见多识广　痛心疾首
日新月异　镜花水月　酒囊饭袋　驾轻就熟
倒行逆施　并驾齐驱　审时度势　水深火热

这里所列的成语都跟规律相合。我们知道了这个规律是有普遍意义的，那么，“惊心动魄”就不要写为“动魄惊心”，“排山倒海”也就不要写为“倒海排山”了。既合于习惯，也符合语言规律。这样，在创造新的词语时，也就知道有所遵循了。

根据以上所讨论的事实，我们还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一) 齐梁时代的文学之士所说的“宫羽相变，低昂舛节，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以及“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其实际意义就是把“平”“仄”分为两类，上句末尾是平声，下句末尾就以仄声与之相应。“平”为平声，“仄”即上、去、入。“平”为“轻”，“仄”为“重”。

(二) 四声分为平仄，而又有平上去入的名称，平声的音调必然相对的比较平。前人传诵的四声口诀说：“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这对于粗疏理解古代四声的性质不无实际意义。

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联系起来看，对于中国汉语的内部规律和由这个规律发展而成的文学上的音律形式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汉语成语概说①

一 成语的性质

说话写文章常常要用到成语。成语就是人民口里多少年习来用的定型的短语或短句。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古代文学语言中当做一个意义完整的单位承继下来的。它的意思可以用现代语来解说，但是结构不一定能跟现代语法相同。例如“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成语的结构是固定的，一般都是四个字，它是相沿已久、约定俗成的具有固定性的东西，所以称为“成语”。

成语不但有固定的结构形式，而且有固定的说法。“去伪存真”不能说“去假存真”，“南辕北辙”不能说“东辕西辙”。因为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不能随便更换一字。成语中应用的词有时跟现代口语不同。也许某一个词在现代语里不这样说；也许成语中用的是一个单音词，而在现代语里跟它意义相当的是个多音词。例如“别无长物”②，用现代语来解说，就相当于“再没有多余的东西”，“长”这一个词的这种用法现在不存在了。例如“有备无患”，“备”用现代语来解说是“准备”，“患”用现代语来解说是“后患”或“祸患”。这都表明成语是语言中已经定型了的东西，相承沿用，所以在用词方面有许多跟现代语不同。

---

①本文写于 1954 年 12 月。载于《语文学习》（上海）1955 年 1 期。

②“长”在这里音 zhàng，是“多”的意思。编者按：今读为 cháng。

二 成语的来源

成语的性质已经简单地说过了。底下谈一谈成语的来源。成语的来源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书本上来的，一方面是从口语里传下来的。从书本上来的又有两类：一类是从古代寓言或历史故事里来的成语，一类是古典作品中的成语。

从寓言和故事里来的成语，可以说是一种"典故"，其中都有一个传说的内容，而且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它的出处。"典故"本来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这种带有典故性质的成语比较通俗，已经是常说的话，因此大家也都熟悉了。例如"狐假虎威"见于《战国策·楚策》；"负荆请罪"是战国时赵国廉颇的故事，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草木皆兵"是晋朝苻坚的故事，见于《晋书·苻坚载记》。

至于出于古典作品中的成语，有些是由古书中摘取来的成句，有些是经过节缩而成的。例如"好为人师"见于《孟子》，《孟子·离娄上》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削足适履"见于《淮南子》，《淮南子·说林》说："夫因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一鼓作气"见于《左传·庄公十年》，鲁国曹刿对鲁庄公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这些成语都是从古书上取来的原句，意思跟原来的相同，没有什么改变。从古书上取来的成语也有少数比喻的用法，例如《荀子·劝学》说："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后人称学生胜于先生叫"青出于蓝"，就是一种比喻的用法。又如苏轼《赤壁赋》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水落石出"原文只是写景，后人用来比喻事情的真相终得暴露，这就跟原来的意思不同了。至于摘取古书原句而加以节缩的成语，如《孟子·离娄下》说："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现在管为学无往而不自得叫"左右

逢源"，"左右逢源"就出于《孟子》。又如《史记·汲黯列传》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现在管后辈超越前辈叫"后来居上"，"后来居上"就出于《史记》。像这种节缩前人成句的成语是很多的

至于人民口头相沿习用的成语，数量也不少。其中有的来源很早，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例如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种苜蓿》条说："此物长生，种者一劳永逸"，"一劳永逸"就是当时的成语，现在还活在人民的口里。又如北齐颜之推所作《颜氏家训·勉学篇》说："江南闾里间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道听途说，强事饰辞"，"道听途说"也是当时的成语，现在依然沿用。其他如"叠床架屋""雪中送炭""锦上添花""水到渠成""人云亦云""节上生枝"（也说"节外生枝"）等等，都是宋代以来人民口里常说的话。有的在民间文学作品里常常遇见，有的仅在口头流传，不见记载。这种成语非常生动活泼，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前的人对于探求成语的来源，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不过有些成语很难找到出处。即便找到它的出处，有时未必是第一次出现，可能还有更早的出处。例如"吹毛求疵"辞典上一般都举《汉书·中山靖王传》"有司吹毛求疵"为出典，可是在《韩非子》里已经有"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毛而察难知"的话，这应当是更早的出典。由此可见，要追究一个成语的来源是很烦难的事。另外有一种情形是：有些成语很难说它一定就是从书本上来的。例如"满城风雨"是一个成语，一般以为是从宋潘大临的诗句"满城风雨近重阳"来的（潘诗见僧惠洪《冷斋夜话》），但事实未必如此。现在把一件事闹得人人皆知叫做"满城风雨"，也许别有来源，也许根本不是从书本上来的。因此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认识：辞典上指出的某一成语的出处，有时只可以作为一个用例来看待，未必就是成语的最初来源。

三 成语的结构

前面已经说过，成语一般都是四个字，但是它的结构形式则有种种不同。例如“名副其实”“冷眼旁观”“所得无几”“各尽所能”都是一个句子的形式，具备主语和谓语。例如“好为人师”“莫衷一是”“视为畏途”“锦上添花”“雪中送炭”都是谓语形式，本身没有主语。有些是两个句子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如“天翻地覆”“水落石出”“日暮途穷”“风流云散”。有些是两个谓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如“提纲挈领”“循规蹈矩”“闭目塞听”“养精蓄锐”“说长道短”“吹毛求疵”“知己知彼”。另外还有其他样式的并列结构，如“欢天喜地”“奇形怪状”“粗心大意”“乌烟瘴气”“南辕北辙”“百折不挠”“层出不穷”“畏缩不前”。诸如此类，形式各有不同。还有些成语是不能用现代语法来分析的，特别是节缩而成的成语，如“一叶知秋”之类。

从修辞方面来看，成语中词与词在意义上的联系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上面所说的“提纲挈领”“养精蓄锐”两个成语，其中一、三两个词是意义相近的词，二、四两个词也是意义相近的词，“提纲”跟“挈领”意义相同，“养精”跟“蓄锐”意义相近，前后一致，形成一种相互对照的关系。又如“说长道短”“欢天喜地”两个成语，其中一、三两个词是同义词，二、四两个词则是相反的，虽然是相反的，可是仍然是意思相关的，这又是一种组成的格式。有些成语是用“不……而……”的格式组成的，如“不期而遇”“不寒而栗”“不劳而获”“不谋而合”“不约而同”“不言而喻”“不期然而然”等等，都是对照的说法、还有些成语是表明事物或行为的数量的。例如“一暴十寒”“一日千里”“九牛一毛”“九死一生”，都是多少悬殊的对比。又如“三言两语”“一知半解”则言其少，“四分五裂”“四通八达”则言其多，其中二、四两个词是同

义词。至于“七手八脚”“七拼八凑”则表示胡乱没有次序，“三翻四覆”“颠三倒四”则表示屡次反覆；着重的意思又有不同。在这种成语里，数词的地位都是固定的，不能改换。

以上仅仅是举例的性质，目的在于说明我们要对成语了解得透彻一些，必须注意到它的结构形式和词与词在意义上的联系。有些问题与古代语的研究有关，现在只能简单地谈这些。

四　成语的作用

成语是语言中固定的材料，它代表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在句子里多半用作一个成分，有时它的作用就等于一个词。这是就成语在句法上的作用来讲的。

如果从修辞的角度来看，成语的作用就在于能够用简单的词句说明一件事实，或比喻一种形象，而达到言简意赅、生动有力的目的。当然，不用成语也未尝不可以把意思表达清楚，但是有时需要应用成语，就因为可以使人听了更感觉透辟精当，并且得到更深刻的认识。下面举几个例子：

1. 他们两个人原来素不相识，本是萍水相逢，现在已经成为知交了。
2. 西湖的明媚春光，桃红柳绿，清波摇漾，使人陶醉，流连忘返。
3. 这本书大半是引自别人所说的话，并没有什么个人独到的见解，只能说是述而不作。
4. 客观的事物总是不断地在变化，人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只能因势利导，使之向人民有利的方向发展。
5. 在新的时代，应当有新的风尚，绝不能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要有除旧布新的革新精神。
6. 多年来，他那种孤僻高傲的性情始终没有变，真可谓江山

易改，禀性难移了。

7. 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出来的历史文物多不可言，参观者目不暇接，看到好处，不免啧啧称赞。

8. 洛阳王城公园的牡丹品种最多，四五月间，满园春色，牡丹盛开，姹紫嫣红，粉黄争艳，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9. 引用前人的文句应当对原意理解清楚，断乎不可生吞活剥，曲解原意。

10. 学绘画是要经过长时期的反复摹练、揣摩、观察、陶融，没有一二十年的工夫，不能做到得心应手。

以上例句中字下加点的都是成语。由此可以看出成语在语言里应用十分广泛，既有言简意赅的表达作用，又有烘托渲染和形容比喻的修辞作用。成语的丰富，也是汉语的一个特点。

五　怎样学习成语

成语是语言中比较特殊的东西。要掌握成语，必须平时留心，认真学习。可是成语的范围很广，应当学习哪些成语是一个先决问题。我们要学习成语，并非要把一些陈旧的不合乎现实的东西都搬出来死记死用，而是要吸取成语中生动活泼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加以充分的合理的利用。我们不是要炫耀自己的博闻强记、不是有意雕章琢句。我们应用成语的目的是要用它来把意思表达得更明确更生动，所以一定要选择为人们所熟悉的成语，而且一定要使它能为作品的内容服务。因此古典作品中的一些陈腐的冷僻的成语绝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

对象清楚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学习呢？我认为最好是从阅读中吸收累积。阅读的作品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重要著作和文学名著。从阅读作品中随时留意，这样才能切合实际，才能真正了解某个成语的实际意义和具体用法。但是在学习的时候，不是笼统地知

道某一个成语的含义就完了，还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 了解成语中语词的意义。例如“焕然一新”在学生的写作中常常写成“换然一新”。这样一个例子不能单纯看做是写错字的问题。很可能学生对于“焕然”这个词的意义就没有了解，误以为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改换一下就完全成为新的了”；殊不知“换”字后面绝不能加“然”字。他对于原来成语中“焕”字后面加“然”字的作用可能毫无所知，因此写成“换然一新”。类此的错误还很多，所以学习成语必须注意成语中的词义。像“不寒而栗”的“栗”、“汗流浃背”的“浃”、“莫衷一是”的“衷”、“无稽之谈”的“稽”、“既往不咎”的“咎”、“三令五申”的“申”、“措手不及”的“措”，都是现代口语中罕用的词，需要明了音义，认清字形。否则囫囵吞枣，就会把字写错，把意思弄错。因此，充分利用辞典来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是必要的。

2. 必须注意成语的用法。学习成语，单单知道成语的解说还不够，必须同时注意它的用法。用法主要指的是某一个成语一般是针对什么事情说的，它所比喻的对象是哪一类的事物。这些千万不要弄错。例如在学生写作中曾经谈到某人对他的关怀“无所不至”，“无所不至”是很不妥当，在这里应当用“无微不至”。“无所不至”见《礼记·大学》：“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无所不至”跟“无微不至”有褒贬之分，不应混淆。还有“水深火热”是指人民在剥削阶级残酷统治之下的极端困苦的生活，“孤注一掷”是指在军事上盲目进行绝无把握的决战，这些都不能随便移用。假如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不注意成语的用法，到了用的时候就可能用错，甚至闹出笑话来。特别是成语中有很多是一种比喻之辞，如“胶柱鼓瑟”“畏首畏尾”“捉襟见肘”“浮光掠影”之类，如果不知道它是比喻什么事情的，是怎样的用法，用起来就不免张冠李戴、莫名其妙。

《尔雅》之作者及其成书之年代[1]

《汉书·艺文志》《尔雅》二十篇，不著撰人名氏。魏太和中博士张揖始称创自周公。其《进广雅表》云：

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践阼理政，日昃不食，……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礼三朝记》：“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辩以观于政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绝六国，越逾秦楚，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郁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既无正验圣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

自有此说，后世多宗之。故郭璞序《尔雅》云：

《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

《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张揖论之详矣。

是且以周公所作者为《释诂》一篇。今考哀公问孔子语见《大戴

---

[1] 本文载于1946年11月17日《大公报》（天津），原题目与今略有不同。本文原未标书名号，现由编者补标。

礼·小辨篇》。文云："循弦以观于乐，《尔雅》以观于古。"北周卢辩注云：

> 尔，近也，谓依于《雅》《颂》。孔子曰："诗可以言，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

案"循弦"者，循乎弦；"尔雅"者，尔乎雅（本王念孙《广雅疏证》说）。雅者，雅言也。张稚让以《尔雅》为书名殆非。至于《春秋元命包》之言，王念孙谓当是释春秋元年之义。其言曰：

> 《公羊传》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尔雅》云初哉首基元始也，《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等字为始，而独以元为始，故释之。

今案其书皆谶讳家言，后汉张衡已称为汉世虚伪之徒所作，以要世取资者（《后汉书·张衡传》）。其所记子夏之言，又未尽实也。稚让据此以证《尔雅》远在孔子之前，而定为周公所造，实不可信。若夫陆元朗谓周公所著者即《释诂》一篇，则又误以张揖所谓之一篇即班固《汉志》二十篇之篇矣。清邵晋涵《尔雅正义》云：

> 《尔雅》，《汉书·艺文志》作三卷，二十篇，张揖谓周公著《尔雅》一篇，今所传三篇为后人增补；是张揖所谓篇，即后人所谓卷，犹云周公所作只一卷，后人增补乃有三卷耳（案黄以周《儆季文抄》卷三《答陈善余书》亦同此说）。陆氏以周公所作为二十篇之一，殆考之不审，以致斯误。

其言是也。

张氏谓《尔雅》为周公所作，虽出于臆度，而谓子夏曾有所述，则本于后汉郑玄之说。郑氏驳《五经异义》云：

> 某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诗·黍离正义》引）

张氏之言本此。然郑氏所云，亦推测之辞耳。而《西京杂记》卷三云：

> 郭伟，字文伟，茂陵人也。好读书，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

矣。余尝以问杨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

《西京杂记》，旧称汉刘歆所作，实为晋葛洪所依托（详见余季豫先生《四库全书提要辨证》）。文中自称余者，乃葛洪所以依托为刘歆之言也。其说亦即由郑张两家出。或以为子云、子政曾有是说则误矣。（《四库全书·尔雅注疏提要》称《尔雅》非专为《诗》作，扬雄《方言》以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案子云《方言》中无其语，实出于《西京杂记》。修《提要》者凡经部之书多以朱彝尊《经义考》为根据，《经义考》但题扬雄曰云云，不著出处，《提要》作者未遑考案，故误题为《方言》耳。）然《尔雅》之训诂取自《诗毛氏传》者至多，是又非孔门之徒所记也。此自宋人已发其蔀，如欧阳修《诗本义》即称《尔雅》非圣人之书，乃秦汉之间学者所为。殊有卓识。惟清儒犹有固守旧说者，如邵氏谓其书始于周公，成于孔子门人，且援引《逸周书·谥法解》之训释字义与《尔雅》相符者为周公尝作是书之证，终不免牵强附会之病。盖古训可以更相传述，二者虽有相同之处，而无同出一手之确证也。

然则旧以为《尔雅》为周公所作之说，自葛稚川而发其误；旧以为孔氏门徒所述之说，至欧阳修而正其妄。其书盖为汉人所纂集。

至其成书之年代，亦有可说。《四库全书总目·尔雅注疏提要》云：

据张揖《进广雅表》……于作书之人亦无确指，其余诸家所说，小异大同。今参互而考之，郭璞《尔雅注·序》称"豹鼠既辨，其业亦显，"邢昺疏以为汉武帝时终军事，《七录》载犍为文学《尔雅注》三卷，（原注：案《七录》久佚，此据《隋志》所称梁有某书亡，知为《七录》所载）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汉武帝时人，则其书在武帝以前。

此以《尔雅》之成书，当在武帝之前，恐未为得。案豹鼠之辨，邢

疏以为汉武帝时终军事，亦本于郭璞。（《提要》举邢疏而不举郭注，失之）《释兽》云："豹文鼮鼠"，郭云："鼠文采如豹者。汉武帝时得此鼠，孝廉郎终军知之，赐绢百匹。"然郭氏以此为终军事亦误，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云：

《尔雅注》汉武帝时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终军知之，赐绢百匹。《文选注》引《窦氏家传》以为窦攸，世祖诏诸侯子弟从攸受《尔雅》。二说不同。

案二说虽有不同，必有一误。考《汉书·终军传》云：

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为谒者给事中。从上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时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辄复合于木上。上异此二物，博谋群臣，军上对宜因昭时令日改元，上甚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后擢为谏大夫，及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而越相吕嘉不欲内属，发兵攻杀其王及汉使，军死时年二十余。

据是则终军未尝为孝廉郎也。且其辨豹鼠事，亦毫无记载，此皆事理之可疑者。然考《太平御览》卷九百十一引《窦氏家传》云：

窦攸治《尔雅》，举孝廉，为郎。世祖与百寮游于灵台，得鼠，身如豹文，荧有光辉，问群臣，莫有知者，唯攸对曰："此名鼮鼠。"诏："何以知之？"攸曰："见《尔雅》。"诏案视书，果如攸言，赐帛百匹。诏群臣子弟从攸受《尔雅》。

又《文选》任昉《荐士表》"岂直鼮鼠有必对之辩，竹书无落简之谬"，李善注引挚虞《三辅决录》及《水经·谷水注》引《虞书》亦称为后汉光武帝时窦攸事，则其非终军又无疑矣。二说传闻异词，宋王楙《野客丛书》及清臧琳《经义杂记》均已证明郭注之说有误。

又犍为文学《尔雅注》者，《释文·叙录》称"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此以舍人为武帝时待诏，不知所本。以

意推之，盖附会舍人即与东方朔同时之郭舍人矣。夫东方朔既待诏公车（见《汉书》本传），故亦称舍人为武帝时待诏。其因附之迹，昭然可察。清儒以《文选·羽猎赋注》尝引《尔雅》犍为舍人注，又引郭舍人注，遂亦定为一人，且谓即与东方曼卿同时之郭舍人。如孙志祖《读书脞录续编》，周春《十三经音略》，邵晋涵《尔雅正义》，宋翔凤《过庭录》，郝懿行《尔雅义疏》，皆主此说。今案舍人者自是其名，汉人称臣例不自记其姓，故往往名存而姓不可考，（如《汉书》有臣瓒注，即其例。详见胡元玉《雅学考》及刘师培《左盦集》卷三《注尔雅舍人考》）其虽为犍为郡文学，而其时代则当在汉武以后。何以言之？盖《尔雅》一书之传习，孝平以前犹未盛行，至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始令天下通《尔雅》者诣公车（见《汉书·王莽传》上）；及乎东汉，光武游于灵台，窦攸独能有鼮鼠之辨，乃诏群臣子弟从之受《尔雅》；足证东汉之初习此者尚鲜。若舍人果为武帝时人，而有《尔雅注》，则刘歆《七略》又必著目，今《汉志》不载其书，是非武帝时人也。

其次，陆氏《释文》及唐人《五经正义》与宋邢昺《尔雅疏》所引舍人之注已杂有类似《白虎通》之训释，如“宵，阳气消也”，“宧，东北阳气始起，万物所养，故谓之宧”，“突，东南万物生，蛰虫必出（必与毕通），无不由户突”之类，皆哀、平之际，谶讳之说既起以后，所用说经解字之法也。此与《白虎通》何异？是又舍人必在武帝以后之说也。然则元朗之言，实不可信。且为经传作注之事，皆起于后汉，注《尔雅》者，如樊光、李巡等皆后汉人；舍人，盖亦后汉人矣。

今《提要》据豹鼠之辨及犍为舍人注《尔雅》，以谓《尔雅》在武帝以前成书，其证据皆欠确凿，已分辨至清。今之《尔雅·释山》有霍山为岳之文，以霍山为南岳，始自汉武，若《尔雅》在汉武以前，则又何说？要之，《尔雅》为汉人所纂集，其成书盖当在汉武以后，哀、平以前。

书刘熙《释名》后[1]

刘熙《释名》八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宋《馆阁书目》题“汉徵士北海刘熙字成国撰”，盖旧本相传如是也。《册府元龟》则称熙为后汉安南太守，安南汉无其郡，当是南安之误。考南安之置郡在灵帝中平五年（见《后汉书·郡国志·汉阳郡》注引《秦州记》），是熙为汉末人也。惟范晔《后汉书》不为熙立传，或疑其为魏初人（如毕沅《释名疏证·序》），则误矣。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释名》云：“《吴志·程秉传》：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薛综传》：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韦曜传》：曜因狱吏上书，言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据此三文推之，则刘君汉末名士，建安中避地交州，（原注：案熙居交州之年固不可知，考《蜀志·许慈传》云：师事刘熙，建安中入蜀。夫慈为熙之弟子，于建安中已学成而去，则其避地交州当在建安初矣）故其书行于吴，而韦宏嗣因有辨《释名》之作也。交州与魏隔远，不当有入魏之事，史又不言其曾仕吴，殆遁迹以终者。清风亮节，亦管宁之流亚矣。”由此观之，熙非魏初人甚明。

今考《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引伏滔论青楚人物云：“后汉时祢正平、刘成国，魏时管幼安、邴根矩，皆青土有才德者也。”夫玄度生于青土，且去魏不远，既以成国属汉，不属魏，益可证其

---

[1] 本文写于1946年，载于《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1月出版。本文原未标书名号，现由编者补标。

为灵帝、献帝间人，未尝入魏。不尔，则不得谓为有德之士矣。至于《后汉书》不为熙立传，则史有遗阙，不可据此以证其非后汉人。

又《四库提要》云："《后汉书·刘珍传》称珍撰《释名》三十篇，以辨万物之称号，其书名相同，姓又相同，郑明选作《秕言》，颇以为疑，然历代相传无引刘珍《释名》者，则珍书久佚，不得以此书当之也。明选又称此书为二十七篇，与今本不合。明选，万历中人，不应别见古本，殆一时失记，误以二十为二十七欤？"案范书所称刘珍《释名》，凡三十篇（《提要》误记为五十篇），既不见后人征引，或此书本为熙作，蔚宗偶然失检，误属之于珍，亦未可知。钱大昕谓：据《吴志·韦曜传》，《释名》确为刘熙所撰无疑；承祚去成国未远，较之蔚宗自然可信。其说是也。惟学者多过信蔚宗之言，妄事推测，或谓是编创始于珍，而踵成于熙（如毕沅、严可均）；或谓珍自有书，今已不传（如张穆、曾朴）；皆不免牵合比附之嫌，姑存而不论可也。又熙所撰《释名》凡二十七篇，序有明文。宋《崇文总目》云："熙即物名以释义，凡二十七目。"是自宋以来之传本均为二十七篇，明选所称篇数不误，《提要》误著为二十篇，反谓明选失记，可谓无的放矢，信笔雌黄者矣。

刘成国著《释名》之旨，详于自序。《序》云：

> 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圣人于时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于既往，哲夫巧士以为之名，故兴于其用而不易其旧，所以崇易简，省事功也。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一本此下有"即物名以释义"六字），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

此言古之为事物立名，各有其义，故推考其得名之由来。自《释天》至《释丧制》共二十七篇，其分类与《尔雅》已不同。《尔雅》

分类较疏，一篇之内所收语词有非篇目名称所能概括者。如《释宫》兼及道途、桥梁；《释器》兼括用具、衣着、食物、兵器等类。至于《释名》，则分类加细。包括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彩帛、首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诸类，各为一篇，事以类聚，物以群分，远较《尔雅》为优。后之类书，以事类系词，因词以记事典，词之分类盖即取则于是。《释名》与《尔雅》虽同为训诂书，而性质有殊。《尔雅》一书乃杂集经传训诂而成，故词之出于古之经传者为多；《释名》一书非为通晓经传而作，旨在探寻事物命名之含义，故以当时日常习用之词为主。虽俚语俗言，亦所不避。两者用意不同。是以欲考察汉代之词汇，《释名》与史游《急就篇》当同为重要之资料，未可以其训释多出于主观而忽之也。

声训之事，起于《易传》，而发扬推衍之者，实为汉之今文经家。如班固《白虎通义》所集汉人解字之说皆为今文经家之言是也。若刘熙者，是否为今文经家不可知，其《释名》即音说义，则承袭今文经家之绪余，固无疑也。其中说解词义，多出于臆测，诚未可信，然披沙拣金，亦时有一二可取。如《释水》云："水小波曰沦。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小沚曰泜。……人所为之曰潏。潏，术也，偃水使郁术也。鱼梁、水碓之谓也"；《释道》云："四达曰衢。齐鲁谓四齿杷为欋，欋杷地则有四处，此道似之也。"如此之类，亦颇有所见。清人推阐训诂，倡因声求义之说，殆远绍《释名》，旁取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有以成之耳。

《释名》之声训可取者诚不多，但释名物之形状亦颇委细，亦可为考索汉代文化之资助。其列词也，义之相类者比而次之，而义之相反者亦然。如"道""德"、"言""语"、"饮""食"、"冠""缨"、"衣""裳"、"宫""室"、"寺""观"、"屋""宇"、"仓""库"等词连类相属矣，而"是""非"、"巧""拙"、"贵""贱"、

“祸”“福”、“哀”“乐”、“吉”“凶”、“甘”“苦”等词亦比而次焉。足见成国于纷繁词语之中雅能探其伦序。至于书中所出之音训，以及当时之方音俗语，尤为后人考索汉代语音者所重视，理而董之，端在达者。

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①]

《广雅》为三国魏时张揖所作。揖字稚让，清河人，在明帝太和中（227—229）为博士。（见唐颜师古《汉书注叙例》）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张揖除撰《广雅》外，还著有《三仓解诂》《埤仓》《古今字诂》《杂字》等书，由此可知他是一个博闻多识，精通文字训诂的人。

《广雅》的体例和篇目同于《尔雅》，始于《释诂》，终于《释兽》，分为上中下三篇，今本作十卷，所收的词语几乎都是《尔雅》以外的，所以名为《广雅》。“广”是增广的意思。《尔雅》编成于汉代初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取材以群经训诂名物为主，而先秦古书中的词语并没有广为搜集，一一采录。到汉代，语言有了更大的发展，词汇不断充实和丰富，方言殊语、品物名称不见于《尔雅》的日益增多；同时文字的字形和词语的意义也多有改易和转变，远非《尔雅》所能赅括；因此张揖别作《广雅》一书，补其所阙。凡先秦两汉经传子史、医书、字书所有而不见于《尔雅》的字大都搜罗在内。这是《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以后的一部重要的训诂书，所以一直流传下来，没有散佚。

可是这部书在清代以前始终没有注本，只是在隋代的时候曹宪曾著《博雅音》四卷。曹宪为江都（今江苏）人以通《文选》知名当世，在隋为秘书学士（见《隋书·儒林传》），因避隋炀帝讳，所

①本文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1期。

以称《广雅》为《博雅》。曹宪的《博雅音》除依字注音以外，间或说明字体。原本可能是单行的，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广雅》都是明刻十卷本（以毕效钦《五雅》本最佳），曹宪音即附于正文之下，颇便参阅。

清代乾嘉时期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风气很盛。《尔雅》《方言》《说文》等书都有精善的注本。《广雅》一书囊括汉魏以上的文字训解，所以也大为学者所重视。当时为《广雅》作注而有成书的有两家。一为钱大昭（钱大昕之弟），一为王念孙。两家互不相谋，而同治一书，都很有成就。钱大昭有《广雅疏义》二十卷，王念孙有《广雅疏证》十卷。钱书成于乾隆末叶，王书成于嘉庆元年（1796），时间也很接近。但是《广雅疏义》始终没有刻板，只有传抄本，知道的人不多，前几十年才有影印本；而《广雅疏证》很早就有家刻本，所以流布很广，当时也极为学者所推重。现在看来，钱氏用力之勤并不减于王念孙，旁搜远绍，引据详赡，但重在搜求佐证，而发明较少。王念孙则精于校订，援引该洽，博约简取，而又能疏通诂训，触类旁通，独造自得。所以论成就自然高出钱氏之上。以清人所著《说文》的注释作比喻，钱大昭的《广雅疏义》近似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类似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曾经说："读《疏证》如入武陵桃源，取径幽深，继则豁然开朗，土地平旷"（见《经韵楼文集》），这绝非过誉之辞。

《广雅》所收的字和训解的来源很杂，为《广雅》作注要比为《尔雅》作注难多了。与钱大昭、王念孙同时的人桂馥曾经指出："治《广雅》难于《尔雅》。《尔雅》主释经，多正训，《广雅》博及群书，多异义，一；《尔雅》有孙（炎）、郭（璞）诸旧说，《广雅》惟曹音，二；《尔雅》为训诂家征引，兼有陆氏（德明）《释文》，《广雅》散见者少，无善本可据，三也。此非专且久不易可了。"（桂氏《广雅疏义序》）这些话说得很对。所以为《广雅》作注没有

足够的学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是不能成功的。

王念孙注《广雅》是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着手的。经过十年，稿凡三易，始得成书。他所作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三方面：

1. 校订今本文字的讹误，增补脱略，删去衍文；

2. 援引古籍，探求书中义训的根据，与《尔雅》《方言》《说文》和群书诂训相阐发；

3. 列举音同字异或声近义同之字，比类合谊，以互相发明。

在这三方面，王氏都能殚精极思，竭尽其能，所以创获独多。

校勘之事是王氏擅长的。王氏既以各种明刻本互校，又采用影宋本以正明本之失，并旁考《说文》、《玉篇》、玄应《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集韵》等书，正唐宋以后传写之误。所校原书讹误错乱脱夺处竟达一千余条，颇费心力，虽有小失，如曹宪音释中"口音"二字都误改为"又音"，然大都精确可信。

在校勘方面，《疏证》中每每引及"影宋本"和"皇甫录本"，这两个本子究竟是怎样情形，书中没有明确说明。但两本文字没有什么差异。按"影宋本"原书为黄丕烈所藏，系据明正德乙亥（明武宗正德十年，公元1515）支硎山人手跋的抄本影写，经宋保转借校录的（见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记》卷一）。"皇甫录本"就是支硎山人的抄本，经顾千里校录而寄给王念孙的。支硎山人的书曾为钱曾述古堂所藏，见钱曾《读书敏求记》和顾千里《思适斋集》。由于王氏居于京邸（在旃檀寺左），"影宋本"和"皇甫录本"的关系不甚明了，所以把两本并举。

皇甫录，明长洲人，孝宗弘治间进士。支硎山人、钱曾、顾千里都不知为何人。案明宪宗成化间进士邓庠号"支硎山人"，当即其人。庠为湖南宜章人，曾为苏州巡抚。支硎山即在苏州。皇甫录的年辈晚于邓庠，邓庠所有的抄本后来可能转归皇甫录，所以称为"皇甫录本"。不看顾千里《思适斋集》，就很难理解"影宋本"和"皇甫录本"的关系了。王念孙所说"影宋本"和"皇甫录本"，实

际就是一种本子。这虽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由于王氏托嘱别人经手，未详究竟，所以出现这样一个漏洞。

至于阐发训诂方面，王氏既能贯穿群书，援引精确，而又能疏通古训，独标新解。凡属于一般通诂，大都不再解释。遇有古书旧注不当的，连类所及，则指陈得失。“不敢凿空之谈、亦不为株守之见，惟其义之平允而已。”（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凡书中言“解者多失之”的地方都值得我们注意。

书中最大的特点也就在于不泥于前人旧注，旁征博考，参互比证，即音以求字，因文以考义，所以解说精当，往往出人意表。王氏虽在注释《广雅》，而随处都在解释先秦两汉古书的词义，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媲美。但是段注《说文》好言本字本义，不免局碍于形体，而王氏则能以音为纲，“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氏自序），凡音义相通的字都比合在一起，那就能执简以驭繁，观其会通。这种方法给研究训诂的人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途径。他在自序里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这种见解确实深得训诂之要。

总的来看，《广雅疏证》包容甚广，成就极大，是清人研究古代训诂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从单词意义的研究发展为义类和字族的研究，与段玉裁、程瑶田、阮元诸人声气相求，而蓄积深，范围广，独成一家之学。从理论到方法都给人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中仍有若干不足之处和缺点，需要加以辨别。例如：

1. 同义词中，有的词义本身就是相近的，有的只是在应用上有交错往来，训诂家予以申说，张揖也就根据训诂家所说缀辑在一起，（《尔雅》已有此病）。对这种情况王氏仅仅罗列一些佐证，不

加辨析，未免不足。如《释诂》"瘉也"一条"为"训为"瘉"(愈)(见《疏证》卷一下)，这只是因上下文而赋予的意义，与一般同义词(包括音近义通)不同。王氏举《左传·成公十年》"疾不可为也"为证。按"不可为"就是"不好办""不好治"的意思，"为"并不就等于"愈"，王氏对此就没有分辨，这还是注经而不破汉人旧注的风习(陈奂《毛诗传疏》表现得最清楚)。

2. 古书亡佚者多，《广雅》中有些词的训诂不易理解，只能实事求是，不必勉强牵合。例如《释诂》"臓、胋、膭"训"美"(见《疏证》卷一上)。王氏《疏证》说："《玉篇》：臓，初減切，脸臓，羹也。胋，徒兼切，大羹也。膭，子含切，膭膭也。膭，于含切，煮鱼肉也。皆美之义也。"这些字或指羹，或指煮鱼肉，何以说"皆美之义"?《疏证》中还缺乏明确的证据。或者由"旨味美"而来，这样就需要有所说明。依照《玉篇》的解释，是否因为张揖所根据的资料中"羹"字误为"美"字呢?亦未可知。

3.《疏证》中每每说"某与某同义"。所谓"同义"实际是一个语词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具有相关的两方面的意义。例如"敦"有厚的意思，厚则有所大(见《墨子·经篇》)，因而"敦"也包有大的意思。同样，"庞"有大的意思，也有厚的意思(见《诗·商颂长发》毛传)。于是王念孙就说："厚与大同义，故厚谓之敦，亦谓之庞；大谓之庞，亦谓之敦矣。"(《疏证》卷一上《释诂》"大也"条)我认为这里应当说："敦"训为"厚"，又训为"大"，"庞"训为大，又训为"厚"，因为"厚"与"大"的意义是相关连的，所以一词有两义。按照王氏的说法，就不是归纳，而是演绎。设若"厚"谓之"浓"，"大"岂可谓之"浓"?很显然，这样一种说明词义的方法是有毛病的。

4. 类似上面一种情形，《疏证》中还经常提到"某与某义相近"，例如《疏证》卷一上在《释诂》"有也"一条下说：

有与大义相近，故有谓之庞，亦谓之方，亦谓之荒，亦谓

之怃，亦谓之虞；大谓之庞，亦谓之方，亦谓之荒，亦谓之怃，亦谓之吴，吴、虞古同声。

这里比拟得很巧。但是能不能得出“有与大义相近”的结论呢？看来不无问题。因为“有”或为“有无”的“有”，或为“亲而有之”的“有”，与“大”的意义并不相近。语言中同一音如果表示两种意义，这两种意义，可以相近，也可以不相近。上面所举的几个语词，在古人书写的时候，文字上有通假，声音上有转移。如果一个字具有两方面不同的意义，由于字有通假（如“幠”与“怃”通，而“幠”可训为“有”）或者有转移（如“幠”与“荒”对转，而“荒”亦训“有”），就可以产生很多交错往来的关系。这样，我们自然不宜由此就把两方面不同的意义牵合为一。同时，词义有引申，词义相近又有部分和全体之分，以一概全，尤为不可。例如《疏证》卷一下“好也”条下说：“凡小与好义相近”，能否这样说，那就很值得商榷。自王氏在训诂学上创设这样一种解说的方式以后，郝懿行著《尔雅义疏》，钱绎著《方言笺疏》，都步其后尘，更加泛滥无归。前人很少评骘其失，实际是不足为法的。

以上所说只是举例而已。书中还不乏刻意标新过当之处，在此不详论。总之，《广雅》一书包容汉以上大量的词汇和训诂，读王氏的《疏证》，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有关文字孳乳繁衍、声音通转与语义发展等各方面的知识。阮元曾经说王氏训诂之学远在惠栋、戴震之上。但《疏证》一书并非全无罅漏。学者应当善于分析辨别，从中寻其脉络，挈其纲领，去其凌杂，取其精华，进一步贯串古今，阐发义例，建设汉语的词义学。王氏治学，谨严有法，讲到声音通转和因声求义的地方都具有一定的轨范和尺度。如果不明其要旨，凡言文字词义即滥用通转，随意比附，或误以为音同者义皆相同，那就不免流入歧途了。

中国训诂学发展的历史[①]

训诂学是中国语言文字学中一门传统的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科。“训”是说明解释的意思，“诂”本义是古言的意思，引申也作解说古语讲。“训诂”的原意是用通行的语言解释不易为人所懂的古字古义，目的在于疏通古书的文义，讲明字义。后来就做为解释词语音义的泛称。

“训诂”一词在班固《汉书》里多写为“训故”。“故”就是古语。如《刘歆传》说：“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所谓“训诂”就是指讲解古字古义。又《扬雄传》说：“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训故”与“训诂”是同义的。章句是分章析句，解释一章一句的意思，训诂则专指讲明文字的音义，两者是不相同的。“训诂学”就是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问。旧日只看做是“小学”的一个部门，现在将逐渐发展为一门有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

语言里的词因时代有变迁，而有古今之异，因地域有不同，而有方言之别。因此，后代的人读古代的著作不能懂，就要以今语释古语；同一事物，不同的方域称名或有不同，就要用通语释方言。语言总是在发展的，语词在使用中意义也常常会有改变。一个词由

①本文载于《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一个意义引申发展出别的意义，就成为一个多义词。多义词在使用时场合不同，意义就不一样。为免去误解，也往往需要加解释。这些就是训诂所由起。久而久之，就有集中讲解字义词义的书，这种书就称为“训诂书”。语言的各个方面都是有系统的。语音的声韵有系统，词汇的构词有系统，词的音与义和词与词的音与义之间的关系也是有条理可寻的。因此由一字一词的解释进而有意识地从事联贯的、有系统的语义研究工作，创造出科学的理论，对汉语发展历史的理解，对解释古书，对编纂字典、词典，对语文教育都会有重要的贡献。

一　训诂学的内容和任务

训诂学既然是研究词义的学问，其研究的对象主体即是古代的书面上的语言材料，而现代方言的口语资料也在参考之列。要研究古代的书面语，应当具备文字、词汇、语法以及语音史的基本学识，掌握语言文字一般的发展规律，才能从事整理研究前代的训诂资料，总结前人研究词义的理论和方法，并进一步开创新的途径，作深入广泛的研究。

前代解释语词的资料极为丰富，研究工作者应当按照时代的先后，按照不同的性质，分别层次加以整理。前代的训诂学家解释语词时所应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训诂学上有所谓形训、义训、声训。形训是就字形本身的结构说明所表现的词义的。义训是用现在人所理解的词语解释字在书面上使用的含义。采用一个同义或义近的词或一句话作解释。声训也称音训，是从词的读音上着眼，使用音义相通的词来说明词义，或有意识地从音上探求词义的来源。三者之中，义训用的最为广泛，不过如何加义训也是随词而异的。要研究前代的训诂，对古代的训诂书、字书、音义书以及音韵书中怎样解释单词，怎样解释固定的词组和联绵词，怎样就文意说明词的

通用和假借以及字音改变而意义不同之类的问题，都需要从事分门别类整理，求出通则，评定是非，从中吸取符合语言实际的有用的经验。

进而言之，凡是一门学术必然有理论、有方法。前代许多研究训诂的专家在解释词义的实践中会提出很多重要的见解。如词与词之间音义相比的关系，通语与方言同实异名的关系，谐声字声旁与字义的关系，本义与引申义和假借义的关系等等。在理论上就有所谓右文说，字义起于字音说，音同义近说，一声之转说，古假借必同部说。同时还提出探求词义的一些主要的方法。如形、音、义三者互求，因声以求义，比例文辞以相证，“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戴震《转语二十章序》）等等。这些都是从研究《诗》《书》古训而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缘由。今日在总结继承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语言研究工作者就要根据现代语言学的原理，研究词义的引申和由旧词派生新词的规律以及正确解释词义的方法；还要研究辨别同义词的法则，词义与语法的关系以及修辞对词义的影响等问题，从而建立起科学的汉语语义学。

二 训诂产生的历史

汉语历史久远，有文字的记载已经四千多年，而语言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有变化。春秋战国以前，一个字大都是一个词。春秋战国以后，构词法有了发展，双音词逐渐多起来，字在增加，字义也有引申和变迁。想要了解古书中的词义不能不有解释。因此在先秦书里就有不少解说字义的材料。其中有据字形说义的，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说：“故文，反正为乏”，《昭公元年》说：“于文，皿虫为蛊”；有从字音推求字义的，如《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庠”与

"养"，"校"与"教"，"序"与"射"都音韵相近。在《易经》里，如《说卦》说："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都从音立训，也属同一类。又有用同义字来作讲解的，如《易经·杂卦》说："恒，久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这些都是字的常用义。有些字所代表的概念比较难懂，或别有专指，就采用语句加以说明。如《易经·系辞下》说："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也。"又《说卦》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又《孟子·梁惠王下》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一一分别说明，力求明确，免有疑惑。在战国时代，"名家"是一时的显学，辨析名实，尤为精密。如《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圜，一中同长也"，"间，不及旁也"，"盈，莫不有也"，"信，言合于意也"，"梦，卧而以为然也"。这些可以说近似科学的定义了。

周朝自平王东迁雒邑以后，王室的势力日趋衰弱，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人民转徙不定，语言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变化。北方黄河流域有了区域共同语，凡是古语或方言为人所不能理解的就要用当时通行的语言即所谓"雅言"来解释。《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中夏"之言。《孟子·梁惠王下》解释齐景公时命太师作乐，诗云"畜君何尤"（"尤"是过错的意思）一句说："畜君者，好君也。"又《滕文公下》解《书经·大禹谟》"洚水警余"句说："洚水者，洪水也。"又《左传·宣公四年》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这些又是以通语解释方言的例子。由以上所说可以充分理解训诂之兴在春秋战国时代。

训诂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约有四种原因：一是语言有了发展，古今语有不同和方言有不同；二是书面语用词与当时口语用词有不同；三是社会不断发展，名物繁多，一词多义的现象比较普遍；四是对用词表达思想的作用的理解和认识有了提高，逻辑思维

日趋严密。因为有了以上几种原因，所以训诂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很好的开端。

三　两汉的训诂书与经传的注释

汉代是训诂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秦末社会的动荡，语言起了很大变化，先秦古籍多凭口耳传受，用隶书写出，世称为今文经。而从汉武帝以后前代的古文经出现日多，其中多古字古义，不尽为人所识，因此就有训诂学家为之注释。但在西汉时期，今文经盛行时，注释五经的人已经很多。以《诗经》而论，就有齐、鲁、韩三家，文字颇有不同。其他各经也有章句训释之类。汉代的训诂学就是依靠经学而发展起来的，而且汉代已有专门解释词语的训诂书。主要的训诂书有《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四种。这四种书各有特点，是中国训诂学的基石。

《尔雅》是由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训诂书，无作者之名，从内容看应当是战国至秦汉之间经学家和小学家迭相增益而成的。旧说是周公所作，或说是孔子门人所作，都不足信。《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卷，20 篇，今存 19 篇。书中《释诂》《释言》《释训》3 篇是解释名物以外的语词，其余 16 篇是解释各种事物名称的，如亲属、宫室、器物、天地、丘岸、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之类。书中所释的词语主要是出自经传古籍。“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尔雅”就是言辞近於雅正的意思。书中有的以汉代的今语释古语，有的以雅言释方言，有的以俗语释雅言。《释诂》《释言》《释训》3 篇主要是类聚一般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用一个通用词作解释，如《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其他各篇主要是类聚同类事物的名称分别解释。有古今称名不同的，有异名同实的，有同名异实的。用单词不能解释的，就用一句两句话作解释。品物多方，训解的方法

也有不同。这是汉代早期一部训诂的总汇，成为后代解释词义的重要根据。汉代的训诂学也就由此开始发展起来。

《尔雅》之后，西汉末扬雄作《方言》，东汉和帝时许慎作《说文解字》，东汉末刘熙作《释名》都是极为重要的著作。

《方言》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中有绝代语释和别国方言。《隋书·经籍志》题为《方言》。扬雄（53—18）是蜀郡成都人。汉成帝时到长安为郎，他由从四方来到长安的孝廉、卫卒的口里调查殊方异语，条列排比，整理成书。原书为15篇，今存13篇。这是专门解释方言语词的一部著作，所解释的语词有的是古代的方言，有的是当时不同区域的方言，把意义相近的列为一条，用当时通用的同义词作解释，并分别说明不同语词所通行的地区。这不仅是一部重要的训诂书，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方言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很高的价值。

继《尔雅》《方言》之后出现的《说文解字》为东汉和帝时汝南许慎（70？—147？）所作，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按照字形偏旁分部编排的字典，虽是一部字书，也是一部训诂书。许慎是贾逵（30—101）的学生，精通五经，既通今文经，也通古文经。他在《说文解字》里利用不同方式解说字义。有根据字形的构造说明造字的本义的：如"理"，治玉也；"忘"，不识也；"须"，面毛也；"突"，犬从穴中暂出也；"炙"，炮肉也。有根据古训以说明常用的词义的：如"慈"，爱也；"劲"，强也；"辟"，法也。其中有许多是字的古义：如"沬"，洒面也；"浴"，洒身也；"澡"，洒手也；"洗"，洒足也；"颂"，皃也（同容）；"翁"，颈毛也；"奭"，盛也；"爱"，行皃；"澒"，丹砂所化为水银也（即"汞"）。书中也有从声音上来作解释的：如"诗"，志也；"尾"，微也；"马"，怒也，武也；"夜"，舍也，天下休舍也；"晋"，进也，日出万物进。还有从字的声旁说词义的：如"斐"，分别文也；"贫"，财分少也。又有根据方言为训的：如"伙"，齐谓多为伙；"眮"，吴楚谓瞋目顾视

曰脈。《说文》解释一个字从形音义三方面着想，立意精深，对后代的字书、训诂书影响极大。

《释名》又是另外一种训诂书，作者刘熙专从词的声音上推求事物所以得名的由来，用同音或声韵相近的语词作解释。这种方法训诂学上称之为"声训"，或称之为"音训"。声训本起于战国末，西汉时今文经家多从声音上解说字义，刘熙是要从语言出发来研究事物命名所以之故，跟今文经家不同。他是有意识地要把语音和语义联系起来，就音以求义。例如《释名·释天》说："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虽然不免有主观唯心成分，但是从声音上推求各种事物名称的取义，类似寻求语源，对训诂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汉代的训诂书还有《小尔雅》《通俗文》可不俱论。总起来说，各种解释词义的方法在汉代已经具备。最著名的训诂学家大部分都是古文经家。东汉时期古文经盛行，如贾逵、马融（79—166）、服虔、郑玄都先后注解经传。郑玄，北海郡高密人，生当汉季（127—200），兼通今古文经，所注最多。他能"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以发疑正读，成为"汉学"的正宗，与许慎并称为"许郑"。

四　魏晋南北朝训诂义疏之学

在魏晋时期，张揖和郭璞是最著名的训诂学家。张揖是三国时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的博士，他搜罗汉代以前古书的词语和相传的古训纂集为《广雅》一书，体例完全依照《尔雅》，而补充《尔雅》所不备，所以名为《广雅》。张揖又作《古今字诂》和《难字》，见《隋书·经籍志》，今已失传。郭璞（276—324）是东晋河东人，为弘农太守著作郎，博学多识，精通训诂，所作古书注释最重要的有《尔雅注》和《方言注》。《尔雅》在汉代已有好几家注

本，郭璞别为新注，超越前人所作，他既能以今语释古语，又能以方言释雅言，诠释品物的形貌，以及其功用等尤为明晰。他所作的《方言注》能贯通古今，以晋代方言解释古代方言，并且联系语音，提出音有通转，为训诂研究增添了新的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人民播迁流转，语言起了很大变化。古书词义艰深，不易理解，于是注释古书的风气日盛。魏晋时期，不仅《易》《书》《诗》《左传》《谷梁》《论语》等儒家经典有注，其他古书如《史记》《汉书》《老子》《庄子》以及辞赋之类也有人注释，训诂之学得以不致废坠。其中精义颇多，不无可取。自宋齐以后，兼释经注的"义疏"体出现，如梁代国子助教皇侃著有《礼记义疏》《论语义疏》。义疏的兴起可能是受了佛教经典有"讲疏"的影响。

魏晋以后除经传有注释外，字书和辞书都多起来。字书和辞书之增多与语言词汇的范围扩大，文字的增多和一词多义有直接的关系。晋代有任城吕忱作《字林》七卷，仿照《说文解字》而有所增益。宋代何承天有《纂文》三卷，北魏阳承庆有《字统》二十一卷。梁代阮孝绪有《文字集略》六卷，顾野王《玉篇》三十卷。现在所存只有唐人增字本宋修《大广益会玉篇》。顾野王原书只有五卷残卷。其他各书清人都有辑佚本。

五　隋唐时期的训诂学

隋唐时期承接魏晋南北朝注释古书的风气，纂著更多。隋代陆善经有《昭明文选注》，唐代李善也有《文选注》。孔颖达（574—648）奉诏作《五经正义》，包括《毛诗》《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左氏传》。同时又有贾公彦作《周礼注疏》，徐彦作《春秋公羊传注疏》，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注疏》。这些书都是参照前代已有的注释而有所抉择。李善书除解释文词字义外，并注明字音和字

的通借，对文句的出典尤为注意，成为一种注释的体式。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不仅解释经文，而且解释注文，对语言中的虚词和文法也有不少的解说，这是以前古书注释中少见的。

在经部、集部以外，子部、史部书籍也有注释。如杨倞有《荀子注》，成玄英有《南华真经义疏》，司马贞有《史记索隐》，张守节有《史记正义》，颜师古有《汉书注》，章怀太子李贤有《后汉书注》。这都代表了一时的风气。虽然是随文释义，但是也汇集了许多前代的训诂资料。

隋唐时期，韵书盛行，可是字书也不少。如隋代诸葛颖的《桂苑珠丛》一百卷，唐武则天的《字海》一百卷，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卷帙都极繁富，应有可观。可惜久已亡佚无存。但就前代书中所引到的材料来看，解词释义已改变旧观，由笼统而趋向于清晰，同时也由只记书面常训进一步注出当时口语使用的意义。这确是一种新的改变。就解词的范围而论，既有专门解释双音词的书，如《兼名苑》，又有专门解释日常应用的口语词的书。现在还能见到的有出自敦煌石窟的《字宝碎金》和《俗务要名林》，都是极珍贵的材料。

唐代在字书、韵书以外还有一类音义书。音义书一类始自东晋，主要为经部书注音。到陈代陆德明（556—627）纂集前代各家所作书音（经书外，包括《老子》《庄子》《孝经》《论语》《尔雅》）为《经典释文》三十卷，注音之外，有时涉及字义。到北齐时曾有沙门为佛典作音义。后至唐代高宗时释玄应作《大唐众经音义》（通称《一切经音义》），唐宪宗时释慧琳又根据玄应书扩充，作《一切经音义》。这两部书都仿照《经典释文》的体例。就原本经文摘字为训，所采古代训诂资料极多，而且有所辨析，在传统小学书中独为一类，对研究前代训诂极为有益，所以随着藏经一直流传下来。清代学者从中辑录出许多训诂材料。

六 宋元明时代的字义研究

宋代承接五代时期研究古文奇字的风气，学者对大量出土的钟鼎彝器广事搜罗，扩大了眼界，学术思想也因之大为解放。在经学方面已不完全斤斤墨守古人的成说，而别创新义，如欧阳修的《诗本义》，王质的《诗总闻》都是如此。在解说文字方面则出现了王安石（1021—1086）的《字说》。王安石《字说》把形声字都说成是会意字，“六书”缺而为五，如谓“邑交”为“郊”，“同田”为“富”，“讼者言冤于公”之类，完全出于主观臆断，虽行于一时，终不免为人所弃置不顾。

但同时有另一学者王子韶，他倡“右文说”（见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音，而且表义。凡谐声声旁相同的字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义。如“戔”是小的意思。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类，都以戔为义。汉字的形声字一般是形旁在左，用以表义，声旁在右，用以表音，所以称声旁为右文。王子韶，字圣美，浙右人（见《宣和书谱》卷六），有《字解》二十卷，失传。他所创声旁有义的学说对后代的训诂学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有很大的启发。

宋代研究《尔雅》的有邢昺（932—1012）、郑樵（1104—1162）两家。邢昺有《尔雅疏》，补郭璞注所未详；郑樵有《尔雅注》，引旧书以证郭；都各有发明。在南宋期间，朱熹（1130—1200）是重视训诂的人，他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书。既采用前代旧注的优点，而又参酌新解；解经说字能运用到钟鼎彝器的铭文，见《诗·大雅》的《行苇》《既醉》《江汉》诸篇，这是以前所少见的。

在宋代以前，学者对古今音异是比较模糊的。到南宋时期才开始注意到古韵问题。吴棫作《韵补》，从古代的韵文材料中考察古

人分韵与《广韵》的异同。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也提出《诗》韵与后代不同。郑庠又作《古音辨》，讨论《诗经》分韵的大类。这是清代学者研究古韵的先导。对研究词义有一定的帮助。

元代在字学上承接南宋时期的"六书"之学，并不注意研究训诂，所以在训诂方面除有两三种经传注释外，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明代学术不振，受宋代性理之学的影响，游谈无根。训诂书籍有万历时朱谋㙔所作的《骈雅》，类聚古书中义近的双音词，按《尔雅》体例分类，每条予以解释，所以称为《骈雅》。这是一部属于雅学的书。在万历以后研究古学的风气日盛，如江宁焦竑（1541—1620）、成都杨慎（1488—1559）、桐城方以智等人都有著述阐发字义。方以智的《通雅》，根据古代的语言材料说明音义相通之理，兼论方言俗语，创见极多，对清代的学者有不少启示。

七 清代训诂学理论的建立

清代学者受晚明焦竑、杨慎等人提倡古学的影响，极力推崇汉代的经学和小学，重考据，求实证，不尚空谈性理之学。到乾嘉时代"汉学"大为昌盛，为经书、子书作注解的人很多。要解释经传就不能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因此语言文字之学盛极一时。《说文》《尔雅》成为人所必读之书。研究《说文》《尔雅》的重要著作都多至数十种，或刊正文字，或发明古训，各有述造。其他如《方言》《释名》《小尔雅》《广雅》等书也有人为之疏通证明。训诂之学有了极大的成就。著名的训诂学家指不胜数。

清代训诂学的发展跟古音学的成就是有密切的关系。自清初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根据《易经》《诗经》等书的韵字开始为古韵分之为十部起，经过江永（1681—1762）、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孔广森（1752—1786）、江有诰（？—1851）

等人的研究，逐渐加详，发展为22部，同时戴震（1723—1777）又提出韵类通转的学说。在声母方面，钱大昕（1728—1804）又提出声转的说法（见《潜研堂答问》），而且发明轻唇音古读重唇音，舌头音、正齿音古归舌头。这些都成为研究先秦古籍和探讨字义的根据。

在理论方面，清代学者在训诂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沟通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研究文字和字义必须理解声音，不理解声音就无以解决从文字形体上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有时会陷于迷惘而不知所措。因为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所以必须了解文字的声音，从声音去探求意义。戴震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六书音均表序》）这是很重要的见解。后来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里说："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段玉裁为王氏《广雅疏证》作序，也说："文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这些话十分精辟，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训诂的准绳，从而建立了许多推考字义的理论和方法，把零散的知识贯串起来，使训诂学在中国语言学科中成为有系统、有理论、有严谨方法的一门学问。

清人研究训诂的目的，从实用的意义来说，首先是要解释经传和其他隋唐以前的古书。他们应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从声音上推求文字的假借

古书之所以难读，一是由于有古字古义，二是由于文字上有假借。古字古义当考之《尔雅》《说文》和其他前代书中的诂训，文字上的假借当求其本字。王念孙说："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即涣然冰释。"（王引之《经义述闻序》）那么，假借与本字的关系首先是音同或音近。段玉裁指出："假借必取诸同部。"

(《六书音均表》"古假借必同部说")所谓"同部"就是属于古韵的同一部。因此，凭借古韵的知识，按照文字上的同音或音近的关系，再参之以文义来推求本字，就可以解决许多古书中难解的文句和古人所加的训诂上的问题。(参看《经义述闻》卷三十二"经文假借"条)这是清人研究训诂方面的一大发现。

(二)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以说明引申义

清人认识到音有古今之异，同时也认识到词义有古义，有今义；有本义，有引申义。如"曾"(céng)作为虚词用，古义同于"乃"，后世用为"曾经"的意思。"仅"唐以前作"约近于"的意思用，后世用为"但"的意思，这就是古义与今义之分。又如"荟"，《说文》解为"草多皃"，引申为凡物荟萃之义(见《说文》段注)。"过"，《说文》训"度也"，引申为有过之过(见《说文》段注)。这就是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汉语词汇中一词多义是常见的现象。段玉裁说："凡字有本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蔽与固皆不可以治经。"(《经韵楼集》卷一"济盈不濡轨"条)他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说明词义的发展，对辨析字义极为重要。

(三)比证文句以考定词义

采用古书中相同的文句互相比证以考定词义，宋代人已经这样做了。在清代尤其重视这种方法。段玉裁注《说文》，刘台拱(1751—1805)作《论语骈枝》都能从实证出发解释古训。王念孙、王引之(1766—1834)父子尤其善于利用古书的资料，解决从来没有人解决的问题。例如解《诗经》"终风且暴"，为"既风且暴"；解"邦之司直"为"主正人之过"(俱见《经义述闻》卷五)，都是颠扑不破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胜义环生，尤为人所称道。王引之作《经传释词》，专门解释古书的虚词，综合各种古书中的用例参互比证，而得其确解，对研究古代文献有极大的帮助。他的书已经联系到语法的范畴了。后来又有人作了补充。

（四）因声以求义

研究字义从声音上来考察，在清代以前虽然也有人注意到，如南唐的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宋朝的王子韶的《字解》，元朝戴侗的《六书故》，明朝的方以智的《通雅》等，但都不曾进行全面有系统的研究，也没有能总结出具体的规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古音的知识，清人有了先秦古音的知识，在前人成说的启发下进一步提出因声求义的原理，把形、音、义统一起来，因形以知音，由音以求义，为训诂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科学的途径。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首先提出“声与义同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示部“禛”字注），进一步又说“凡同声多同义”（言部“誓”字注）。如从“農”声的字有厚重义，如濃、醲、膿，从“辰”声的字多有动义，如振、震、賑。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同从一个声符的字不一定只有一义，不同声符而音同或音近的也可以有同义的关系。段氏也同样指出有这类现象，这就比前人的右文说有了新的认识。王念孙作《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而又把古书中有关的声近义通的字都联系起来解释，“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着重从语言的角度说明其间的音义相通和声音相转的关系。这种作法接近于词族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王氏又作《释大》一篇，从声母方面观察声母相同而意义也相近的现象，又是一种新的尝试。与王氏同时的程瑶田作《果蓏转语记》，指出凡物的形状、作用相同或相似的往往用声母相同的词来称谓，但字形不必相同。这又把声近义近的道理阐发无遗了。清代的训诂学到王氏父子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研究的范围不仅是单音词，也注意到双音词；不仅研究实词，还研究虚词，初步进入了语法的范畴，对古书的解释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贡献极大。

清人对于训诂的研究所应用的方法主要是以上几种。他们除了注释古书和疏证古代训诂著作以外，还研究一些古代的钟鼎彝器款识，探讨一些文字的古义，并且做一些古代训诂音义的辑佚工作。

如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任大椿的《小学钩沉》，顾震福的《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是一些资料书。另外，清人还编纂了不少训诂书，如吴玉搢（1698—1773）的《别雅》，史梦兰（1813—1898）的《叠雅》，夏燮的《拾雅》，洪亮吉（1746—1809）的《比雅》等书。阮元还主编了一部《经籍籑诂》，把古书中所见的每字的训释都编录在一起，检一字，而众义俱在，是一部训诂资料的总汇，极为有用的工具书。在历代书籍当中还有很多方言的记载资料，也有人搜集编录。如杭世骏（1696—1773）有《续方言》二卷，程际盛又有《续方言补正》一卷，程先甲又有《广续方言》。其他方言、俗语也有人集录。如钱大昕有《恒言录》，胡文英有《吴下方言考》，毛奇龄（1623—1716）有《越语肯綮录》，翟灏有《通俗编》等等，为研究古今方言俗语提供了方便。

清人研究训诂的成绩是伟大的，但也不无缺点。主要的缺点有两方面：一是在段氏以后有些学者墨守《说文》，以为《说文》的字都是本字，《说文》的训解都是本义，一词一语都要到《说文》去寻本字，滞碍而难通。不知《说文》九千五百多字中有古字，也有汉代后起的增益偏旁的字，具有前后不同的层次，不能作为平面的看待；其训解以通用义为多，也并非都是本字本义，甲骨文、金文的佐证很多。二是讲解训诂，声转无方，凡言“语转”“一声之转”之类未必合于先秦古音，滥用通转之说，所言多误，如钱绎《方言笺疏》之类，足为先戒。

八　近代以来训诂学的发展

20世纪之初到现代研究训诂的学者继承清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吸收了外国的一些早期的语言学的知识，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字原和语根的探求。余杭章炳麟先生（1868—1936）作

《文始》，取《说文》中的510个独体字和半独体字作为“初文”和“准初文”，推求由同一“初文”而繁衍出来的音义相关的语词。凡音义皆近，叫做孳乳；音近义通，叫做变易。目的在求“语源”，求语词之间的亲属关系。但可惜没有脱离文字形体的束缚，所求不是“语源”，结果是文字之原。他用的方法是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在声音的通转上又以他所定的“成均图”为根据，有些也失之勉强。

其后，沈兼士先生（1886—1947）作《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主张以形声字为出发点，用归纳的方法研究形声字同一声符所表现的基本意义。但同一个声符所表现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一个，也当有所区别。形声字的声符，凡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可以构成一个词族，由此再联系音韵，借重古音的知识（包括声母韵母），以求其语根。以实际证据为主，不以主观想象为断，其结果比较可信。这种理论无疑问是正确的。就研究的方法来说，把语言文字做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来研究，溯源探委，具有创新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他后来所主编的《广韵声系》就是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张本。

（二）研究同源字。同源字是音近义同和义近音同的字，合在一起可以定出是同出一源。类聚同源字的意思也是在寻求语源。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同源字大都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在原始的时候本来是一个词，代表某一基本概念，后来语音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才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但是同义词不都是同源字，要以声音是否相近为定。王力先生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古代的训诂资料，探微索隐，编成《同源字典》一书，以韵部为纲，声纽为目，条理秩如，是研究汉语词义学的一部新著。

（三）虚词的研究。近代因为语法学的兴起，虚词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最明显的改变是研究虚词的人对虚词的词类和用法都有

比较清晰的说明。杨树达（1885—1956）曾根据《马氏文通》作《高等国文法》，后来就以《高等国文法》为基础，参照王引之《经传释词》，作《词诠》一书，专门解说虚词。其后裴学海又作《古书虚字集释》集录前人所说，并加以补正，与《词诠》相得益彰。吕叔湘先生有《文言虚字》一书，简明赅要，是学习古代文言文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四）根据出土的古铜器铭文考订古书的训释。先秦的古书都以篆书古文书写，到汉代经过传写，后来又转写为隶书，文字伪变已多。汉代以来的解释往往有误。现在可以借助商周铜器铭文解决一些前代义训中的症结问题。近代著名的学者王国维（1877—1927）首先以铜器铭文解释《诗》《书》中的常用词语（见《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别开生面。后来一些古文字学家继踵而起，创获更多。在这方面成就最多的是于省吾（1896—1984）。他平生所最服膺的是王念孙，所以他所著的书都重实证，不为凿空之论。如《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等书驳正前人误解的地方极多，为利用古文字资料刊正古书创立出一种新的门径。

（五）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唐宋以后语词的考释。清代学者对一些通常在书面上见到的口语词已经有所集录，大都是随笔札记，略明出处，而解释不多。近代以来，罗振玉（1866—1940）虽有《俗说》一书，稍补前人著述所不备，但仍属札记性质，还不能说是训诂的研究。惟到张相（1877—1945）作《诗词曲语词汇释》一书才开始作唐以后诗词曲语词的研究。诗词曲中很多习用的不容易懂的口语词在字书和词书中都没有解释，张相一一举例，比证详考，作出解释，是一种新的成就。同类的著作还有陆澹安先生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和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都有很精到的解释，为阅读唐以后的文学作品提供参考。

九　训诂研究的展望

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肇始于先秦春秋战国时代。训诂之所以兴，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变化。古的语词，后人不懂，就要有解释，方言有歧异，或语词在表义的内涵上有了新义，也需要有解释，所以就产生训诂。

从训诂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训诂学的兴盛，两汉是一个高峰，清代是一个高峰。两汉学者的训诂著作和经传的注释为训诂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汉训诂学的兴盛跟语言变化的加剧和古文经的传布有极大的关系。清代的训诂学有理论，有方法，发展为一门语言学科，跟经学、史学的考证和古音学等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学者受语言学、语法学的影响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范围上都有了新的建树，改变了旧日墨守古训，拘牵文字形体，和重古略今的风习，开创了新的途径。

研究训诂对解释古书，了解古代的科学文化和考证语言发展的历史以及校勘古书，编写字典辞书都有重大的作用。今后的训诂学从理论上和实用上都会向建立有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的方向发展。理论的开拓将给词汇学和词典学提供科学的根据。具体的工作，首先是总结前人的成果，吸取前人研究的经验和外国语义研究方面的理论，联系古今，旁及方言，分别层序，研究词义发展的各种现象，并寻出一般的规律，给语文教学和编纂词典以帮助。还有根据古今不同时代的语音系统，从音与义的关系上从事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词族的研究。这项工作的完成将为汉语发展史增添新的重要内容。

训诂学的继承和发展[1]

这次能有机会参加我们训诂学研究会第二次年会，非常高兴。看到研究训诂学这方面的同志们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壮大，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将起很大的作用。苏州风景秀丽，现在虽是晚秋的时节，而绿树葱郁，花发似锦，在此景物优美的地方能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老前辈相会，得有论学之乐，也格外使人高兴。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的特有的一门学问，它跟文字学、音韵学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还更重要。因为在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进程当中，训诂学跟我们很多工作有联系。一是训诂学跟整理古籍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要整理古籍，怎样去理解古代的词义，必须了解古人是怎样训释词义的。要能读懂古书和古书的注释，必须懂得传统的训诂学，否则就很难整理古书。二是我们要编字典、词典，总要给字或词加训释，如果没有训诂学的专门知识，不去研究训诂学，就不能编写出划时代的、在发展文化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字典和词典。就是在教学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给学生解释一个词，应当怎样解释才正确，在文句里怎样解释才恰当，都需要研究。所以我说训诂学直接跟我们当前的工作有联系。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对世界文明有很多贡献。今后在语言学这方面也应当有所建树。我们应当研究训诂学，并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知识，求得发展，以丰富普通语言学的内容。

---

①本文是1982年11月在苏州召开的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二次年会上的讲话。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对传统的训诂学的成就我们怎样去继承它，又怎样去发展它呢？还有，继承和发展这两方面，就当前学术界的情况来说，我们又应当重视哪一方面呢？我感觉这是一个问题。在这里，就一时想到的，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我想，要使训诂学振兴起来，我们工作的重点，首先是要放在继承这方面，所谓继承，就是要把前代训诂学的优良传统和前人研究词义的成果继承下来，认真领会，吸取其精华，掌握其方法，使之发扬光大。清代汉学家的吴派、皖派都是在训诂学上有成就的。晚近章太炎先生、黄季刚先生继轨前修，在这方面的贡献都非常之大。

中国训诂学的书籍很多，自汉代有《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书以后，历代都有不少训释文字的著作，各有其特点。古代各种典籍，包括经史子集，有注解的也很多，注者怎样根据文义解释词语，不无类例可寻。我们都应当加以研究，整理成为有系统的知识。清代学者对训诂的研究成就最大。他们对解释词义，探讨词义的根源，以至说明词义的发展等都有创新的见解。他们利用丰富的文字知识和古音知识进行训诂的研究，既有理论，又有方法，使训诂学发展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门专门的学科。他们研究训诂所应用的方法至少有以下几种：

1. 以经解字，以字解经。这是段玉裁自己讲的，本之于戴震。以经解字，就是根据经传的文句说明字的古义；以字解经，就是根据字的形音义讲通经传的文义，由文字之有假借以疏通诂训。

2. 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来说明引申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这一方面很突出。

3. 从声音的通转上来申明古训。如钱大昕在《潜研堂答问》里指出字有本音（即正音），又有转音，从声音的通转推求字义的关系。

4. 以今语解释古语。这是从郑玄、郭璞以来解释字义经常应用的方法。

5. 因声以求义。一方面从谐声的声符来考察同一声的字所共有的含义；另一方面从声韵相同，或声韵相近来说明字义之相近或相通。

6. 用比证文句的方法考证词义。如王念孙、刘台拱在这方面最擅长。比证法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

7. 由古人名号来考证词义。如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就是如此。

清人有以上这些方法解说字义，我们应当加以概括、总结。另外我们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例如训诂学史的研究，古代方言词语的辑录等等。只有对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有新的发展。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对于过去的东西还不是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继承（整理和研究）很重要。

谈到发展，我们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现在对古文字、古音韵、古语词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应用新的观点，开创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前人研究古语用力多，研究今语用力少；研究单个词语用力多，研究全面词语用力少。有些问题只粗辟门径，未曾深入钻研。今天，我们就应当注意方言词汇的研究，贯串古今，探讨有关词语的训解和词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还要注意探索规律，进行理论方面的建设，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譬如我们编词典，怎样来解说词义，怎样阐明词义的发展，都需要有理论作指导。汉语语词意义的发展也非常复杂，不是用一个引申义或比喻义就够了。从比喻义来说，有些联系到修辞。最初有人在文章里有过一种比喻的用法，后来慢慢地为人所仿效而变为通常应用的意义了。在现代的语言学书籍里也讲到词义的变迁，意义有扩大、缩小和转移几种现象，但不能说明词义变迁的缘由。我们应当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联系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探其根源，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

前人有一些理论都蕴藏在他们的整部著作里，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就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中摘取出来，加以整理归纳，成为有系统的知识。

总之，我们研究训诂要对前人的成就有全面的理解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我们的任务不单是为了读懂古书去研究训诂，还要注意到实际应用，进一步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语言科学，在编辑字典、词典以及推进语文教学等方面有所贡献，我们共同来努力，一定会取得新的成就。

清代的训诂学[①]

一　传统训诂学研究的范围

训诂学是中国旧日“小学”中的一门，跟现代所说的“语义学”（semantics）类似。语义学研究的范围较广。如词与概念的关系，语音与语义的关系，语词的繁衍，词义的发展和变化，语义转变的原因等等。传统的训诂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1. 研究文字的确切的训解
2. 探讨字义的本源
3. 考察词义的引申和改变
4. 归纳语词声音与意义的关系
5. 研究虚词在句法中的作用
6. 编写词典的办法

二　训诂研究发展的历史

语言里的语词随社会的发展而有变化，语词的意义因时因地或有不同。后人读前代的典籍有不懂的词字，就需要有解释。词义之所以不易理解，主要由于古今言异、方俗语殊，或由于文语与口语不同，而文字在记录语词时又分歧多端，词义也有引申变化，因而

---

①本文载于《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7 月出版。

在我国战国秦汉之际有不少书在解释一些字义。到汉代就有《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字书和训诂书，代表古人对于字义研究的不同方面。《尔雅》或以今语释古语，或以通名释别名；《方言》以通语解方言；《说文》就字形以说义；《释名》就音以推寻事物得名之由。这些书流传下来，一直为后世研究古训的人所重视，成为历代研究词义的基础。

汉代以后，字书、音义书、韵书蜂起。如《广雅》《字林》《玉篇》《经典释文》《切韵》等书都是，而且历代讲解字义的书也很多，如唐代的《匡谬正俗》，宋代王观国的《学林》，孙奕的《履斋示儿编》，项安世的《项氏家说》，明代的方以智《通雅》等等。但大都缺乏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缺乏理论的建树。王安石的《字说》诚不足道。直到清代才把研究训诂做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看待，而且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类。

三　清人研究训诂的成就

清人研究训诂，成绩超卓，远迈前代。主要的成就表现在三方面：

1. 辨析字义，疏通古训；

2. 沟通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3. 建立研究字义的理论和方法。

清人研究训诂所以能有卓著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古音学为基础，能根据声音以探求词义。陈澧说："言以表意，字以表音"。那么，以声音为关键，则对文字之孳乳，形体之假借，词的内部结构，词与词在意义上的关系，都可以得其条理。所以戴震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清人尊崇"汉学"，推崇许郑，对汉人的经传注解都殚精极思，寻其义例。以为要通经学，必通小学。因

此，对许慎《说文》特别重视。他们有了音韵文字的丰富知识，对字义的研究就取得极大的成就，有关“雅学”的著作也特别多。旁及古今的方言，注意的范围也有所增加。

他们所以度越前修，除通古音以外，在认识上不同于前人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明字有假借

古书难懂，一则是由于有古字古义，一则是由于文字有假借。清代学者注意到假借字与本字必为音同或音近。王念孙说：“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王引之《经义述闻序》）段玉裁曾说：“凡假借必取诸同部。”（指古韵部而言 见《说文注》示部祇字下）他们利用古音学的知识从字的假借关系上推寻本字，解决了很多古书中难懂的字句。

二是明词义有转变引申

清人不仅认识到音有古今之异，同时也认识到词义有转变引申。这就注意到语义的发展和变通了。在段注《说文》、王氏《广雅疏证》、钱氏《方言笺疏》和郝氏《尔雅义疏》中讲到引申义的很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说明一词多义。

三是明声义相通之理

在语言的发展中有许多语词是声近义通的。清人体会到谐声字中同声符的往往有共同的基本意义。王氏《广雅疏证序》说：“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段玉裁说：“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说文》示部禛下），又说：“凡同声多同义”（《说文》言部䛐下）。不仅如此，另一方面他们还发现语词中声母相同或韵部相同的字意义多相近。例如阮元《释门》一文指出“凡事物有间可进，进而靡已”的都与“门”声相近。钱大昕《潜研堂答问》又指出“毛传释《诗》，自《尔雅》诂训而外，多用双声取义”。推而广之，物体形似的，其命名也往往相同。程瑶田作《果蠃转语记》

说："声随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把文字的形体和字的声音、意义都贯串起来了，成为研究训诂的一项重要理论。

四 清人研究字义的方法

清人利用以上这些知识进行训诂的研究，既有理论，又有方法。他们所应用的方法，概括来说，有以下七种：

1. 以经解字，以字解经。这是戴震和段玉裁所标榜的一种方法。所谓"以经解字"就是根据经传原文以推究字义，所谓"以字解经"就是根据文字的义训解释经传的文义。这是两者交相为用的意思。

2. 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说明引申义。字的本义，有些可从字形上来推断，有些只能从最早使用的意义来断定。清人重视推求字的本义，所以着重研究《说文》，以《说文》为因形求义的典范。《说文》所载往往是较早的古义，可据以说明一词多义的引申义。

3. 从声音的通转上解释古训。如钱大昕《潜研堂答问》指出"古字有正音，亦有转音。如求读若奇，难读如傩，敦读如雕……皆声之转。"戴震作《转语》分同位正转和位同变转，都是为了说明声音文字意义的联系。

4. 以今语解释古语。古代郑玄、郭璞已经应用这种方法来说明古训古义。清人也很注意用现代语解释古语。

5. 因声以求义。清人理解到研究训诂不能脱离声音，凡谐声声符相同，古韵同部，声母相同，或古韵阴阳对转的字义多可通。王念孙父子最善于应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来探求字义。王念孙作《广雅疏证》，不株守文字，而从声音上把意义相通的字都贯串在一起。他在自序里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他在

《释大》里更是充类至尽。就唇音而言，丰、封、旁、方、朴、甫、庞皆有大义，这就是“不限形体”的最好的例子。

6. 比证不同文句以考察词义。如刘台拱《论语骈枝》释“有酒食先生馔”，释“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如王引之作《经传释词》考校词义，举同文以互证，举两文以比例，用互文、对文等以说明训释。

7. 从事物的名号上考核字义。如王引之《经义述闻》中有《春秋名字解诂》，从古人名与字上考察字的古义。

清人应用这些方法疏通许多不易理解的古训，解释不少向来没有解释清楚的词义，并初步注意到联绵词和虚词的研究、由单字语义的研究转向为有系统的字族的研究。训诂学也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了。

五 结 语

总起来看，清人训诂学的根柢就在于以声音通训诂。应用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比较法。比较的材料有纵的一面就是古今，有横的一面就是同时代的各类材料。戴震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又把“语言文字”合称是符合现代科学语言学的观点的。王念孙所从事的字族义类的研究，有推求语源的意味。

清人研究训诂也不无缺点。其主要缺点如下：

1. 由段玉裁到俞樾很多学者株守本字本义，墨守许书，把后起的字视为本字是错误的。

2. 声转过于宽泛，不合规律。动辄谓“一声之转”，实不尽然。

3. 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汉魏以上，对后代词义的研究很少。

4. 虽然重视古代方言，搜集了一些资料，但缺乏分时代、分地域的研究。

虽然如此说，但是在“雅学”和“许学”两方面都有很多重要的成就，他们所著的书籍对近代的中国语言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章太炎、刘师培、黄季刚、王国维、沈兼士、杨树达诸家都在清人学说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瑞典人高本汉作《汉语词类》（Words Families）也是根据古音系统来研究语词义类的。前几年王力先生写成《同源字典》。同源字是指音义相近或义近音同、义同音近的字。这部书在前人论著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是研究汉语语义学的新的成就。近人应用清代学者的方法研究唐宋词曲小说中的词语也颇有成绩。训诂学将有更大的发展。

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①

"方言"与"方音"是两个名词，意义是不相同的。"方音"是指某地语音里的声韵而言。方言则指某地的语汇和语法而言。我国自古以来，四方的语言就不一致。字音方面固然差异很大，就是语词方面也互有异同。可是我们要研究古代语言的各方面，除根据书本上的记载以外，还要考察现在实际的方音俗语。

古代方音的现象，由经子诗文的韵读以及汉人的经子注释中可以透露出一些消息来，此外再没有什么特殊的材料了。至于古代的方言，旧书笔记里颇有记载，而汉代扬雄的《方言》，更是一部最珍贵的书。他把许多古代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语词，集录在一起，分别注出每个语词所流行的方域，并且说明何者为"通语"，何者为"转语"，这对于我们考索古音古义都有很大的用处。后来清人依照他的体例搜采古代方言而编纂成书的也不少。这两方面的材料，固然后者多于前者，可都是书本上的死材料。然而为考求古音，仅仅凭仗书本上的材料是不足的，因此不得不取之于现代实际的方音。以今溯古，以古证今，这样往往可以解决不少音韵上的问题。例如据现代方音以拟测古音，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近20年来，方音的研究是最有进展的。至于方言的研究，则还没有努力去作。

即以书本上的材料而论，扬雄《方言》一书，严格的说，尚无

① 本文写于1946年9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人完全加以整理。清代虽有戴震的《疏证》、钱绎的《笺疏》、王念孙的《疏证补》，可是仅照注解《尔雅》的办法，举出一个语词用法的例证，说明它与其他字通假的关系，或探讨同类音近的语词义类相通的脉络，这样做还是不够的。比如说：各处不同的方言里，它们音韵上的差别是什么？哪些语词是属于某一种“音变的条例”（principle of phonetic change）而由甲方言转变为乙方言的？而且甲方言转变为乙方言，普遍的在音理上有没有一种规律？古人的某一个词，在现在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了，有无由音变而孳生的新词？这是就音韵一方面来说的。

若就意义一方面来说，两个地方的同样一个语词是否它们的涵义一样？一个语词由甲地传到乙地，有无意义上的变迁（semantic change)？若就地域来讲，汉代的方言在地理上分划的情形如何？是否可以画出一个方言地理图来（dialect geography)？诸如此类，都是前人未竟之业，留待我们来作的。至如前人所作属于搜集材料的书，如杭世骏的《续方言》、钱大昕的《恒言录》之类，只是随手掇拾，既不曾分时代，又挂一漏万。假若求全责备的话，历史上的记载，我们都不可放过。例如南北史里的俗言，唐代传奇、宋人笔记语录、元人杂剧，以及明清小说之类的方语，都应当搜集起来，以便作一种有系统的研究。

但是这种工作需要的时间很长，一则可以从容不迫地去做，一则也非当务之急。当前最主要的事情，还是现代方言俗语的研究。因为书本上的记载一时尚不致亡逸，而各处的口语经过抗战变乱，再过若干年也许要泯灭无闻了。而且为构拟古代的汉语语音，需要研究现代的方音；要明白古代的语词，也需要注意到今日的方言。理由有五点：

1. 古代许多训诂的材料书，如《尔雅》《说文》之类，其中许多同义词往往是各处的方语，为了解这些同义词的来源，不得不从方言入手。

2. 如果古代的方言有失于记载的，我们应当从现代的方言里去找。

3. 见于古书的许多古方言的读法，需要借助现代方言的语音来证实。

4. 在意义上有许多古今可以互证的，现代方言对于解释古语的意义上很有帮助。

5. 研究古代的语法，可以用现代的方言来作出发点。

这样看来，现代方言的研究是十分切要的了。然而借今语以释古语的方法，古人应用的已经很多。今以郭璞注《尔雅》，段玉裁注《说文》作例。如《释诂》“阳予也”，注云：“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阳。”“瘵，瘼，病也”，注云：“今江东呼病曰瘵，东齐曰瘼。”“憐，怜，惠，爱也”，注云：“憐，韩郑语，今江东通呼为怜。”“契，绝也”，注云：“今江东呼刻断物为契断。”这是郭璞以后代方言注《尔雅》的例子。又《说文》卜部“斟，斟斟盛也，汝南名蚕盛曰斟。”段注云“此汝南方言也。今江苏俗语多云密斟斟，音如蛰。”㝱部“寣，卧惊也。”注云：“《广雅》曰：寣觉也，义相近。今江苏俗语曰睡一寣。”疒部“疥，搔也。”注云：“今四川语如此。”目部“瞟，瞭也。”注云：“今江苏俗语以目伺察曰瞟，音如瓢上声。”这是段氏以今方言注《说文》的例子。然而前人应用这种方法来疏证古语的并不普遍，我们现在应当充分地来利用。可是在材料的运用上，不能不讲求。我认为仅仅注意到现代的一二方言，随手来用，依然不可。未应用以前，需要有一番整理研究的工夫。因为前人之举今证古，往往是牵合而成的。一方面有一个古语，一方面有一个方语，方语所云是否即此古语，其中关系之深浅颇有可疑。所谓关系者，第一意义是相等，第二音声是否有关。我们知道方言中的语词时常有音无字，设若因为一个语词适与某古语的义类相若，且其声音与古语某字韵书的反切相近，即勉强牵合为一事，有时会有错误的。反过来说，假如我们细心考究过现代某语

实际的音值与古代某语的读音，在音韵演变的条例上说得通；在义类上应当是同一个语源；如此或可定谳。所以我们零散的知道一些方语是不够的，随便来应用解释古语，更有危险。最好先作一番深切有系统的研究，然后再说。

研究之始，首贵有翔实的记录。以往州县的志书里"风俗"一类有时也附记当地的语言，但多疏陋不备，只可作为参考的资料。此外清人间或也有记录一地方言的书——如毛奇龄《越语肯綮录》，胡文英《吴下方言考》之类。可是他们的目的，或在记录俗语俗字，稽考载籍，求其所本；或在证明他们的语音如何与古相合；但并非一种有系统的方言记载。真正合乎现代精神的，只有范寅的《越谚》。此书分为三卷，他把耳熟口习的俗语、名物、字音，都分类的记录下来。不拘泥文雅，不改避土音，确是难得。如果就材料来讲，可说是很翔实了。可惜为时代所限，他没有正确标音方法，所以非本地人无法揣测得清楚。至于后来章太炎所作的《新方言》，诚然是研究方言的一部奇书。他荟萃许多的方语，依据《尔雅》释诂、释言等的分类写出，而以古声韵为条贯，说出它们在语言史上转变的情形。取材精审，用心缜密，足与《文始》相表里；在研究的方法上，可谓尽其能事。然而也有可以商酌的地方。一则包括的地域过广，不能太细。如"吴楚""江南""闽广"一类的名词，在地理上的界画有些含混不清。名为"吴楚"，果为何县，何乡？同为"吴楚"，是否地理完全相同？我们以为扬雄的时代应用古地理名词已有不妥，当今之世放着今地理不用，而用古地理，更不合宜了。再则方言中的词字，有时没有确当的写法，约定俗成的通行字未始不可用。如果一定追求本字，刻舟求剑，终不免鼠璞之讥。何况在字源学上（etymological）语根（stem or root）的断定，并非易事，仅以声韵的相近相通做为断定的根据，有时必然似是而非。这都是受了前人所作《恒言录》《通俗编》好求出典的影响所致。因此尚待斟酌的地方也就多了。以往对于研究现代方言的成绩，不过

如此；范寅、章太炎自是其中翘楚。

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个新的方案，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1. 记录工作

(1) 分地录语，方音与方言并重。换句话说，除记录当地方言外，对于本地音韵的系统也要兼顾到，使方音与方言增加更多的联系性，二者不可偏奇不全。

(2) 记录方言，除文字之外，兼以国际音标注音。字音、语音、词汇之外，同时要记录语法和一般的语助词。

2. 研究工作

(1) 初步的研究：先由个别的研究作起，然后推衍到综合的研究。

(2) 历史的研究：由初步研究的结果，考其语源，以及音读意义之演变，作历史上的探讨。

其中记录的工作最关重要。然而应当如何着手，不得不先有一种粗疏的准备。如以地域而论，中国的领域如此宽广，我们应以自然地理的界划为范围，分区来考察。如以记录词汇而论，应先调查方音，然后再记录语汇。调查方音一方面，从前赵元任先生所编的几种表格，最为实用，记录语汇一方面，岑麒祥先生所编的《方言调查表》（1936 年中山大学所印），也很方便。其中分类录语，对于名物、语词、语法各方面都顾到了。不过二者可以合而为一，扩而充之，重新编定一个调查的底本，内容应当包括下列七部分：

1. 本地的音韵。声、韵、调三方面都简单的列举数百字，记录出读音来，以为考校方言语音的参考。

2. 事物的名词及代名词。此类宜求详尽。《越谚》卷中名物之属分类其广，如天地、人伦、神祇、鬼怪、疾病、身体、屋宇、器用、货物、饮食、服饰、禽兽、水族、虫豸、花草、竹木、瓜果、谷蔬、技艺、风俗之类皆是，颇可取法。

3. 形容的语词。属于《尔雅》释诂、释言、释训三类的语词，

在岑先生《方言调查表册》内这一类所占的地位太少，不妨加倍扩大。

4. 语助词。选择例句，包括各种不同的语法，并调查当地的语助词。

5. 特殊的词字。凡在语法上因意义或用法的不同而转变音读的语词，以及两字同音，单词双义之类属之。

6. 谚语。俗谚俚语，歇后语之类属之。

7. 短篇的故事及歌谣。这是附带的一种记录，目的在于补充前面调查之不足。歌谣对于考察俗文学也很重要。

这是一个简单的草案，虽然不甚完备，可是从调查方言的意义上讲，各方面都有了。

当我们有了这种详细的方言记录以后，才能谈到研究。研究有了初步的基础以后，对于古语的解释，自然增添了许多新的根据。这在研究汉语史上是必经的途径，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生机。如果仅仅步清人之后尘，仍旧由书本上去找办法，结果会有时而穷的。现在大家调查方音的成绩，已卓越可观；唯有对于方言的研究，刚在开始。我很希望多得几位同志之友，向这一方面努力，来实行调查方言的工作。

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重要意义[①]

汉语从很古的时代起就有方言的差异，声音既殊，词语也互有不同，直到现在各处语言仍有不同的差别。北方话流行的区域固然很广，但是各地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至于其他几个大的方言区域，如吴语、闽语、湘语、皖语、赣语、粤语、客家语等，语音、词汇、语法几方面都各有其特殊性，难以互相理解。就是属于闽语一系，闽北与闽南也不一致。

这些不同的方言，有的外国人认为是不同的语言，那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不同的方言的语法结构与普通话基本是一致的，语音系统都与中古音可以互相对照，词汇也不过是叫名儿和说法上间或不同，而基本词汇仍然是一致的，所以不能说是不同的语言。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地方方言会出现这些差异呢？这里将会有两种因素：(1) 汉语历史极为悠久，这些方言各有其发展的历史，由于时间先后不同，社会经济与地理风习不同，以致逐渐发生歧异。(2) 这些方言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不能没有融合的地方，有融合就会产生一些音的变化和增加一些特殊的词汇。既然汉语有这些不同的地方方言，为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加速社会各方面的建设，就必须大力推广普通话；并从事各地方言的研究；比较方言与普通话的异同；使全国人民都能以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语言。这是

①本文是1979年11月6日在湖北大学的演讲，周士琦1981年2月据录音整理而成。

极其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就普通话而论，它固然是从北方方言的基础发展起来的，试问我们对北方方言是不是有了全面的了解呢？那却不然。北方方言地区范围很大。北方几省在语音、词汇和构词法上都不是完全一致的，既有古语之遗，又有很多特殊的情况。例如陕西说“正南”就叫“端南”，山西有些地方还保存入声，晋南说“墙”叫“脂”，诸如此类，就很值得我们注意。北方方言里有不少语义鲜明，通行面较广，而为现代语词典所不收的词，应当搜集在一起，以丰富普通话的词汇。语言跟人的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每个人都应当注意语言的研究，特别是专门从事语言研究工作的人，更应当努力以赴。

在语言学里，方言学只是其中的一门，但在汉语各方面的研究工作中，方言的研究却极其重要。因为研究现代汉语方言，不单纯是为了便于推广普通话，从发展语言科学方面着想，还有更多的重要意义。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方面：

1. 有助于汉语历史的研究；

2. 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

3. 为编辑汉语大词典提供现代活语言的依据。

语言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包括：现代语的研究，历史的研究，本民族语与外族语言关系的研究，世界各种语言的结构和发展的研究等等。单就研究汉语来说，要从事历史的研究，首先要从了解现代语入手。现代语是通晓古代语的一个关键。尽管我们有极丰富的历史资料，但是单凭仗历史资料还是不够的。比如我们读古代的散文，所以能够读得懂，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现代语的基础作凭藉。尽管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过很多变迁，可是基本词汇和主要的语法结构依然不变。因此，古语与今语是相联系着的。不知今就不能知古。惟其能相互比较，即同以求异，才能由今语以通古语。要研究汉语的历史，就要研究现代的方言。

现代的方言都是从古代语经历不同的时期分化发展而来的。语言分化出不同的方言，是与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变动、人民活动的范围、社会经济的往来等各方面相联系着的。方言的本身，自有其发展的历史，但在不同方面都会保留着不少古代语所有的东西。也许某些方言保留的比较多一些，而另一些方言保留的少一些。情况虽有不同，但都是同一种语言的分支。所以，或据今以证古，或据古以通今，都要对今日的方言有充分的全面了解。

就以语音而论，清代的江永和陈澧二人所以能通晓《广韵》的声韵系统和宋人的"字母""等韵"之学，这跟他们自己的方音中保留的古音成分比较多有关系。江永是婺源人，陈澧是番禺人。婺源旧属徽州，今在江西东北，与浙江接近；番禺即广州。两地辨音最细，都有入声。现在我们能进一步理解《切韵》音系的读音，也正是借重于现代各地的方音。清人钱大昕讲《舌头类隔之说不可信》，是根据历史的资料获得的结论，而我们现在又能进一步从闽南方言中找到可靠的根据以与历史资料相证验。这都是据今可以证古的明显事例。又古人分别汉字声调为四，即平上去入，实际的调值我们已经不知道。现代方言读字，音调各异，四声分别阴阳，清声母读阴调，声母与调类发生关系。这件事一定起源很早。今日方言的读音，在调类上可以与韵书所注字音的清浊相应照。这就是可以据古以证今。

谈到词汇和语法也是如此。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远在汉代扬雄作《方言》时就已经注意到了。他觉察到要了解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些词语的意义，应当从实际存在于方言中的词去探讨。因而他记录了很多不同方言的词语，分别词义的异同，辨别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哪些是汉代当时的通语、哪些是方言，哪些是古雅的别语。根据这样的记录，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古与今的关系，方言与通语的关系和语词在方言中声韵转变的关系。后来晋代的郭璞为《方言》作注，又兼录不少晋代的方言词语，并且特别注出读音，古今相互比

证，为词汇的研究创通了一条新路。可惜后来没有更突出并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著作出现。

词汇是随时代而不断发展的，不用的旧词逐渐消亡，而又陆续产生新词。可是我们从书本上见到的词汇有些不太理解，往往以为是已经消失了的旧词，其实在现代的方言里可能依然存在。很多是由于汉字的障碍使我们不能理解。因为古人写出来的字跟我们现在写的字不同。加之古人没有拼音符号作工具来注音，所注的反切用今音读又跟现代口语的读音不同，这样也就容易被我们误认为是已经死去的词了。

词汇方面的问题很复杂。要明了古人应用过的词语的涵义，例如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字书、韵书中所记载的一些双音词和宋元明小说戏曲中所出现的一些特殊词，恐怕不能不从现代方言里去找。要了解汉语词汇发展的全貌，特别是构词法，更不能抛开方言而不顾。所以我认为研究现代方言的词汇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还很少。过去西方的传教士虽然写过一些关于汉语地方方言的书，如上海、厦门、四川、内蒙等地方言，但是缺乏现代语言学的知识，价值不大，尤其是与汉语历史的研究无关。

研究词汇，不能局限于记录一地一处的方言，最重要的是应作主要地区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发展语言科学，同时对丰富文学作品的语言也会有所裨益。文字写得简洁、生动、准确，是要有足够的语言修养的，但是在用词上也会随体裁的不同而有差别。例如小说、剧本是不是在纯洁、健康而又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下用一些方言词语呢？怎样取舍，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另外，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对于了解社会发展和人民迁徙的历史也是有帮助的。例如大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从公元3世纪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推移，语言的交错往来非常频繁。今天有些不同区域的方言所用的词汇彼此很接近，由此可以看出在历史上人

民活动的情况。像江西的西南部吉安、泰和、赣州一带；湖南的南部衡阳以南和四川的南部，有些地方的词汇特别接近，这与商业经济有关系。这种现象当然不是一代两代的问题。为什么如此，就需要探讨。

关于语音、词汇我们说了一些，下面说一说语法。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东西，可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语法也有改变，尽管很迟缓。现代方言的语法结构可以说基本上都跟古代语法相近，而闽语和粤语保留的古汉语的文语成分更多一些，可以跟文言语法相印证。自《马氏文通》以来，学者对于古代文言语法的研究已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对于古代语体文的语法研究还没有展开。例如唐、宋僧人的语录和宋代程朱学派的语录，必然与口语比较接近，但有些句法、虚词、语助等跟现代普通话就颇有不同；猜想在现代南方方言里不能没有遗迹可寻。因为我们知道，在某一时期之内，表示同一意念时，常有两种平行的不同语法形式，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择，一种行开了，另一种不用了，而在后代的方言中也许还有其遗迹。所以我们能广泛地研究现代方言的语法还是必要的，从中我们还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因此，要从事汉语历史的研究，就必须以书本的资料与实际方言中的资料相结合，才能有更大的成就。

就目前情况来看，近 50 年来，我们虽然有了一些极有贡献的关于现代方言的论述和极有价值的十几种方言的调查报告，可是大都侧重于语音的描写或历史音韵的对比，在词汇和语法方面还缺乏专门的著述。全中国还有很多方言一直没有接触到。就以北方话而论，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做过详尽的调查。虽然对陕西、山西、河北、福建的个别地点有过一些精细的研究，可是我们还应当扩大范围，做全国各省普遍的调查研究。不同的省分在语言中不仅会保留很多古语成分，而且方言土语中还会或多或少保留一些从外族语言借来的语词。有些方言还具有构词上的特别附加成分，都值得我们

注意。

总之，研究现代个别地区或地点的方言是一项基本的工作，但同时还必须在个别地区或地点方言研究的基础上做全面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在综合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语音转换的规律和构词的多种方式；还可以从语言的共同点上去看过去人民往来的踪迹和方言与方言融合或分化的历史。这些都有助于理解汉语发展的历史。

经过全面的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综合研究之后，我们的知识面扩大了，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增多了，必然可以促使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向前跨进一大步。既能给历史的研究以直接参证资料，又可以明确指出现代汉语方言的体系，画出方言地图，以利于推广普通话。毫无疑问，推广普通话和方言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同时，由于有了新的历史研究跟平面研究两方面的丰富成果，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会有多方面的贡献。如语言的分化与统一，语言的融合，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方言的形成及其与社会、经济、政治、地理、人民活动的关系，语音转换的一般规律，语词和语义的发展，语法从分歧到集中，从简单到繁复的过程等等。

另外，从目前我们编辑词典的实际工作出发，现代方言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编纂的是一部现代语的词典，就有一个对方言词汇的处理问题和汉字应当怎样写的问题。谈到现代汉语，自然不能舍去方言不论。为适应语言研究的需要，方言词典仍然是要编的。编辑方言词典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书本材料的积累，一是进行实际的调查。以前各地还有些本地的字书和杂字书，一向不为人所重视，现在都应当尽力搜集在一起。搜集资料，在编辑字典和词典的工作中极为重要。资料不完备，挂一漏万，固不允许，就是偏畸不全，也难以使用。书本的资料已全，还要进行实际调查，辨音辨义，用科学方法加以编录整理。对旧日书本的资料还要分别古今，有所取舍，不宜兼包并蓄。

还有，我们从事现代方言的研究，在编辑历史大字典和大词典时就可以利用方言把字义和词义解释得更明确些。清代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就在这方面很用心。近代章炳麟著《新方言》，着重于通古今之语，以今方言释古语词。其中有些解释比较好，有些泛用声音通转，则不免近于牵强附会。不过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我相信在有了方言词典以后，我们会精进一步。

广泛地进行汉语方言调查工作既然有此必要，现在就应当及时去做。因为语言是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着的。社会的经济、文化不断有所改变，方言也在不断消失，所以必须及早着手才行。从事语言研究工作的人必然都体会到研究方言的重要意义。调查方言也是了解有关语言的全面知识的最好门径。一个语言工作者不从事实际语言的调查研究，是不会理解语言的全貌的，也不可能学好语言学。古人说："譬如为山，成于一篑。"如果我们能有步骤地去调查各地方言，期之三年，必有所成。我国的语言科学必将有新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词　典　学[1]

词典是学习知识的工具书，但编纂词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编得正确而且适合需要，便于使用，既要有全面的专业知识，又要有正确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因此词典学就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研究编纂词典的问题。从体例到解释词语，所要研讨的问题很多。

通常应用最广的词典是普通的语文词典，它应当包括语言词汇中的所有通用的单词和常用的成语。汉字的字典和词典以前几乎都是按照部首偏旁来排的，同一个部首偏旁的字又按笔画多少来排，编排和检查都不够方便，所以现在一般都采取按音排列，另附按汉字笔画或部首偏旁的索引。知道读音的，就可以按音检字，不知道字怎样读的，可以利用汉字索引去寻检。

词典是关于语言词汇知识的全部描述。它不仅给人以知识，同时对语言的运用也有示以规范的作用。对字的写法、词的读音、语义、词在语法上的词性以及用法等都应当展现得很清楚。

编纂词典最繁难的部分自然是解释词义和分析词义。解释词义，既要正确，又要简当清楚，避免模棱含混。意义相关和相近的词必须互相照应，使读者能充分理解。在可能范围内应当避免互训。如果一个词具有几个意义，那就要做细致的分析。考察哪个意

①本文写于1987年6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义是原义，或是比较早的意义，哪些意义是后起的意义，哪些意义是常见的，哪些意义是比较少见的，意义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怎样才能把一些不同的意义明确而有条理地解说清楚，这些都需要仔细研究。既要善于分析，又要善于综合。既不能把每个意义孤立地看待，也不能把不相关的意义混淆不分。所以必须处理得当。

一般的词典在安排多义词的意义时，通常是把基本的或是常用的意义先列在前面，而把引申的或特殊的意义放在后面。如果是历史性的词典，就要依意义发展的先后来排列了。不过，相关的意义必须相连在一起，这样才不致于散漫而无条理。

词典不仅要用简洁的词句说明一个词的意义，还要用恰当的例子表明词的用法。我们只有理解一个词的用法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的意义。词的用法包括词与词搭配的关系，词的使用范围和词的修辞色彩等等。这些都是词典中必须具备的。所以编纂词典的工作是语言各方面知识的具体应用。编纂词典的人既要具备语言学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同时还要有比较高的语文修养。否则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果。

编纂词典是一项极繁重的工作。从汇集语词，选择例句，逐条讲解，直到编纂成书，要经过许多工序。编辑词典本身就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词典学也就逐渐成为一门有系统的科学。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语言词典除了普通词典以外，还须要有正音词典，同义词词典，成语词典，方言词典，外来语词典，语源词典和语言各科专门术语的词典。不同的词典因内容不同，在体例和编排上又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求正确，其次是详明，使读者能从中获得必要的知识。

"伍记"与《新华字典》①

我们当代最通行的一本小型字典是《新华字典》。这本小字典的编纂计划和体例的拟定有一段故事，这就是这里要说的"伍记"。

话要从头说起。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 年之秋，许多先生先后返回北京，会面相聚的机会逐渐多起来了。乱后相逢，心情欢畅，话是说不完的，同时又深深感到八年人事倥偬，忽忽而过，而今可以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多做些确实有意义的事了。

一次，在魏建功先生座上，燕谈之余，讲到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并涉及到字典的问题。深切感觉字典对开发知识、提高文化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需要编一本新型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字典。当时我们所谓的新型，意思在于破除以往只注重文字，不重视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弊病。本着这个意思，就想试编一种小型的字典为中小学生应用。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做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谈话之间，仿佛一个新的试验工作将要开始了，心情十分振奋。如果真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那是十分愉快的。

要做，首先要多约几位同道讨论一下编纂的体例和有关的问题，于是魏先生就约了金克木、吴晓铃、张建木三位先生和我在魏先生家里交换意见。第一次相聚是星期五，一谈就是一个上午。几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不妨先编一本小的，以后再扩大编

---

①本文写于 1983 年 3 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1 月出版。

一本中型的。这一天所谈涉及到的范围很广，对收字、注音、释义以及编排的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设想。大家兴趣很浓，就决定每星期五上午在魏先生家把具体问题一项一项的进行讨论。五月间北京的天气已经热起来了，我们四个人都能准时到达，从未间断，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

魏先生的寓所在北京朝阳门内东四牌楼大街，街道很宽。由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路边人行道上就是出售鱼肉蔬菜日用杂项的集市，每日上午人声喧阗，熙熙攘攘，行商坐贩，比列成行。其中有为人搬家或运货的，两三个人有一辆排子车放在路边，等候主顾，名为"脚行"。如果姓王，就挂着"王记脚行"的牌子。我们五个人要编一本字典，叫什么名字呢？那时候没有什么"小组"的名称，可能是魏先生想到了门外有"王记脚行"的名字，笑着说："啊！我们五个人不就是'伍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伍记小字典'好喽！"这当然是一句笑话，可是"伍记"就跟后来的《新华字典》联系起来了。

我们"伍记"这几个人都是研究语言学的，谈话三句不离本行。魏先生是长辈，我们年纪轻的人都喜欢跟魏先生在一起讨论学问。为了编字典，经过几次讨论以后，初步拟出一些条例来。回忆起来，约有以下几项：

1. 以前所出的小字典都是按《康熙字典》214部首编排的，只有《国音常用字汇》是按注音字母的次第来排的。我们要新编一本，一定要采取音序的排列法，另附部首检字。部首也可以稍有改变。

2. 收字数量，根据现在常用的程度来看，可在5 000到6 000之间。有些联绵词应当作一个条目出现。第二个字可以采取"参见"的方式注明。注音就以《国音常用字汇》为准。

3. 释义方面的问题较多。我们确定了几项原则：（1）解释用语体，意思要明确，尽量不用互训的方法；（2）一词多义的，可以

把通常的意义列在前面，不常用的列在后面；（3）解释的后面要举例，把常用的词语列在解释的后面。可以是词，也可以是成语或短句。有些需要联系语法作解释；（4）词语的解释会涉及意义发展的问题。有些词义是由一个较早的意义引申出来的，有的是出于比喻而来的。在释义中可以注明“引申义”或“比喻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由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意义，那就不妨立一个“转义”的名称。这也是清人讲训诂时常用的称谓。

4. 字头要用楷体字，不用老铅字，以便于中小学学生学习字的写法，免得写出那种四不像的美术字。

5. 从便于中小学学生理解词义出发，有些名物应当附以插图。

定了这些基本原则以后，魏先生试着编了几个字，作为一个编写的模式。但是后来大家都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着手再进行。所谓“伍记”云者，也就散伙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先生敦请魏先生主持编写一本字典，并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命名为“新华辞书社”。辞书社只有四五位编纂人员。在魏先生主持下，积极努力，编成《新华字典》初稿，油印若干册，送请有关的先生们征求意见。最后，又经过一次修订，以“新华辞书社”的名称印发了第一版。这一版基本上都是按照“伍记”所拟的原则付诸实施的。

1962 年《新华字典》修订过一次。1965 年又修订重排过，字体改换了像前代一种活字版体，跟原来用楷体的意思不同了，实际并不好看。学生如果照猫画虎，笔下永远写不好。插图也被取消了，这也跟原意不合。原版的插图不太好，是真的；但应当设法改进，不宜取消。很多人不以为然，这里就不必多谈了。

《新华字典》的出版标志着字典的一项革新，对推进语文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魏先生是这本字典的主编者，同时也是一字一字的审定者。从起始酝酿直到编成，得到出版，经过有十年之久，是他精力所萃，而知道的人并不多。不

幸魏先生于去年逝世，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损失。因为“伍记”是他倡导的，工作是他作的，这段故事和事实不能无记，所以略述梗概，为关心辞书编写情况的人作参考。

中国辞典学发展史[①]

辞典和字典的编纂在中国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早在汉代就有了训诂书和字书。《尔雅》是一部训诂书，分别训释古籍中的词语和草木鸟兽虫鱼的名称，这就是最早的一部词典。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字书，按部首编排文字，说明字的形音义，成为后世字书编排的一贯格式。到魏晋以后，又有韵书出现，依韵列字，指明音义，成为一种按音排列的字书。这三种类型奠定了中国辞典字典的编排体式。

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三种不同格式的书又互相影响。训诂书没有注音的，就需要加注字音；字书中一字数音数义的就需要增加音义；韵书也要照顾到字体的正俗和义训的繁衍。因此，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书都要形音义三者兼顾，才便于应用。如汉樊光、李巡，晋郭璞都为《尔雅》作音，隋曹宪为《广雅》作音，《说文》以后，《字林》《玉篇》音义加详，《切韵》《广韵》以后，义训不断增多，都是取于便用。形音义三者兼顾，这是辞典、字典发展的必然趋势。

古代的辞书、字典随时增多。这跟语言的不断发展和实际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不但词汇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日益加多，而且文字的形体也不断有增省变易，词的含义也有改变和引申。因此辞书和字书屡有新编，其内容和解词的方

---

①本文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平田昌司先生之约为《均社论丛》创刊十周年纪念而作；载京都1984年12月《均社论丛》十五号1—4页。

式也各有不同。大体来说，从汉末到隋唐就有以下几种情形：

1. 分事类或义类解释相关的词。如：

汉末服虔《通俗文》：容丽曰媌，形美曰婧，容媚曰婠，南楚以好为娃，肥骨柔弱曰婐娜，颊妍美曰娧媚，容茂曰姀（《御览》三八一）。不媚曰嫱，可恶曰娢，大醜曰奃，醜称曰娭（《御览》三八二）。合绳曰纠，单展曰纫，织绳曰辫，大绳曰絙（《御览》七六六）。鱼臭曰腥，猴臭曰臊（玄应《一切经音义》一"腥臊"下引）。鸟居曰巢，兽居曰窟（玄应《音义》八"巢窟"下引）。

刘宋何承天《纂文》：梁州以豕为猪，河南谓之彘，吴越谓之豨（《初学记》二九）。牛羊无角谓之牤，牛羊角长谓之犄（《初学记》二九）。在上曰帐，旁曰帷，四合象宫殿谓之幄也（慧苑《华严音义》上"吉祥幄"下引）。

唐张戬《集训》：有底曰囊，无底曰橐；大曰囊，小曰橐；皆盛物具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六"浮囊"下引）。

2. 采摭诗文中相关的词语类聚在一起。如：

梁元帝《纂要》：春曰青阳，亦曰发生、芳春、青春、阳春、三春、九春。时曰良时、嘉时、芳时（《初学记》三）

3. 解释事物的异名。如：

唐释远年《兼名苑》：石灰一名垩灰，烧青白石成熟，冷竟浇之碎成灰也（源顺《倭名类聚钞》（十卷本）三"石灰"下引）。天河一名天汉（《倭名类聚钞》一"天河"下引）。流星一曰奔星（《倭名类聚钞》一"流星"下引）。细雨一名霢霂（《倭名类聚钞》一"霢霂"下引）。盂一名卮（《倭名类聚钞》四"盂盏"下引）。第一名簟（《倭名类聚钞》四"箕附第"下引）。

4. 解释语言中的双音词。如：

《通俗文》：言不通利，谓这謇吃（玄应《音义》一"謇

吃”下引)。曲脊谓之伛偻(玄应《音义》二“背偻”下引)。淅米谓之洮汰(玄应《音义》七“洮汰”下引)。除物曰摒挡(玄应《音义》一五“摒挡”下引)。金银镂饰器谓之错镂(《御览》七五六)。理乱谓之撩理(玄应《音义》一四“撩理”下引)。

《古今正字》:矇莽,不明皃也(慧琳《音义》九九“矇朗”下引)。宋寥,音深远,无人声也(慧琳《音义》四一“寂寥”下引)。

5. 说明物之所用。如:

《通俗文》:所以理发谓之刷(《御览》七一四)。张帛避雨谓之伞盖(《御览》七〇二)。

这些都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语言的丰富性,不仅注意到文语词,而且注意到方言和日常的俗语,能从实际使用出发,采取一种综合解说的形式来解释词义。这种比附义近的、反义的、同物异名的、事物相类的词语在一起予以解说,在中国辞典学的发展中树立了一种新的格式,给综合性的类书提供了极好的解词的资料。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语言学史时不可忽略的。

辞典和字典的注释贵于详实明晰。梁代顾野王的《玉篇》能详列义训,而且兼引书传文字为证,有凭有据,在辞典方面别开生面,给后日的韵书、字典创立了一种新的格式,这是值得称述的。不过,《玉篇》书中的训解主要采自前代书传的旧注,解释还不够明晰;并且对词义的引申和通常使用的意义也有所不备,不免美中不足。可是到隋唐以后,字书和韵书的解释就不同了。一则由简单趋于繁富,一则由笼统而趋向明晰。这是辞书、字典在释义方面进一步发展的新趋势。例如:

挹 《说文》十二上:抒也。

《玉篇》:诗曰不可以挹酒浆。挹,𣂏也。

隋诸葛颖《桂苑珠丛》:凡以器𣂏于水谓挹

(慧苑《华严音义》上“悒”下引)。

覲 《说文》八下：诸侯秋朝曰覲劳王事。

《玉篇》：见也。

《桂苑珠丛》：覲谓就见尊老也(慧苑《华严音义》上“覲谒”下引)。

缮 《说文》十三上：补也。

《玉篇》：补也，善也，持也。

《桂苑珠丛》：凡治故造新皆谓之缮也(慧苑《华严音义》上“缮”下引)。

冀 《说文》八上：北方州也。

《玉篇》：冀州也。北方州故从北。

《桂苑珠丛》：冀谓心有所希求也(慧苑《华严音义》上“冀望”下引)。

某 《说文》六上：酸果也。

《玉篇》：莫回切，酸果也。又音母，不知名者云某。

《桂苑珠丛》：未有的名而虚设之曰某(慧琳《音义》六四“某摽”下引)。

机 《说文》六上：主发谓之机。

《玉篇》：弩牙也。

《桂苑珠丛》：机谓制动转之关键也(慧琳《音义》三三“机关”下引)。

编 《说文》十三上：次简也。

《玉篇》：织也，绳编以次物也，连也。

《桂苑珠丛》：取物交织谓之编也(慧苑《华严音义》下“编草”下引)。

片 《说文》七上：判木也。

《玉篇》：半也，判也，开拆也。

唐释氏(弘演)《切韵》：半也。薄物曰片，不全曰片

(穗久迩文库本《五行大义》一背记引)。

二 《说文》十三下：地之数也。

《玉篇》：《说文》曰：地之数也。《易》曰：天一地二。

释氏《切韵》：一三之间也（《妙法莲华经释文》上引)。

胶 《说文》四下：昵也。作之以皮。

《玉篇》：胶者，《考工记》注云：皆谓煮用其皮，或用角。

释氏《切韵》：粘物煮皮角为之（《妙法莲华经释文》上引)。

浦 《说文》十一上：濒也。

《玉篇》：水源枝注江海边曰浦。

无名氏《四声字苑》：大川旁曲渚，船隐风所也（《倭名类聚钞》一“浦”下引)。

厅 《玉篇》：客厨。

《四声字苑》：延宾屋。又衙厅也（《倭名类聚钞》三“厅”下引)。

帆 《玉篇》：船上帆。

《四声字苑》：风衣也。船上挂樯上取风进船幔也（《倭名类聚钞》三“帆”下引)。

由上可知前代解词之书不仅释词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且有意识地注重内容的实用性，解释的词语也由笼统而趋向明晰。编排的方法，或按事类，或按部首，或按韵部，不拘一格。但根据习惯和汉字的特点，按照部首排列文字的方法一直相承应用。《说文》分部首为540部，《玉篇》分为542部。自明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有所并合，定部首为214部以后，到清代编《康熙字典》的时候就因承不改了。

近三十年中国语文词典编纂法的发展①

词典和字典是学习和工作必备的工具书。随着社会学术文化的日益发展，人们对词典和字典的需要也愈加迫切。不同的学科固然要有不同的专科词典，而一般应用的语文词典和字典尤为需要。

语文词典和字典的编纂不应当是陈陈相因的。在对于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在词汇学（Lexicology）和语义学（Semantics）有了新的进展的情况下，语文词典和字典的编纂必然会有新的面貌出现。近30年来中国的语言科学各个部门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汉语历史的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词汇和语法的研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等等都有许多重要的专著出现。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识的增长使词典和字典的编纂日趋美备。在研讨编纂符合实际需要的词典和字典的过程中，科学的词典学（Lexicography）也就逐渐建立起来。

为了说明近30年来中国辞典编纂的发展，须要回顾一下以前辞典的情况。

过去我们经常应用的两部辞典，一部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一部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辞源》是1915年印出第一版的。这在当时是一部首创的新型辞书，对发展我国文化起了极大

①本文写于1982年7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的作用。编者深感以往只有字书而无辞书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以单字为纲，单字下叙列“复词”，兼收古今词语和各种学科名词术语，具有百科辞典的性质，这样就把字书和辞书合为一体，在辞书史上别开生面。在解释方面，编者特别注意求其实用，不仅收录旧日书籍中的训释，还举出一般通行的意义。如“俗”字下的解释有：“一风俗也；二不雅曰俗。”另外也兼顾一部分词性的改变与词义引申发展的关系。如“俘虏”一词解释为“获也，谓为敌军所得也。今亦作名词用，所获之敌人皆谓之俘虏。”这是以前辞书里所没有的。

《辞源》强调各方面的实用性正是一大特点。其缺点主要是单字的音义与单字下所列的“复词”中的单字音义不能呼应，而且所引书证未能详注出处，甚至有错误，还不够完善。

后来，1936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辞海》，虽然也是百科性的辞典，但收词范围扩大，而又注意选择，于 50 万条目之中采录 10 万余条，凡是极易懂的词语一概不收。引书都详注书名篇名。一词多义，在分别义项时，侧重综合，避免繁琐。关于名物，前人解说不同，则一一详加考证，并附加按语。这些又比《辞源》提高了一步。

40 年代还有人编纂过专门汇集联绵字和异体词的书，如《联绵字典》《辞通》之类，虽然不无缺点，但内容丰富，对研究古书中的词语也有一定的用处。另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小字典、小词典以及成语词典等等。

近 30 年来，由于广大的语文工作者对语言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词典、字典的编纂有了很大的发展，种类日益增多。现在，小型的字典已有好几种，如《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学文化字典》等，中型的汉语词典已出版的也有好几种，如《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此外还有《汉语成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为了适应小学的语文教育，还

有已出版和正在编纂的小学生字典。除一般的词典、字典以外，还有同义词词典、方言词典、外来语词典之类都将相继出版。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典也已编出多种并在持续编纂出版之中。词典、字典种类的增多，标志着我国文化在蓬勃不断地发展。

现在《辞源》《辞海》又进行了修订，《辞源》以解释古书的词语为主，《辞海》是部综合性辞书，以解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词语和较常见的语词词语为主。这种修订实际等于重编，词条既不相同，体例也有改变，跟旧版已大不一样了。目前正在进行编纂《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古今兼顾，源流并重，利用已有的语文研究成果，会有更大的成就。

在不同种类的词典和字典的编纂实践中，编者一方面继承了以往辞书编纂法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对词典的目的要求以及编纂的方法和应当努力的方向都有了不少新的理解和认识，从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为科学的理论。中国的词典学必将建立起来成为一门有理论、有系统的专门学科。

从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一些字典和词典来看，普及的与提高的两种都同样被重视，而且既要有关于现代语的，也还要有关于古代语的；既要有普通一般性的，也还要有专属某一方面的（如方言的、外来语的）。这是总的方向。就词典中收词方面来说，要根据服务的对象，注意知识性、实用性、规范性；而在解释方面特别注意逻辑性、科学性、准确性——这些已经成为通常的准则。最大的改变，一是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注音，二是解释的文句尽量用语体。中小型的词典、字典，大多按音序排列，另附部首检字。

从编纂的体例和方法来看，现在出版的辞书跟以往的辞书大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分别同字异语。文字在使用中有同一个字代表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音词的现象，如“花”字、“打”字，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同字异语”。近些年来所出的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对这种同

一个字而代表几个不同的语词的，大都分别为不同的词条处理，这在语言教学上有很大的作用。

2. 分清单字在复词中的读音。以往的辞书只在单字下注音，复词下概不注音；如果一个单字有几个读音，单字后面所领的复词应当采取哪一个读音，并未注出。如“蔓”有 màn、mán、wàn 三个音，“蔓草”音 màn，“蔓菁”音 mán，“瓜蔓”音 wàn，旧版《辞源》“蔓菁”下就没注音。旧的《辞海》在这方面也没有注意。可是现在新版的《辞源》和《辞海》这两部书在音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安排。《辞源》在单字下分列一字的音义，标出 1，2，在复词中读第 2 个音的就在字的右下方标出 2 字。新的《辞海》索性就把读第 2 个读音的注出来。如“兴”有 xīng、xìng 两个音，“兴味”“兴致”都注出读 xìng。《辞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收的复词或成语中凡有异读的字，都一一加注汉语拼音，例如“无宁”的“宁”注出 nìng 的音，“款识”的“识”注出 zhì 的音。所有这些都是很大的改进①。我们知道音与义是相关的，把音读错，别人听了就会产生误解。如“发行”有两音，fāxíng 与 fāháng，意义不同，不能相混。

3. 词义的分析趋于细致。汉语里一个词在使用上可能有多种意义，有的因词性不同而意义有差别。在词典里应当分为不同的义项，并注明词性。这件事已经有人注意到。另外，以前的词典注释词义，多取自旧日的字书、韵书和训诂书，不免陈陈相因，失之于笼统。现在已趋向于细致。对于虚词，吸取前人研究的成果，辨析尤为详尽。例如“以”字作为介词，《辞源》旧版解释极少，而新的修订本就列举了七种意义：

①把，拿。《左传·僖二十三年》：“子犯以璧授公子。”

②在，于。《左传·桓二年》：“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

---

①《辞源》也应该这样做。

条之役生太子。"

③从。《汉书》九十五《西南夷传》："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

④向。《仪礼·乡射礼》："主人以宾揖先入。"

⑤因为。《论语·卫灵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⑥跟，同。《诗·邶风·击鼓》："不我以归。"

⑦按，依照。《书·洪范》："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

这样的分别异同，给予解释，对读者理解古书中"以"字的意义和用法便利多多，我们不能不感谢编者用意之善。

一个词有多少意义，要看是否掌握了足够的语言资料。有足够的资料才便于分析综合。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广泛搜集资料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要确定词义，应以语词在实际使用的意义为准，一些古语词要根据语词出处的上下文以断定其含义，这是极大的进步。

4. 解释词义侧重应用明确的解说方式。解释词义要做到准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人多用互训和解为"某也""某貌"的方式。现在一般都避免互训，而采用意义极相近的词语来加以解释。例如"淳朴"解释为"诚实朴素"，"凌乱"解释为"不整齐；没有秩序"。最值得重视的是用科学的解释方式来说明词义。例如"夹"这样一个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从两个相对的方面加压力，使物体固定不动。"又如"感动"一个词的解释是："思想感情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激动，引起同情或向慕。"有时还指出词义所应用的场合或语词使用的范围。例如：

〔进修〕为了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而进一步学习（多指暂时离开职位，参加一定的学习组织）。

〔浓厚〕（色彩、意识、气氛）重。

〔即使〕连词，表示假设的让步。注意：即使所表示的条

件，可以是尚未实现的事情，也可以是与既成事实相反的事情。

〔乖戾〕（性情、言语、行为）别扭，不合情理。

〔不但〕连词，用在表示递进的复句的上半句里，下半句里通常有连词“而且、并且”或副词“也、还”等相呼应。

这些都表现出对解词释义的新的要求。

5. 重视词义的发展变化。词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语义是有发展变化的。自《新华字典》开始分辨词义的引申、比喻和转化，在教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所出的词典，对多义词义项的排列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通常应用的意义列前，不常用的意义列后；另一种是以本义或较早的意义列前，引申义、比喻义、通假义列后。新的《辞源》修订本对古词语的意义演变特别注意，不同义项的安排就采用第二种方式。这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到词义发展的源流，而且给研究语义学的人提供了资料。不过，讲到意义的引申、比喻和通假也还有一个时代早晚的问题，要能安排得好，还是不容易的。

6. 注意例词、例句的选择和释义的书证与参阅资料的选定。词典里在解释词义时经常要举一些例词和例句，以为释义的补充。在现代语的词典和字典里，所举的例词和例句特别注意词语的规范性和词在语句中的实际用法。在解释古语词的词典里所引用的书证就特别注意选用时代最早的出处，而词的解释也是根据实际的例子概括出来的。新的《辞源》修订本有时还在解释词义之后，根据需要适当地为读者提出可以参阅的书籍和篇目。有了这种提示，读者可以据此推寻原委，增加知识，求得进一步的理解。这是以前的词典中所少见的。以前编纂辞书的人虽然博览群书，参合比证，然后有所折衷，可是不立“参阅”一项，读者也很难理解其甘苦，甚至不免有“鸳鸯绣了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之感。现在采用了注出“参阅”的方式是值得称赞的。

以上六项都充分表现出近30年来中国在语文词典编纂史上取得了新的成果。任何学科的发展总是要在有广泛的探讨和研究的基础上随时代的需要而前进的。中国的辞书事业必将随着语言问题研究的扩大和深入而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突出特色和确保质量①

编纂《汉语大词典》这样一部大型语文词典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经过编写人、编委、主编和各有关方面同志的共同努力，已取得很大成绩，将要编写完成了。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这部词典从总的方面来看要以什么样式出现呢？由选词、释义、注音、编排一直到插图、版式等等，都值得考虑。还有我们要不要站得高一点，考虑一下我们所完成的部分的特色在哪里，不足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呢？我觉得自己发掘出来问题是什么，要比别人替你去发掘好得多。犹如写文章，与其别人给我们改，不如自己去改。自己改的过程中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写出来的东西质量更高。

从我所看到过的《汉语大词典》的一部分初稿，我觉得这部大词典很有特色。像收词条日多、义项分析细致等。但我想还可以提出几点应有的特色来，这就是：（1）资料都是第一手材料，并经过核对。（2）词条编排有序，安排有革新。（3）释义准确，不强解，义项比次有序。（4）书证详而不杂。我们要特别强调质量：不许有常识性的错误，收词和释义的文句要注意规范性。

因为我想到应有的这几点特色，我就根据我所看到的那些部分提一些肤浅的意见。

1. 部首可以归并，但不可随便增加。部首为便于检查，可以

---

①周祖谟先生是《汉语大词典》的学术顾问，本文是他于1983年9月在厦门召开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有所归并，有些字形体容易安排在一起。少数字给它们另立一个部首，就破坏了传统，是不了解文字学的表现. 像增加的“卓、业”两部就都不妥，因为字数都不多。

2. 多音单字的字头同下面所列的复词（或成语、熟语）应当有一种合理的可行的排列方法。例如“屏”字有 píng，bǐng，bīng，bìng，四个字头依次排列，注上 1，2，3，4。下面所收复词不管读 1、读 2、读 3、读 4 都杂列在一起。我建议这些复词分别列在不同的四个字头之下。这就是“编排有序”，如果做得到是一大革新，也是一大特色。

3. 不同义的词条、不能牵合在一起，列为同一词条。如“【正当】①（—dāng）合理合法。②（—dàng）正处在。”②与①不同，同时也不是一个词。

4. 收词要注意规范，不能因为见于重要作家的作品就不讲求。也不能把偶有的一种变式说法不加考虑而滥收。如：拙涩，振刷，出惊，懦怯，素朴，目牛无全，建瓴高屋；“片帮”属行业语，也可以不收。

5. 注音条例中《集韵》韵目采用其古字或隶定写法大可不必。书证旧注中有音切的要引音切，不引音切如何可以确定今音？一字两切的宜参考《经典释文》、贾昌朝《群经音辨》。梵语原文要注意，不要走样。

6. 释义要考虑准确。如：“一”第二个义项“序数的首位（第一位）。”首位不大合适，为什么不干脆说“第一位”呢？还有个解释“某个”。它不是某个，而是某一个。不要避免上面字头。还有一个义项“另一，又”，“又”可以取消。

“中流”，“社会中流人物”，释义“犹中坚”。这个中流指中坚，我不大了解，不能由你的意思猜想，中流者，社会上不偏不倚的人。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我们的想法、说法。

“中间”（三）（—xián）闲暇。引《汉书·文帝纪》中唐颜师古

注。这里不能训“闲暇”。应理解为留出空档。

“正当”③引《水浒传》，释“妥贴停当”，不妥。原文应理解为“依理你嫂嫂坐着，我去荡酒才对。”在释义上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没有很好的考虑；其次，随便给古人作解释，这种思想一定要去掉，这是不可以的。例如说“杜甫曾居少陵”，这闻所未闻，杜甫向来没住过少陵这地方，先世曾住过那里。

“般若”下释“为表示有别于一般所指的智慧,故用音译”。不妥。

“欧$_3$爵”释“驱赶麻雀。”不一定指麻雀，雀者小鸟也。

7. 引文中人名不易了解的。如引《新唐书·李逢吉传》，其中“度”指裴度。可否在度前用括号标出姓？

8. 引书不要贪多，多则芜杂。同一义项之下，甚至同时代的，能说明问题的就不要引很多，有一则可。

9. 引书有人名，还要有书名，后面附人名引书索引，只引简名不妥。至于无人名无朝代名都宜补。如果人名后不写书名，是不是可以在书后做一个人名书目索引，这也是一个补救的办法。

10. 标点的使用须一致。

最后谈谈审稿。审稿是最要紧的一件事。办法我提倡各自审自己的，在审稿中，我提倡这样一种精神：要舍得割爱。我们现在写文章，顺手就两三万字，我觉得这玩意儿不是个事，这是个文风问题。鲁迅早就说过，能写短篇的就不要写中篇，能写中篇的就不要写长篇。我们自己肯割爱，这很重要。不要以为材料来得不易，舍不得割爱，就全弄进来了。要从总体来看，这就是臃肿。不需要，就要去掉。如果有些条目自己不能确定，可请别的单位协助。同类词条，如宗教佛学，可寄宗教研究所，让他们替我们审。《现代汉语词典》过去也采用这个办法，这样比较保险，不容易出错误。还有，审别人的稿的时候，不要信笔雌黄，看得不顺眼就乱改，要尊重原编者用心所在。要很好地考虑，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搞不清楚的地方就查书。

汉字的产生和发展[①]

一 汉字产生的时代和早期汉字与图画的关系

汉字是汉族的祖先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②]

汉字产生的确切时代我们还不能断定，可是根据远古文化遗物的考查，在河南、甘肃等地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文化中还没有看到文字。彩陶文化时期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汉字的产生可能是在彩陶文化之后。[③]

今日我们能看到的最古的汉字是商代的文字。商代的文字已经是一种很发达的文字了。其中不仅有象形字和表意字，而且有了形声字和假借字。这都是要经过很长的时期才能发展成功的。由此推断，汉字的产生要远在商代之前，可能在公元前 1500 年至 2000 年之间。

---

①本文写于 1962 年，载于《问学集》，中华书局 1966 年 1 月出版。本文原未标书名号，现由编者补标。

②古人传说文字是黄帝史仓颉所作。例如秦李斯《仓颉篇》说："仓颉作书，以教后诣。"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种传说是不足信的。

③彩陶是一种红色的陶器，陶器上画着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有些陶器还画着一些事物的图像，但还不是文字。彩陶文化也称"仰韶文化"，因为代表这种文化的彩色陶器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实际上彩陶分布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省的黄河流域，不是仅仅在仰韶才有。参看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39—46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商代的文字见于龟甲、兽骨、铜器、骨器和玉石器上面，除铜器上的字是铸成的以外，其他都是用刀刻的。① 商人最好占卜，如祭祀、征伐、行止、田猎、农事等都要占卜。占卜所用的东西主要是龟腹甲，有时也用牛肩胛骨。把龟甲和牛骨事先钻成一个个的深槽，占卜时用火在钻处烧灼，从背面坼裂的兆文来定休咎。占卜的事情就用文字记载下来刻在兆文的旁边，这就是“卜辞”。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卜辞都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所以称这种文字叫“甲骨文字”。

商代占卜的甲骨是清代光绪年间（1880 年以后）在河南安阳西北五里小屯村发现的，这个地方在洹水之南，是殷代的旧墟。甲骨文字为世人所知是在公元 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以后。最早收藏甲骨的是王懿荣，其后是刘鹗和罗振玉。从 1928 年以后又有过几次科学的发掘，前后获得的甲骨有 10 万片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商朝后半期的东西，即盘庚迁于殷以后的东西，从殷王武丁时代起到帝辛时代止，约 273 年（前 1300—前 1028）。距离现在已经有三千多年了。这些龟甲兽骨的刻辞，大部分是卜辞，也有一部分是记事的文辞，其中包含着极丰富的殷商文化史料，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最宝贵的资料。从甲骨文字发现以后，很多古文字学家进行搜集、整理、考释和研究的工作，前后编定写成的专书就有二百多种。现在考释出来的文字已将近两千。这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极大的贡献。

甲骨文的发现使我们对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有了明确的认识。

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很发达的文字了，可是还保留不少图形的文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汉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见下页图）

这些字都是根据外物的形象描绘出来的，很接近于图画。现在我们所写的汉字如“目”“耳”“牛”“羊”之类已经跟事物的形象很不相像了，那是因为经过了长期的演变，所以变了样子。原来的

① 也曾经发现用朱色或黑色来写的，不过很少。

写法跟事物的形象是非常接近的。

由图画发展为文字，必然是由繁复趋于简单，而且要有一定的写法。这个过程在甲骨文里也表现得很明显。上面的一些字虽然接近于图画，但已经成为一种代表语词的文字，为了书写的方便和排列的整齐，就不能不把原来的图形改变一下，使它更便于应用。甲骨卜辞都是由上而下直行写的，或向左行，或向右行，有些横写不方便的就改为竖写，如犬、豕、马、象、虎之类，有些笔画繁复的就尽量要求简单，只要能把事物形象的特征表现出来，就不需要像图画那样复杂了。例如“戈”在商代铜器上画作，在甲骨文里简写作，“羊”在早期的卜辞里写作，后来就简写作，这都表明甲骨文字已经是逐步在脱离图画的阶段，演变成为一种真正记载语言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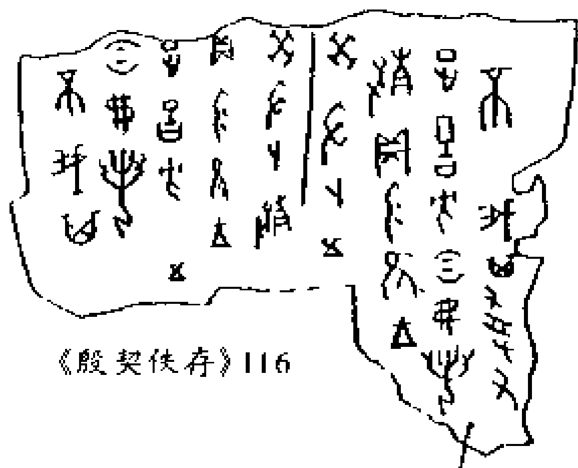


二　汉字体系的建立

甲骨文给研究汉字发展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根据甲骨文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到汉字的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甲骨文里有图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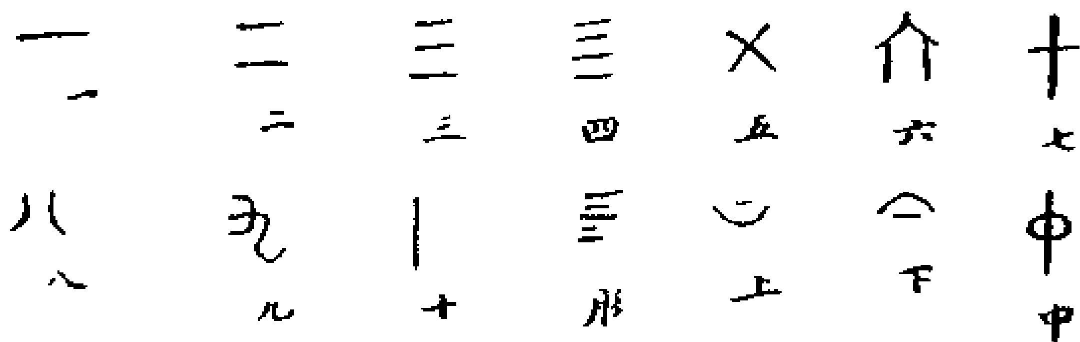
字三类，这就是汉字体系的内容。（见下图）

图形文字包括象形字和指事字。凡字是象物之形的字在文字学上都称为“象形字”。如上面所说的“人”“口”“日”“月”“牛”“羊”之类象形字就是汉字造字的基础，从一个象形字还可以产生许多其他的字。例如大（大）象人形，夭（夭）、矢（矢）、天（天）、夫（夫）等字都是与“大”形体相近的字，而美（美）、亦（亦）、夹（夹）、立（立）、乘（乘）、陵（陵）等字皆从“大”。大就是一个基础。


《殷契佚存》116

（癸丑卜殻贞弓隹王征号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祐）

在语言里有些代表抽象概念的词是不容易用一个象形字来表现的，只有用符号来表示。例如：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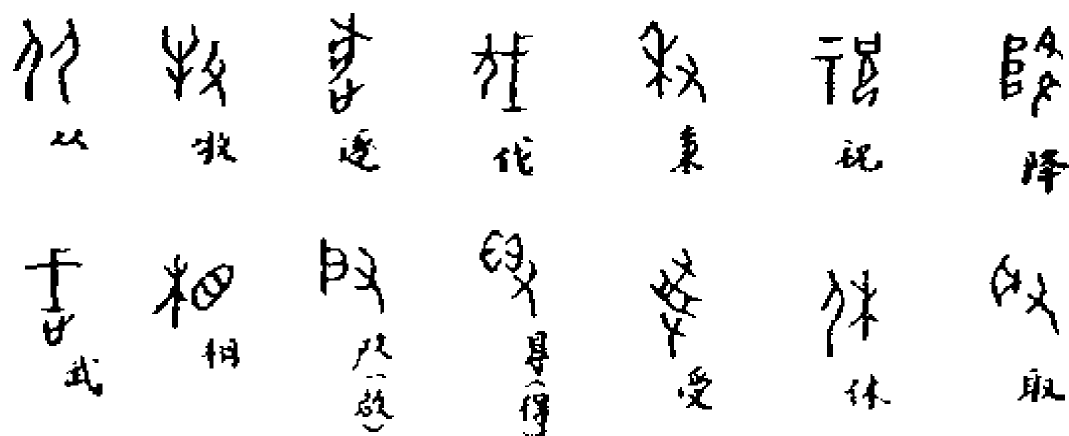


这种字只是一种符号式的文字。上下和中间很难表示，古人用二、二、中来表示是很巧妙的。在文字学上称这种字为“指事字”。这种单纯用符号以见意的办法也是造字方法之一种，不过这种字数量很少，在汉字当中不是主要的。

---

①“彤”即“彤日”的“彤”，祭祀之后第二天又祭祀就是“彤日”。这个字从字形上看是表示连续不断的意思。

在甲骨文中，除了图形文字以外，还有大量的表意文字。表意字是从字的结构成分上来表现词义。例如亐（元）表示人的头，㒸（见）表示人以目观看，𡈼（𦣠，即望）表示人企立张目而望。这种字虽然类似象形，而性质是表意。表意字中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常用两个或三个成分结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意思。例如：



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表意字。“从”表示人相从；“牧”从牛从攴，表示牧牛；“逐”从豕从止，止代表人的足，表示追逐；“伐”从戈从人，表示杀；“秉”从禾从又，表示以手持禾；“祝”从示从兄，表示祝告；“降”从阜从夅，表示由高下夅，“夅”（ ）是人的两足；“武”从戈从止，表示威武；“相”从木从目，表示看；“启”从户从又，表示开。“导”从贝从又，“受”从受从舟，“休”从人从木，“取”从耳从又。诸如此类，都是一种合体的表意字。这种合体表意字，文字学上称为“会意字”。

由象形文字产生表意文字之后，文字就逐渐丰富起来了。可是语言的词汇随着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日益扩展和加深而日趋丰富，文字势必也要增多，单纯应用象形、表意的方法来造字也就行不通了。因为事物有形可象的未必都能描绘得出，遇到无形可象的或难以表现的就更有困难。于是不得不另外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表音。

汉字在商代的时候，象形字和表意字占多数，同时也出现了一

些表音的文字。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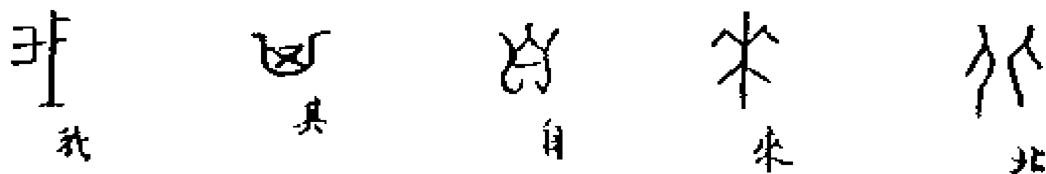
这些字一部分表意，一部分表音，文字学上称这种字为“形声字”。

甲骨文中还有原来是一个象形字，后来在象形字上加上表音成分而变为一个形声字的。例如：



“凤”和“鸡”原来都是象形字，后来“凤”字右边加上“凡”声，[1]“鸡”字左边加上“奚”声，就成为形声字了。由此可以看出由象形字向表音字发展的过程。表音字的出现是要求文字跟语音相配合的一种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在甲骨文里不仅出现了形声字，而且在文字的使用上出现了很多的假借字。假借字就是借用一个语音相同的字来代表另一个语词，它的作用就是表音。例如：



“我”象戈形，“其”象箕形，“自”象鼻形，“来”象麦形，“北”

①甲骨文里“凤”假借为“风”。

象二人相背。在卜辞里“我”是代词，“其”“自”都是虚词，“来”是往来之来，“北”是四方的名称。这些都是假借字。假借字只是作为一种表音的符号来使用，不再有表意的作用。文字在使用上有了假借的方法，就可以少造字，遇到难以造字的时候，也可以用假借以济其穷。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使文字与语言相适应了。假借字的产生可能要比形声字早得多。

总起来看，汉字的体系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建立起来了。甲骨文里既有象形字、表意字，又有假借字和形声字。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先有接近于图画的文字，后有表音的文字。但是这些阶段不是截然可分的。有了图形文字的时候，就可以有表意的成分；有了表意文字的时候，也就可以有表音的成分。由象形、表意趋向于表音，这就是汉字发展的内部规律。

三　汉字的发展

文字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要能够很好地适应这种需要，就必须与语音相结合。汉字最初虽然先有象形字和表意字，但要应用文字来记录语言，就不能不根据语音来创造文字。所以在商代的甲骨文里既出现了文字上的同音假借，又出现了不少的形声字。这说明文字必须走上表音的途径才能有发展。

我们的祖先掌握了这条原则，所以从周代以后，文字发展的总的方向就是为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而不断地创造形声字。在原有的文字当中有些也由表意字改变为形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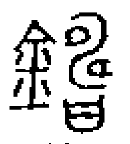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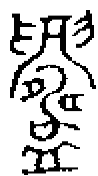
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有趣味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事实。例如“铸”字在周代的铜器里有许多不同的写法，从这些不同的写法可以看出“铸”字是怎样发展来的。（见下页图）

这些不同的写法表现出“铸”字最初只是一个表意字，表示以手持鬲在火上陶铸的意思，后来加上表音的成分（如“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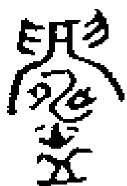
“己”)，又加上表事物的成分（“金”)，最后变为一个纯粹的形声字。




又如“征”字在甲骨文里只写作正，到周代的铜器中就写作征，加上“彳”，以别于“中正”“正月”的“正”，“征”是一个形声字。“盘”字在周代铜器中有的写作般，有的写作盤，有的写作鎜，“盘”字从皿般声（或从金）是一个后起的形声字。

从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在文字向表音途径发展中，我们的祖先怎样改进原有的文字和怎样适应语言的需要而创造新的形声字。由原来没有表音成分的表意字加上声符而成为一个形声字；以原有的象形字和表意字为基础，作为声符，再加上意符（即形旁）而产生新的形声字；这就是汉字由象形字、表意字转向表音字的发展过程。



后来形声字不断地发展，就成为汉字发展的主体。3 000 年来汉字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形声字的范围。

形声字一半表意、一半表音。表意的部分称为形旁，或称为意符；表音的部分称为声旁，或称为声符。形旁所表示的意思主要是事物的类属。例如属于人事方面的加“人”旁，属于思想感情方面的加“心”旁，属于疾病方面的加“疒”旁，属于衣着方面的加“衣”旁或“巾”旁，与水有关的加“水”旁，与“山”有关的加“山”旁，草、木、虫、鱼之类则加“艹”，加“木”，加“虫”，加

"鱼"。[1]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偏旁的系统。形声字的声旁具有表音的作用。声符与字音有的相同，有的只是相近。一般说来，在韵母一方面相同者居多；在声母一方面则不尽相同，有很多形声字只取其发音部位相同而已，不过声母完全相同的还是占多数。这样声旁就有了一定的表音作用。例如"共"谐"恭拱供烘洪閧巷"，"巷"又谐"港"；"工"谐"功攻空红江扛项虹"，"空"又谐"腔"。字音虽然不都跟声符一致，而大类不远。[2]

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先有一部分形旁和声旁，后来逐渐增多，构成汉字的繁复体系。早期汉字中的形声字形旁和声旁写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例如"艸""广"作为形旁都写在上面，"水""木"作为形旁大多数都写在左边，原来是为了书写的方便和形式的美观，后来也就成为一般的格式了。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组合在一起有下列几种方式：

左形右声：江河征炸吟袖迷铜陪

右形左声：和放颜飘收鹅部期靓

上形下声：草崇室奢篇

下形上声：吾常煮裂帛含盟婆

外形内声：国疗圃裹阑阁衢

内形外声：问闻毂辩

这些形式虽然很复杂，但同从一个形旁的字写法大都一致。例如"人、口、手、木、水、衣、禾、彳、辶、言、足、金"等偏旁一般都在字的左边，"力、支、殳、见、页、鸟"等偏旁一般都在字的右边，"宀、广、竹、艹、雨"等偏旁都在字的上边，"子、皿、贝、黾"等偏旁一般都在字的下边，这样也就比较整齐了。

---

①偏旁和字义之间并非都完全符合，只能作为一种粗疏的标志来看。

②有些字声旁与字音按今音的读法可能相去较远，但古今音不同，古人读起来应当是相同或相近的。因此根据谐声系统可以考证古音。

形声字的偏旁范围和字形的构造方式从汉代起已经完全具备，自汉代以后形声字日益增多。语言里随时产生新词，文字中也就随时出现新的形声字。因此形声字在汉字当中占90%以上。

这种形声字都是在已有的象形字、表意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有了一定的偏旁范围和已有的普通应用的汉字，要造一个形声字当然很容易，同时依照语音来造字也正合于文字向表音方向发展的规律，所以形声字的大量发展，成为汉字发展过程中一个主流。原来代表某一个语词的字不是形声字，后来也很容易增加形旁而变成形声字。例如“昆仑”写为“崑崙”，“扇动”写为“搧动”之类。至于汉以后新产生的表意字（如“泪”“尖”“歪”等），就很少了。

汉字本身是一直向表音方向发展的，但是由于始终没有脱离固有的象形和表意的系统，没有发展成为纯粹拼写语音的文字，所以还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

汉字所以长期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当然原因很多。除了受历史上社会、政治种种条件的限制外，还应当说跟汉语的特点有关。在创造文字的时候，汉语的语词大部分都是单音节的词，而且语法上的形态变化很少，在这种情形之下，方块汉字是能够表达古汉语的结构的，所以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另外，汉语从很古就有不同的方言。方言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语音，这种表意性质的文字自然就成为有力的交际工具了。过去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方言的分歧是很难消除的，汉字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要有所改变也很困难。文字孳生繁衍，越来越多，但有大量的字因为所代表的语词已经消失也就废弃不用了。

秦朝统一文字的历史意义①

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与六国文字

根据《史记·秦本纪》，周宣王时，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庄公之子襄公救周有功，所以周平王东迁雒邑后，封襄公为诸侯，始立秦国，跟东方诸侯通使聘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最后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

秦国处于西周故址，承接周人的文化，所使用的文字跟西周的铜器文字（即金文）是同一系统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秦统一六国以前的文字材料主要有四种：

（一）《史籀篇》的籀文。《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载《史籀》15篇，注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15篇，建武时（25—55）亡六篇矣。"《史籀篇》远在汉末即亡佚。许慎《说文解字》收录有220多字，称之曰"籀文"。王国维作《史籀篇疏证》认为《史籀篇》为春秋战国之间秦人所作以教学童的书。字的体势与篆文接近而比较繁复，所以又称之为"大篆"。

（二）秦景公时（前576—前537）的"秦公钟"和"秦公簋"。这两件铜器上的文字形体较西周金文稍趋整齐，但很有气势。

（三）石鼓文。石鼓的时代古人认为是周宣王时候的。近代马

①本文写于1985年7月。载于《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衡（叔平）认为是秦穆公时所刻（前659—前621），唐兰（立庵）认为是秦灵公时所刻（前422），说法不同。但字体仍是大篆。写法比较繁复，而较整齐谨饬，时代当晚于秦公簋。

（四）诅楚文。秦惠文王时刻（前318以后），有三石，一在凤翔出土，一在渭河出土，一在洛阳出土。文见《古文苑》。有摹刻本。文字跟小篆相近。有少数字跟籀文相同。

这几种材料在体势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很清楚是一个系统。可是东方诸国的文字则不然。东方诸国都有各自的文化，文字颇有不同，更不与秦文字相同。从铜器方面来看，各国文字之不同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书法的体式不同，或方，或长，或整饬，或疏放。如北方的齐晋，南方的徐楚吴越风格各异。另一方面是字的形体笔画不同，还各有一部分特殊的字。

至于战国时期的盟书、鉨印、货布、陶器、竹简上的文字更是纷乱，变化多歧，不易辨认。汉代所发现的古文经（包括孔子壁中书）有《尚书》《周官》《春秋》《论语》《孝经》等都是战国时期六国的传写本，字形特殊，跟秦文字相差甚远。汉人以其为早已不用的文字，所以称之为“古文”。许慎《说文解字》内有古文，魏三体石经也有古文，跟篆文是两个系统。战国时期文字既然如此分歧，就很有统一的必要。所以秦始皇灭六国以后，二十六年即下令统一文字。

下面举一些例子，以见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分歧。（见下页《春秋战国古文字示例》）

二　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政治意义

文字是记录语言、表达思想的工具，可以行远传久，为治理国家、发展文化不可须臾离的东西。所以许慎《说文解字叙》里说：“盖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

春秋战国时期古文字示例

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自春秋至战国，历时将近五百年，各国之间，文字的差异很大。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就要求“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说文解字叙》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里包括两件事。一是凡跟秦文不合的一律废除不用。始皇三十三年李斯又奏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皆烧之。”于是用

六国文字书写的书籍归于消亡。二是李斯对原有的秦文大篆有所省改，以成“小篆”，使文字便于书写，这确是一件大事。李斯所写的小篆，现在可以看见的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还有会稽刻石的徐铉临本，跟大篆（籀文、石鼓文）确实不一样。

秦朝统一文字的政治意义有三方面：

（一）秦始皇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免除六国诸侯的后代和各地的豪族大姓复起，造成分裂，免除国与国的战争。

（二）统一文字才可以统一文书和法令，这是治理国家的必然要求。

（三）文字得到统一，促进了四方人民和各族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团结，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得以发展。

三　小篆在体势结构上的特点与字形的简化和规范化

李斯等改大篆为小篆顺乎文字在使用上发展的趋势，由繁趋简，由不整齐趋向整齐，由不规则趋向规则，所以能为人所接受，获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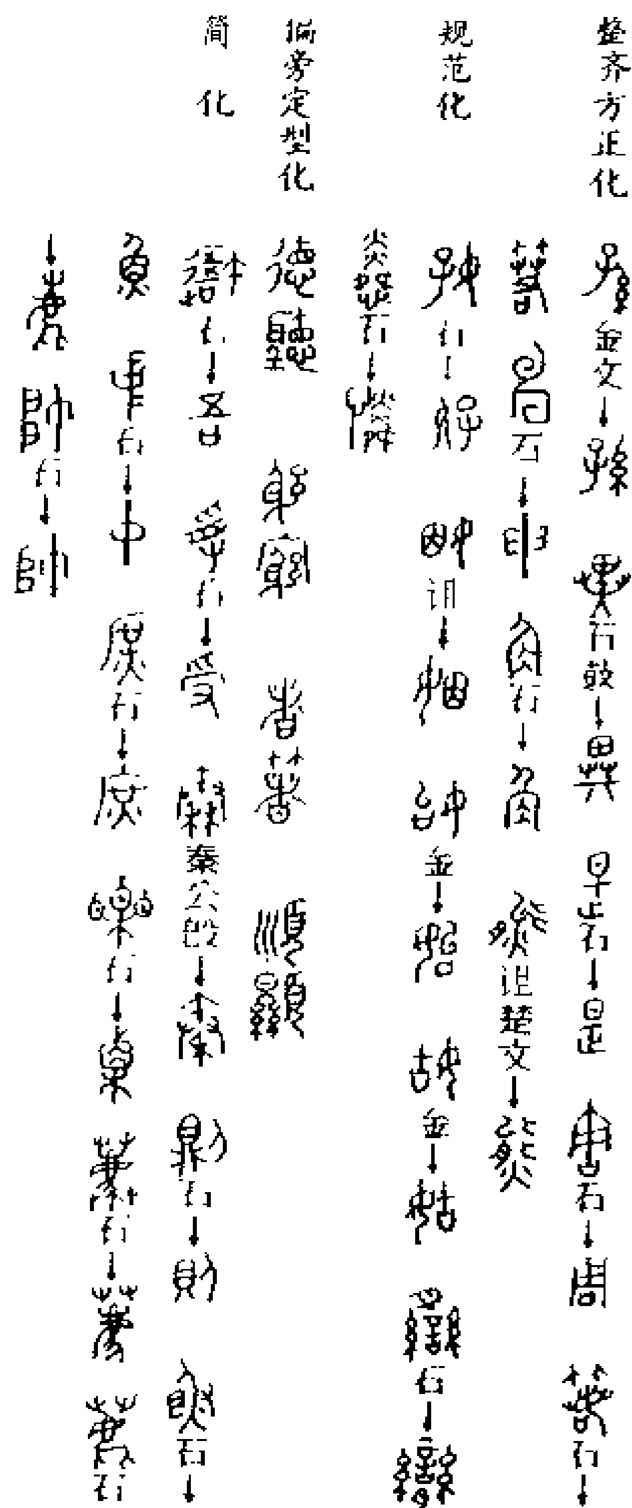
在秦人没有灭六国以前，即战国时代的晚期，秦文字已经有趋向简易的迹象，如商鞅戈，吕不韦戈。李斯等又进行有意识的省改，并走向规范化。以大篆跟小篆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小篆改变大篆的地方很多。首先从字的整体来看，小篆已向整齐方正的方向发展。不像大篆那样松散接近图画　从字的偏旁结构和笔画多寡来看，小篆的写法是：（1）一个字的笔画多寡有定；如果做为一个字的偏旁，写法仍然不变。（2）同从一个偏旁的，偏旁的地位有定，不容混乱　如“女”字边的字，大篆“女”旁在内，声旁在左；小篆则一律改“女”旁在左边，以与“人”旁、“彳”旁、“木”旁之类一致，进行规范化。（3）小篆改变大篆的写法最突出的也是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简化。如“秦”字原从两个禾，改从一个禾，“粟”原有三个实，改从一个实。简化可以使文字更便于书写，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举一些例子，以见小篆是怎样改变大篆的。（见下图）

四 秦朝统一文字对语言文字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秦朝小篆的规范化是自甲骨文、金文发展到大篆的一次总的整理和改造，使文字形体进一步系统化，对汉以后语言文字的发展至少起到两方面的作用：

（一）小篆在古文字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转折点，后代的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基本上都是在小篆的基础上经过简化，改变笔法，发展而成的。隶书比篆体草率，在战国时已见端倪。秦代隶书兴起，逐渐成为一般应用的字体。到汉代隶书盛行，篆书就比较少用了。文字的发展转到一个新的时代。现在我们看到的汉简和帛书几乎都是用隶书来写的。隶书写起来比篆书容易，文章、书籍自然就多起来，古书传



秦朝小篆

写也就容易多了。设若文字没有小篆整齐化这样一个阶段，隶书的形成不会那样快，没有简便易写的隶书，很难想象汉代会有那么多的书籍和作品。李斯改大篆为小篆，统一文字，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

（二）小篆有一定的书写规范，其结构的形式和结构的法则都已固定，偏旁也都有其系统性，这样，不仅书写学习有规律可循，而且为配合语言，创制新字也有了一定的办法，由是形声字不断增多，语言中所有的词都可以按照其读音和意义制成文字，因而使文字在记录语言上能更好地适应，这又是李斯整齐文字所做的一大贡献。由此可知李斯创制小篆对汉语语言文字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联系到我们今天的工作，整理汉字，提倡汉字规范化，进行部分有条理的简化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防止随意的简化，破坏汉字的规范。

许慎《说文解字》及汉字的重要性[①]

这次承蒙漯河市文化局和许慎研究会的邀请，能够来到漯河市，能同各位同志会面，聆听高论，深感荣幸。

关于成立许慎研究会的重要性，几位领导同志讲得很透彻，我完全同意。成立许慎研究会应当说是一件大事。许慎，在学术界，惟有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比较了解，理工科的同志就不一定知道许慎是何许人了。那么，我们就应当使人知道才对。

许慎生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1 900年了。他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作的《说文解字》是当今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语言词典，给后代人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宝库，从汉代一直流传下来，历代都有人学习研究。清代的学者写出来的重要著作就有100部以上，足见这部书对于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影响之大。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里，在公元100年之际就出现了许慎这样一位伟大的语言文字学家确实值得称扬，他的名字应当列在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大词典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家相比，毫不逊色。可是在国际上除了少数的汉学家，如法国、日本一部分学者知道以外，恐怕知道许慎的人就很少了。许慎在整个世界文化史上毫无疑问应当有一定的地位。因此我感觉到我们有这个许慎研究会，

---

①本文是1989年5月在河南省漯河市召开的许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拟。

大家来研究“许学”，同时要多多宣传许慎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进一步在世界学术界引起对汉学的重视。

此外，我认为成立许慎研究会也是属于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项工作。现在有一些人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总以为没有很多可说的。其实不然。我们知道英国有一位科学家李约瑟教授写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各方面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都做了详细的叙述，而且他还称赞说：“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他特别提出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把沈括做为中国科学家的代表人物看待。《梦溪笔谈》中涉及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范围之广是惊人的。其中有天文、历法、地理、数学、气象学、地质和矿物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医药、冶金、工艺等等方面的探讨和说明，无怪乎李约瑟认为他可算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了。就此一端来说，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中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方面确实不少，不应当弃而不论。以李约瑟这样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尚且如此称颂来看，我们更没有理由对祖国的光辉的优秀的文化传统毫不在意了。

以语言学而论，在西汉时期，已有《尔雅》和《方言》两部讲词义的书。《尔雅》按照词义把语言中的大部分的语词作了分类，每类词又都分别作了解释，主要的精神是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这是汉语最早的一部训诂书。《方言》则是以通语来解释在不同方言中所出现的同义词或义近词。这两部书可以互相补充，但是所解释的语词并不十分完备，语言中很多实际应用的词都没有收录。因为作者着重的是解释书传中的语词和方言，凡属于通常应用的口语词就不烦解说了。不过这两部书对研究古籍还是很重要的。《尔雅》对语词的分类对后代的训诂书也有不少的影响。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学史中的一部巨著，是汉语言

文字的宝库，许冲在《上说文表》中说："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说文》既是一部文字学书，又是一部语词的训诂书。其中的文字形体以小篆为主，兼收古文、籀文。由此我们可以通晓甲骨文和金文，我们可以通晓古训，读通古书，它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语言和古代的文化至关重要。它的重要性远在《尔雅》《方言》之上。我们应当认识到《说文》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发，并且把《说文》所收的文字放在汉代这一个阶段里和汉代的哲学、文学、史学的著述联系起来说明汉代语言文字的发展情况，这将会更有意义。这是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刚才会长谈了很多今后的工作任务，颇有宏图大志，这恰是使人很高兴的事。

另外，我想着重谈一谈文字的问题。文字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在远古时代或者说原始时代，从没有文字到创造了文字，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次重大的飞跃。有了文字，有了国家，文字就成了记述史实的工具。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说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机构要拟定法令和各种不同的文件，非得有文字不可。文字可以行之久远，口语就办不到。有了文字，书于竹帛纸张，后人由此才能知道古代的语言，古代的历史。我们设想，如果没有文字的话，我们今天对于有史以来4 000年的光辉历史就无法知道了。我们还可以想一下，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字，跟一个民族有文字相比，在人民的生活中该受到多么大的局限呢！

中国在上古很早很早就有了文字，而更为奇特的是这种文字一直经过不同时期的演变，到现在，我们仍然用这种文字记载语言。我们日常应用的一些基本字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就都有了，后来由篆书变为隶书，由隶书变为楷书，体势和笔画虽有不少变化，可是依

旧保持原形，还是一个个的方块字。可是在外国大都使用拼音文字，跟汉字迥乎不同。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不改一下呢？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的国家在秦汉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方言多而又包容着一些少数民族的大国，如果不用这种文字，我们的国家就不会达到这样的统一。在历史上，民族经过融合，已经有一些古老的民族消失了，但是还有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语言。汉语地区的方言虽然逐渐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消灭。方言的语音不同就难以互相交际，所以汉字正符合实际的需要。我们听广东人、福建人讲话觉得很难懂，可是在纸上写出文字来就无不通晓了。由此可知文字关系着一个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不这样说，不用汉字而用拼音式的文字，我们就很难实行。譬如说汉语拼音方案，那是一个学习普通话语音的很好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看一段按照汉语拼音方案写出的文章或小说，你能懂吗？你能很快地理解吗？不是说不能懂，当然能懂，因为它还是汉语，可是你未必一下子能看明白。比起用汉字写出来的就大不相同了。这不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于用拼音符号的缘故，而是汉字本身有个特点，它是便于目治的。譬如“陇海铁路”四个字，不用念，一看就了解了，汉字就有这样的好处。从字形上首先给我们一个词义的大的范畴，如金属类的词，铜、铁、铅、锡都从金；水一类的词，河、海、潮、汐都从水；形体本身就表现了一定的意义。而在音上呢？它又有一定的系统。在声符上，同声符的字又往往具有共同的基本含义。总之，在形体上所表现出的信息之多，不是拼音文字所能有的。我们应当珍视汉字的形式，学好使用汉字。

有人总说汉字难写难认。我看那不是本质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进行教育，推进文化教育的问题。我们不认真研究怎样教幼儿学习的方法，不研究从文字的使用频率和文字本身表现音义的规律去寻求办法，而空喊难写难认，这是错误的。我说应当特别申说文字教学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现在有不少人写的字一塌糊涂，

漫不经意，胡画一气，使人哭笑不得。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病，医生给我写在病历上的字，稀里哗啦，萦回缭绕，一个字也不认识。怎么写出来的汉字会难认到如此地步呢，原因就在于书写的人对汉字的优点和汉字的表意性质缺乏认识，所以我们应当很好地理解汉字。这是非常重要的。

说汉字难写，由于笔画繁多，笔画繁多则由于把不同的部件摆在一个方块内。设若不摆在一起，把部件分写，也许就不觉繁难了。反过来看，写一个英语的多音节的词，如 literature（文学），dictionary（字典），那又何尝很简单呢？我们在教学上如果善于安排，从笔画简单的字教起，然后把文字结构的情形分类作解说，经过反复练习，也就化难为易了。

今天是“五四”的第二天，70 年前“五四”时期，曾经有人提出“废除汉字”的口号。汉字如果被废除，我们今天就都成文盲了。当然，那是欠思考的一种激进的提法。汉字废除掉，几千年的书籍都成为废纸了，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也就泯没无闻了，那我们又怎能称得起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呢？论断事情绝不可执著于一面，而忽略其余。不重视汉字在继承文化遗产的作用，而加以鄙薄，那是错误的。为了提高全国汉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消灭文盲，我们不能不认识文字的重要性，对于汉字还要好好研究它，研究怎样更好地使用它，发挥它的作用。

以前人们总以为汉字不能输入电子计算机，可是现在全无问题了。这是前几年大家所想象不到的。汉字能输入电子计算机，对于检索、统计、排版、翻译等各个方面都极大地提高了效率，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现在全世界都承认汉语是国际间交往的一种重要语言，各国学习汉语的人愈来愈多。在世界的语言中，汉语是最精练、最简短的语言，不同的外国语言我们都能翻译过来，而且恰到好处。汉字随着汉语的广泛学习，这对传播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发挥极大的作用。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眼光，不能胡里胡涂地

认为汉字不如拼音式的文字，不能忽视汉字体系之构成和在记录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先民的卓越的智慧和它在我国的历史上的方言分歧中人们互相交流思想的适应性。我们不是说在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字中惟有汉字好，我们只是说汉字并不比别国的拼音文字差。我们要深入研究有关汉字的问题，在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之外，还要使汉字与汉语在国际交往中，在传播我国的优秀文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研究文字，《说文》应该是一部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说文》既是认识商周古文字的阶梯，又是研究隶书发展的途径的主要参考资料。前人对《说文》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前面已经说过，单以清人而论，有关《说文》的重要著作总在100部以上。那么我们又怎样进行研究呢？是否要开创一种新的道路呢？这是要共同来讨论的问题。我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要研究文字必须结合语言来进行。我们一方面要发掘《说文》在字形上、在训解中给我们的关于语词音义的信息，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每一个字在古代汉语中是怎样使用的，通常所含有的意义是什么，作为构词的语素时又有哪些意义上的转变和发展。许慎所加的解释，不都是字的本义。我们要提倡用一种新的历史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说文》。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语词的理解中认识汉代社会的生活和汉代人已掌握的自然科学各方面的知识，增加我们对于古代文化的理解。许慎研究会的成立会带动大家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兴趣，为宣扬祖国的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为提高人民文化的素质，促进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成绩一定是巨大的。我就说这么些，请大家指教，谢谢。

《说文解字》概论[1]

一 绪 论

1. 汉字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文字起源很早。尽管出土的陶器上也有像很早的文字的东西，但它究竟属于什么时代，怎么去认识，还有待深入研究。因此，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系统的记录汉语的文字是甲骨文。从甲骨文发展到铜器上的文字即金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六国古文：秦早期的籀文、货币上的文字、陶器上的文字等等。到了秦始皇时代，简易了秦的籀文，成为小篆。再发展成隶书、草书、行书、真书（即楷书、正书）

从书写方式上看，汉字的发展有形变和势变。形变即字形有了改变；势变即书写的笔画有了变化。形变如金文跟六国古文相差很远，小篆跟金文相比又有了很大变化。篆书是圆笔居多，小篆已有点变化，隶书变化很大，把圆笔改成方笔。如“大”“日”，字形由圆的变成方块。这种发展一方面由繁复趋于约易，简单化，如由大篆、籀文到小篆；另一方面又可看到由单体变为合体，加上不同偏旁则成为形声字。书写上由繁复趋于约易，字的繁衍上由形以表义向表音方向发展。最早先有图画代表形象，作为文字把图画简化而成为象形字。还有指事，《说文》举“上”“下”为例，因为无物可

---

①本文系根据周祖谟先生于1984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讲授《说文解字》课程的录音摘要整理而成的。题目为编者所拟。

象，所以有指事。又有会意，会意一般是合体的，如“相”，是由两个独体合成的会意。此法还是有时而穷的，遂向表音方向发展，因此有了形声。又有转注、假借，合前几种为六书。转注，《说文·叙》讲“建类一首，……考老是也”。前人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比较准确的是刘台拱的讲法：“从一义生数字谓之转注，以一字摄数义谓之假借；随音立字，谓之转注，依音记字谓之假借。”戴震、段玉裁讲转注是互训，非也，互训不是文字孳乳的方法。假借以不造字立字，同音假借，拿一个字代表两个不同的语词。转注是表音的，假借更是表音的，因此我说是形从表义向表音方向发展。

文字使用上，一字多形（或体，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慢慢趋向固定。从历史上看，有古字今字之别。

2. 声韵的演变。首先应理解声、韵是一个系统（system），不是杂乱无章的。一种语言里声母、韵母各分多少类是有数的；声韵的结合是有规律的，是系统的。比如：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tɕ］［tɕ'］［ɕ］一定跟［i］［y］（或有［i］［y］介音的韵）相拼，不跟ɑo相拼。声韵的演变就是在这一系统内部有些发展改变。演变或者由简而繁，比如古代的“端透定”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为“知彻澄”和“照穿床”。或者由繁而简，比如“蓝”是来母，而“监”是见母，古代有复辅音声母［kl］。为什么说古代有复辅音？这样的事例不是个别的。比如“恕”从如声。一个字也可以有两个读音，比如“率”shuài、lǜ，最早为两个辅音，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为有的保留了前面的辅音（如“监”），有的保留了后面的辅音（如“蓝”）。除谐声外，从汉藏语同源词比较也可看出古有复辅音。

时代有不同。从汉语语音的声韵系统发展来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period）：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上古又可以分成前期（proto Chinese）、后期（archaic Chinese）。时代前后亦有伸缩，商代为上古前期，周秦即为上古后期；若周秦以上为上古，则汉代

也可说是上古的后期。魏晋南北朝为中古，唐、宋为近古，元、明、清是近代，现在为现代。研究任何学问，了解其历史，都应在历史上划分不同的阶段，不要笼统。

方音有不同。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错的关系，方音由分歧而逐渐融合，趋于一致，这是一个发展趋势。方音自古有之，而汉语是有一个最早的母语的，方言不过是其不同分支而已。有些美国学者认为闽语跟早期汉语不是一回事，有自己的原始闽语的母语。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闽、粤、吴、北方话都是由一种早期汉语演变来的。因为一种语言不能单从语音来比较，还要看它的语法、词汇。闽语也是音节语言，没有很多的形态（phonological）变化，语法结构跟其他汉语方言基本一致，声调也可以对应。词汇上的证据就更多了，不过有些词汇北方话没有。这里面有不同民族往来时互相影响的问题，吸收一些别的民族语言的词汇。语言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方言的发展是交错的，有的趋于一致。一致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北方话一般无入声，但山西话还有入声、声调也不同，有的有五个、六个声调。

总之，关于声韵演变要建立两个观念：一个是古今时代的不同，一个是方音的不同。

3. 语义的发展。文字的意义有本义，有变义。本义指从早期文字形体上所反映出来的取像及其所代表的词义。变义指使用文字在表意方面所起的发展变化。变化又是多方面的，转义、比喻义、借义都是对本义而言的变义。研究语义，不能孤立地看。第一，要看这个词在最早的文献里是怎么讲的（the first appearance），有的不能单从字形来看。第二，要根据这个字（词）处于一定的句子中的意思来定，不是仅仅单凭古老的字书（训诂书）来看的，训诂书讲的不一定是这个字的全面的意思，或是在某个句子中的意思。例如《尔雅·释诂》第一条："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这些字是不是都当开始讲？其实开始只是核心

(kernel) 的意思，事实上用处不一样，所指的方面也不一样，要把语词放到具体的句子中来看它是什么意思才行。

就语言的总体来说，形音义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要研究语言，就不能偏于一隅，要把事物的各方面联系起来观察分析（古今，形音义），所谓“观其会通”“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就是要联系起来观察分析。同时也要了解历史的发展，所谓“探本求源”“明其原委”，也就在此。把事物孤立起来看，不是科学；只了解一段，不了解历史的发展，是不能理解透彻的。

二 许慎的事迹及许慎为什么作《说文》

1. 许慎事迹。《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传》中有记载，不过很简略。“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当时很多人觉得许慎很博学，特别是经学。“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又从贾逵读书，古文字之学是从贾逵受学的。“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儿子许冲《上〈说文〉表》，说其父曾为“太尉南阁祭酒”，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本从逵受古学”。还著了《淮南子注》。古人作书，书叙放在书后面，目录又在叙之后。刘向校书作叙录，都是校订完毕作叙录。从许慎自叙和许冲的上表可以了解作《说文》的时代。

2. 为什么要作《说文》。《说文》之前有很多杂字书，用一些文句编成，为儿童识字而设。如《仓颉篇》。罗振玉影印的《流沙坠简》里有杂字书。赵高作《爰历》，胡毋敬作《博学》，司马相如作《凡将》，史游作《急就》，扬雄作《训纂》，贾鲂作《滂喜》，都是杂字书，编成韵语，最早皆四言，后来有七言。汉代有所谓《三仓》。许慎为什么作《说文》？当时经学很复杂，古文经已盛行，是

对今文经而言的。古文经是用古文字写的，称“古文经”；今文经是口耳相传，用汉代隶书写下来的，叫“今文经”。晁错从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写下来的是今文经。汉代有两次古文经出现，一次是从孔子宅壁中取出，一次是河间献王从古屋里取到的。古文经是用六国古文写的，而不是汉代的隶书。许慎作《说文》时，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还在争论。刘歆已看到古文经，它是有本之学，篇幅也多些，内容也有不同。比如《左传》就是古文经，《公羊》《谷梁》为今文经。最早只有今文经流传，立于学官，许招博士弟子员，有官有禄。古文经出现之后，也要立学官，招博士弟子员，今文经学家则反对。刘歆有《让太常博士书》，批评今文经学家，时人非毁古文经，以为向壁虚造，这是不对的。今文经学家又喜讲谶纬，如董仲舒，说了很多没有根据的说法，谶纬盛行。许慎从贾逵受古文经，既通古文经，又通今文经，“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要保存古文，说明文字形体的结构、文字的表义跟声音，所以作《说文解字》。《叙》曰：“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诸生说字解经不合古谊，因此他要作《说文解字》。何谓文？何谓字？《叙》曰：“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解释。解：分析（分判）。文：独体字，造字是怎么样的？象形还是指事？字：合体字，分析它从何得声？是什么偏旁？故曰《说文解字》。《叙》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情。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以古文经为主，孟氏《易》是今文经。（1）

分别部居；（2）据六书分析字体；（3）搜集训诂，博采通人；（4）明字音；（5）采古籀。《说文》包容了这么多的内容。当时今古文经争论未息，古文经在东汉已开始盛行，许慎要保存古学，文字上多方面采纳，编新字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字典。公元100—121年，在那样的物质条件下，写成《说文》，成为字书之祖，在文化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收字9 353个，重文1 163个，解说133 441个字。保存了战国、秦、汉间的古文字。

三 《说文》的价值

1. 收字范围很广。包括了（1）秦汉间通行的篆文；（2）古文（壁中书），含奇字，采自扬雄的书；（3）籀文，即大篆，比小篆繁复，笔画重复的多。如“则”，籀文左边写得跟“鼎”似的。（4）或体，收当时书本上流行的不同写法。“文籍”的“籍”，“返回”的“返”。还有一种他认为的俗体，“公”字不是正规的小篆，认为是俗体。“袖”有正体、俗体。包容面很广，给我们丰富的古代文字的知识。

2. 首创分析文字结构的理论和方法，一扫西汉、东汉间今文谶纬谬说，这是很大的功绩。汉人早就讲六书，如班固、郑众等。许慎通过实践把汉字加以整理，把这种理论具体表现在字典里。当时今文经学家有很多臆说，推十合一为士之类，很可笑的。许慎很了不起，给后代很多字典树立了规范。许冲《上〈说文〉表》曰：“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据形系联”，有条不紊。为何“毕终于‘亥’”？亥者，该也，树根底下也叫荄，万物皆该备。由“一”“上”“示”“三”“王”，从形体上往下牵引，下来到“亥”。六书说很重要。尽管六

书本身不够完善，有了六书，对汉字结构形式比较清楚些。六书里，象形、指事为独体，所谓文；会意、形声为合体，所谓字（“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里“从某某”，或“从某从某”，这是会意；“从某某声”，这是形声。合体又是用独体字组成的。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上不断孳乳和增多。前面已讲过，转注，以刘台拱的说法比较正确，随音立字，声旁相同，形符不同。假借是同音假借。西汉、东汉间今文谶纬之学盛行，不是根据文字形体结构发展规律，而是按唯心方法讲文字构造，所据亦非篆书，更不是籀文，而是汉代隶书。《说文·叙》在讲了八体六书之后说：“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执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今文经学家据隶书讲文字结构是错的。许慎根据古籀、篆文说明文字结构，把今文谶纬谬说一扫而空。

3. 创立部首编排文字的方法。这是受《三仓》《急就》的影响，特别是《急就篇》。“急救奇觚与众异，分别部居不杂厕。”先姓氏，后名物，分别开。同类的字写在一起，偏旁相同的字排在一起，如鸟虫、草木。这对许慎很有启发，他能创立部首编排文字的方法，为后代立下一很好的规范。

4. 记载了丰富的古代词汇，保存了大量词的古义。古汉语单字往往是一个词，许慎对每个词都要讲解，讲解用词也往往是古义。比如：“毕，田网也。”捕鸟网。“自，鼻也。”甲骨文[illegible]。

"须，面毛也。"六艺群书的古义有很多在《说文》里记录了下来。另外，还有古音，形声字，说出"从某某声"，声旁与此字有直接关系；"读若某"，记载了古音。所以，《说文》是研究汉语文字的重要典籍，讲词源学、文字学、词义学都要参考《说文》；要理解古书、古代文学作品，不能不理解《说文》；编词典，要注意词的本义，也要参考《说文》。但《说文》所记，亦非全是古义、本义，这先不谈。

四 《说文》的功用

1. 可以利用《说文》部首和形体分析了解隶书与今楷书的构造。《说文》用篆文分析每个字的结构、偏旁。隶书、楷书与小篆不同，有些字不知为什么这样写，可以从小篆知道。如"兵""其""采"。"陷"和"滔"，楷书写法不同，易写错。从古文字看，"滔"上面从爪，用手取；"陷"，一个人掉下去了，字形、字义区别得很清楚。

2. 可以根据《说文》保留的篆书和古义，认识和研究甲骨文和金文。《说文》著录下小篆来，我们才可据小篆与甲骨文、金文相对照，认识甲骨文、金文，若无篆书就难多了。有的小篆和更古的文字之间比较容易了解其关系，如"女"，无小篆，也能认识甲骨文"女"。有的就不那么容易，如"伐""腋（亦）""监（人于水监）"。再如："鬭""老""奔"，古文字就比楷书、隶书形象多了。有的字从篆文字形也不能理解，与甲骨文对照起来，就明白为什么那样写了。如"彘"，小篆作"[illegible]"，为什么这样写？不清楚。甲骨文为"[illegible]"，从"矢"从"豕"，就看得很清楚了，篆文从甲骨文发展而来，如无篆书，也不易理解甲骨文此字的字形。

3. 据《说文》的六书说，文字中很多是会意字，有些还是形声字。写出这个字时，就知道其字的取像、取义何在。如"逆"

"大""启""得"。理解最初古训的取义是什么。汉字中形声字占大多数；由表义向表音发展，这是文字发展的规律。也有跟古文字不对头的，"在"，《说文》"从才，得声。"是形声字。"青"，从生声。篆书上没有撇。"地"，从也声。"矣"，上边从以声，楷书作"厶"，从篆形更易理解。

4. 从《说文》可推寻词义的转变跟用字的假借，因为《说文》给一个字作解释，都有来历，六艺群书的解释都概括在里面了。如"逆"，今为顺逆，不用迎逆义了。"降"有二音 jiàng，xiáng、词义转变。"旨"，《说文》为甘旨，今为旨趣。"禦"，今简化后无"示"了，古则为御下。从示，是祭名，今为抵御。再如："适""汤""视""企"等。

5. 从《说文》所收词汇中可见其对古代社会文化发展及其阶段的反映。事物有不同名称，今以一个共名称之。如祭祀，《说文》有很多专门祭祀之名，后代不需要了，无此名了，但还有祭祀，只用一个普通名称，无专名了。专名反映最初文化的情况。玉石，反映用玉做的器物，而最早又是用石作的器物。玉器又作礼器，圭、璋等佩饰也有玉石做的，代表当时人的生活、文化。牛部，不同颜色牛的命名，与畜牧时代牧养牛有关。"犨，白牛也。""犥，白黑杂毛牛。"反映了社会发展阶段的生活文化情况，古人对事物认识的深入程度。

五　《说文》的传本、注本

今日所见《说文》的本子，主要是宋以后的，唐写本很少。清代有木部残卷（唐写本），只存188个字，仅占全书的2%。书籍制度上，最早用竹简、绢帛，但要卷起，不便阅读。又发展出册页、帖子、叶子本，唐代就有了叶子本，可折叠的。唐残本是叶子本，每面十行，每行二篆，上下排着两个字，双行小字是注。先出反

切，然后是许慎释义。日本有口部12个字断简，一片，上下两行，每行二篆，存12个字。据说还有6个字一片，但未见过。也是叶子本，注文列下面，反切在注文之后。这个反切与今所见宋本反切不同，字的次序也不完全与宋本一样。关系之大，牵涉到许慎排字次序问题和体例问题。唐人对《说文》《字林》都很重视，为何传本这样少，不可理解。唐本反切跟《字林》反切相近。五代所传的《说文》本子与唐本一致（部首和反切）。今日所见宋本，为大徐所校订，与唐本不同。

宋本：徐铉所校订。他发现相传的本子有误，把很多的本子拿来对照，详细考察，又发现有遗漏的字，补了新附字。反切音以孙愐《唐韵》为准。今日所见的《唐韵》残本，与大徐本反切也不完全一样，可见孙愐《唐韵》传本在宋代也有很多。徐锴为弟，称小徐，作《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用功夫很深，有通释，说解《说文》十五卷的字。另外讲部序、通论、祛妄、类聚、错综。小徐本的注文和篆文的次第也跟大徐本不同，《系传》早成。徐锴比徐铉高明，通释里有很多好东西，清人注《说文》受《系传》影响很大。《系传》有两个本子，一是《四部丛刊》影宋本，因是抄本，有不少错字；另一是刻本，刻得很精，祁寯藻所刻《说文解字系传》即为通常应用的刻本。祁本也有错字，可用《四部丛刊》本对校。《系传》是本很好的书，引古训、古书来解释《说文》，很有价值。只不过因清人有更好的更详尽的注本，把《系传》给淹没了。

清人的本子，汲古阁本最早，藤花榭的本子，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刻工非常精美。陈昌治据孙本改刻为一字一行。中华书局影印的本子，每个篆书上都标出楷书，并附《通检》，比陈昌治本又高出一筹，当然，有的字属于隶定。

清代注本：徐锴《系传》。引古书证《说文》许慎的训释，这也是清人注《说文》的一贯方法。段玉裁用汲古阁本和其他本子对校、作注。段氏用心很细，胆子也大，改字也有改错了的。桂馥

《义证》，与段不同。段是注《说文》，桂氏是给《说文》找根据，引古书用到这个字时如何讲。桂氏书材料很充实，不大有错误，用起来很可靠，作为材料书很有用。王筠《说文句读》兼取段、桂二家，是比较通用的书。梁任公以为此书便于初学，解释简明扼要。另有《说文释例》，解释《说文》的文例、辞例；《文字蒙求》，按六书讲的。王氏曾校过《系传》，在《说文》释例方面很有建树。桂氏缺点是墨守许说，不敢驳许。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解文字，引古书训解，考定字声。他把《说文》原书拆散了，不按五百四十部，按他所定的古韵十八部统摄《说文》之字。十八部用《易》卦名，如“丰”“升”“临”“谦”等。把《说文》谐声字用古韵部统摄起来，同属一个声符的字按《说文》出现先后为序列出来，一部中有许多声符，皆归属在一个韵部之中，查字要按谐声偏旁查，一个字下面也有或体，下面有《说文》的训释，还有转注(引申义)、假借、声训、古韵、转音。定声，即统纳入十八部之内。每韵部之后，又附录了不见于《说文》的唐以前古书上的字，有一千八百多字。最特殊的是对转注和假借的讲法，“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这完全是意义引申，而非《说文》转注原意了。“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朋友之“朋”无其字，借朋鸟之“朋”；“来”是借小麦之“来”，用为来往之“来”。他书中并不全是如此，多是古书上的通借，非《说文》之假借，这也是他独创的一种。

六　怎么读《说文》

从前读《说文》的人都要先抱着段注来读的，还要点，全书点下来也要两年时间了。现在不能那样了。

1. 先要读《说文》，不看注。丰富文字形体的知识，从学习《说文》部首开始。注意文字形体的认识学习。还要熟悉形声字的

形符与声符。如“临”“志”。对会意字，楷书已看不出其义了，可通过篆书和楷书相比，了解其变化。

2. 了解《说文》的编排体例，分辨训释的方法，编排的方法，文例辞例，怎样说明这个词。

3. 掌握常用字的训解，这对读古书有很大便利。因有些词义不太好理解，去古已远。《说文》中保存了很多最早的通用的意义，掌握其中一部分很有用。总之，要读《说文》，就要掌握字的形体，分析字的结构，掌握常用字义。

七 《说文》的编排方法

1. 部的次序。《说文》分部排字受《三仓》《急就篇》的启发。许冲《上〈说文〉表》讲了“其建首也，……知化穷冥”。至于《叙》中开头的“叙曰”是后加的，非许氏原文。以形体相近者依次系联，并无深意。“始一终亥”。今文经家哲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始于一；亥，该也，备也，根也，故终于亥。其他则无深义，只是据形系联。此书体大思精，当时许氏书于木简，受条件限制，非一以贯之，有的系联不上，只好按意义相近的排列了。小徐《系传》，完全从义理上讲部序，不足为据。主要是据形系联，也有按意义系联的，如“齿”“牙”“足”“彳”，形不似而意义近。

2. 部首与部内文字的关系及部里文字的次序。部首一般是部里字的形旁，只有少数是部里字的声旁。比如，卷三上“句部”，“拘”“笱”“鉤”，部首为声旁。“丩部”，“纠”，部首亦为声旁。卷九上“后部”，“垢”“后”为声旁。“司部”，收一个“词”字，“司”为声旁，这是例外。也有些自乱体例了，但主要的还是部首是部里字的形旁。

部里文字的次序：（1）专名在前，后列其他。如“山部”“水

部”，均先列山名、水名，后列与山、水有关系的字。（2）先列实物名，后列其他方面的词。如“足部”，开头皆足部的名称，与走有关的词列其后。“宀部”，“家”“宅”在前，其他列后面。名词之外的形容词、动词在最后 （3）意义相近的字比次在一起，如“口部”，“咦”“咽”“喘”“呼”“吸”“嘘”“吹”，意义相近，排在一起。（4）好的意义的词在前，不好意义的词在后。以上归纳了部内字序的四种情况，我认为许慎部中文字次序总的来说是有规律的，但不是绝对的，因当时是写在木简上，排乱、排错的情况也有，还有可能传写错误，唐写本“木部”残卷就比二徐本排列次序好。虽有错乱，但并非无次序，乱七八糟。这样做的好处：首先，古人专名在前，动词、形容词在后，反映出古人对名词、动词、形容词有一个朦胧的粗浅的认识。其次，把好的意义的词和坏的意义的词分开，表明古人对词义的理解，跟今天的词义相比，有的变化了，从中可见词义的发展。总之，读古人书，从这里推测古人用心之所在。许氏并未讲部里字的次序如何，他只讲部次，没讲部里边也有次序，其实里边也有意义。我们读任何一部古书都应窥探古人用心之所在。

读《说文》，首先要重视部首的学习。重视每个字的形、音、义，注意加以分辨，且留心部首字的写法与今楷书之间的关系。要把部首字的学习与部首内所收的字联系起来看。五百四十部，这是许氏据篆书分析出来的，有些并不完全对。比如“丶”，其实不是跟其他形旁一样的，是他离析出来的；“亠”，古人书里没有这一部（《康熙字典》里念“头”）。部首读音大体上与大徐本反切相应。有的部首当时可能不是字，是许慎分出来的。识别部首，看形体写法，要能念出来。比如辵，念 chuò；虍，念虎，不用说虎字头；宀，念 mián；爿，念 pán；囗，念 wéi。

记部首有点巧妙的办法：（1）辨形。有的部首形相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倒过来念 jì 旡（无）。（2）同性质，意义相近的。

如“止、正”，“是、辵”“彳、行”，“目、䀠”。连类而及，容易记忆。(3) 重叠偏旁的。“䀠jū、皕bì”，“羊、羴shān”，“隹、雔、雥”，“玉、珏”，“山、屾”，“鹿、麤”，“㹜”，“炎、焱”，“沝”，“泉、灥”，“孨”。

进一步就要利用部首了解文字的构造，即前所说，把部首与部里的字联系起来看，哪是形？哪是声？会意是由哪个部分与哪个部分会合？“祳”，会意兼声。“珑”，会意兼声。“世”，从卅。“竦”，立部。“分”，八部，从刀。要了解《说文》在解释词义时应用的方法，能牵上字形的时候一定据形释义，如一个词有好几个意思，许氏选一个与字形搭得上的意义作为解释，这是他的特点。大多为会意字，有时形声字也要据形以说义，认为是会意，而把声旁与意义联系起来，即会意兼声，如上举“祳”“珑”等字。心知许氏之意即可，不必斤斤追逐，讲形声也无关系。

如果是联绵词，上字已释义，下字就不出解了，这是比较有规则的。例如：“琅玕”，“玫瑰”。

“一曰”，用于解释多义词，释义后再说一个别的意思。例如：“昌，美言也，……一曰日光也。”（卷七上）“扐，裂也，……一曰手指也。”（卷十二上）“播，种也，一曰布也。”清人有疑古倾向，王筠认为“一曰”不是许氏原著，是后人加的。我以为不宜过多地疑古。“一曰”不仅有释义，还有释形、注音的，故应视为许氏原有的东西。例如：“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这是“一曰”释形。“玤，石之次玉者，……读若《诗》曰‘瓜瓞菶菶’。一曰若蛤蚌。”这是“一曰”讲音的。

“读若”，为汉经师给字注音的术语，大部分“读若”是谈注音，也有少数联系字义，主体是注音。“瑂，读若眉。”也有“读与某同”，作用同“读若”，也是注音。“读如”，以假借居多。

“省声”。《说文》对会意与谐声有分别，有的谐声字很特别。“進，登也，从辵，閵省声。”“詧，察省声。”“羔，从羊，照省

声。”此字完全从四点来推测，不一定对。“竇，空也。从穴，𧶠省声。”隶定后跟“賣”相同了。这些是可信的，有的就不一定可信。有的说“从某，某声”也可以，不必说“省声”。如：“睎，望也，从目，希声。”

“阙”。《说文》有47个字注“阙”义．有的是不知字形而阙，“㒳，再也，从冂，阙。”义阙的如：“戠，阙，从戈从音。”音阙的如：“兟，进也，从二先，赞从此，阙。”“㲋，疾也，从三兔，阙。”关于这个问题，有《说文阙义笺》《说文阙义考》。清人认为可能是许书原有，传抄而阙了。古书传抄中有缺漏的，但《说文》之“阙”不都是抄阙的。有的则比较能肯定是传抄中阙了，比如：“朕，我也，阙。”（卷八下）从字形上看，可见从舟、灷，许氏不会不作解释，大概是传抄而阙的。

引经。清人很多讲《说文》引经的。《说文》引《诗》，有的跟今毛诗一样，有的是韩诗。所引《仪礼》，多今文经的。《说文》前后引经的字也有不同的。我认为，《说文》引经的目的主要是证字义。“向，北出牖也。……《诗》曰：‘塞向墐户。’”“殷，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试，用也。……《虞书》曰：‘明试以功。’”

八 《说文》解说文字的条例

1. 先释义，再释形，后释音。“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调，和也，从言，周声。”“皇，大也，从自。自，始也。……自读若鼻。”

2. 注解的句读问题。一般句读比较清楚，篆文之下，解释字义。有两点需注意：（1）连上篆文为句。“昧，爽旦明也。”应读为“昧爽，旦明也。”也有人认为小字隶书“昧”省了。“参，商星也。”（参、商，星也）“诂，训故言也。”（诂训，故言也）“离，黄

仓庚也。"（离黄，仓庚也）（2）注文如何理解的问题：一句应作数读，一篆之下的解释应分开来念。"褆，安福也。"（安也，福也）"振，举救也。"（举也，救也）"吾，我自称也。"（我也，自称也）"标，木杪末也。"（木杪也，末也）《说文》本身也有分开的，"咸，皆也、悉也。"是否许慎有的分，有的就疏忽了呢？不！写书的人是认真的，后来传抄时偷懒而漏了、省了。

3. 解释字义的体例。古人给字加训释，有三种训释方法，形训、义训、声训。

形训，就字的结构来释义。《左传·宣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说文·戈部》："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左传》上还有"皿虫为蛊。"《说文·面部》："䩄，面见也。……《诗》曰：'有䩄面目。'"这些都是形训。

义训。陈说词的词义。《说文》中主要是义训，不必多说了。

声训，按词的声音推说它的词义。声训起源很早，《易》经里已经有很多声训了。《说文》里也有一些。"天，颠也。"（双声）古文字"天"就是人的头。"帝，谛也。""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履"古人通常用，皆来母字。"八，别也。""户，护也。""门，闻也。"这些都是声训，训释和被释词词义并不相等，只有一点相似，某方面与被释词有关系，音上相同或相近。这是古代训诂学家的推想，为什么这个词取这个音？这个音与意义是何关系？是他们主观推想，主观性较强，不是实际应用的东西。比如，"星"，刘熙《释名》："星，散也。"我们也可说："星，小也。"（今说"零星"）从主观上推，有的有点道理。心母字，很多都有小的意思。《诗经》上"鼓瑟吹笙。"笙者，小也，小者为笙。"星"也是从"生"得声。"生"，古读为心母（审母）。从声音上联缀看出其义，这是 kernel（核心）词根，由此发展出一些词，加偏旁，有的音没变，有的音有小变。把语言中零散的词汇从声音上贯穿起来，成为字族（family）。声训，今文经家常用此法。刘熙是古文经

家，但受了今文经家影响。

《说文》中形训、声训是少量的，字大部分是义训。《说文》中解释字义的特点须特别注意。据形以说义是它的特点，把字形和字义联系起来。许氏总是迁就字形去解释字义，大多属于今意字。《说文》体例，“从某某”是会意；“从某、从某”也是会意。“从某、从某、某亦声。”会意兼形声（表声音的是第二个某）。比如“合”，收在“亼（jí）部”，“合，口也，从亼，从口。”但不在“口部”。“喿”，收在“品部”，不收在“木部”，“喿，鸟群鸣也。”“品，众庶也。”（众也，庶也）“木”上三个“口”，从形释义。“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十个口传述下来的，从字形以释义。“交，交胫也。从大，象交形。”也可说交错，但他就形说义，故曰“交胫”。“即，即食也。”小徐说：“即，就也。”“加”，收在“力部”，不收在“口部”。“加，语相增加也。从力，从口。”“卖”，不放在“贝部”，而放在“出部”，篆文上边是“出”字。“买”，放在“贝部”。这些皆会意字，据形以说义，也有会意兼声的。

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①

清代注解《说文》的有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几家，而传习广、影响大的是段氏《说文解字注》。段书创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先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后来因为文字过繁，简练成注，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次第完成，前后用了31年的精力，可以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了。

《说文》是研究古代文字训诂的必读之书，旧日除南唐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以外，没有其他注本，而徐锴书传抄也有残缺。清代乾嘉之间，正是汉学昌盛的时期。《说文》一书尤其为人所重视。段氏受学于戴震，既长于经学，又长于音韵、训诂和校勘，而且熟悉先秦两汉的古书和前代的字书、韵书，他用其所长来注解《说文》，不仅能淹贯全书，发其义蕴，而又能疏通古今音训，深知体要，所以大为学者所推重。

不过，事情总是创始者难。段氏凭借他那超卓的学力和才识来整理许书，固然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由于一人的精力有限，平时搜集贯串用的时日多，考求研讨用的时日少，方面即广，自然不免有疏漏。甚至有时又自信太过，反而流于武断。所以，段书刊行以后，专门著书评订段氏之误的就有好几家。如钮树玉有《段氏说文注订》八卷，王绍兰有《说文段注订补》十四卷，徐承庆有《说文解字注匡谬》八卷。其他单篇散记驳正段注之误的也还不少。足

①本文写于1962年。载于《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1月出版。

见段注并非完全正确。要读段注，首先要了解其中得失所在，才不致迷惘而不知所从。

段氏认为“向来治《说文》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所以悉心校其讹字，而为之注。（见卷十五下许慎叙注）段书包容甚广，总起来看，段氏的主要工作有下列几方面：

一　校订《说文》传本的讹误

《说文》大徐本和小徐本不同，汲古阁所刻大徐本又与宋刻本不同，因此，段氏在作注之前，不能不先从事校勘。段氏是擅长校书的，他曾用几种宋刻大徐本互校，又用元人《韵会举要》校订小徐本，然后又以大徐本和小徐本对校。此外并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唐人《五经正义》《史记》《两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玄应《一切经音义》、唐宋类书以及《玉篇》《广韵》《集韵》等书所引以刊正二徐本之误；同时又斟酌《说文》通例，以本书证本书，决定今本之是非。误者正之，缺者补之，复者、衍者删之，字失其次者改之，并在注中说明。其中固然有得有失，但这种旁搜远绍，力求其是的作法是前所未有的。

二　发明许书通例

段氏以前解说许书的人一般总是侧重于“六书”，而对许书的主旨和全书的大例并不甚理解。徐锴作《系传通释》也很少发明。段氏以为“自有《说文》以来，世世不废，而不融会其全书者，仅同耳食，强为注解者，往往眯目而道白黑”（许慎说文叙注），所以，他特别注重《说文》体例的阐发。有注于一字一句之下的，有注于一部之末的。例如：

1.《尔雅》《方言》所以发明转注、假借，《仓颉》《训纂》《滂熹》及《凡将》《急就》《元尚》《飞龙》《圣皇》诸篇仅以四言七言成文，皆不言字形原委，以字形为书，俾学者因形以考音与义，实始于许，功莫大焉。（一部一字下）

2.此书法后王，尊汉制，以小篆为质，而兼录古文、籀

文，所谓“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则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一部弌字下）

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元字和天字下）；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也。（一部元字下）。

3. 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者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一部部末。关于部中字次，段氏在玉部末又有具体说明。）

凡许全书之例皆以难晓之篆先于易知之篆。如辑下云：车舆也，而后出舆篆，輒下云：车两輢也，而后出輢篆是也。（车部輒字下）

4. 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一部吏字下）

5. 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凡传注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为、有读若。读为亦言读曰，读若亦言读如。字书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读若，无读为也。（示部桑字下）。

凡字从某为某之属，许君必言其故。（玉部瑱字下。此谓许慎必就字的形旁为训。）

6. 凡合二字为文，如瑾瑜、玫瑰之类，其义即举于上字，则下字例不复举，俗本多乱之。（玉部瑜字下）

7. 许君原书篆文之下以隶复写其字，后人删之，时有未尽。（玉部灵字下）

8.《说文》言一曰者有二例：一是兼采别说，一是同物二名。（艸部蘿字下）

9.《说文》凡草名篆文之下皆复举篆文某字，曰某草也。如葵篆下必云：葵菜也，蓋篆下必云蓋草也。篆文者其形，说

解者其义，以义释形，故《说文》为小学家言形之书也。浅人不知，则尽以为赘而删之，不知葵菜也，蓨草也、河水也、江水也皆三字句，首字不逗。今虽未复其旧，为举其例如此。(艸部蓨字下)

凡言某与某同意者，皆谓其制字之意同也。(羊部芈下)

10. 按许引左氏，则言《春秋传》曰，引公羊则言《春秋公羊传》曰，以别于左氏.（邑部郿字下)

11. 凡许云礼者，谓礼经也。今之所谓《仪礼》也。（系部缙字下)

12. 许重复古，而其体例不先古文、籀文者，欲人由近古以考古也。小篆因古籀而不变者多，故先篆文，正所以说古籀也。隶书则去古籀远，难以推寻，故必先小篆也。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异于小篆者，则以古籀附小篆之后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书之通例也。其变例，则先古籀，后小篆。如一篇二下云古文上，丁下云篆文二、先古文而后篆文者，以旁帝字从二，必立二部，使其属有所从。凡全书有先古籀、后小篆者，皆由部首之故也。(许慎叙“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下)

诸如此类有关许书体例的说明在段注中总有五六十处之多。王筠《说文释例》序说：“段氏书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对段书释例的一部分极为推重。读者可以由此入手理解许书。

三　根据古代群书训诂解释许说

段氏《说文注》是段氏在经学、小学两方面成就的集中表现。许书训释大都根据经籍训诂而来，要疏证许说，必须对古书有根柢。段氏注《说文》所采用的方法是首先融会全书，以许解许。许书中同义词往往互训，段氏必随文举证，申明其义。其次则援引经传子史，推求许说所本。间或引用今方言与许说相证。许书训释简单，凡属于草木、鸟兽、山川、地理、名物、制度一类的词，段氏必博考群书，摘要说明。许说有可疑或传写有问题的，段氏也随例

诠发。如许云：哭从狱省声，家从豭省声，段以为皆不可信。二下告部告下云："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段氏谓许因"童牛之告"而曲为之说，非字意。八上人部仞下云："伸臂一寻八尺。"段氏据"尺"字下解说，并详考古代群书注释定仞下当云七尺。这都是很对的。许慎训解也有不可知的，则阙而不释。如一上玉部"琥"；许云："发兵瑞玉"。段云："许所云未闻。"三下殳部"殿"，许云："击声也"。段云："此字本义未见。"七下宀部"宋"，许云："居也"。段云："此义未见。"八上衣部"衺"，许云："衣带以上。"段云："此古义也，少得其证。"足见许氏在各方面都交代得很清楚。

段氏引用的材料极广，自先秦下至唐宋，很多重要的古书都涉猎到了。有时为了解释一个词的用法往往翻遍好几种书，反过来也运用《说文》训释解释了不少古书的文句。例如：

1. 若，许云：择菜也。（一下艸部） 段云：《晋语》："秦穆公曰：'夫晋国之乱，吾谁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为朝夕之急？'"此谓使谁先择二公子而立之，若正训择。择菜，引申之义也。

选，许云：遣也。（二下辵部） 段云：选遣叠韵。《左传》"秦后子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惧选。针适晋，其车千乘。"按此选字正训遣。后子惧遣，故适晋，实非出奔也。

2. 窕，许云：深肆极也。（七下穴部） 段云：窕与窘为反对之辞。《尔雅·释言》曰：窕，肆也。《大戴礼·王言》"七者布诸天下而不窕，内诸寻常之室而不塞"，《淮南·俶真训》"处小隘而不塞，横扃天地之间而不窕"，……《齐俗训》"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窕而不周"，《兵略训》"入小而不偪，处大而不窕"，《墨子·尚贤中》"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窕，小用之，则不困"，……《荀卿子》曰："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

穴而不偏"，《管子·宙合》曰："失成轴之多也，其处大也，不窕，其入小也，不塞"，《司马法》曰："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又曰："击其劳倦，避其闲窕"。凡此皆可训窕为宽肆。凡言在小不塞，在大不窕者，谓置之小处，而小处不见充塞无余地；置之大处，而大处不见空旷多余地。高诱曰："不窕，在大能大也。"今本《管子》《墨子》窕误作究，非是。……郭注《尔雅》云："轻窕者，多放肆。"真愦愦之说也。《左传》曰："楚师轻窕"此窕义之引申，宽然无患谓之轻窕。

3. 骄，许云：马高六尺为骄。诗曰：我马维骄。（十上马部） 段云：《汉广》："言秣其马"，"言秣其驹"，传曰："六尺以上为马，五尺以上为驹。"此驹字《释文》不为音。《陈风》："乘我乘驹"，传曰："大夫乘驹"，笺云："马六尺以下曰驹。"此驹字《释文》作骄，引沈重云：或作驹，后人改之。《皇皇者华》篇内同。《小雅》，"我马维驹"，《释文》云："本亦作骄。"据《陈风》《小雅》，则如《周南》本亦作骄也。盖六尺以下，五尺以上谓之骄，与驹义迥别。三诗义皆当作骄，而俗人多改作驹者，以驹与蒌、株、濡、諏为韵，骄则非韵，抑知骄其本字音在二部（即宵部），于四部（即侯部）合韵，不必易字就韵而乖义乎？陆氏于三诗无定说，彼此互异，由不知古义也。

这些都是以许书与古书文句互相证发的例子。书中连带校释古书的地方很多，似乎支离，实际也是在证明许义。

许慎《五经异义》与《说文》有同有异，段氏以为《异义》先成，《说文》晚定，当以《说文》为主（见一上示部社下）。汉人《诗》《礼》传注也有和许慎训解不同的，大都属于名物制度一类的词，段氏也一一并采录，加以比较，考其源流，辨其得失（玉部琫下）。

四 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

《说文》是很古的一部字书，其中保留了很多古字、古音、古义。段氏为许书作注，在字的形音义三方面都用了很大的功力。他认为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是互相关联的，要研究《说文》，必三者互求。而三者之中，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了解声音，他在王念孙《广雅疏证》序里曾说：

>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取其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其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他有这种卓见，所以在《说文》注里特别注意音与形义的关系。每字之下，除举出徐铉本《说文》反切以外，并标出他所考定的古韵十七部的部类，使学者不仅可以由此略知古今音的异同，还可以藉此理解音与形义之间的种种关系。以音以纲，就音以说明文字的孳乳通假和词义的相近相通，这是段注的特点之一。钮树玉在《段氏说文注订叙》中反以“创十七部以绳九千余文”为病，那完全是不理解段注的话。

《说文》九千多字，形声字最多。形声字的声旁，有的只是表音，有的可以由声中见义。而声旁相同的字，意义也有时相通。段氏在示部禛字下说：“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或称其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实欲互见。不知此，则声与义隔。又或如宋人《字说》，只有会意，别无形声，其失均诬矣。”在十四上金部鏓字下说：“悤者多孔，蔥者空中，聰者耳顺，义皆相类。凡字之义必得诸字之声者如此。”书中类似这种阐发声义关系的例子很多。例如：

1. 芋，许云："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芋也"（一下艸部)。段云："口部曰：吁，惊也。《毛传》曰："讦大也。凡于声字多训大。"

2. 蕍，许云："华盛"。（一下艸部）段云："此于形声见会意。蕍为华盛，瀰为水盛皃。"

3. 犫，许云："白牛也"。（二上牛部）段云："白部曰：皠，鸟之白也。此同声同义。"

4. 诐，许云："辩论也。"（三上言部）段云："皮，剥取兽革也。柀，析也。凡从皮之字皆有分析之义，故诐为辩论也。"

5. 誓，许云："悲声也。"（三上言部）段云："斯，析也。澌，水索也。凡同声多同义。"

6. 鼖，许云："大鼓谓之鼖。"（五上鼓部）段云："凡贲声字多训大。"如《毛传》云："墳大防也；颁，大首皃；汾，大也；皆是。"

7. 袗，许云："禅衣也。一曰盛服。"（八上衣部）段云："参本训稠发。凡参声字多训为浓重。"

8. 襛，许云："衣厚皃。"（八上衣部）段云："凡农声之字皆训农。醲，酒厚也；浓，露多也；襛，衣厚皃也。"

9. 鍠，许云："钟声也。"（十四上金部）段云："按皇，大也，故声之大字多从皇。"

10. 陉，许云："山绝坎也。"（十四下自部）段云："陉者，领也。《孟子》作径，云：山径之蹊。赵注：山径，山领也。《杨子法言》作山岖之蹊，皆即陉字。凡坙声之字皆训直而长者。"

这些就是"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的例子。但是，并非所有的形声字都如此。有的声旁只是表音，有的字声旁虽然相同而意义相去很远，不能执一以概全。（后来刘师培在《正名隅论》里说

凡从某一声的字都有某义，丝毫不加分辨，那是错误的)。不过，段氏就其中可考的加以阐发，使学者知道怎样从散漫中去寻求条理，认识语音语义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仍然很重要。

在解释联绵词的时候，段氏也同样用声音来贯串。例如：

1. 齟，许云："齟齬齿也。"（注连篆文为句，二下齿部）段云："《广韵》曰：齟齬不相当也。或作鉏鋙。上床吕切，下鱼巨切。按金部鋤下云：鉏鋤也。鋤或作鋙。《周礼注》作鉏牙。《左传》西鉏吾，以鉏吾为名，牙鱼古音皆在九鱼。……"

2. 曖，许云："埃曖日无光也。"（七上日部，曖，奴代切）段云："埃曖犹靉靆也。《通俗文》：雲覆日谓之靉靆。"

3. 旖，许云："旖施旗皃。"（七上㫃部）段云："旖施叠韵字，在十七部（案即古韵歌部）。许于旗曰旖施，于木曰檹施，于禾曰倚移，皆读如阿那。《桧风》'猗傩其枝'，传云：猗傩，柔顺也。《楚辞》《九辩》《九难》则皆作旖旎，《上林赋》'旖旎从风'，张揖曰：旖旎犹阿那也。《文选》作猗狔，《汉书》作椅狔。《考工记注》则作倚移，与许书禾部合。知以音为用，制字日多。《广韵》《集韵》曰婀娜，曰旖旇……皆其俗体耳。"

4. 佝，许云："佝瞀也。"（八上人部）段云："佝音寇，瞀音茂，叠韵字。二字多有或体。子部㝅下作㝅瞀，《荀卿·儒效》作沟瞀，《汉书·五行志》作区霿，《楚辞·九辩》作怐愗，《玉篇》引作佝愗，应劭注《汉书》作㲉霿，郭景纯注《山海经》作谷霿，其音同，其义皆谓愚蒙也。"

以上所举都是一些联绵词。联绵词的写法有时虽然不相同，但是从声音和意义两方面来看，往往可以确定就是一个词。段氏能用古韵部类来判断（如鉏牙为鱼部字，旖施为歌部字，佝瞀为侯部字），更有很多是前人所没有说明过的。段氏也有时注意到联绵词中声母

的关系（如言部"謘"下说"谆謘，盖犹钝迟"，水部"泷"下说"泷涑即泷涿"），可是还没有能充分去推寻。如上所举旖施与倚移是一类，倚傩与旖旎又是一类，段氏混而为一，还不够恰当。

五　说明古今字和假借字和字义的引申与变迁

古书所用的字互有不同，或字同而义异，或字异而义同，与《说文》比较，又有同有异。段氏认为《说文》所出大都为本字本义，而古书则字有假借，义有引申，所以与《说文》不同。要了解古书的文字训诂，必须先了解《说文》。他说：

> 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与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之权衡也。故《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许慎叙"庶有达者，理而懂之"下）

这表示段氏治《说文》，正是要从《说文》入手以通经传的文字训诂。这是段氏注《说文》的积极目的。陈焕在段注跋语中说：

> 焕闻诸先生曰：昔东原师之言：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余之注《说文解字》也，盖窃取此二语而已。经与字未有不相合者，经与字有不相谋者，则转注假借为之枢也。"（案段氏言："异字同义为转注，异义同字则为假借"。许慎叙"厥谊不昭，爰明以谕"下）

根据这些话来看段氏注，也确是如此。段氏书能不以解释许氏原文为限，进一步说明经传中文字的假借，意义的引申，**把研究《说文》和理解古书的词义结合起来，这是段注的另一个特点**。段氏在严元照《尔雅匡名》序中说："吾见读《说文解字》而于经传《尔雅》愈不能通，鉏铻不合，触处皆是，浅人遂谓小学与治经为二事。然则从事小学，将以何为也？"正是说明要"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道理。段注给人的表面印象似乎是在解经，不易捉摸，但

是如果了解其主旨所在，也就容易知所取裁了。

段氏书中详考经传用字之例，说明古今字和假借字的例子很多。例如：

1. 余，许云："语之舒也"（二上八部）段云："《释诂》云：余，我也；余，身也……《诗》《书》用予，不用余；《左传》用余不用予。《曲礼》下篇'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云：《觐礼》曰伯父寔来，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凡言古今字者，主谓同音，古用彼，今用此异字。"（段氏《经韵楼集》卷四解释《曲礼》郑注云："凡郑言古今字者，非如《说文解字》谓古文籀篆之别，谓古今所用字不同。如古人作衡，后代作横；古人作鄉，后代作嚮是也。周初盖用余，故礼经古文用余，左丘明述《春秋》亦用余。《诗》《书》则荟萃众篇而成，多用予，《论语》《孟子》用予。《春秋》时名予字子我，知《春秋》时用予，而左氏特为好古。郑意余为古字，予为今字，非可以互易之也。"这段话对古今字说得很清楚，足与此相发。考甲骨文金文中有余无予，亦可证余为古字，予为后起字。）

2. 于，许云："於也。"（五上于部）段云："《释诂》《毛传》皆曰于於也。凡《诗》《书》用于字，凡《论语》用於字。盖于於二字在周时为古今字，故《释诂》《毛传》以今字释古字也。"（考甲骨文金文亦有于无於）

3. 亯，许云："献也。"（五下亯部）段云："下进上之词也。按《周礼》用字之例，凡祭亯用亯字，凡饗燕用饗字。如臣亯君字作亯，《士虞礼》《少牢馈食礼》尚饗字作饗。《小戴记》用字之例，凡祭亯、饗燕字皆作饗，无作亯者。《左传》则皆作亯，无作饗者。《毛诗》之例，则献于神作亯，神食其所亯曰饗。如《楚茨》以亯以祀，下云神保是饗，《周颂》我将我亯，下云既右饗之；《鲁颂》亯之不忒，亯以骍牺，下云

是饗是宜；《商颂》以假以亯，下云来假来饗；皆其明证也。鬼神来食曰饗，即礼经尚饗之例也；献于神曰亯，即《周礼》用亯作亯之例也。各经用字自各有例，《周礼》之饗燕，《左传》皆作亯宴，此等盖本书固尔，非由后人改窜。”

4. 哙，许云：“咽也。”（二上口部）段云：“《小雅》哙哙其正，笺云：哙哙犹快快也。谓同音假借。卢氏文弨云：《淮南·精神训》哙然得卧，《宋书·乐志》吴鼓吹曲我皇多哙事，皆与快同。”

5. 龂，许云：“齿本也”（段于本上增肉字，二下齿部）段云：“《曲礼》笑不至矧，郑云：齿本曰矧，大笑则见矧。正龂之近部假借字也。”

6. 龈，许云：“啮也。”（二下齿部）段云：“此与豕部豤音义同，疑古只作豤，龈者后出分别之字也。今人又用为龂字矣。”

7. 讼，许云：“争也，一曰歌讼。”（三上言部）段云：“讼颂古今字。古作讼，后人假颂皃字为之。”

8. 离，许云：“离黄，仓庚也。”（四上隹部）段云：“今用鹂为鹂黄，借离为离别也。”

9. 宵，许云：“夜也。”（七下宀部）段云：“《释言》《毛传》皆曰宵夜也。……有假宵为小者，《学记》之宵雅是也。有假宵为肖者，《汉志》人宵天地之皃是也。”

10. 抵，许云：“侧击也。”（十二上手部）段云：“《战国策》抵掌而谈，《东京赋》抵璧于谷，《解嘲》介泾阳抵穰侯。按抵字今多讹为扺，其音义皆殊。《国策》夏无且以药囊提荆轲，《史记》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提皆抵之假借字也。”

11. 畜，许云：“田畜也。”（十三下田部）段云：“田畜谓力田之蓄积也。……俗用畜为六畜字。古假为好字。如《说苑》尹逸对成王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晏子对

景公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谓畜即好之同音假借也。”

另外，经传中一个字可能有几种用法，而在《说文》中往往可以找到几个相应的不同的字。段氏对这一类也特别留意。例如：

1.厲，许云：“旱石也。”（九下厂部）段云：“旱石者，刚于柔石者也。《禹贡》厉砥砮丹，《大雅》取厉取锻。引申之义为作也。见《释诂》；又危也，见《大雅·民劳》传，虞注《周易》；又烈也，见《招魂》王注。俗以义异异其形。凡砥砺字作砺，凡劝勉字作励，惟严厉字作厉，而古引申假借之法隐矣。凡经传中有训为恶、训为病，训为鬼者，谓厉即疠之假借也。训为遮列者，谓厉即迾之假借也。《周礼》之厉禁是也。有训为涉水者，谓厉即濿之假借。如《诗》深则厉是也。有训为带之垂者，如《都人士》垂带而厉，《传》谓厉即烈之假借也。烈，余也。”

2.夷，许云：“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段据《韵会》改为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十下大部）段云：“《出车》《节南山》《桑柔》《召旻》传皆曰：夷平也，此与‘君子如夷’‘有夷之行’‘降福孔夷’传夷易也同意。夷即易之假借也。易亦训平，故假夷为易也。《节南山》一诗中平、易分释者，各依其义所近也。《风雨》传曰夷悦也者，平之意也。《皇矣》传曰夷常也者，谓夷即彝之假借也。凡注家云夷伤也者，谓夷即痍之假借也。《周礼》注夷之言尸也者，谓夷即尸之假借也。尸陈也。其他训释，皆可以类求之。”

这些就是段氏在《尔雅匡名序》中所说“经传《尔雅》所假借有不知本字为何字者，求之许书而往往在焉”的例证。

明白古书中文字有假借和了解古代声韵的部类，这是清人所以能读通古书、超轶前代的主要凭藉。假借就是音同或音近的字互相替代，所以言假借，亦必以音为纲领。（段氏曾指出“假借取诸同

部者多，取诸异部者少”，见《六书音均表》卷三古异部假借转注说。）上面所举正是就音来加以推寻的。厉烈古韵同部，夷彝尸古韵同部（尸夷本为古今字）。经传用字之所有假借，与古人字少和书写时仓卒不得其字有关系。古人字少，一字可以兼数用，所代表的不一定就是一个语词。后来文字日繁，就有不少后起的本字。这种后起的字是为更好地适应需要而产生的。段氏把经传的字和《说文》所收的字从音义上加以比较，说明其间的关系，不仅使人能够对《说文》有更多的理解，而且解释了不少经传中文字训诂的问题。不过，《说文》所载不完全是本字本义，《说文》所收也有不少是后起的本字，段氏不察，完全相信《说文》，也往往陷于错误。

段氏虽然注重《说文》的训释，但对于字的其他经常见到的训解仍然不放过。《经韵楼集》卷一“济盈不濡轨，传曰由辀以下曰轨”一条曾指出：“凡字有本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蔽与固皆不可以治经。”这是很重要的见解。关于引申义和假借义，他在《经韵楼集》卷五“亯饗二字释例”一条又具体举例说：

> 凡字有本义，有引申之义，有假借之义。《说文解字》曰亯者献也，从高省，曰象进熟物之形。引《孝经》祭则鬼亯之，是则祭祀曰亯，其本义也。故经典祭亯用此字。引申之，凡下献其上亦用此字；而燕饗用此字者，则同音假借也。《说文解字》又曰饗者鄉人饮酒也。从食，从鄉，鄉亦声。是则鄉饮酒之礼曰饗。引申之，凡饮宾客亦曰饗，凡鬼神来食亦曰饗；而祭亯用此字者，则同音假借也。

此下又详举《易》《周礼》《仪礼》等书为证，足与《说文》亯饗二字注互相发明。《说文》所说“亯，献也”，从古文字来看并不是字的本义。饗，古文字作鄉，象二人相向共进饮食，饗为后起字。《说文》训饗为“鄉人饮酒”也是后起的意义。但在经传中亯饗二字各有引申义和假借义是很清楚的。段氏能从字义的发展上看问

题，说明字有本义，又有引申假借之余义，这在传统的训诂学上无疑是一大发展。

段氏对于字义既然有这样的认识，他在《说文》注中说明字义引申的就有七百八十余条。例如：

1. 荟，许云："草多皃"（一下艸部）段云："引申为凡物会萃之义。"

2. 牢，许云："闲也，（段补也字）养牛圈也。"（二上牛部）段云："引申为牢不可破。"

3. 过，许云："度也。"（二下辵部）段云："引申为有过之过。"

4. 循，许云："行顺也。"（段改为行也。二下彳部）段云："引申为抚循，为循循有序。"

5. 世，许云："三十年为一世。"（三上卉部）段云："按父子相继为世，其引申之义也。"

6. 目，许云："人眼也。"（四上目部）段云："目之引申为指目、条目之目。"

7. 倍，许云："反也。"（八上人部）段云："此倍之本义。《中庸》为下不倍，《缁衣》信以结之，则民不倍，《论语》斯远鄙倍皆是也。引申之为倍文之倍。《大司乐》注曰：倍文曰讽。不面其文而读之也。又引申之为加倍之倍，以反者覆也，覆之则有二面，故二之曰倍。俗人鄙析，乃谓此专为加倍字，而倍上、倍文则皆用背，余义行，而本义废矣。"

段氏关于引申义是什么，还缺乏明确的解释。书中所举字义的引申，性质也很复杂，甚至于有很多不属于意义引申的一类也称之为引申，未免失之笼统。例如托意于此而寄形于彼的，不能算作引申；无字可写，只是借音的，也不能算作引申。可惜段氏没有能够细加区别。这需要另加评述。

段氏言字有古今，同时也注意到义有古今。例如：

1. 曾，许云："词之舒也。"（二上八部）段云："曰部曰朁曾也，《诗》'朁不畏明'、'胡朁莫惩'，毛郑皆曰：'朁，曾也'。按曾之言乃也。《诗》'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听'，《论语》'曾是以为孝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皆训为乃，则合语气。赵注《孟子》曰：'何曾犹何乃也'，是也。是以朁训为曾。'朁不畏明'者，乃不畏明也。皇侃《论语疏》曰：'曾犹尝也'。尝是以为孝乎，绝非语气。盖曾字古训乃，子登切，后世用为曾经之义。读才登切。此今义今音，非古义古音也。"

2. 瞻，许云："临视也。"（四上目部）段云："《释诂》《毛传》皆曰：瞻视也，许别之云临视。今人谓仰视曰瞻，此古今义不同也。"

3. 伴，许云："大也。"（八上人部）段云："《大学》注胖犹大也，胖不训大，谓胖即伴之假借也。《方言》《广雅》《孟子》注皆曰般大也，亦谓般即伴。《广韵》云：侣也、依也，今义也。"

4. 仅，许云："材能也。"（八上人部）段云："材，今俗用之才字也。……材能言仅能也。……唐人文字仅多训庶几之几。如杜诗'山城仅百层'，韩文'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又'家累仅三十口'，柳文'自古贤人才士被谤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元微之文'封章谏草繁委箱笥，仅逾百轴'。此等皆李涪所谓以仅为近远者。于多见少，于仅之本义未隔也。今人文字皆训仅为但。"

5. 骤，许云："马疾步也。"（十上马部）段云："小雅曰载骤骎骎。按今字骤为暴疾之词，古则为屡然之词。凡《左传》《国语》言骤者皆与屡同义。如'宣子骤谏公子''商人骤施国'，是也。《左传》言骤，《诗》《书》言屡，《论语》言屡亦言亟，其意一也。亟之本义敏疾也，读去吏切，为数数然，

数数然即是敏疾，骤之用同此矣。”

据此可知段氏不仅善于发明古训，而又能区别古义与今义，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观点的。

除此之外，段注中有关古今语音、文字、词义变移的说明极多。如四上鸟部“鸭”字下论鹦鹉之鹉本作鸭，音茂后反，鹉字为后起。六上木部“柴”字下说明古音缉盍两部字与脂祭两部字谐声相通。八上人部“俦”下辨俦字有徒到直由二切，意义不同，俦侣字唐宋前皆作畴，不作俦。又“偷”字下论偷字本音他侯切，训薄，后世音羊朱切，训为愉悦，非古音、古义。这种博举而详说的例子，对学者的启发很大。

段氏研究词义是从多方面来入手的，比较前代书传训诂的异同，形与音与义三者互求，这都是最主要的方法。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段氏取材很广，而推考词义，是从古书原文文句出发，而不是单纯依靠前人的注解。他把字书和训诂书的训解和书传文句中实际表现的词义联系起来考察，所以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一字多义的，段注在训释之外，兼举别义；数字义近义通的，则比类加以说明。义有歧异的，又详加辨析。（如二上八部“尔”字下和十二上“耳”下说明尔耳两字不能相混，八下欠部“歎”下指出歎嘆二字今人通用，而《说文》义训不同。）使学者可以闻一知二，繁复之中，自有条理。当时阮元等人编纂《经籍纂诂》，搜罗古书的训解极为详备，但是缺乏条贯。段氏与刘台拱书曾说：“《经籍纂诂》一书甚善，乃学者之邓林也。但如一屋散钱，未上串。拙著《说文注》成，正此书之钱串也。”（刘盼遂《段王学五种》经韵楼文集补编下与刘端临第二十四书）由此可见段氏抱负之大。

以上所论都是段氏所作的几方面重要的工作。总起来说，段氏《说文解字注》的成就是很多的。一方面，把许慎作《说文》的意旨和《说文》这部书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贯串全书，详加注释，使《说文》成为可读之书；另一方

面，段氏参考群书字训，就形音义三方面互相考校，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说明古书中文字的假借、意义的引申、古今语的异同，创通许多探讨词义的方法，继承了前代训诂学的优点，而又加以发扬，这样就使训诂的理论和方法都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段氏对文字形音义的探讨已经带有历史研究的性质，而且能从以往训诂学只作一字一义的孤立的说明转向注意全面系统知识的探索，这尤其值得重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以前只是经学的附庸，从清代乾嘉以来，才逐渐发展为专门独立的语言文字之学。段氏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段氏在注文中连带解决和说明的问题还很多。例如有关汉人训诂词例的解释（一上示部祇下释“当为”“读为”“读如”，裸下释“之言”，三上言部雠下释“犹”），有关一些古书体例的说明（如六下邑部“鄮”下指出《汉书·地理志》的地名“皆随其地语言为音”，十下心部“恐”下指出凡《释文》云“本又作”之下往往出古字），对学者都有极大的帮助。段氏书中除了写出自己的见解以外，别家有说可采的也一并录出。如惠栋、戴震、钱大昕、程瑶田、卢文、焦循、刘台拱、江声、姚鼐、王念孙、汪龙、陈鳣、江沅、陈奂等人有关名物训诂的解释都有择录，这更使读者能够开拓眼界，获得更多的知识。

段氏对自己的书也是颇为自负的。一则说茨长或许为知己（见《说文叙》注），一则说孰谓今人不可以胜古人（见十四上车部“軝”下评程瑶田说），足见胸中自有高低。但是，一个人的才力究竟是有限度的，这样一部大书，不能没有罅漏和缺点。何况成书的时候，已年近70，精力就衰，校订自不能周密。书中主要的缺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　校订许书，有时自信太过，流于武断

段氏《说文注》的长处在于征引广，有发明，有独到的见解。但有时过于自信，失之于武断。以校订许书而论，许书久经传写，

讹误自多，段氏校改篆文九十二，删篆文十九，增篆文二十二。原来的训释和字次也颇有改订，其中有些是比较可靠的，或者是符合许书体制的，但有些就缺乏足够的证据，那就应当以不改为是。

段氏对周代铜器文字既很少研究，（仅注意到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下“蕲”字下曾提到钟鼎文）对秦汉篆书石刻和汉人隶书也不重视，因此，在刊正篆文上就有时失之卤莽。例如齿部“龇”字，各本皆从齿从匕，许云：“毁齿也”。段云：“今按其字从齿匕，匕，变也。毁与化义同。玄应书卷五龇旧音差贵切，卷十一旧音羌贵切，然则古读如未韵之纍，盖本从匕，匕亦声，转入寘至韵也。古音盖在十七部。”案段据玄应所称旧音改龇字从匕，不可从，汉人隶书字皆从七，不从匕，许慎所录篆文一定也是从七。又如木部“本”字，许云：“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段氏依《六书故》所引唐本改作“木下曰本。从木，从丅。”篆文也改作从木丅。“末”字，许云：“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段氏改篆文作从木从丄。案《六书故》所引唐本不可信。本末都是属于指事字一类，不是会意字。秦泰山刻石，“本”字与《说文》相同。段氏不察，误据戴侗书改变相传的写法，未免武断。又如《说文》有“镏”无“劉”，段氏改“镏”作“鐂”，这是师心自用，一无是处。至于删增篆文，增改注文，问题更多。例如齿部删去“齗”字，足部删去“踞”字、“跛”字，木部删去“穋”字，日部“昧”字、“睹”字、“昕”字下注文“旦明也”都改作“且明也”，这些都极不妥当。不如只在注中说明，留待读者思考。

二　解释转注假借与许慎原意不合

《说文叙》所说六书转注一类，历来解说纷纭。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戴震根据《说文》考老互训以解释转注，而段氏又用戴震说把“建类一首”的“类”解为义类，“首”解为五百四十部部首，（《说文叙》注），认为数字展转互相为训的都是转注，因而转注又有“类见于同部”和“分见于异

部”之分。他又说：“转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文字者也。数字同义，则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这不仅与许慎原来举“考”“老”二字为例的情况不合，而且也自相矛盾。许慎既然说“建类一首”，依理只能限于同部之内，异部的互训字就不能算为转注。段氏所说合于“同意相受”，而不合于“建类一首”，无怪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批评段说与许书不合。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转注一类是否不属于文字孳生繁衍的一类。依照戴段两家所说就只是同义字的互相替代了。这与许说也不相符。刘台拱《转注假借说》曾经指出：“以一义生数字，谓之转注；以一字摄数义，谓之假借。随音立字，谓之转注；依音托字，谓之假借。”（《刘端临遗书》卷八）这种解释就比段氏所说要恰当得多了。不过，对于许慎所说“建类一首”的意思不谈，仍然与许说不完全相合。另外，许说假借为“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显然是专就最初本无其字而说的，而段氏偏偏又把古书中本有其字的同音假借与许说纠缠在一起，使汉人所指在文字发展过程中有借用已有文字不造新字的一种方式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了。这都与许氏原意不符。

三　解释许书训释颇有错误，有时甚至穿凿附会，强为曲解

许慎《说文》解说中的错误是很多的，但是在段注中而有原书不错也把它解错的。例如：

1. 嚏，许云：“悟解气也。”（二上口部）段云：“悟解气者，欠字下云张口气悟是也。悟，觉也；解，散也……许意嚏与欠异音同义。玉裁按：许说嚏意非是，不必曲徇。嚏之见于《月令》《内则》者各一。……《月令》民多鼽嚏之谓鼻塞而妨嚏。《说文》喷一下曰鼓鼻，而释嚏为欠，直以其字从口不从鼻故耳。殊不思《内则》既云不敢嚏，又云不敢欠，其为二事憭然。……故嚏解当改云歕鼻也为安。口与鼻同时气出，此字之所以从口也。”今案嚏与欠虽为二事，但同是自内出气，

许训嚏为悟解气，只能说不够明晰，而不能认为是错。任何人都能分辨嚏、欠，许慎不会如此无知。

2. 臑，许云："臂羊矢也"（四下肉部）段改许注为："臂，羊豕曰臑。"段云："各本皆作臂羊矢也。《乡射礼》《音义》引《字林》：臂羊豕也。《礼记音义》引《说文》：臂羊犬也。皆不可通，今正。许书严人物之辨，人曰臂，羊豕曰臑，此其辨也。"案羊矢《礼记·少仪》释文，《史记·龟策列传》注徐广引并同。钱坫《说文斠诠》说："坫考《素问》，羊矢脉穴名，近臂臑，是矢字未尝误也。"然则段氏改羊矢为羊豕，是以不误为误。今考医书，人臂肘上一节外侧曰髆，内侧曰臑。《说文》臑字也正与臂肘二字相厕，则臑并非专指羊豕臂而言。段氏强为之说，徒使人迷惑。王筠《说文句读》不从段说，极是。

3. 即，许云："即食也"（五下皀部）段云："即当作节，《周易》所谓节饮食也。节食者，检制之，使不过，故凡止于是之词谓之即。凡见于经史言即皆是也。《郑风》毛传曰：即，就也。"案古书中即没有训为节食的，段氏改即食为节食，可以说是向壁虚造。即字古书通训为就，许所说的即食就是就食的意思。至于虚词的即字与节食更没有关系，不能随意牵合。

段注中除了有误解许说的地方以外，还有不少牵强附会的说法。例如：

1. 禧，许云："礼吉也。"（一上示部）案"礼吉也"当依《广韵》作"福也，吉也。""福"误为"礼"，下又脱"也"字，所以错为"礼吉也"禧训福为古书通训，吉与福意义相近。段氏没有注意到今本文字有误，而解释为"行礼获吉也"，完全是望文生义，毫无根据。

2. 牛，许云："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二上牛部）此注件字严可均《说文校议》谓当作伴。段氏删大牲以

下七字，改为"事也，理也"，与马下训怒也，武也同例。段云："事也者，谓能事其事也。牛任耕。理也者，谓其文理可分析也。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案牛以事与理为训，已不尽可解，段氏又以《庄子·养生主》语说明牛有文理，尤为荒谬。

3. 用，许云："可施行也。从卜中。卫宏说。"（三下用部）案篆文用字不从卜中，卫宏说不可从。段氏既不加辩驳，反而说："卜中则可施行，故取以会意。"这完全是牵强附会的话。

4. 孚，许云："卵孚也。从爪子。一曰信也。"（三下爪部）段氏改"卵孚也"为"卵即孚也"。段于"一曰信也"下注云："此即卵即孚引申之义也。鸡卵之必为鸡，䲹卵之必为䲹，人言之信如是矣。"案孚信与卵孚并无意义上的联系，段说迂曲不可信。

段氏中误解曲解的例子还很多，不烦多举，读者当善于分辨。与其过而信之，不如多闻阙疑。

四　墨守许书，以为许书说解必用本字

《说文》所收的字有古字、有古今通用的字，又有不少异体字。其中有些字是现存古书中没有的。例如：

1.《说文》：㒳，再也；兩，二十四铢为一两。（七下㒳部）案㒳兩本为一字。金文㒳字上或加一横，小篆则写为兩，犹如甲骨文𠕁字上或加一作雨，小篆写为雨。许慎则㒳兩分为两个字，训解不同。㒳原来的意义不明，或说象物平分。《说文》说二十四铢为两则是假借义。现存古书中只有兩字，没有㒳字。

2.《说文》：㤅，惠也（十下心部），憂（爱）行皃也（五下夊部）。案㤅憂实为一字。㤅从心从旡，旡作憂加心字则成憂。《说文》把夊字作为一个字，训为行迟曳夊夊，因憂从夊，

所以训为行皃。古书慈爱字都作爱，不作㤅。

3.《说文》：跀，断足也（二下足部）；刖，绝也（四下刀部）案跀刖二字同从月声，一从足一从刀，但意义相同。

4.《说文》：坿，益也（十三下土部）附，附娄小土山也（十四下阜部）。案坿附二字同从付声，一从土，一从阜，从土从阜的字意义也有相通的，如《说文》阯或作址。坿附《说文》分收两部，训释不同。现存古书中坿益字多作附。

5.《说文》：屰，不顺也。从干下凵，屰之也。（三上干部）；逆，迎也，从辵屰声（二下辵部）。案屰甲骨文作屰，为大字倒文，象人从对面来。逆，甲骨文作逆，彳或作行，表示道路，止象人的足，此字从屰从彳，表示在路上与人相迎、相逢的意思。辵是后加的意符。《说文》屰字即由屰字变成，许慎说从干下凵，与甲骨文原意不合。现存古书中只有逆字，没有屰字。

6.《说文》：夅，服也，从夂中相承不敢并也（五下夂部）；降，下也，从阜夅声（十四下阜部）。案甲骨文降作降，金文同，象两足自阜上下降。另外没有看到夅字。《说文》分夅降为二字，而夅字训服，说从夂中相承不敢并。案降服当为降下的引申义。现存古书中只有降字，没有夅字。

7.《说文》：䁴，妙也（妙段改作眇），从人从攴，豈省声（八上人部）。微，隐行也，从彳䁴声（二下彳部）。案金文有䁴字，从火从攴。《说文》训妙，不是造字的本义。现存古书中只有微字，没有䁴字。

8.《说文》：叀，小谨也。从幺省，屮财见也，屮亦声（四下叀部）；專，六寸簿也，从寸叀声，一曰專纺專（三下寸部）；嫥，壹也，从女專声，一曰女嫥嫥（十二下女部）。案甲骨文有叀𠂤二字。后者从又。象纺锤形，可能就是《说文》專字下所说的一曰纺專的專。不过甲骨文專字读如惠，与惟字

通（见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音与専字不合。现古书中只有専字，没有叀嫥二字。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来看，《说文》中确实保存下了不少古字。这些字虽然不见于古书，但有一部分已在古文字中发现，足见许慎必有所本。不过《说文》的训释未必都是造字的本义。如网、夅、敚、叀都是。另外，《说文》中也有不少的字是晚周或秦汉时期所产生的，其中有些可能是异体字（如跀），有些可能是后起本字或有意加以区别的字（如絜、悄、殚、迻之类），情形非常复杂。文字的产生有先后，而古书的时代又有不同，历久传写，也会发生不少的改变。所以《说文》中有些字不见于现存的古书，古书中所写的形体和字的意义也不能都与《说文》相同。

《说文》是一部注重分析文字形体的书，许慎解释字义自然倾向于就形说义。因此，恖训惠，夋训行夋，夅训服，降则训下，敚训妙，微则训隐行。就形以说义固然容易得字义之本，但有时也会失之于牵强，如说"彳"，小步也；"支"，去竹之枝也；"叀"，小谨也；"叉"，物落上下相付也；"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等等。都与古文字原来造字的意义不合。《说文》既主就形说义，有些字不止一个意义的，也就只取其与形体相应的写上，其他大都舍弃不录。这样，《说文》本身就有得有失。学者应当善于抉择，取其是而违其非，不能信守不替；认为许慎所说的完全都是对的。其实，许慎著书的目的在于遵修旧文，博采通人，使学者不为误说所蔽而已。

段氏理解到许慎因形说义的精神，但又为许书所囿，认为《说文》所载的形体义训都是本字本义，凡古书中的字与《说文》不相符的统称为假借，这就把文字的形义死守在《说文》上而不能通权达变了。本字本义在研究文字训诂的时候是要讲的，可是必须从具体的例子来确定，不能一切都以《说文》为准。因为《说文》只是代表后汉许慎一家之言，而《说文》中所收的字包括由汉以上多少

世纪内所产生的字，不是平面的一个时期内所造的，许慎给每个字所加的训释只是就他当时所能知道的采用，而不能说这些训释都合乎造字的原意。段氏倡本字本义之说，对解释文字形义的发展是有用的，可是完全根据《说文》衡量一切古书，反而局隘，不符合古代使用文字的情况。

创制文字和使用文字都是在矛盾中不断发展的。从创制来说，字少则不敷应用，势必逐渐增多。有的就一个字增加偏旁而分化为两个字，以表示两个不同的意义；有的由于语转或其他原因，由同一个意义而产生两个不同的字。可是形体繁复，则不便于书写；文字数量过多，则又不便于使用。在这种矛盾情况下，字体必然要向简化方向发展，在用字方面，也必然要趋于以简驭繁。因此在形体方面，大篆变为小篆，而又转变为隶书、楷书。在用字方面，凡是不必要的，就废置不用，而取其应用比较广泛，意义相类的字来代表。如用懷、稱、卒、交，而不去用褱、爯、猝、这。有些已经通行的假借字，即使后来又产生了本字，这种后起的本字也未必为群众所采用。所以在使用文字方面，既要固定，以防止写别字，同时又要在纷繁的文字系统中求其适用，避免繁杂。以简驭繁，就是用字的历史规律。

段氏不了解这种情形，胶执在《说文》的本字本义上，把具有不同文字层的《说文》看成是一个平面的总和，在《说文》注中每言“某当作某”，或“某古作某”，“某行而某废”，这都是就《说文》的训释来安排的。其实，有不少字是后起的，或是在某个时期所产生的异体字，一般书籍中未必广泛应用，甚至还有人很不熟悉，并非两者都处于同样的地位而抉择取舍，有意要废去哪一个。有些字很可能始终就不曾流行过。字书中虽然兼收并蓄，而用字的人还是要合乎约定俗成，还是要循着以简驭繁的规律，因此段注所说“某行而某废”的话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某字古书罕用，通作某字，那就恰当多了。

段氏最大的误解在于认为《说文》注解必用本字。十四上金部铨字，许云："温器也。"段氏改"温"为"昷"，注云："昷，各本作温，今正。许书温系水名，昷训仁也，故引申为昷煖字。煖下曰昷也，㬈下曰安㬈昷也。凡经史可借用温，而许书不宜自相矛盾。凡读许书者知此，则九千三百余文之说解，绝无不可通之处矣。盖非用其字之本义，即用其字之引申之义，断无有风马牛不相及者也。温训水名，此云温器也，是为风马牛不相及矣。昷器者，谓可用煖物之器也。"他在注许慎《说文叙》六书假借下又说："如许书每字依形说其本义，其说解中必自用其本形本义之字，乃不至矛盾自陷。而今日有绝不可解者，如㥢为愁，𢚧为行和，既画然矣，而愁下不云㥢也，云𢚧也，……但为裼，袒为衣缝解，既画然矣，而裼下不云但也，云袒也；如此之类，在他书可以托言假借，在许书则必为转写讹字。盖许说义出于形，有形以范之，而字义有一定，有本字之说解可以定之，而他字说解中不容与本字相背，故全书讹字必一一诂正，而后许免于诬。许之为是书也，以汉人通借繁多，不可究诘，学者不识何者为本字，何义为本义……故为之因形以说音义，而制字之本义昭然可知。本义既明，则用此字之声而不用此字之义者乃可定为假借。本义明，而假借亦无不明矣。"

这些话正如钮树玉所说是自立条例（《说文段注订叙》），与实际不相符合。一则因为许慎生当后汉，当时通行的是隶书，许慎通习《五经》，《五经》都是习用之字，他绝不会应用经史古籍罕用之字；一则从本书来看，注文中不用本字本义的不可胜数，如"省声"的"省"，不作"媘"，"人用己私"的"私"不作"厶"，"微"不作"敚"，"専"不作"嫥"；由此足见段氏所说不足置信。段氏注许书遇两字则改为网，左右则改为𠂇又，私改为厶，微则改为敚，温则改为昷，居处字则改为凥，徒然自扰。有些字由于《说文》训释与古书通用的字义不同，段氏也就拘泥许说，论定用字的是非。例如：

1. 迁，许云："进也。"（二下辵部）段云："干求字当作迁，干犯字当作奸。"（案《说文》：干，犯也；奸，犯婬也。）

2. 龠，许云："乐之竹管"（二下龠部）段云："此与竹部籥异义，今经传多用籥字，非也。"（案《说文》：籥，书僮竹笘也。）

3. 敟，许云："主也。"（三下攴部）段云："按凡典法、典守字皆当作敟，经传多作典。典行而敟废矣。"（案《说文》：典，五帝之书也。）

4. 晐，许云："兼晐也。"（七上日部）段云："按此晐备正字，今字则作赅，赅行而晐废矣。《庄子》《淮南》作赅，今多作该。"（案《说文》：该，军中约也。无赅字。）

全书类此者极多。影响所及，下笔从《说文》，反为局隘。如俞樾曾作《考定文字议》（见《宾萌集》），提倡用字要用正体，要用本字本义，一切都以《说文》为准，后来有些人著书也好用《说文》本字，表面似乎尊崇汉学，则古称先，实际上与许氏精神不合，完全是一种复古思想的表现，缺乏历史发展的观点。

五　段注中所说意义的引申，类例不清，有些不是引申而列为引申义

段氏讲字义有本义，有引申义、有假借义，这对研究字义的发展和一词所以多义很有帮助。可是哪些算是引申义，哪些不是引申义段氏并不曾划分清楚。例如：

1. 薄，许云："林薄也。"（一下艸部）段云："按林木相迫不可入曰薄，引申凡相迫皆曰薄。如外薄四海、日月薄蚀皆是。"

2. 盖，许云："苫也。"（一下艸部）段云："引申之为发端语词。"

3. 莫，许云："日且冥也。"（一下茻部）段云："且冥者，将冥也。……引申之义为有无之无。"

4. 羽，许云："鸟长毛也。"（四上羽部）段云："长毛别于毛之细缛者。引申为五音之羽。"

5. 而，许云："颊毛也。象形。"（九下而部，颊毛也段改为须也）段云："引申假借之为语词，或在发端，或在句中，或在句末。或可解释为然，或可解释为如，或可解释为汝。……"

6. 独，许云："犬相得而斗也。从犬蜀声。羊为群，犬为独。"（十上犬部）段云："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引申假借之为专一之称。《小雅·正月》传曰：独，单也。"

这里段氏所说的引申义都与字的本义无关，这只能说是假借。"羽"字本为鸟长毛，五音之"羽"更是假音，无所谓引申。"而""独"二字下又用"引申假借"为说，把两者混在一起，足见他自己也把握不准了。

段氏谈意义的引申，主要是根据《说文》的训释。他认为《说文》的训释都是字的本义，因此把与本义有关的意义都称为引申义。但是《说文》的训释未必与古文字所表现的造字原意相合。例如许慎说：行，人之步趋也；孚，卵孚也，一曰信也；画，界也；既，小食也；有，不宜有也；这些都不是造字的原意。从篆文和古文字的写法来看，行为道路，孚即俘字，画即规画，既为食已，有象以手持肉。许慎的训释既然不是字的原意，段误据许训以推论意义的引申自然难得正确。许慎去古已远，有些字原意如何，许慎也无从知道，我们不宜责备许慎，可是段氏过信许书，则反生纰缪。

所谓引申义，必须是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意义。例如"牢"为养牛马圈，引申为牢固；过为度过，引申为过失；世为三十年，引申为父子相继曰世；谢为辞谢，引申为凋谢；列为分解，引申为行列。但是有些字原来的意义并不清楚，有的意义与许慎所说又毫无关系，这样就无从称之为引申。有些可能是两

个词。例如“甫”字，许云：“男子之美称也”（三下用部）段氏云：“以男子始冠之称，引申为始也，又引申为大也。”案甫训始训大与男子之美称无关，不得谓之引申，段氏强为之说，不足取信。又如“方”字，许云：“併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八下方部）段氏云：“《周南》‘不可方思’，《邶风》‘方之舟之’，《释言》及《毛传》皆曰：方泭也。……泭者，编木以为渡，与併船异事，何以毛公释方不曰併船，而曰泭也？曰併船编木其用略同，故俱得名‘方’。方舟为大夫之礼，《诗》所言不必大夫，则释以泭可矣。若许说字，则见下从舟省，而上有并头之象，故知併船为本义，编木为引申之义，又引申之为比方，‘子贡方人’是也。……又引申之为方圆，为方正，为方向。”案甲骨文方作㐭，不从两舟省，许说方为併船，不是本义。至于段氏所说比方与方舟或者有关系，而方圆的方与併船无关是可以肯定的。段氏笼统谓之引申，反而把引申义的含义弄模糊了。由此足见段氏对于意义的引申还缺乏精细的研究。

研究词义，联绵词跟一般单音词是要分别处理的，联绵词是否由其中的单字意义引申而来，更应当注意，不能随意解释。例如“訇”字，许云：“骇言声。从言匀省声，读若玄。”（三上言部）段改骇为駭，注云：“駭，各本作骇，依《韵会》订。此本义也。引申为匉訇大声。”案段改骇为駭，所以说引申为匉訇大声。匉訇即軿訇，张衡《西京赋》云：“奋隼归凫，沸卉軿訇”，沸卉，軿訇都是叠韵。李善注：“奋迅声也。軿，芳耕反，訇，火宏反。”此与许训骇言声不相关。又如“弟”字，许云：“韦束之次弟也。”（五下弟部）段云：“以韦束物，如辀五束，衡三束之类。束之不一，则有次弟也。引申之为凡次弟之弟，为兄弟之弟，为岂弟之弟。”案岂弟为叠韵。《诗》云：“孔燕岂弟”，“岂弟君子”，都是乐易的意思，与次弟的意思无关。段氏把这一类联绵词与本字意义不相涉的也都视为引申，那是错误的。

以上都是段注的主要缺点。其他毛病，仍然不少。如引文有误，出处不详；重古轻今，好言正俗；前后异议，互相矛盾；论音昧于双声，有时与叠韵相混；注中有时夹叙一些封建的理学的迂腐之论，这些都不再详举。

总之，段氏这部书虽然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但不无瑕疵。他自己曾说："剖析既繁，疵纇不免，召陵或许知己，达者仍俟后人。"（许慎后叙注末）他一方面自许有得，一方面也想到仍然免不了有缺点。我们读段氏的书也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尺度衡量他的得失。从大的方面来看，段氏的学识是丰富的，他的长处在于有见解，他能看到古今语言文字是有发展的；要研究语言文字，必须形音义三者相结合，不应当忽略三者之间的关系；他重视知识的实际运用，从反复考索材料而增加了不少理论知识，使传统的训诂学获得新的发展。这些都是他的优点。但是他在当时汉学盛行的空气下，由崇信许郑而墨守许书，不肯应用篆文以外的材料，来分辨许书的是非；而且对文字在使用上以简驭繁的道理缺乏认识，强分此疆彼界，而忽略许书本身的历史性和它的局限性，因此注中有些地方比较圆通，有些地方就非常沾滞。在某些方面他是有独到见解的，但是，有时又蔽于己见，改动许书，甚至说"凡此校正，私谓必符许意，知我罪我，所不计也。"（十四上金部鐈字下），足见自负之甚。不善于阙疑，强以为知，那就难免发生罅漏了。这些都是他的缺点。因此我们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理解段注，先从总的方面认清它的得失，再看其中每个字的解释，也就容易知所去取了。

前人评论段注，每多似是而非之论。或如徐承庆之流，好为诋诃，专攻其短，而学识远不及段氏。古人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必须深造自得，了解他的意旨所在，才能正确地评议他的得失，才不致见其小而遗其大。清同治间马寿龄作《说文段注撰要》，所注意的只是文字一方面，其他无所择录，还不能算为撰要。段注

在过去的影响很大，所以不能不举例略段注的得失，使初学者不致为注文浩瀚所苦，迷惘而不知取舍。对段氏的缺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至于段氏的成就，上文所说也仅是就书论书，想要变为具体可用的能发展我们语言学的东西，还需要经过分析改造才行。

中国文字学发展的历史①

战国秦汉间的识字书

中国的文字学已有长久的发展历史。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学童识字的字书。班固《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载《史籀》15 篇，他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史籀篇》早已亡佚，许慎（58? —147?）《说文解字》还保存了二百多字，字形繁复，跟春秋到战国初期的铜器文字很接近，据王国维（1877—1927）推测，《史籀篇》应是秦国早期教学童的识字书。"籀文"就是战国时秦国所使用的文字，籀文也称为"大篆"。

后来，秦始皇兼并天下，实行统一文字，李斯等又改《史籀》大篆为"小篆"，字形既求其整齐方正，笔画又要求简化，偏旁写法也要求一致。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文字整理工作，对后代汉字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为教学童，李斯又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些书无疑问都用小篆来写，对推行小篆、统一文字也起了重要作用。汉代初年把三部书合在一起，总称为《仓颉篇》。这种书既为学童识字而设，所以编为韵语，以便记诵。《仓颉篇》久佚，从前代古书所引和近代自居延所得汉代木简中的《仓颉》残简来看，我们知道《仓颉篇》是四字一句，两句

① 本文写于 1985 年 10 月。载于《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7 月出版。

一韵，开头是“仓颉作书，以教后诣”。《汉书·艺文志》说：“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所谓“正读”就是能认识是什么字，能知道字的读音和意义。“仓颉篇”本用小篆书写，汉代隶书盛行，也就用隶书来写了，所以传习不绝。

到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凡将篇》是七言韵语，据说没有重复的字。《急就篇》则是三言、四言、七言，而以七言为主。三言、四言隔句一韵，七言每句押韵。到平帝时扬雄又作《训纂篇》，去《仓颉篇》的重复字，凡 89 章，5 340 字。这些书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汉代通行字书的样式。《仓颉篇》既多古字，到后汉光武帝时张敞外孙之子杜林作《仓颉故》，以解释其中的字义，这是字书有注解之始。《汉书》说：“世言小学者由杜公”（《杜邺传》），等于说文字之学创始于杜林。

“六书说”与文字学的建立

汉代通行使用的文字是隶书，对文字有研究的是一些古文经家。“古文经”是六国晚期的写本古书，如毛诗、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古文论语等都是用六国时期的古文字写的，跟篆书不同。古文经家在朝廷秘阁校书，他们能看到许多古书，他们从篆书和古文籀文中分析出造字的条例，创为“六书”说。“六书”的名称曾见于《周礼·保氏》。汉人所称的“六书”细目始见于《汉书·艺文志》。《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大都本于刘歆《七略》，刘歆是古文经家，所以很明显，“六书”说是古文经家创造出来的。这种造字条例的分析成为早期文字学理论的一部分。到汉和帝时，侍中贾逵的

弟子许慎根据六书进一步分析篆书的形体结构，建立研究文字体系的方法，作《说文解字》十四篇，按照偏旁分为540部，始“一”终“亥”，凡同从一个偏旁的都列在一起，同条共贯，杂而不越，每个字的解说都兼顾形音义三方面，这是极大的特点。全书以小篆为主，兼收古文、籀文，共收字9 353字，重文1 163字，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最有创造性的字典，在中国也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字典。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和古音古义，对研究文字的功用极大。中国文字学在这时已经建立起来了。后代许多字书都仿照《说文解字》的体例，按部首编排文字，这种方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应用。

魏晋南北朝的字书

在汉代篆书不通行，通行的是隶书和草书。《说文》的正文是篆书，在社会上不易通行，所以晋任城人吕忱作《字林》七卷，用隶书书写，全书沿袭《说文》的编排方法，仍分为540部，而收字有12 824字（见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比《说文》多3 671字。在唐代这部书跟《说文》同为士林所重，但到宋代以后反而亡逸，清人任大椿始有辑本。南朝梁代，又有吴郡人顾野王编纂一部《玉篇》，共分三十卷，仍沿袭《说文》的编法分为542部，但是部次有变动。书中每字下详举字义，并引证经传文句和注解，这是前所未有的。字有异体，则分列在两部或数部，也跟《说文》列于一字之下不同。全书收字达16 917字（见《封氏闻见记》），又比《字林》多4 000多字，反映文字在随着语言不断发展。这部书在唐代跟《说文》一样流行，一直流传至今。不过，今本《玉篇》是唐代孙强的增字本，注文已大加删节，宋人重修，名为《大广益会玉篇》，跟顾野王原书的面目全不一样了（参见《大广益会玉篇跋》）。

魏晋南北朝的文字学，主要表现在编纂字书上，一是多收罗古

今异体，二是多列举训释例证，原原本本，信而有征。这两方面对后世字书的编纂都有很大的影响。如宋代的《类篇》，明代的《字汇》《正字通》，下至清代的《康熙字典》，都合于《玉篇》的格局，广采众书编纂而成。其次，魏晋时代有关文字的杂书也不少，如魏张揖的《古今字诂》《杂字》《埤苍》，晋王义的《小学篇》，晋葛洪的《要用字苑》，宋何承天的《纂文》，齐王劭的《俗语难字》，梁阮孝绪的《文字集略》等都见于前代史志，唐人书中引到的很多，他们对文字跟语言的实际配合以及俗语今义之类都极为重视，这是一大特点。可惜这些书今已亡佚无存。在魏晋时代“仓雅之学”盛行，“仓”即《仓颉篇》，“雅”即《尔雅》。《尔雅》是汉初的小学家所编的解释词义的书，张揖、郭璞学识都极为渊博。郭璞尤精于训诂，著述亦多。

唐代的刊正字体与说文研究

南北朝时期解散隶体，行书、草书、楷书盛行，字的写法日趋于混乱。如“恶”写为“恧”，“鼓”写为“皷”，“席”写为“席”之类，（见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都是一些别字讹体。所以到隋唐时代开始刊正文字。隋代曹宪曾著有《文字指归》四卷，到唐代贞观年间秘书监颜师古校正经籍作《字样》一卷，以刊订字体。基本精神是折衷于篆隶正俗之间，取其适中，以为楷法。后来他的侄孙颜元孙又作《干禄字书》，分字为正、通、俗三体，提倡高文典策应当用正体。其后唐玄宗有《开元文字音义》一书，以隶书居首，而以篆书附下，以确定楷体的写法。到唐代宗大历中张参又作《五经文字》一书，根据《说文》《字林》《经典释文》等书审定字体；文宗太和开成间唐玄度又作《新加九经字样》，补充《五经文字》所不备，由此楷书有了一定的规范。这是文字学史上在整齐文字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唐代本是韵书盛行的时期，虽然也有人编制了很大的字书，如武则天的《字海》就有一百卷之多，但是没有传布，反之，在社会上却有不少记载日常用语的书，如敦煌古书中的《时用要字》《字宝》《碎金》《俗务要名林》等，自成一类，很切合实用。

《说文》在唐代虽为应“书学”考试的人所必读，可是因为有《玉篇》《切韵》可以检字，就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说文》的价值去从事整理工作。大历中李阳冰精于篆书，曾刊定《说文》，很多荒谬无稽之说，徒知篆法，不足以言学。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南唐徐铉、徐锴兄弟二人才精究许书，而徐锴尤为精通。徐铉入宋后曾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使《说文》流传至今。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这是《说文》最早的注本。徐锴认为“文字之义，无出《说文》”，所以把许书比之于经，而称自己的解释为传。《系传》的主要工作是疏证许说，引书以证古义，并且从文字的谐声偏旁和字音上推寻语义的本源，创见很多，在文字方面特别说明古书中字有假借，由于时移世易，字义有古今之异。辨析精审，在文字学史和训诂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徐锴又有《说文解字韵谱》十卷，把《说文》的字按韵书的韵部来排，颇便于检索。

宋代的金石文字之学

五代末和宋代初年好古之士注意搜集古文奇字，编纂成书，如郭忠恕的《汗简》，夏竦的《古文四声韵》都是。他们所根据的材料主要出自书本和一部分的石刻。可是，后来商周钟鼎彝器出土日渐增多，有些学者如刘敞、杨南仲、欧阳修等开始从事古器物的著录和研究。一方面摹绘器形，一方面试着认识铭文。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蓝田吕大临作《考古图》，并作了释文，这是属于古文字学的第一本书。他虽然只认识了几百字，但是为古文字学的建立开创了道路。后来类似《考古图》的书有王楚的《宣和博古图》，

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专录铭文的有南宋绍兴年间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专门集录文字的有王楚的《钟鼎篆韵》。后来薛尚功又作《广钟鼎篆韵》，集录的文字稍稍加多，这是清代学者研究钟鼎文字的先驱。

宋代不单是对钟鼎彝器文字开始进行研究，而且对石刻文字也很注意。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都有关于石刻的记载。在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洪适作《隶释》一书，凡二十六卷，收碑碣258通，专门研究汉碑的隶书，考证不少文字的假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材料，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宋元间的六书之学

六书自东汉人提出以后，应用六书来研究文字构造的不多。宋代王安石作《字说》，过分强调形声字的声旁有义，把形声字都解释为会意字，六书就缺其一。南宋时郑樵创新，不用《说文》系统，专用六书作文字体的分析，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立330母为形之主，870子为声之主，合为1 200文成无穷之字。他把《说文》的540部归并为330部，开后人归并部首之先河。他的学说保存在《通志·六书略》里。宋末元初戴侗作《六书故》，则不用《说文》部目，而另分为九部。一曰数，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动物，六曰植物，七曰人事，八曰杂，九曰疑，分为三十三卷。文字以钟鼎文为主，注用隶书，以六书说明字义，颇有创见，可惜不为人所重视。元世祖时杨桓又作《六书统》二十卷，用六书来统摄文字，先列古文大篆，次列钟鼎文字，再列小篆。他想利用古文字来推寻造字本意，但为六书所囿，类例庞杂，反不足取。

明代的《字汇》和《正字通》

自许慎作《说文解字》创以形旁编排文字的方法以后，《字林》《玉篇》和宋代的《类篇》都仿效《说文》而作。惟《玉篇》稍变许氏部次，而把字义相近的序列在一起，《类篇》则一如《说文》原来的部序不改。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05），梅膺祚作《字汇》十二卷，另外创制新的排列法，具有革新精神。他按照楷书笔画多少排列部目，自一画至十七画列为214部，而一部之内的字也按笔画多少排列次第，这是很便于检查的一种新方法。因为从篆书变为隶书，部首之间已经很难据形系联，为便于查检，势不得不以笔画多寡为序。所以后来的字书如崇祯末年张自烈、廖文英所编的《正字通》，清康熙年间所编的《康熙字典》都沿袭承用，至今还是编排检字常用的方法。

《字汇》收字以见于《洪武正韵》的为主，兼采经史中常见的字，怪僻的字一律不收。注释比较简要，在明代极为流行。《正字通》就是根据《字汇》而作的。全书也分为214部。不过收字多于《字汇》，注解也增繁，并援引前代书籍为证，兼及一般俗语意义，虽稍嫌芜乱，然比宋代的《类篇》切于实用。清代的《康熙字典》也就是以《正字通》为蓝本修辑而成。收字加多，例证更加充实，惟成于众手，不无错误。道光年间王引之奉命作《字典考证》十二卷，刊正其误。

清代的说文之学

中国文字学到了清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这跟考证经史，推重汉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要通五经就不能不通小学，而小学里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说文》，所以《说文》之学在清代最为盛行，以说

文学名家的很多。段玉裁（1733—1815）有《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解字注》十五卷，桂馥（1733—1802）有《说文义证》五十卷，王筠（1784—1854）有《说文释例》二十卷和《说文句读》三十卷，钱坫（1744—1813）有《说文斠诠》十四卷，朱骏声（1788—1856）有《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其他有关《说文》的论述极多，不胜枚举。

他们对《说文》的研究，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校勘许书。《说文》经过历代传写到宋代刻板，讹夺已多，明代毛晋、毛扆用宋本雕，又出现一些错误，所以段玉裁首先根据不同的宋刻本和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以及其他古籍校订汲古阁本的讹误。段氏以后又有几家刊正《说文》，进一步改正宋以后传本的疏失。

（二）解释许书的体例。为读通《说文》，首先要了解《说文》的体例。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里最先指出《说文》中有注文连篆文读例。如“参”字下注文是“商星也”，应读为“参商星也”。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更随注阐发许书通例，王筠极为推重，王氏又作《说文释例》一书，多所发明。后来又有人对《说文》中的“一曰”、“读若”、引经等等作考证。

（三）疏证许书的训解。《说文》中保存了很多的古字古义。在清代最先注解《说文》的是段玉裁。他引证经传子史来解释许说，并且从形体和声音两方面说明字义，最有创见。同时注《说文》的还有桂馥、王筠。桂馥的《说文义证》搜集的古书训解最为完备，对研究许书的训解很有帮助。后来王筠又参照段、桂两家书作《说文句读》，简当易读。

（四）说明古今字和假借字。文字在使用上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古有今。段玉裁说：“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广雅疏证序》）许慎书中有些是古字跟后代通用的字形不同。清人研究《说文》，根据许书的训释

而说明古某字与今某字相当，以见文字的孳乳和演变。古人写字，有时同音或音近假借。古书所以难读，往往由于文字有假借。清代研究《说文》的人，如段玉裁、王念孙、桂馥、朱骏声对古书的假借字都有所发现，解释了不少经传中文字训诂的问题。

（五）根据《说文》的谐音字研究古音。古音的研究自宋代就已经开始。郑庠有《古音辨》，吴棫有《韵补》。到明代陈第又作《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主要都是根据《诗经》和《楚辞》等韵文考察古韵。到清代又开始注意到文字的谐声。段玉裁据《诗经》押韵分古韵为十七部，又按照《说文》的文字谐声系统把声旁按十七部列为谐声表，以与《诗经》押韵情况相印证，在考证古音方面创出另一种方法，识见超卓，引起很多学者注意。后来就出现不少《说文谐声谱》之类的著作。影响所及，也就有人利用文字的谐声系统研究古声母的类别了。

（六）根据《说文》的文字谐声系统因声以求义。形声字声旁相同的字，其意义有时相近或相通，在清人的小学著作中，段玉裁阐发的最清楚。他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广雅疏证序》）又说："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解字注》示部禛字注）他在《说文注》里举出很多谐声字声中见义的例子。如凡于声字多训大，凡从皮之字有分析之意，凡巠声之字皆训直而长者，如此之类很多。这样把形音义贯串在一起来研究，执简驭繁，掌握规律，使知识条理化，成为新的语言文字之学，这是前所未有的。

近代的古文字学

清代学者除了研究《说文》篆书以外，也还注意到隶书和草书。如顾蔼吉有《隶辨》，翟云升有《隶篇》，石蕴玉有《草字汇》，都是属于字典的性质。可是自乾隆嘉庆时期起，金石学特盛。清朝

官修的《西清古鉴》和《宁寿鉴古》著录的是宫内所藏的钟鼎彝器，而在民间又不断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仅摹为图录，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铭文，古文字学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文、石鼓文、古玺和古陶文字。同治间，吴大澂著《字说》，提出一些文字的新解释，他又作《说文古籀补》搜集了各种古文字材料以增补《说文》，为用古文字与《说文》籀篆相对照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一百年之间，集录铜器铭文的，在阮元（1764—1849）的《积古斋钟鼎款识》之后，有吴式芬（1796—1856）的《攈古录金文》，吴荣光（1773—1843）的《筠清馆金文》，方濬益（？—1899）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著为图录的，有吴大澂的《恒轩吉金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品类繁多，盛极一时。关于文字的研究，如刘心源的《古文审》，孙诒让的《古籀拾遗》《籀高述林》《古籀余论》等书对研究金文都有所发明，而孙诒让倡偏旁分析尤为重要。

到了近代，古器物收藏家更注意摹拓传印。罗振玉（1866—1940）对影印铜器铭文不遗余力，有《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罗甚富，为研究铜器铭文提供极大的便利。王国维又作有《金文著录表》，把前人书中已著录的钟鼎彝器都注明见于何书，学者也就可以按图索骥，检视原书了。

引起古文字学家有更大兴趣的是商代甲骨卜辞的发现。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古文字学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王懿荣、刘鹗首先搜罗甲骨。刘鹗又印出《铁云藏龟》一书，学者大为惊喜。孙诒让开始认识甲骨文，写出《契文举例》，后又作《名原》，对汉字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理解。

后来甲骨文出土的数量越来越多。罗振玉把他历年收藏的汇编为《殷墟书契》前后编印出，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作《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又根据卜辞考证商代

的先公先王，成就独多。在罗、王之后，已故的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有董作宾、容庚、郭沫若、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孙海波等人。这些人里，容庚有《金文编》，孙海波有《甲骨文编》，都按《说文》部次编排，等于是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董作宾曾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最先提出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并作有《殷历谱》。陈梦家有《殷墟卜辞综述》一书，对甲骨卜辞作了全面的说明。郭沫若、唐兰、于省吾三家著述极多，他们在考释甲骨文、金文两方面都各有发明，成绩超卓。在文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建树较多的是唐兰。唐兰论文字的构成破除六书说，而倡三书说，即象形、象意、象声，以三书范围一切文字，这是一种新的见解。（见唐兰《中国文字学》）

现在古文字的研究正在蒸蒸日上，甲骨文、金文都有集录在一起的书，如《甲骨文合集》《金文合集》，为研究提供了方便。近些年来，出土文物日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陶器、货币以及秦汉的竹简、木简、汉代的帛书都是研究的材料，古文字学定将有更大的发展。

结　语

根据上面的叙述，中国文字学发展的历史按照时代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时期：

（一）秦汉时期。秦代到西汉以编纂学童的识字书为主。东汉时期古文经家注意研究相传的篆文、古文、籀文，分析造字的原则，创“六书”说，开始建立文字学。和帝时，许慎作《说文解字》，以篆文为主，兼采古文、籀文，按形体偏旁编排文字的方法，分别部属，据形系联，成为中国第一部字典，影响极大。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文字逐渐增多，一字往往有异体，而且有不少增益偏旁的字，因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注解详细

的字书，同时也出现了按韵编排文字的韵书。还有解释古今字和俗语、俗字的书。这个时期是编纂字书的时期，自东晋以后，也是音义书盛行的时期。

（三）隋唐时期。这个时期为了确定楷书的规范，减少南北朝时期的别字讹体，因而有“字样”之学，目的是确定楷法，使楷书趋于定型。在这个时期内虽然韵书盛行，但是在文字形体方面仍尽量要求纯正，对正体、俗体分别很清。这个时期内，除刊正文字的书籍以外，还有很多属于《时用要字》一类的书和编纂日常口语词汇的书，这类书在社会上颇为流行。唐代篆学衰微；注意篆法的只有李阳冰堪称独步。到五代时，南唐徐锴始有《说文解字》的注解，成为一家言。

（四）宋元明时期。宋代有了《说文》的刻本，字学开始复兴。始而学者注意搜集古文字，编订成书；继而开始根据古器物和古代石刻等实物从事古文字的研究，为文字学开辟了一条新路。古文字学随着古器物学的兴起而建立起来。铜器的铭文由收录于古器物的图录中而被摹录为法帖，成为研究古代文字和文化历史的资料。由南宋到元代又有杰出之士，重新利用六书探讨文字制作的原则，虽时有新解，而所立类例不免支离破碎。明人承其弊，除编有新的部首检字的字书和刊正俗体字者以外，虽有述作，但大都无可取。

（五）清代时期。清代是经学昌盛的一个时期，要通经传，就不能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所以文字学也随之而兴盛。乾嘉之际，学者尊崇汉学，《说文》的研究最为盛行。他们以古音知识为基础，把文字、音韵、训诂融会贯通，向新的语言文字学的方向发展。道光、咸丰间学者注意到以钟鼎文字与《说文》篆书相比较。同治、光绪间钟鼎文字研究成为文字学的新领域，到近代就有了极大的发展。

（六）近代。近代学者对文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研究的资料包括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玺印、竹简、木简、绢帛、石

刻等所有的古文字和唐宋元明书籍中的俗体简字，而且研究内容之广泛为前所未有。不单纯局限于识字，由识字进而涉及到语词文句的意义和语法结构。有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更由古文字以考证古史和古代的社会文化。研究的方法特别重视分辨材料时代的早晚。例如甲骨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铜器铭文分西周和春秋战国来诠释。多数学者能破除“六书”旧说，根据古器物上的文字探求古人造字的原则和字形结构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从形体上考索字的本义跟引申义的关系。因此文字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语文教育的一部分。语言文字学家又从事整理汉字和简化汉字的工作，以促进汉字规范化，使汉字更好地为记录汉语服务。所有这些都是近代的新成就。

汉字的优越性[1]

刚才听了几位先生的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也可以说深得我心。我感觉事实就是事实，凡是科学的东西，总不是随便就能驳倒的。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认识本来是逐渐深入的。过去，我也没在这方面很好地做些钻研，去体会汉字的发展状况，尽管从事教学，讲文字学，讲训诂学，讲音韵学，讲字形、字音、字义……，而到底，却没有研究汉字在我们数千年的应用当中为什么能够不动地一直延续下来？这是个理论问题，确实需要分析和研究。

今天参加这个会受益匪浅。听了袁教授、钱老、安老的讲话[2]，觉得对于汉字性质的认识有所提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常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比如说汉字难写，我也觉得是难写，有的地方很麻烦是不是？繁体字笔画特别多。可是呢，我也写了好几十年了。今年 77 岁了，也没觉得特别难。遇见外国留学生，我就问他们："你们学汉语有什么困难吗？"他们说："难学

---

①本文系根据周祖谟先生 1991 年在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题目为编者所拟。

②编者按："袁教授"指袁晓园女士，"钱老"指钱伟长先生，"安老"指安子介先生。

啊！”我说：“并不难啊，怎么见得难呢？”他们仍是“难学，难认”这一套话。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想钱老对于这点已经发挥得很透彻了。不过我想再进一步说明一下。汉字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的形和义拼得非常紧。为什么呢？我们从早期的最简单的基础的汉字的字形来看，它本身是由象形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整个系统中有一类就是象物形，像东西的形状，另有一类表示的意义在形体上出现，像刚才袁教授举的例子。还有一类呢，即在汉字发展中起主流作用的一大类是形声字。汉字主要是这三大类。在这三大类中，象形和象义是基础。我们认识汉字从形体上就很容易加以理解。比如说：人、水、牛、羊，表示普遍事物的名词并没什么难的。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教学上，我们应有一套规律教法，就是按汉字的整个系统来考虑，先教笔画少的，而且形状最为明显的，引起学生的兴趣，使他们很快的就能够把笔画简单而又有趣味的字记住。比如，袁教授刚才举的日月为明，那就是很有趣味的字了。如果先教这些字，学生很快即能学会。

汉字形和义表现得最清楚不过的就是那个偏旁。我觉得东方人的文化、思想和西方人不完全一样。中国人对事物讲究分类，这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看《尔雅》这部训诂书，这本书早在战国就逐渐写成了。它就是按语词的义类来分的。首先一部分是语言中应用的词，底下按草、木、鸟、兽、鱼、虫，就都分开了。分类是非常重要的。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时，它找出了部首，掌握了汉字结构的一个分类学，用形旁来统辖汉字。所以他说：“据形系联”“以究万原”。他能够找出这样一个系统来，这很重要。这是一个分类。后代的类书、字书都是如此。延续《说文解字》的就是按照它的偏旁，540 部偏旁演变发展，最后变为 210 多个，逐渐形成一个有系统的东西。

类书也是这样，它是按天文、地理分下来的。文学这方面总集也是按类别分下来的。这一点说明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从科学的

角度是注重分类的。而汉字偏旁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充分的表现。我们如果掌握了汉字的偏旁就会发现，汉字通过偏旁它最基本的词义就都能表现出来了。人旁、心旁、山旁、水旁，你一看就知道了。比如：刚才钱老说的化学元素符号，气体上面都带气字，金属的带金字旁，非金属的加石字旁，一看就非常清楚。这是非常有趣儿的。

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因为汉字最基本的部件是有限的。一个字可以是两个部件，也可以是三个部件，有时有四个部件，这就是很多的了。这些基本的部件形式写起来并没有什么难的。说音难吗，也不然。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现在的普通话是 436 个音节。从形声字来看，它的声旁也有一定的系统。当然，有些因为历代语音的变化，我们从字面上看不出来了，不太清楚了。比如说，容易的易字，易就念 yì，可是踢球的踢呢，它就念 tī，为什么念 tī 呢？这就是一个音的变化使这个字念 tī。另外挑剔的剔字，右边加一个竖刀。还有警惕的惕字，因为要注意，所以左边加个心字。这三个字都念 tī 音。汉字本身都有一个它演变的系统性，有的几乎完全一样，它可以出一串的字。比如像宛转的宛，茶碗的碗，这是一套的。还有从女字边的婉，从玉字边的琬，讲玉器上边是圆的。它都有一个圆的意思，本身宛转就是圆的了。所以这些字一看，声音都是一个声音，在意义上都有一个圆转的意思。再比如烟囱的囱，从囱的意义上讲都是有窟窿的地方。比如窗户的窗，是个变音，底下从囱，窗户必然得有洞的了，没有洞就不是窗户了，不通空气了。虽然它念 chuāng，是音变，但从囱，我们就形而知义。另外吃的葱（蔥），中间也是空的，所以从囱得声；当然也还有别的意思的，比如表示蓝颜色。表示青白色的马的驄，加个马字边。聪（聰）是讲人的智慧，聪明。念 cōng 的音，而意义也在这声音上面表示出来了。所以，我们理解汉字时，应当看到它

的形和义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汉字一个根本的性质。不了解这个汉字的根本性质，就总觉着汉字难学，难认等等。实际上了解了形跟义的关系，在实用上就多少感到有很多方便而不至于难学了。

汉字在形上表义是很有趣儿的事。我有一位研究生，他正在作论文，因为作论文，他要查很多很多资料。从这些资料中要找某一类的词，很不好找。因旧书是竖着一行一行地写的，新书是横着一行一行写的，要查词儿很费劲。我说："我教你一个秘诀。让你很快地查到要找的词。"他说："先生，你有什么秘诀啊？"我说："要看竖行的，就斜着从右上方一直到左下方，横行的就相反，从左上方斜着到右下方看，这样用眼一扫，所谓一目十行，立刻就会找到你要找的词了。如果你要找一个句子，怎么找呢，这里也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句子里面的字是什么，然后找这句话中笔画最简单的字。这样很快就能找到你要找的句子。"从前，有位先生叫刘文典，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教我校勘学，有一天，他问我："要查一个书中的句子，怎么查才好啊？"我说："就是先找那个笔画最简单的字，就能找着了。"他说"你说的真对，就是这么回事"，那么就是说，前辈他已经肯定了我的这种方法了。再看效果如何呢？我那位研究生听我告诉他后，如法炮制，查书时这么一来，那么一斜，很快他就查完了一本书中有关汉字的词句。足见，我们不要把汉字的形体看轻，它是一个科学，有系统的东西，并且是易学的。

关于汉字的智能型，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小孩在学东西时，在他面前摆上实物，最易使他学会。如有实物告诉他是两个，他能明白，如果空白抽象地讲 two，2，他就不能明白。如有形象的东西，小孩才好理解，拿两个苹果放小孩面前教他，他很快会明白 2 是怎么回事。再拿一个苹果，告诉他是 3，他也很快能够学会这是 3。汉字本身有许多都是通过形象来表现义的，不过从甲骨文开始逐渐演变，字形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但是如果在教汉字时，把

偏旁、部件一个个都弄清楚，讲清楚，学生就能很快地学会汉字，同时也学会了汉语的语词。汉字在开发智力上面，我看未见得比拼音文字逊色。而且我感觉到开发得更快，就像刚才我讲的一目十行的办法很容易，所以汉字开发智力是很好的东西。要想理解古代事物的名称，通过汉字就可以思过半矣，它有这种好处。至于汉字的国际性，刚才钱老，袁先生都讲过了，我就不必多讲了。

汉语在世界上是最精练、最简单的。因为它没有形态变化，语法和构词有自己一套规律。这种系统性、科学性是很值得我们自豪的。有这样一种文字用来表达我们的汉语。将来在计算机（computer）声控方面，汉语是最优选的，最优秀的。因为凭着汉语单音节的一个个声音能说出一串音。当声控计算机通行以后，立刻感觉到我们汉语是最好不过的了。而描写汉语、记叙汉语的符号呢，就是汉字。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讨论会，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个人在认识上也提高很多，我就把自己一点很粗浅的意见作为刚才三位先生的一点补充好了。谢谢大家。

古代汉语的字音①

一 字音的构成

汉字是一个个的方块字，每个字的读音都自成一个音节。一个字的读音可以从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进行分析。声母是指字的开头的辅音部分（如 b，d，g，z，c，s 等——汉语拼音，下同），韵母是指声母以外具有元音的部分。韵母，有的是单元音（如 i，u，y），有的是二合元音或三合元音（统称为复合元音，如 ai，ao，iao，uai），有的是元音之后带有韵尾辅音（如 an，ang，ing）。-n，-ng 在元音之后，所以称为韵尾辅音。至于声调，指的是字音音调的高低升降。高低是相对的。升是由低升高，降是由高降低。音调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韵母的主要元音上。发元音的时候，声带是颤动的，在物理学上称为“乐音”，所以能有音调上的不同。声、韵、调三者是构成汉字字音的要素。

汉字成千累万。汉字的读音，大多数都有声母，只有一部分的字，如“衣、屋、安、因、英、翻”之类是没有声母的，有人称之为零声母字。零声母的字在《汉语拼音方案》中，拼写的时候 i 作 yi，u 作 wu，ia、ie 之类作 ya、ye，ua、uei 之类作 wa、wei。

---

①本文系周祖谟先生应张中行先生之约所撰，系《文言常识》一书中之一节，该书1988年5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题目为编者所拟。

二　字音的声韵系统

现代汉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系统为标准音的，汉字的读音自然要按照北京音的声、韵、调系统来读。北京音的声、韵、调系统是从唐宋元明以来长期逐渐发展而成的。声母有21个，韵母有38个，声调有4个。声母与韵母所构成的有音有字的音节约有698个（声调不同的不在内）。

1.21个声母，依照《汉语拼音方案》排列如下：

双唇音：b，p，m　　唇齿音：f

舌尖音：d，t，n，l

舌根音：g，k，h

舌面前音：j，q，x

舌尖后音：zh，ch，sh，r

舌尖前音：z，c，s

2.38个韵母，按照主要元音之前有没有介音和介音的类别区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

a. 开口呼韵母

-i（z后）-i（zh后），a，o，e，ai，ei，ao，ou，an，en，ang，eng，ong

b. 齐齿呼韵母

i，ia，ie，iao，iou，ian，in，iang，ing，iong

c. 合口呼韵母

u，ua，uo，uai，uei，uan，uen，uang，ueng

d. 撮口呼韵母

ü，üe，üan，ün

这里所列的韵母，开口呼是没有介音的，齐齿呼是元音i和带有i介音的，合口呼是元音u和带有u介音的，撮口呼是元音ü和

带有 ü 介音的。

3. 4 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和“阳”在这里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两个对称的名词，代表平声有两类而已。古人所说的“四声”是“平、上、去、入”。北京音没有“入声”。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北京音的阴平声是高平调，阳平声是由低升高调，上声是低降而转升调，去声是由高下降调。

三　字音和字形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但是形声字占 80% 以上，形声字的声旁也能显示出一点读法来。例如从“申”旁的字“伸、呻、绅、神”，从“青”旁的字“清、蜻、情、晴、请”之类，声韵与声旁是相同的（音同而调不同的不算在内）。可是就现在的读音来说，有很多形声字的声旁跟字音并不相谐合。不相谐的情况主要有三种：

1. 声同而韵不同。例如：皮—玻，师—筛，思—腮，列—例，发—废，瓜—孤。
2. 韵同而声不同。例如：告—浩，工—空，长—张，屯—纯，羊—祥，青—精。
3. 声韵都不相同。例如：妥—馁，带—滞，多—移，屈—掘，寿—铸，也—施。

在以上三种情况中，数量比较多的是第三种。有时同从一个声旁的几个形声字读音也不尽同。如从“少”的字有“秒”“妙”“抄”“炒”，从“者”的字有“都”“诸”“赭”“箸”“屠”“褚”“绪”“暑”，从“且”的字有“祖”“粗”“锄”“助”“姐”，读音都不同。

形声字的声旁跟字的读音所以不一致，主要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是由于文字在历史发展中为群众所创造，既非产于一时，也非出自同一地人之手，其中也有方音的影响。大体来说，古

人所注意的是声旁与字音是否同韵或韵近，其次是声母是否发音部位（即唇舌牙齿喉五音）相同。另外一种原因是由于语音在历史上有很多变化，最初是相谐的，后代的语音与古音有了不同，自然产生字音与声旁不一致，甚至有相差甚远的现象。由于有上述的原因，汉字形声字当中有不少字的声旁已经不能很好地起到表音的作用，所以在读字的时候往往单凭声旁来读是不行的。如“宓”音 fú 又音 mì，“鄞”音 yín，“砾”音 lì，“趿”音 tā 等就不是一看就念准的。

但是，事物不能孤立来看待。假如单独就字的谐声声旁与字音不尽相谐而说形声字的声旁一无用处也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把同从一个声旁的字比在一起来看，对字音韵母的理解还是有帮助的。有些声旁虽然所谐的字在韵母上读音不相同，但是仍有规律可寻。举例如：

者：a. 奢，赭；b. 都，睹。

皮：a. 披，疲；b. 波，颇。

台：a. 胎，殆；b. 治，始；怡，饴。

非：a. 扉，绯；b. 排，徘。

从这几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从字形跟字音的关系上会进一步理解到，在汉字读音教学上形声字的声旁还可以利用。

四 直音、读若和反切

现在我们给字注音用的是“汉语拼音字母”；但在以往的古书的注解、字书、韵书里给字注音用的还是汉字。在过去，利用汉字注音有三种方法：一是直音，二是读若，三是反切。

“直音”是用一个通常应用而又普通认识的同音字注不常用或跟一般读法不同的字。例如“耜音似”“蹂音柔”“厩音救”“菲音非”，都用的是同音字。因为用同音字注音是很直接的，只要按照

字下所注的同音字来读就行，所以旧日称之曰“直音”。

“读若”也说“读如”，是一种譬喻的方法，即用一个易认的同音字或音近字来说明被注字的读法。有时也用某一词中或古书某句中的某字来注音。这种方法是一种比况的方法，汉代人称为“读若”或“读如”。东汉许慎所作《说文解字》里应用最多。例如：

趁，𧼙（zhān）也。读若尘。（今音 chèn）

窕，深肆极也。读若挑。

唉，应也。读若埃。

褫，夺衣也。读若池。（今音 chǐ）

绺，纠十缕为绺。读若柳。

哽，语为舌所介也。读若井汲绠。

毖，直视也。读若《诗》云：“毖彼泉水”。（今音 bì）

“直音”和“读若”两种注音方法都不是很好的方法。就“直音”这种方法来说，如果遇到难字而没有同音字或有同音字而又不容易认，那就注犹不注。至如“读若”的注音方法跟“直音”相似，其中有的是同音，有的只是音近，甚至于有些是作者个人的方音读法，随手拈来，未必通行。所以后来就废弃不用了，惟有“直音”的方法还相沿使用。

下面来谈“反切”。

“反切”是一种拼音的方法，是用两个汉字相拼而成一音。例如“东”（dong）音“德红切”，“德”“红”相拼，就成为 dong。用汉字为符号来拼音，始于公元 3 世纪汉末魏初。因为印度佛教东来，受“梵文”（Sanskrit）用字母拼音方法的影响，所以创出用上一个字和下一个字相拼以反成一音的注音方法，在魏晋的时代大为流行，随之也就在“字书”之外产生了“韵书”。字书如《说文解字》是根据字形，按部首来编排文字的；韵书是根据字音，按韵分部来编排文字的，韵书就用“反切”来注音。“切”（qiè）是拼切的意思。俗言有“咬牙切齿”的话，“反切”的“切”就是上下两

音向一起拼切的意思。“反切”也称“切语”，自魏晋至唐代称“某某反”，宋以后称“某某切”。意思是一样的。因而统称之为“反切”。

反切的用字是上一字要与被切字声母相同，即所谓“双声”，下一字要与被切字的韵母相同，即所谓“叠韵”，而且声调要一致，平是平，上是上，不能相乱。在两字相拼的时候，上字只取其声母，下字只取其韵母。上字的声，下字的韵，二者相拼而成一音节，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

工（gōng）音古红切。古 g-，红-ong，g→ong→gōng。

官（guān）音古丸切。古 g-，丸-uan，g→uan→guān。

留（liú）音力求切。力 l-，求-iu，l→iu→liú。

海（hǎi）音呼改切。海 h-，改-ai，h→ai→hǎi。

振（zhèn）音章刃切。章 zh-，刃-en，zh→en→zhèn。

应用这种方法，即使是难字也可以注出它的读音来。这比用“直音”“读若”的注音方式前进多了。

五　韵书的字音规范

我们在前面说过魏晋时代开始有了韵书，下至南北朝时，作者增多，按四声分别韵部编排文字，每一韵部又分别声母异同，同声母的字连写在一起，注出反切，称为一“小韵”。每字之下加注字义。这样韵书既便于检字，又兼有字书之用，所以到隋唐时代韵书大为盛行。最著名的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切”是“声”的意思，《切韵》就是声韵的意思。《切韵》有五卷，按四声分卷。平声字多，分为两卷，上、去、入三声各为一卷。案字音有声调的分别，这是汉语的特点。平、上、去三声，音调较长，入声音调短，而且有韵尾上的不同。根据韵的韵尾在音韵学上分为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三类。“阴”“阳”是对称词，没有什么意义。

1. 阴声韵的韵尾是元音；

2. 阳声韵的韵尾有-m，-n，-ng 三类；

3. 入声韵的韵尾有-p，-t，-k 三类。

四声的分别是从古代相沿下来的。字音的读法是以书音为本，而又参照南北流行的韵书，斟酌古今，侧重分析，四声韵部就有 193 韵。例如“东冬钟”就分为三韵，“支脂之微”就分为四韵，这跟后代的语音很有不同。

至于声母，根据《切韵》的反切上字进行归纳，可以分出 35 母，用汉字标出兼注出国际音标如下：

双 唇 音：帮〔p〕滂〔p'〕并〔b〕明〔m〕

舌 尖 音：端〔t〕透〔t'〕定〔d〕泥〔n〕来〔l〕

舌尖前音：精〔ts〕清〔ts'〕从〔dz〕心〔s〕邪〔z〕

舌尖后音：知〔ṭ〕彻〔ṭ'〕澄〔ḍ〕

庄〔tṣ〕初〔tṣ'〕床〔dẓ〕山〔ṣ〕

舌面前音：照〔tś〕穿〔tś'〕神〔dź〕审〔ś〕禅〔ź〕

日〔ń〕

舌面中音：喻〔j〕

舌 根 音：见〔k〕溪〔k'〕群〔g〕疑〔ng〕晓〔x〕匣〔ɣ〕

喉 音：影〔ф〕

在这 35 个声母之中“并、定、从、邪、澄、床、禅、群、匣”和“明、泥、来、日”在音韵学中都称为“浊音”，读“浊音”，声带是颤动的。其他则称为“清音”，读“清音”，声带是不颤动的。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方音并不一致。陆法言编定《切韵》就有正音的作用。所以唐代科举考试就以《切韵》音为标准，诗赋押韵要按《切韵》的韵部来押。到了宋代编订《广韵》，仍以《切韵》为准则。不过，南方和北方字的读音都有改变，除了考试和应制时要按规定的情形押韵外，平时一般作品就不那样严格了。读书音也有改变。例如唐代宗大历时（公元 8 世纪）张参所作《五经文字》

的读音就跟《切韵》不完全一致了。主要是声韵的部类有了改变，总的趋势是由繁趋简。《切韵》的字音规范也就慢慢地打破了。

六　古音和今音

汉语有极悠久的历史。讲到古音，也有时代的不同。不同的时代，语音的声韵系统就不完全相同。从古代诗文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粗略地说，先秦两汉以前和后代的语音差别最大，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跟元明清以至现代的普通话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在我们读古代的诗歌韵文的时候从押韵上最能体会得到。

例如在《诗经》里把“哉来”一类字和“时期”之类的字在一起押韵，把“华家”一类字和“居虚”之类的字在一起押韵，把“河歌”一类字和“皮宜”之类的字在一起押韵，这些都跟后代的语音大不相同。凡能相押的，其元音必然相同或相近。又如在唐人的诗歌里，“回杯”一类字和“开来”之类的字相押，“园翻”一类字和“门昏”之类的字相押，“车蛇”一类字和“家麻”之类的字相押，这些跟元明清以至现代的语音也很不相同。由此可见，语音随时代而有发展和变化，历史上不同的时代的语音声韵系统是有变化的。汉字的读音受语音演变的影响也就有古今音的不同。

我们要了解先秦两汉的字音的声韵系统，所能依据的主要资料是形声字和诗歌辞赋的押韵。根据形声字的谐声规则，被谐字和主谐字（即声旁）在声韵上或相同，或相近，由此可以考察一个字或一组字的声类和韵类。例如“波”从皮声，“江”从工声，我们根据：“波”与“皮”、“江”与“工”的谐声关系再参照《诗经》的押韵情况就可以把许多相关联的字归属在一起成为一个部类。应用这种方法，推而广之，可以把先秦两汉的声韵大类区分出来。这样，对于理解汉字的谐声和上古诗歌韵文的押韵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字音的声韵系统，可以做为考察根据的

材料就比较多了。除诗歌韵文的押韵材料以外，还有韵书是一种重要的依据。另外还有一些通俗的字书也可以参考。

现在由古代存留下来的最早的比较完整的韵书就是陆法言的《切韵》，可以说是中古读书音的代表。后代承袭《切韵》而作的韵书，韵部又分别加细，宋代的《广韵》多至206韵。但是各地的实际语音已经变化很大，礼部考试不得不有所变通，因而有的韵"独用"，有的韵可跟邻近的韵"同用"。金元人所刻的《礼部韵略》归并同用的韵，合为106韵。韵部的归并正代表语音已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书刻于山西平水（今新绛县境），所以有"平水韵"之称。后来到元泰定帝时周德清有《中原音韵》一书，开始脱离了《广韵》的窠臼，根据当时北方中原音来编制，分韵为19部，声母为20类，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这已由中古音演变为近代音。到明清时代就发展成"官话"了。"官话"是以北京音的声韵系统为标准音的。"官话"势力不断扩大，就成为今天所说的普通话。普通话的声韵跟古代的韵书反切的读音已经相差很多。我们读古代作品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古今音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唐宋韵书所反映的字音的声韵系统跟现代普通话做一比较。

七　古今音的差异

古今音的差异不外表现在声、韵、调三方面。下面分别以《广韵》为例加以说明。

1. 声母

声母方面的不同主要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失落声母，一种是读音有变化。例如"宜、吾、言、银"等字，古音有声母ng，现在普通话的读音已经没有声母。《广韵》"宜"音鱼羁切，"吾"音五乎切，"言"音语轩切，"银"音语巾切。这些反切上字都失落声母。

声母读音有变化的，例如古音中有“清声母”和“浊声母”两类，在现代普通话里“浊声母”已变为“清声母”。举例来说：

a. 供、靳、眷、对、顿、布、配、壮、荀

b. 共、近、倦、队、钝、步、佩、状、旬

a类“供、靳”等字是清声母字，b类“共、近”等字古音则是“浊声母”字（今江浙语里还保留这种分别），现在普通话都读为清声母，虽然发音部位没有变（如舌尖音还是舌尖音，舌根音还是舌根音），但发音方法都改变了。“浊音”变为“清音”声带不颤动。同时声调也有不同。平声清声母字读阴平声，浊声母字读阳平声。如“君”是清音，读阴平；“群”是浊音，读阳平。上声“浊声母”字则读为去声。如“巨”（其吕切）、“在”（昨宰切）韵书都属于上声韵，可是声母是浊音，今音都读为去声。

声母读音有变化比较普通的还有：

c. 江、间、居、机、交、经、金

d. 煎、焦、将、精、尖、嗟、津

这里c类“江、间”等字的声母古读舌根音g，d类“煎、焦”等字的声母古读舌尖音z，现在有些方言还如此，但在北京音里这两类字的韵母或有-i，或有-ü，都读成舌面音的j，发音部位有了很大的改变，跟古音完全不同了。

2. 韵母

在韵母方面，古今音的变化就更大了。现代普通话比《广韵》的韵类少得多。例如：

蓬朋　梨犁　阶街　言妍　双霜　惊经

每对字今音都相同，但在韵书里不属于一韵。韵母之不同主要表现在韵母的主要元音上，如“蓬”字的韵母主要元音是“o”，而“朋”字的韵母主要元音是“e”。到了后来，音有变化，韵母的主要元音变得相同，“蓬”“朋”的读音就没有分别了。可是，韵书中同韵的字在今音里也有分化成不同韵母的，如“家”“斜”二字，

“家”音 jiā，“斜”音 xié，韵母变得不同。

韵母读音的另外一种变化是韵尾辅音。例如“今、林、心、谈、廉”一类字在古音中的韵尾是-m，而不是-n，可是现代普通话的读音已经和“巾、邻、新、坛、连”没有分别。又如古音入声字的“屋、各”等字有韵尾-g，“一、七”等字有韵尾-d、“夹、匣”等字有韵尾-b，现在广东话还保留这种分别，但在普通话里已没有入声，这些字的韵尾一律失落，声调也变了。

3. 声调　在声调方面，古人分为平、上、去、入。在诗律中，称平声为平，上去入为仄。平上去入因声母的清浊而各有不同的两类，清声母为一类，一般称为阴调，浊声母一类，一般称为阳调，两者音调的高下有不同。现在方言中还有近于古人分类的，不过普通话没有入声，平声虽分阴阳，而上去都不分，所以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还有，古上声浊声母字（即阳上），如“动、似、巨、倍、在、尽、近、但、践、善、荡、静”之类都变为去声，上声清声母字（即阴上）则不变。古入声字，则分别派入平上去三声，而且失去韵尾辅音，其主要元音有些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李白诗：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这里押韵的“骨、发、月”三个字都是韵书上的入声字。在现代普通话里，这三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全都不同。“骨”（-ǔ）读上声，“发”（-ā）读阴平，“月”（yè）读去声。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随声母而异，是有规律的。派入平声和去声的最多，派入上声者最少。粗略地说：

（1）b，d，g，z，zh，h 和相对的浊声母读阳平；

（2）p，t，k，c，ch，s，sh，x，l 和鼻音 n，m 读去声。

古今语音演变的情况很复杂，以上所说的只是一些主要的情

况，知道这些，遇到古书中的注音或古代的韵文与今音不同的地方，就知道怎样去辨别其中的问题了。

八　读古籍时会遇到的字音问题

1. 反切的读音

反切注音的方法在历史上虽然应用了一千七百多年，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声韵系统有了改变，韵书里和古书里的反切有些就拼切不准，有些就拼切不出来，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是反切用字不贴切，如以合口字切开口字，或以开口字切合口字，就不合乎反切的原则；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时代不同，声韵系统有变，反切用字古今读音不同，也就难以拼切准确。举例来说，如《广韵》“建”字音居万切，“建”是开口字，“万”却是合口字。又“卦”字音古卖切，“卦”为合口字，而“卖”是开口字。韵母都有不合。还有以“於”字作反切上字的，如“依”音於希切，“殷”音於巾切，“焉”音於乾切，“幽”音於纠切，“医”音於其切等，“於”字等于虚设，只取下字的韵母就是被切字的读音。可是有的就不然。例如“威”音於非切，“娃”音於佳切，“於”就音 w 才拼得对，这就不好办了。这是反切用字不贴切的例子。

至于声韵系统有了变化，旧日的反切拼音的问题就更多了。首先要说明的是“类隔切”。公元4世纪以前，如“方、府、甫、分，芳、敷、抚、孚，符、房、扶、附”等字的声母都读双唇音，不读唇齿音［f］；“武、亡、无、文”等字的声母也读双唇音［m］，不读唇齿音［v］。因此遇到被切字是［p］［p'］［m］一类的字而以这些字作反切的时候，就切不准了。例如“篇”音芳连切，“彬”音府巾切，这类只能改读为双唇音。这类的反切，音韵学上称为“类隔切”。意思是同类而又有隔碍的意思。因为都是唇音一类，双唇音称为“重唇”，唇齿音称为“轻唇”。还有公元4世纪以前，如

"竹、陟、知、张、猪"等字跟"都、当、多、丁"音近，"丑、敕、耻、褚"等字跟"他、托、土、汤"音近。音韵学上"竹、陟、丑、敕"等为"舌上音"，"都、当、他、托"等为"舌头音"，同归舌音一类。前代反切有以"舌上音"切"舌头音"的，如"椿"音都江切，"罩"音都教切，那又是"类隔切"。如果"椿"音"陟江切"，"罩"音"竹教切"，那就可以与今音相合了。这又是因为古今音有异而引起的麻烦。

要能掌握由反切拼出今音来，还不能不注意声调的改变。前面已经说过入派三声的规律。另外还有上声浊声母变为去声，也不能忽略。例如《广韵》"杜"音徒古切，"弟"音徒礼切，"杜""弟"都是上声字，但是今音都读为去声。这里只能粗略地、选择主要的说一说，有些还需要有音韵学的知识才能得其门径。现在我们通常使用的字典辞书都注的是汉语拼音，但是我们读古籍的时候总会碰到一些反切注音，意在辨别多音多义，那就不能不理解反切是怎么回事了。

2. 辨平仄

汉语从古就有声调的区别，宋齐以后开始有"四声""平上去入"的名称，"平仄"的名称稍晚。前面已经说过，平指平声，"仄"指上去入，"仄声"唐人也称为"侧声"。韵书侧仄同音。"仄"就是倾斜不平的意思。在诗歌里平仄分用，自古已然。骈体文也要讲平仄。例如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等句，二、四、六几句的末尾一字是平仄间开的。在唐以后的近体律诗里，有严整的格律，平仄更不能相混。以七言律诗而论，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但是使人难辨平仄的地方主要是入声字。唐人作诗遵《切韵》音，宋人作诗遵《礼部韵略》，明清人作诗遵《平水韵》。《切韵》《礼部韵略》跟《平水韵》的入声是一致的。北方人读古诗就必须能辨别哪些字是入声字。注意的要点是要

多在"阳平声"中留心。比如：bá拔，bó伯、勃，bié别，fá乏、罚，fú伏、福，dí敌、迪，dé得、德，gé革、格，guó国，hé合、曷，huá滑，huó活，xié协、挟，jí吉、及，jié结、杰，jú局、菊，xí习、席，zhú竹、烛，zhuó浊、茁，shí石、食，shú孰、淑，zé则、责，zuó昨等都是入声字读为阳平声的。我们了解了入声，在读古代诗歌作品的时候，遇到对句的平仄格律才不致茫无所知。

3. 入声字的读音

这是一项不容易处理的问题。一般来说，读古籍只有按今音来读。但在读古代诗词的时候，往往还要分别平仄。北方没有入声的区域，旧日都读短促的降调，有如去声。如杜甫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白"是入声字，与"黄"平仄相对，旧日读为短促的"擘"。在"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蜀相》)两句诗里，"柏"也读为短促的"擘"，因为"柏"与"何"平仄相对。又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曲终收拨当心画（音获），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画""帛""白"都是入声字。又如杜甫的《北征》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两首诗都用的是入声韵，《咏怀》中的几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出、阙、活、物"四字是押韵字，都以读为短促的去声调为宜。

4. 平去两读的字

古代有一小部分的字有平去两读。例如两汉以前"庆"字"宪"字只读平声，后来才演变为去声，而不再读为平声。现在我们在一般文字中读为去声的字，有的在古人的诗里作平声。例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忽忘。""忘"字作平声读。李白《蜀道难》"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

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叹”字也作平声读。又如“看”字，今作去声，可是古人作平声读。如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看”“安”押韵。又如“论”字，今作去声，古人也读为平声。如杜甫《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论”字作平声。由此可见这些押韵字都要按照原作去念，不能按照今音来读。

5. 读破字例

古人读字，把一些意义有改变的字和一些词性有变易的字改变了读法，现在普通称为“读破”。例如“度”是尺度，音 dù，“度”作忖度的意思来用，就音 duó；“见”是眼睛看见，音 jiàn，如果是显露出来，或使人见，就音 xiàn；“处”是处所，位置，音 chù，对事物加以处置，就音 chǔ；“分”是分开，音 fēn，如果说名分、职分，分际，就音 fèn；“奔”是奔跑，音 bēn，如果是奔向某处，就音 bèn。这些或改变读音，或改变声调，一直为大家所沿用。但是有些字古人有两读，今人就不必照旧采用。例如“妻”字为名词，音 qī，平声，以女嫁人则音 qì，去声，为动词。“使”字为动词，使令的意思，音 shǐ，上声，被使的人，即“使者”，为名词，则音 shì，去声。“断”字是截断的意思，音 duǎn，上声，是使动词，如果是自断的意思，音 duàn，去声。这些现在很少有人一定要分别了。不过，像“解衣衣我”，“以王王之”，“以食食之”，“食我以其食”，作为动词的“衣”“王”“食”旧读 yì，wàng，sì。这些为避免意义混淆起见，字典里还是分为两个读音的居多。

音韵学的内容及其功用①

音韵学也称为声韵学。研究的内容包括审辨字音和历史音韵的变迁两方面。

审辨字音，旧日有等韵字母之学。等韵字母之学创始于唐代，实际就是中国自己创建的一门语音学。最初在汉末因为受梵文“悉昙章”的影响，逐渐体悟到汉字的读音也可以按照梵文分别声（体言）音（摩多）的方法辨别出声母和韵母来。晋宋以后在声母方面已有喉舌牙齿唇的分类，齐梁时期又有双声叠韵的名称。到了唐代开始创制了30字母，宋代又增之为36。即：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彻澄娘、见溪群疑、照穿床审禅、精清从心邪、影晓匣喻、来日。在韵的方面，唐人又根据隋代陆法言《切韵》的分韵类别分辨韵母读音的洪细划为四等。如豪韵为一等韵，肴韵为二等韵、宵韵为三等韵，萧韵为四等韵。四等之分是看韵母有无i介音和韵母元音的口腔开张度的大小而定。（今音一二等已不分，三四等已不分，与隋唐时的读音有不同）到宋代就有了“韵图”，把本于唐五代间的《切韵》而修订的《广韵》中的韵类和声类编排为一种拼音表，以便于了解各韵中声韵相拼而得到的字音。下面简略举例，以见一斑：

---

①本文写于1964年5月。载于《周祖谟语文论集》，1989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声　　母	帮滂并明	见溪群疑
一等韵豪韵	褒橐袍毛	高尻○敖
二等韵肴韵	包胞庖茅	交敲○聱
三等韵仙韵	鞭篇便绵	甄愆乾○
四等韵先韵	边○蹁眠	坚牵○妍

这种图表用声母拼韵母以得出字音，就把整个汉字的音节都表现出来了。要理解韵书的读音就不能不留意等韵字母之学。等韵字母之学就是审音之学。

研究音韵学必须从审音入手。能审音就是能够辨别字音的声韵类属。然后对古今音的异同、古书中反切的读音、汉语词汇中复音词声韵之间的关系，以及古典文学作品中字音平仄音调的转换，还有现在普通话的读音与方音对应的规律等都不难索解。

研究音韵学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是历史音韵的变迁。这一方面可以称之为历史音韵学。语言是用文字来记载的。在历史上语音随着时代而逐渐有变，文字的读音也因之而变。语音的改变不是全盘的，而是在某些方面有变，其他方面就因承不变。变是有规律的，不是这样一个，那样一个没有规律地变。因为语言的声音是成系统的，有多少声母，有多少元音和韵母，有几个声调，把声母跟韵母拼在一起成为多少音节是有定的。这就是经常所说的“语音音系”。假如某一个声母或某一个韵母有了改变，那么，属于同声母的或同韵母的在同一种条件下就都按照一定的音变规则而变。当然，也不无例外。因为同一种变化可能时代有早晚，有的先变了、有的后来才变，也可能书音不变，而口语某一个字有改变，也可能因方音的影响而产生分歧和例外。所以不能认为某一项音变就一定没有例外。但是例外是少数，合乎同一规律的是多数。我们要了解古今音的异同，要了解古代某个时期的语音系统，不能不从事历史音韵的

研究。这应当说是音韵学科中重要的内容。

历史音韵的变迁，根据已经进行研究过的认识，可以划分为上古音、中古音、近古音、近代音。上古指周秦两汉，中古指魏晋南北朝，近古指唐宋，近代指元明清。这是我个人关于历史音韵演变分期的主张。这四个时期只是四个大的段落。如两汉跟周秦并非完全相同，不过从总体来看，大体是接近的。其他，如南北朝跟魏晋，宋跟唐，明清跟元，都不是全面相同的，定为一期，也是就其相近者多而确定的。

研究历史音韵的演变，可根据的材料非常广泛，且因时代而有不同。最主要的材料是各时期有韵的诗歌和韵文以及前代不同时期的字书和韵书的注音。以诗歌而论，上古有《诗经》和《楚辞》，汉魏以迄近代有古诗、歌行和近体律诗，宋代有词，元代有曲，可以根据这些材料考查各时期的韵类。至于字书和韵书种类繁多，可以根据注音考证声韵的部类，以见历代字音的演变。可是，先秦时代没有字书和韵书，要考查这一阶段的声母类别，就要依靠谐声字和古书中经传的异文了。

了解历代声韵的沿革，可以有助于解决古书中文字的假借和古书在传抄中产生的讹误。古书中经常出现声音相近而意义不同的“假借字”。假借字是对“正字”而言的。“正字”是按文义应当写的字。书传中不写正字而写假借字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古书多出于口耳相传，传写者一时不得其字，而写一个音近的字；另外一种原因是在某一个时期某些词语常常采用某字，而不用正字，以此代彼已为习惯。例如《毛诗》是“古文经”，就有不少假借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和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时代比较接近而有许多习惯上应用的假借字。清代的学者研究古书，往往超越前人，很多地方是由于了解古音而知字有假借，从假借字声音上推求它的正字，原来难以解释的文句每每迎刃而解。所以读古人的著作不能不知道古音。

古书的时代有早有晚。先秦两汉的书固然难读，就是六朝隋唐的作品也不尽好读。一则由于其中多古字古义，再则由于书经传写，时有讹误。讹误之由出于笔画字形相近而写误者半，出于音同音近而误为某字者半。音近而误的有因声近而误的，有因韵近而误的。如果我们知道了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声韵类别，我们就可以利用音韵的知识校勘古书，改正传写或雕板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误。历史音韵学也就成为校订古籍必备的知识了。

了解历史音韵不仅可以藉此以考求文字的假借和用来刊正古书中的讹误，而且还可以由声音以说明经传的异文。如“升降”或作“登降”，或作“陟降”，“文莫”（见《论语·述而》）也就是“黾勉”。进一步来说，还可以从声音上来寻绎词义。如《左传·哀公十二年》：“乃舍卫侯”，“舍”就是“释”（见《经典释文》）。《礼记·曾子问》：“不知其已之迟数”，“数”就是“速”（见《郑玄注》）。

在了解了历史音韵的情况以后，我们对汉语发展的历史才有可能稍具明晰的理解。特别是普通话语音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得上来了。如果研究汉语的词汇的发展，则更需要古音的知识。由此可见音韵学的功用很多，而且是一门注重实际应用的学科。要与兄弟民族语言做比较研究，要追溯古代汉语与藏语的关系，都离不了音韵学。

不过，有不少人认为音韵学很难学，学也很难全通。其实这与学习的方法得当与否有关系。音韵学本是一门口耳之学，要辨别声音，不能不用口发音，不能不用耳听音。用口发音，应辨别发音方法与发音部位。汉代刘熙《释名·释天》有横口、蹴口、合唇、开唇的说法。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谈发音有“抗喉、矫舌”，“攒唇、激齿”的名目。因此学习音韵学一定要肯于动口，练习发音。所谓用耳听音，就是能用耳辨别声音。要能辨别声音，又必须在练习发音时对不同的音有所体认之后才能成功。如是来说，练音就是第一要义。要练习发音，应当以语音学的知识为引导去理

解传统的音韵学中的名称术语，进而研究古代韵书的音系。这是求得贯通的重要方法。

其次，研究音韵的演变，历来是以宋代的《广韵》为基础。《广韵》是根据隋唐时期《切韵》一系的韵书纂录而成的。《切韵》所代表的是中古时代的读书音。由《切韵》可以上溯古音，下考今音，所以要熟悉《广韵》的声韵系统。

要熟悉《广韵》的声韵系统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除了理解反切和与宋代的韵图相对照以外，最重要的方法是要藉重自己口里的读音跟《广韵》的声韵相比较，注意相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就要稍加记忆。但是还要勤勤翻阅，熟悉韵字和韵目，从中探求有无规律可寻，久之，自然贯通。然又必时时多作练习，求其实用。可以举一些唐人诗句注出每字的声韵部类。例如：

1.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

2.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3.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4. 细水流花归别浦，断云含雨入孤村。

从中可以辨别哪些字是双声，哪些字是叠韵，哪些字是旁纽，哪些字是入声字，今音有无浊上变去的字等等。这样认真去试验，久之，不仅熟练，而且饶有兴趣，学习会逐步提高。

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途径[1]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教局、湖北省语言学会和中南民族学院及其他院校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协助下，经过筹备组的积极准备，今天在此胜利召开，这是值得庆贺的。我受筹备组的委托，谨向上面所说的机关、单位致以衷心的感谢！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同志，还有港澳的学者。著名的语言学家、我们的老前辈王了一先生，能亲临指导，尤为难得。我能参加这次会议，得有机会向各位奉手求教，心里非常高兴。我们都会体会到，学术研究，是在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情况下不断向前发展的。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现在，我们大家能在一起，济济一堂，共同讨论本学科的有关问题，进而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我想同志们、朋友们一定十分赞成，非常高兴。从参加会议人数之多和论文之丰富多彩，也足以看出大家兴奋的心情。

我们的汉语音韵研究，是很有成就的。许多前辈先生继承了传统的古音学、等韵学而又有许多新的建树；还有不少学者，吸收了19世纪以来外国的语言学和语音学的知识，联系我们可以利用的古今的语言材料，探讨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在审音辨类上既精于

①本文为1980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于《音韵学研究通讯》1981年1期。

古人，而又能构拟不同时代的语音系统，阐明声韵演变的规律。这些成就使汉语学得以向前发展。汉语音韵学已成为中国语言科学中一个重要部门。随着学术的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它的重要性也益加显著。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研究历史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人也应当懂得音韵学。

就语言学界来说，当前有许多实际工作要做。为适应四化需要，推广普通话，进行拼音文字的研究，就是很重要的工作。要推广普通话，不能不广泛而细致地调查方音。要调查方音，没有语音学和历史音韵学的知识不行。还有，我们要编纂汉语历史的大字典、词典，编写语音学的教材，讲述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发展，没有音韵的知识也不行。这都是实际工作的需要。

语言和文字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字所记录的是语言，而语言离不开声音。不了解古代的语音系统，就不易了解古代的文字记载，也不能说明古今语言的关系。文字的形、音、义三者是不可分离的。古书之所以难读，主要在于字有通假，义有多歧。不通声音，就不能通其形、义。古书中还有不少语言上的问题，有待我们通过声音去探讨。现在，古文字的材料随着古文物的发现而日益增多。研究古文字要通晓文辞，由通晓文辞以了解古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但古字难认，要识别古字，自然要形、音、义三者相证；不明古音，往往会滞碍难通。至于研究汉语古今之间语词的繁衍嬗变，研究古书的训诂，就更需要了解音韵了。清代的段玉裁、王念孙深明古韵，而对声纽的理解就远不及钱大昕和戴震。他们的著作里谈到“双声”，谈到“一声之转”，并不全对。我们要对汉语作全面的研究，了解音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说汉语音韵学是中国语言科学中一个重要部门。

学术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的方向，我想，一方面要打通文字、音韵、训诂三者的界限，融会贯通；另一方面要扩大研究的范围，从多方面的材料入手。以语音发展的历史而论，还有不少空

缺。宋元以来，语音的研究已有人重视，这是值得称赞的。另外，古代的对音材料并不少，如梵汉、藏汉对音以及其他译音的材料是很宝贵的，我们应当分时代、分语种作专门的研究。在这方面，虽然有人做过开创的工作，但还不够充分，应当继续去做。再有，现在国外很多学者注重汉藏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用来推证汉语的古代读音，我们更有条件在这方面努力。壮语、苗语、藏语、嘉戎语、羌语都有人研究过，如果能应用语言历史比较法与汉语对比，找出历史上的关系，探寻汉语语音在历史发展上从文字本身难以发觉的踪迹，那确是一大贡献。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为了发展这门学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必要互相促进，提高学术水平，成立一个汉语音韵学研究会。我们可以讨论一些理论和方法的问题，也可以互通声气，交流成果。在探讨某方面的问题时，也可以协力合作。为发展学术，还应当培养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者。这也需要交流经验。总之，我们要以本学科为起点，建立科学的全面的汉语学。

研究会自然是一个学术性的组织，参加的人有教师，也有对这方面有兴趣、有工作成绩的语言工作者，不限一格。意见或有不同，理应互相尊重。老一辈的学者在音韵学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令人钦佩的。他们的学识、造诣之深，难以企及，无容厚非。我们的态度是：对于传统的学术，我们有责任去发扬光大；对于新的理论和方法也要不断地吸取，取精用宏。我们要不要袪妄、袪偏呢？我看是要的。年轻的一代，有的见地不高，间或骄矜自喜看不起别人，我们应当善意加以引导，培养好的学风，使他们知道团结的重要意义，并成为热诚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的人。满招损，谦受益。我个人读书很少，识见浅薄，说话有不妥当的地方，希望前辈和朋友们指教，谢谢！

关于研究音韵学的几点希望[1]

先生们，同志们：

今天，中国音韵学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就要圆满结束了。我们的会开得很好。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对我们特别关注，陕西社联给我们大力支持，西北大学、师范大学等校的同志为会议费神筹划，我们非常感谢！

西安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古都，历史古迹很多。我们开会的地点就接近汉代长安的昆明池。杜甫有“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的诗句，而隋朝陆法言与萧该、颜之推等人论古今音韵、南北是非正是在长安。我们今天在一千四百多年之后得于西安相会，讨论音韵，揽古抚今，自然别有一番情味。想到陆法言等论韵不过数人，而我们今天在座的将近100人，而且有好几位外国的语言学家参加讨论，提出的论文有六十多篇之多，如果颜之推老先生还在的话，看到我们有此盛会，必然要瞠目结舌，退避三舍，赞叹不已了。

自音韵学研究会成立以后，两年之间，大家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由上古到中古进展到近古以至现代，各时代的问题都有人去研究，对传统的等韵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比如对唐宋语音的研究，对《中原音韵》的研究，对“内外传”的研究，对现代方言

---

①本文为1982年8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如山西方言、福建方言等声韵系统的研究，都是这次讨论会所关心的问题，在研究的方法上也在推陈出新，或以今证古，或参照别族的语言互相印证，并且由材料的整理提升到探讨理论。所有这些，都说明两年来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就思想认识方面来说，我们对音韵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我们从事语言教育、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从事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得更加明确。我们还要把我们研究的成果去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在世界语言学的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阅读论文和讨论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少收获。会上发言踊跃，互相启发，既谈论材料，也谈论观点方法，有发问，有答辩，老中青济济一堂，各抒己见，气氛融洽，然而还不能说人人皆满意而去，大有言犹未尽，欲罢不能之感。现在为时间所限，大家不得不分手，东出函关，南出武关，西出散关，北出萧关，打马就道，拱手告别，来年相会。

对于汉语音韵学的研究，范围既广，方术多门。从这次的讨论会中我体会到有几点值得我们共勉的：

1. 历史音韵的研究要与现代方言相互证发。古人说，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前人重视古音的研究，而对现代方音重视不足。古人去我已远，只能就文字材料来论列。而今日的方言就在耳边，我们知道的还很少。不大力从事方言的研究，就不能说明古今的音转和音变。许多语言的演变规律、就蕴藏在方言之中。此其一。

2. 研究汉语音韵不能不藉助现代的普通语言学。一个是语音学（Phonetics），一个是历史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的传统音韵学在历史上都藉助于外来的语音知识而获得发展。反切的兴起，等韵字母的建立都与梵文悉昙东渐有关。前秦鸠摩罗什、唐代智广、宋代惟净都有关于悉昙方面的著作。19 世纪的语音学对我们研究音韵影响更大。现代外国关

于语言的研究日新月异，这些都值得我们注意。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在国外已成为一门显学，我们多多注意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作为研究汉语历史音韵的借鉴。有借鉴跟没有借鉴，成就迥乎不同。此其二。

3. 语言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研究语言的人不能不重视语言与历史的关系。许多语言的事实往往与当时的历史有连带的关系。抛开历史而不顾，有些结论就不可靠，有些问题也说不清。例如方言的融合就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与活动有关。不把那些情况弄清楚，就难以讲得透彻。此其三。

4. 研究音韵应与文字的研究、语词的研究相联系。文字、音韵、训诂前人都属于“小学”之内。文字的材料，训诂的材料，还有有关语音方音的记载，如笔记、小说、方言志书等我们都应当顾及到。研究古音韵的人不能不懂古文字。前代的字书、训诂书、古书的注释都不容忽视。此其四。

当然，要注意的方面还有，无庸多谈。以上只是就从讨论会中体会到值得综合一下提出来说的。我自己知道的很有限，我没有能多听各位的发言，可是我读了各位的论文，获益很多。回去以后，还要好好地读，有机会还要向大家请教。对于年轻的朋友勇于提出问题，用心钻研，并写成论文在此宣读，深表敬意。

最后，敬祝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有更多更大的成就，旅途顺适，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广韵》略说①

《广韵》为北宋真宗时陈彭年、丘雍等人所修，这是一部韵书，而兼有字书之用，从中可以检查到隋唐时代字的读音和相传的训解，对阅读古籍和理解古代的声韵都很有用处。

韵书是按字的读音来编排文字的。自魏晋时期开始有了韵书以后，到南北朝时期增多。北方作者以洛阳音为主，南方作者以金陵（南京）音为主，都按平上去入四声分韵。所谓“韵”，就是字音的韵母，如 a，ai，an，ian，eng，ing 之类。南北方音既有不同，南北的韵书分韵也不完全一致。到隋朝陆法言作《切韵》，斟酌南北，参照传统的书音，分别四声，共分 193 韵。凡诸字字音的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的都归为一韵。如：

1. 麻，加　　　-a，-ia（今音，下同）
2. 埋，怀　　　-ai，-uai
3. 长，杨　　　-ang，-iang
4. 仙，泉　　　-ian，-iuan（üan）

这四类就分为四韵。

陆法言分韵是很精细的。有些音在今音是不分的，如“鱼”与“虞”、“先”与“仙”，现在大多数地区的读音都相同，可是《切韵》都分为两韵；这跟陆法言所根据的当时各地的实际语音和传统

①本文写于 1983 年 5 月。载于《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7 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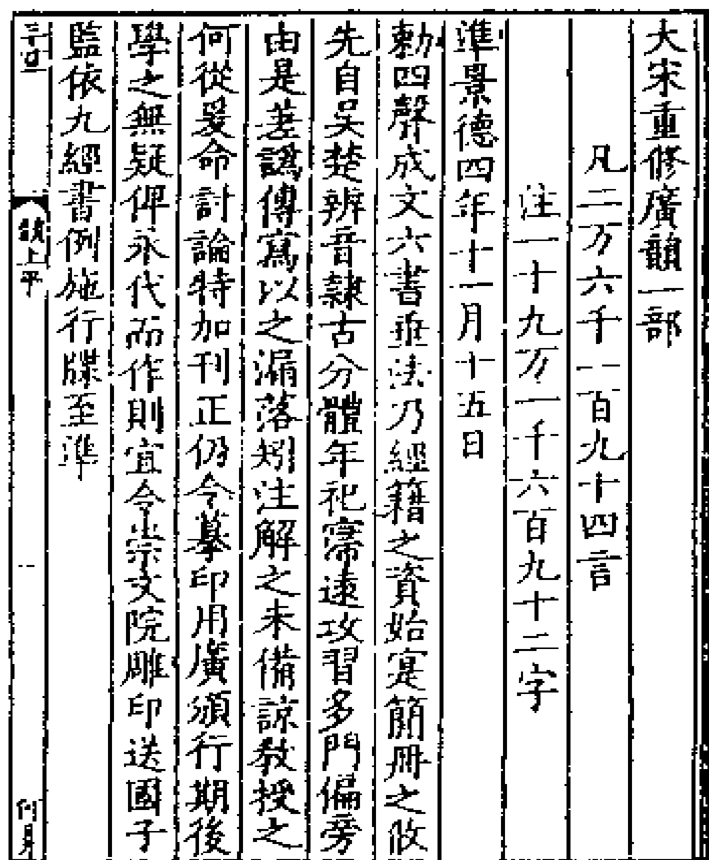
的读书音有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古今音韵有不同。陆法言编定《切韵》的旨趣是与其粗，不如细。可以说，在当时南北语音有分的一律分，重分而不重合。尽管有的方言不与《切韵》音完全相同，但大类相近。这样，用的人可以自己取舍，能分的，既跟《切韵》一样，那么用起来自然称便；不能分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方音合并。因此《切韵》到了唐代大为流行。唐代科举考试作诗、作赋，礼部就以《切韵》作押韵的准则，不过小有并合而已。

《切韵》中一韵之内的字按照不同的声母分别排列。凡是声母相同的字都列在一起，称为一“小韵”，或称为“一纽”。“纽”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同属于一个声母的意思。如真、轸、震、质四声虽不同，而声母相同，总归一纽。每一小韵都在第一个字下注出反切，同一小韵的字，读音都相同。如《切韵》“东”韵内“同”字下注“徒红反”，其下“童僮铜桐”等字都与“同”同音；“公”字下注“古红反”，其下“功工蚣疘”等字都与“公”同音。如果一个韵里包含两个韵母，声母虽同而韵母不同，也就分为两个“小韵”，或者说分为两“纽”。例如《切韵》“寒”韵内“干”音“古寒反”，其下“乾竿肝玕”同音，同在“寒”韵又有“官”音“古丸反”，其下“莞棺观冠”同音。两者声母虽同，而韵母不同，所以分为两纽。声韵的条理秩然不紊。这样，读者要检一个字就按照字音的声调、韵部去检查。

陆法言的《切韵》在唐代虽然流行很广，可是收字不够多，注解也稀疏不完备，于是就有人相继为之增补。韵部有增加，异体俗字也不断增多，训释更是日趋繁复。如孙愐《唐韵》每字下除一般义训外，兼采百家杂说，并及姓氏郡望。这样一来，韵书的功用增广，既可用来查字辨音，又可考求字义，还能寻按故实，几乎成为极其有用的字典、辞典。到了五代的时候，雕板渐兴，书籍由抄写转为印刷，得书比较容易，韵书也就成为一般日常备用的书籍了。

宋代的《广韵》即承袭唐代晚期的增字加注本的《切韵》而

来。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五代时期的刻本《切韵》残叶，跟《广韵》很相近。宋真宗景德年间因举人用韵多异，所以命陈彭年、丘雍等参照唐代旧本诸家《切韵》重加刊正。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崇文院上校定《切韵》五卷，大中祥符元年六月改称《大宋重修广韵》。


大宋重修廣韻一部
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
注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
準景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勅四聲成文六書垂法乃經籍之資始寔簡冊之攸
先自吴楚辨音隸古分體年祀寖遠攻習多門偏旁
由是差譌傳寫以之漏落矧注解之未備諒教授之
何從爰命討論特加刊正仍令摹印用廣頒行期後
學之無疑俾永代而作則宜令崇文院雕印送國子
監依九經書例施行牒至準

《广韵》五卷，平声字多，分上下两卷，上去入各一卷。编纂体例与《切韵》相同，不过分韵多至 206 韵。卷首题“陆法言撰本，长孙讷言笺注”，并博采郭知玄、关亮、薛峋、王仁昫、祝尚丘、孙愐等诸家书悉载卷中。全书共收字 26 194，注文 19 1692。这部书是我们今日所见注释最繁富的一种早期韵书了。

《广韵》有两种不同的刻本，一种是详注本，一种是略注本。详注本为宋刻本，略注本为元刻本。两者清代都有翻刻本。略注本用处不大。近代影印的都是详注本。现在通常应用的详注本有清张士俊泽存堂刻本和黎庶昌所刻《古逸丛书》本。另外还有《四部丛刊》影印南宋间所刻巾箱本和 198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南宋

黄三八郎书铺所刻的《巨宋广韵》本。张氏泽存堂本《广韵》板得自毛氏汲古阁而增补其所缺，刻印极精，但书中颇有讹误，本人旧著《广韵校本》一书，附有校勘记，可以参看①。

《广韵》的用处很多，我们可以藉此考查字的古音古义，诚然是一部好书。从音韵方面来说，《广韵》既因承《切韵》而来，其声韵的类别所代表的就是中古音的系统。前人曾借重《广韵》以考证周秦古音，说明上古音与中古音的异同和历史发展过程。近人从事方音的比较研究，也往往需借用《广韵》的声韵系统来做方音之间声韵调的对比，说明其异同。再如我们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声韵上的问题，须翻检韵书。下面简单地举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几个句子来看。

>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
>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
>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

上面字旁加点的都是入韵的字，但是我们读起来不都叶韵。检查韵书，"月"与"发"是同韵的入声字；"思"在韵书里有去声一音，音"伺"；"画"与"帛、白"都是入声字，"帛、白"同音，"画"字不音 huà，而音"获"。在白居易的口里念来都应当是谐和的。这就是古今音有不同。我们看了韵书才能明白。又如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

>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

①《广韵校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8 年出版。中华书局 1960 年据商务版重印。中华书局 1988 年重印出版，新附索引。

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平仄相对是有规律的。其中“独”字、“薄”字北京音阳平，而韵书都是入声字。“天涯”的“涯”今音念 yá，与上面的“悲、时、知”都不谐，可是韵书中涯字又音 yí，与“宜、仪”等字同音。念 yí 就叶韵了。

还有，说普通话的人口里没有入声，遇到古入声字就很难分辨，不能不看韵书。例如“德活独合阁夺席节”等字普通话都读阳平，“骨笔属匹曲辱铁”等字都读上声，“目鹿获月列客力”等字都读去声，跟韵书全不相同。推而广之，要了解古代的字音和古汉语的声韵系统都必须通晓《广韵》。不了解《广韵》，就无法理解古音。

从字义方面来说，《广韵》可以与《玉篇》并论。《玉篇》是梁顾野王所纂，宋代重修，名为《大广益会玉篇》，是《说文》以后按部首编排的一部字书，每字的训释大都出自梁代以前的古书；而《广韵》所出的字义有不少是后来出现的意义，并有很多后来的词汇，可以补充《玉篇》。因此，《广韵》对我们研究词汇和训诂都同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要能利用《广韵》，最重要的事是要理解《广韵》的声韵类别，并了解《广韵》的声韵部类跟自己口里读音的异同。《广韵》206 韵，平声分 57 韵，上声 55 韵，去声 60 韵，入声 34 韵，虽分载在五卷书里，而四声的韵目是相承的。例如：

A. 东董送屋　钟肿用烛　江讲绛觉　真轸震质　文吻问物
寒旱翰曷　阳养漾药　唐荡宕铎　登等嶝德　盐琰艳叶
添忝㮇怗　凡范梵乏

B. 之止志　微尾未　模姥暮　咍海代　宵小笑　豪晧号　麻马祃　侯厚候

上面 A 类一些例子四声具备，B 类一些例子有平上去三声，而没有相承的入声。

至于书中韵目排列的次第则是分组序列。凡声音相近的列为一组。以平声57韵为例，可略分为12组：

1. 东冬钟江 2. 支脂之微 3. 鱼虞模 4. 齐佳皆灰咍 5. 真谆臻文欣元魂痕 6. 寒桓删山先仙 7. 萧宵肴豪 8. 歌戈麻 9. 阳唐 10. 庚耕清青蒸登 11. 尤侯幽 12. 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这里像“江”韵、“齐”韵、“元”韵、“麻”韵等的归类以今音来看似乎不妥，实际是古今音有不同。《广韵》中上声、去声的韵目排列的次第是跟平声相应的，只是“冬”韵、“臻”韵以字少没有上声韵目，所以有55韵。去声韵目里“臻”韵的去声没有韵目，另外增多了“祭泰夬废”四韵，所以去声有六十韵。“祭泰夬废”四韵没有相承的平声和上声，它是由古代的入声变来的。

从四声分韵的总体来看，《广韵》所分的韵部可以说相当精细。陆法言《切韵序》曾说：“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唐代考试用《切韵》，已经准许一部分窄韵合用。到宋代，考试改用《广韵》，又有归并。现在《广韵》韵目下或注“独用”，或注“某同用”，即是为考试而设。但是一韵之内所包括的韵母有一类的，也有两类的，少数韵也还有三类或四类的。如：

支韵：移，为；　齐韵：鸡，圭；　皆韵：皆，乖；　元韵：言，袁；　先韵：前，涓；　阳韵：良，王；　麻韵：巴，斜，瓜；　庚韵：庚，京，宏，兄。

其中有两类的，在《广韵》音里大都是一类韵母是没有 u 介音的，一类是有 u 介音的。前者称“开口”，后者称“合口”。像麻韵的“巴斜瓜”三类，就是 a，ia，ua。庚韵的“庚京宏兄”四类，就近似 eng，ieng，ueng，iueng。这样细分起来，韵类就多了。二百零六韵依据反切的注音来定也就有 324 类了。由此可见《广韵》辨韵分类之细。

《广韵》注音一律用“反切”。一字两音的，则注“又某某切”。

反切的上字表“声”，下字表“韵”。根据下字，我们可以辨别韵类；根据上字，我们可以辨别“声类”。“韵类”上面已经说过了，“声类”经过前人研究，确定有41类。下面采用宋人所定的字母名称来表示：

帮滂并明　　照穿床审禅日

非敷奉微　　照（庄）穿（初）床（崇）审（山）

端透定泥来　　见溪群疑

知彻澄娘　　晓匣影喻喻（于）

精清从心邪

宋人所定字母只有36母，但《广韵》中“照穿床审喻”五母各有两类，所以共有41类。“照穿床审”的另一类可以称为“庄初崇山”，“喻”母的另一类可以称为“于”。

以上所说就是《广韵》这部书的声韵类别。它既然是承袭陆法言《切韵》而来的，那也就是隋代以前中古音的声韵系统。但是从唐宋以后语音不断有改变，声韵的部类也随之逐渐由多变少，现代各地的语音已经跟《广韵》大不相同了。为了便于了解《广韵》的声韵系统，本人编有《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一书，依照原书的韵次，四声相对照，注出各部每纽的今音，可资参考①。

最后，还要讲到与利用《广韵》有关的一部重要著作，那就是《广韵声系》。这部书是沈兼士先生所编，刘文兴、葛信益等人襄助而成。沈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广韵声系》这部书是把《广韵》原书所收的文字依照谐声的系统排列，在全书所出现的谐声声旁中举其最初的声符按四十一声类重编，每一声类序列《广韵》中声母相同的主谐字下所有的谐声字，每一字下都照录《广韵》原书的反切和义训，同时还在本字的旁边注出它的声韵部类和开合等第。纲举目张，条理统序，类似清人所作的《说文谐

①编者按：中华书局1980年9月出版，1983年8月第二次印刷。

声谱》。不过，清人所作的《说文谐声谱》是以古韵部为纲的，《广韵声系》乃是以声类为纲，别具一格。根据这样的排法，我们可以从谐声的关系上研究古声母的类别和读音，还可以就同在一个声母下的谐声字做综合比较，研究其有关文字、语词的发展以及音义联属的关系。这是一部《广韵》改编本，很有用处。书末附有索引，颇便检查①。

---

① 编者按：辅仁大学194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6年据原稿出版影印本，附索引。

我和《广韵》[①]

《广韵》是北宋真宗时陈彭年、丘雍等奉敕纂修的一部韵书，是我们研究汉语历史音韵和考证古代文字音义的重要书籍。说到汉语历史音韵，现代学者都把《广韵》做为中古音的代表，因为它是承袭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和唐孙愐《唐韵》一系的韵书来的。我们研究隋唐以前上至先秦的古音要用它，研究唐宋以后的近代音和现代的方音也要用它，所以说是一部重要的书籍。不过，其中讹字脱文很多，这里只谈我以前是怎样校勘《广韵》的。

《广韵》全书收有 26 194 字、依四声编排、分为五卷，共有 206 韵。刻本有详注本和略注本两类。详注本有北宋国子监刻本，有南宋国子监刻本，两者差异很少，只是刊工姓名不同，这两种宋刻原本流传甚希。略注本有元泰定间刊本，见清代黎庶昌所刻的《古逸丛书》；又有明清间顾炎武翻刻的明经厂本，两者仅节取《广韵》详注本中的简单训释，不及其他，所以我称之为略注本。

现在我们通常应用的《广韵》是清张士俊《泽存堂五种》内重刻的《宋本广韵》和黎庶昌《古逸丛书》内的覆宋本。这两种都是详注本。此外，还有两种详注本：一种是清代曹寅所刻的《楝亭五种》本，惟入声注不全，而且原印本流传极少；另一种是《四部丛刊》内影印的南宋刊的巾箱本，这些详注本究竟哪一种最好，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得明白的，只有全面做过比勘，才能明其究竟如何。

---

①本文写于 1989 年 11 月 15 日。载于《书品》（中华书局）1989 年 4 期。

1936年春我将在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受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校一定本，于是首先聚集各种板本，承北京图书馆善本藏书室主任、著名的古典文献专家赵万里先生惠借傅增湘双鉴楼所藏北宋本和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北宋本照片。双鉴楼本缺二、五两卷。赵先生又借予王国维所临清黄丕烈过录的段玉裁校本和王先生用巾箱本校的泽存堂本。另外还有上海涵芬楼所藏景写南宋本和楝亭五种本。这些都是难得看到的材料。加上我手边已有的张氏泽存堂初印本和剜改本，黎庶昌《古逸丛书》本，以及元泰定本和明经厂本，已达10种之多。这10种都要往复一一对校，辨别异同，才好定其是非。

这自然是一项勤苦而又必须有耐心的工作。经过全面对校之后，得知泽存堂本和《古逸丛书》本都是出自南宋监本，刊工姓名全与北宋本不同。其次得知南北监本错字都不少，张士俊泽存堂本已做了不少校正，是其长处。但是也有原本不误，而张氏改错了的，甚且还有非原本所有，而为张氏增加出来的，不经校对，无从知晓，这是泽存堂本的短处。黎刻《古逸丛书》本照监本覆刻，本当存其原貌，但他又偏偏按张本改订，张本对的，固无论，张本错的，照搬过来，反成过失。《四部丛刊》本也是出自监本，不过错误较少，也许经过校订。《楝亭五种》本则与《四部丛刊》本相近。至于上面所说的略注本虽然注解少，可是可以改正详注本的地方还是很多，未可弃置不问。

校勘《广韵》，单靠这些刻本还不够，因为《广韵》是依据由唐代流传下来的《切韵》《唐韵》系统的韵书加以纂修的，校勘《广韵》应当尽量应用所能见到的唐代的《切韵》和《唐韵》的写本。

1936年那时我能见到的唐五代时期的韵书已有20种之多，那是非常幸运的。20种之中，有的是残本，有的是残叶，即使是一叶，也是吉光片羽，可供校勘之用。其中属于国内所有的，有《唐

韵》残卷，为清末蒋斧所藏，上海神州国光社曾影印出版。又有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有北京海王村公园内延光室摄影本。另外，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中收有孙愐《唐韵序》一种。20种之中散落于国外的计有17种。其出于敦煌石室的，被英国斯坦因劫去的有《切韵》残卷3种，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有王国维摹本；其被法国伯希和劫去的有9种，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9种之中，除刘复所编《敦煌掇琐》内所刊出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唐韵序》两种以外，另有写本《切韵》残叶和五代刻本韵书7种。在此之外，还有德国列考克在吐鲁番获得的刻本韵书残叶两种，又有日本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图谱》所收录得自吐峪沟的写本《切韵》残片一种。连同国内流传的共20种。

应用这些唐本韵书与《广韵》对校，得到的认识是：陈彭年、丘雍等纂修《广韵》，体例一仍唐本之旧，他们所根据的底本就是唐五代间流传很广的《唐韵》一系的韵书。陆法言《切韵》为193韵，自孙愐《唐韵》把真韵系、寒韵系、歌韵系的合口字分出，增多谆准稕术、桓缓换末、戈果过诸韵以后，则多出11韵。共为204韵。《广韵》所以为206韵，当本于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平声"严"韵系多上去二声韵目，因而为206韵。这是从分韵上可以得知《广韵》所根据的底本是《唐韵》一系的韵书。其次，再从反切上来看，《广韵》的反切与陆法言《切韵》和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都不同，而多同于蒋斧本《唐韵》，但又不是全同。那么，陈彭年等所根据的底本当是另一种《唐韵》系统的韵书。

有了上述这些唐五代的韵书的写本或刻本，在校勘上就有了更多的凭仗，按韵检查，可以刊正《广韵》的讹字脱文，有想不到的收获。

我在进行校勘的时候，先以张氏泽存堂初印本作为底本，与其他宋本和元明两代的刻本对校，凡有不同，都记在泽存堂本的书眉

上。这是一道工夫。然后另取一本泽存堂本与上述的20种唐五代韵书对校，同样把不同处记在书眉上，这又是一道工夫。有了这两个校本作基础，然后进行一字一行的校定。举凡文字的形体，反切的注音、注释的文句都一一审核，刊正谬误。凡版本上不能解决的，自然要去检书定其是非。经常要查阅经史子集诸部书籍的原文和旧注以及手边最常用的字书、韵书和训诂书。如《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玉篇》《经典释文》《集韵》《新撰字镜》《篆隶万象名义》等书。凡是有校改，如误字、脱文、衍文，都书于泽存堂初印本书眉上，并按《广韵》卷次、韵部、叶数的次第写成校勘记。凡有不知，只有阙疑，不敢妄下雌黄。在校勘记中引及段玉裁校本的地方一并查出根据，加以补充，使其说信而有征。段氏所校，大抵本于经传旧注和《说文》《集韵》等书。段氏学术的线路是可以摸索得到的。

我在校勘当中，改正原书错字1712字，增补脱文195字，删去衍文70字，共校正讹误1987处。此外，我还进一步校订了"又音"。《广韵》中字下有的又音，该字有在所指的音韵地位出现的，也有不见于某韵某纽之下的。还有当见于某韵某纽之下而不见，反而别见于邻韵某纽之下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由于所根据的韵书本身有差错，也可能是又音的记载的来源不同，其见于邻韵的就是这里所指的又音。参差错迕，很难确定。现在处理的办法是：凡本书缺载的都在当出的韵部书眉上注出；凡见于邻近他韵的，都在校记中去说明，不在书眉上加注。意思是某韵下所出的又音也许就指的是邻近某韵字的读音，因为疑惑不明，所以不与本书不载的又音情况同样处理。有人不知道，也以为是本书失载，影印我的校本，另加补出，是不能深刻理解韵书在编纂传抄中存留的问题，师心自用，不免有蛇足之诮。

《广韵校本》和《校勘记》五卷是相对照的。从开始着手进行，经过校订、摘录，最后写定《校本》，并写出3477条校记清本，

用了一年的时间，努力以赴，终抵于成。1937 年完工之后，1938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即以本书清本在香港用玻璃版付印，1939 年出版。1949 年以后，台湾有影印本。1960 年上海商务印刷厂第 2 次影印，由北京中华书局出书。此事已隔 29 年，中华书局于去年① 又据商务版重印，以供应读者需要，并由周土琦作索引一编，附于书后，以便检索。

《广韵校本》在当年写定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唐写本韵书在中国无法看到。还有日本涩江全善和森立之编的《经籍访古志》著录的有南宋闽中建宁府黄八三郎书铺印行的《巨宋广韵》，只知其名，无从见到原书或书影，深感遗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1 年印行的上海图书馆的藏本了，与张氏泽存堂本对校，颇有异同，详见本人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今不具论。

在校勘中我所见到的《广韵》的讹误，可以综合为以下几点：

论形体：有因承唐本俗体，字体不正，与声韵不相合的；有本来不是一个字，形义都不合而误合为一个字的；有两个字，音义相同，本来是一个字，因其中之一为讹体，遂误分为两个字的；还有某字的或体误置于另一字之下的。

论声音：有反切或又音有误字的；有一字出现讹体，而别为讹体设立一音，增入别韵的；有因纂集时根据的旧音反切有误，而别出一音的；有抄写错行，音有不合的；有字音与谐声不合，纂集有误的。

论义训：有一纽之内上下二字相连，下字脱夺，其注文窜属于上字的；有形与音都不误，而义训错乱的；有承袭前代字书之误，而把两个字的解释合并在一个字之下的；还有《广韵》所注与古书的义训不合的。

论引书：有书名引错的；有引文中脱落文字的；有引某书注仅

---

① 编者按：指 1988 年。

举书名，不言某书注的。

《广韵》所以有这些错误，主要是所根据的底本有误，陈彭年、丘雍等草率了事，以致以讹传讹。另一种原因是雕刻时出现的错误。像《广韵》这样一部书包容了在古书里所见到的字和隋唐时期民间流行的俗体，字的注释又极为繁富，要把其中讹误都改正，不能不下功夫。《广韵校本》和《广韵校勘记》已经是五十多年前所作，其中不无缺误。1939 年也曾作《校勘记补遗》数十条，附于书后，但仍有不备。读者可以根据上面所举的一些要点寻案原书，参考古籍旧注，当有更多的发现。

中国古代诗歌的比兴和想象[①]

中国古代诗歌极为丰富，从《诗经》《楚辞》以后，不同时代的民歌和五言、七言、古诗、律诗以及词曲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多彩的。这跟民族历史的悠久，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这些古代的宝贵的文学遗产表现出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才能。诗歌、艺术、音乐、舞蹈都起自民间。人民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优美的文学作品，文人承袭了优秀的传统而又有所创造、发展。从古代诗歌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各方面的知识。

从诗歌本身做为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形式来说，既有不同的格调、音律和句式，而又在艺术表达上要求精练、美妙，具有感染力，“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钟嵘《诗品》），所以作家在表达思想情感方面就应用了种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不同的作品给人的观感也就不同。有的兴会飚举，有的沈郁深挚，有的清新宛转，有的淋漓尽致，命意遣辞，各有所能。从观察事物的敏锐、描绘情状的精巧、想象的丰富深刻来说，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很多。为了取得借鉴，我们自然要取其精华，弃其糟

①本文写于1978年9月。载于1985年10月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三六册。

粕，这是无庸多说的。

前人论诗、论词的“诗话”“词话”虽多，但是专从某一方面或者某一角度进行综合探索，阐发一个问题的不多，大都零散，不成系统。现在只就古代诗歌中的比兴和想象举一些例子作为讨论的资料，说明古代诗人怎样因受外界事物的感发以表现内心活动的境界。这不单纯是一个修辞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学上的理论问题。

比兴始见于《毛诗》大序。诗有六义：风、赋、比、兴、雅、颂。郑众《周礼·大师》注认为“比方于物曰比，托事于物曰兴”。“兴”就是兴起的意思。“比”就是以彼方此的意思。

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又说：“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少，取类也大。”他认为“比显而兴隐”，比是以事物相比附，兴是借物以讽喻。这是受了《毛诗》小序的影响，以为《诗经》每章都有微言大义，开头的话都是一种有所托喻之辞。其实并非如此。古今民歌起句往往就眼前所见外物而兴咏，不存在什么深义。例如《诗经·王风·黍离》：

>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我们不能说开头两句有托讽的意味。但是唐人却受刘勰的影响，把“比兴”指为诗有讽喻，这是不恰当的。（杜甫如此，白居易、元稹更是如此）“比兴”合为一个词，比与兴的意义就有了改变。

我们认为“比”是以事物相比，用来说明作者自己的认识和思想感情的。兴是言别的事物引起自己要说的话。两者都是诗歌方面表现的方法。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释比兴义称：“索物以记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这说明无论是“比”，还是“兴”，表现在诗人的作品中都与外界的事物相

联系，而诗人内心的联想和想象都是以外界的事物为基础的。

比兴在古代诗歌里应用很广泛。就“兴”来说，主要有三种情形：

（一）因物而兴感。如：

谢灵运《登池上楼》：“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杜甫《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二）借物以抒情。如：

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刘禹锡《竹枝词》：“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为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周邦彦《点绛唇》：“今日原头，黄叶飞成阵，知人闷，故来相趁，共结临歧恨。”

秦观《踏莎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穷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三）怀古而兴叹。如：

许浑《金陵怀古》：“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杜牧《乐游原》：“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就“比”来说，诗歌中有种种比方。《文心雕龙》“比兴”篇曾

说："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刘勰所说的"心"也就是情感。比的应用见于诗歌的可以列为以下几项：

（一）以物比物的颜色或形状。如：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柳宗元《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

苏轼《浣溪沙》："雨脚半收檐断线，雪林初下瓦疏珠，归来冰颗乱粘须。"

（二）以事物比声音。如：

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三）以物比事。如：

屈原《离骚》："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杜甫《旅夜书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州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苏轼《水龙吟》（和章质夫咏柳絮）："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四）借事物以喻情感。如：

杜甫《喜达行在所》："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

当落日，心死著寒灰。”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贺铸《青玉案》：“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周邦彦《玉楼春》：“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

（五）以物比拟作人。如：

杜甫《宿府》：“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李白《劳劳亭》（在江宁）：“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白居易《三月二十八日赠周判官》：“一春惆怅残三日，醉问周郎忆得无？柳絮送人莺劝酒，去年今日别东都。”

贺铸《踏莎行》：“急雨收春，斜风约水，浮红涨绿鱼文起。年年游子惜余春，春归不解招游子。”

（六）比衬以见意。如：

刘皂（一说贾岛）《旅次朔方》：“客舍并州已（数）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似故乡。”

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陆游《宿武连县驿》：“宦情薄似秋蝉翼，乡思多于春茧丝。”

又《烧香》：“千里一身凫泛泛，十年万事海茫茫。”

（七）正比。如：

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

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八）反比。如：

《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楚辞·九歌·湘君》：“桂櫂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至于想象则超脱于比兴，扩展于现实，而出之于联想或虚构。姑举两种情况为例：

（一）想象出于推测和联想。如：

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李商隐《无题》：“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又《筹笔驿》（在四川广元县北）：“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韩翃《送客水路归陕》：“相风竿影晓来斜，渭水东流去不赊。枕上未醒秦地酒，舟前已见陕人家。春桥杨柳应齐叶，古县棠梨已作花。好是吾贤佳赏地，行逢三月会连沙。”

又《送孙革及第东归》：“过淮芳草歇，千里又东归，野水吴山出，家林越鸟飞。荷香随去棹，梅雨点行衣，无数沧洲客，如君达者稀。”

陆游《秋思》：“中原形胜关何在，列圣忧勤德泽深。遥想遗民垂泪处，大梁城阙又秋砧。”

（二）想象源于神话

杜甫《祠南夕望》(湘夫人祠)："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

李贺《李凭箜篌引》(比拟乐音)："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苏轼《渔家傲》(金陵赏心亭送王胜之龙图。王守金陵，视事一日移南郡)："公驾飞车凌彩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

想象的产生必然跟外物的引发有联系，脱离外物就无从构成想象。物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兴是因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是因此物、此事而联想到其他相似的事物以相比拟，想象则就感官所接触的事物或情景根据时间地点进一步设喻、推想，以至于虚构。这些都不能脱离形象而构思。例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形容月光"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姜夔《踏莎行》(江上感梦)"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都能因物以拟景，即景以抒情。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写梦中所见更极尽驰骋想象之能事，但不能不借助于自然的景物。

就"比"来说，也是想象的一方面。不过比喻总以近似为主，有时转入夸饰；"想象"可以超出现实，而转入一个新的境界，有时则不免以物拟人。这又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方法。诗人的联想力强，想象力也特别丰富。他们善于观察事物，体会物情，而又具有真挚深厚的感情，所以能把所见、所闻、所想的情节意境以及个人的感受和意愿，用优美的文辞，经过陶冶熔铸以出之。在艺术的技巧上，用比喻、夸饰、渲染、烘托等等手法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所以好的作品历久仍为人所传诵。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论诗主"妙悟"，称盛唐诗如羚羊挂角，如镜中花、水中月，无迹可求，清人王士祯《渔洋诗话》又标榜"神韵"，只从个人感受出发，而未能触及根本。近代王静安《人间

词话》又标举“境界”一词，指出情景交融，合乎自然，方为上乘。然则物象是情景交融的依据，一切比兴、想象都以外界事物为基础，而诗人独能善假于物，因物而构成联想，自联想而形成种种想象。王静安指出“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这话是对的。

编者按：

周祖谟先生不但对古典诗词颇有研究，而且其作品也当行出色，深得古人三昧，然世人罕有知之者，现选录几首，以见一斑。1978年10月《赴敦煌道中作》：“祁连岭峻堆冰雪，嘉峪关高见戍楼。古道逶迤随树转，山泉萦绕傍田流。沙平日暮风烟净，野旷天低禾黍稠。陇雁南征声唳唳，明驼载货去悠悠。”1986年4月16日《重游西安兴庆宫》：“花萼沉香迹已陈，美人箫管寂无闻。君王雅爱腰肢舞，空有风飘绿柳裙。”又有《浣溪沙》一首，伤年华之流逝，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花发春城入眼明，柳丝摇曳燕飞轻，几番尊酒话平生。　往事云烟空有恨，百年身世足堪惊，素笺何以寄深情。”1982年10月游西安作《浣溪沙·灞桥柳》：“古柳依依向晚晴，长条拂地舞轻盈，灞桥流水泛金星。　阅尽行人今古恨，望极烟草浅深情，路旁何处有长亭。”

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①

1932年我应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试题除作文一篇外，还有“对对子”一题，题目是“孙行者”。这个题目很新颖。我想，要做到符合题目的要求，必须是人名对人名，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当时我想到可以作对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引之”，一个是“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引”又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我就以“胡适之”为对。后来听说这个题目是陈寅恪先生所出。他对于以“胡适之”为对也颇赞赏。白君化文还特意在《燕都》（1989年1期）为文谈及。不过，胡先生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又是驰名中外的学者，我用他的名字对“孙行者”，未免对长者有不恭之嫌，所以不曾向人提起。考试一过，也就忘了。可是，我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听胡先生讲课的时候，心中却泛起往事来了，仿佛负疚很深似的，有点儿不好意思。

用对对子来测验考生对于中国语文的理解以前是没有这样做过的。寅恪先生为什么要出对对子的题目呢？这是一个问题。欣幸的是陈先生有《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专论此事。他说：

> 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有密切关系者，以

①本文载于《燕都》（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2期。

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时有所依据，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在今日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术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法。此方法去吾辈理想中之完善方法固甚辽远，但尚是诚意不欺，实事求是之一种办法。兹略分四条，说明如下：

（甲）对于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此理易解，不待多言。

（乙）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此节最关重要。声调高下与语言变迁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中国之韵文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竟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又中国古文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若读者不通平仄声调，则不知其文句起讫，故读古书，往往误解。

（丙）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若出一对子，中有专名或成语，而对者能以专名或成语对之，则此人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可以测知。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凡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路必贯通而有条理，故可藉以选拔高才之士。

这篇信曾发表于1932年9月5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今从周策纵先生《续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兼论对联与集句》一书中摘出，香港求自出版社1964年出版）。刘叔雅先生，名文典，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著有《淮南鸿烈集解》《三余札记》和《庄子补正》等书。他精通《文选》并在大学讲授骈俪文。据我所知，他同陈先生交谊甚厚，家住城内沙滩蒙福禄馆（闷葫芦罐）一号，所以陈先生寄信给他，同他谈论用对对子的办法考新生。

从信中所说，我们可以领会到陈先生是从汉语和汉字的特有性质出发来看待对对子的功能，认为它是测验考生的学识和才能的较

好的办法。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每一个汉字是一个音节，都有其声调，而且是形音义三者结合的整体。陈先生以对对子考新生，虽然没有说考中国文法，但提出论字的虚实，实际也是在测验考生对于词的语义文法范畴的理解和应用，寓义甚深。

寅恪先生对于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特别重视，因为声调的抑扬高下是构成汉语书面语的音律美的固有的条件，不能分平仄，就不能欣赏诗歌韵语和美术性的散文。所谓美术性的散文即指骈俪的文章而言。但是为文注意平仄声调的更迭在古书里所在多有，来源甚古。例如《国语·周语》说：

>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

这一段文字说周宣王即位之后不重农事，不亲耕劝农，忽略农为国本，所以虢文公指出他的错误，说明农事之重要。文中农、生、兴、成都是平声，出、在、始都是仄声，平仄互相更迭，音调自然悦耳。如果不了解平仄，那就很难领略作者的用心，其中用词之美妙处也就无从欣赏了。所以陈先生设想用对对子的办法测验考生对汉语具有声调的特性是否理解，能否在对对子上分辨平仄，确是一种好办法。

至于用对对子的办法测验应试者读书的多少，语汇是否丰富以及思想有无条理，这就要用对长对子的方法来考验了。周策纵先生说："对子可以测验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又说："除了知识测验的作用之外，更可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从这里流露出来。"足见对联、楹联的形式虽然简单，却能表露出作者才思、情趣的丰富。

陈先生提出以对对子为一小题测验考生的才能正体现了汉语的文学特性。在 1932 年的时候，有关汉语文法的书籍还不多，所以

他有“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的话，准备从对对子上来考验应试者对于文法的理解。现在有关汉语文法的书籍已经很多了，考试已经有了许多新的方法，自然不需要再用对对子的方法了。因为白君化文谈及往事，大家不一定都理解陈先生为什么用对对子的方法来考试学生，而又特别以“孙行者”为题，其中到底是什么缘故，所以举出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明其用意所在，也算是为白君的文章加上一个脚注。